

马杰伟 张潇潇 著
陈韬文 图

後
人
子
出
版
社

媒体现代

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MEDIATED MODERNITY

a dialogue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theories

马杰伟 长萧萧 著
陈韬文 图

媒体现代

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MEDIATED MODERNITY

a dialogue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theories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马杰伟、张潇潇著,陈韬文图.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7-309-08278-4

I. 媒… II. ①马…②张…③陈… III. 传播学:社会学-研究 IV. G2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4216 号

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马杰伟 张潇潇 著 陈韬文 图
责任编辑/陈 军 卢 茗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5 字数 231 千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278-4/G·1001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寻找传播学的社会学视野

有感于传播学在社会理论方面的不足，我于 2005 年起为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生开了一门社会理论课，要求学生每周阅读一本英文社会学专著，并对传播学作出反思。经过多年努力，其间夹杂沉重的阅读压力及由此而生的豁然开朗的体验。2011 年我与青年学者张潇潇把思考的过程整理成这本《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张潇潇 2008 年入学，先后两年一修再修我讲授的这门课程，并与我合著书稿，展现青年学者的毅力、恒心与锐见。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华语传播学社群，采取对话的笔调而舍拘谨的理论书写，目的在于营造探索与对话的气氛。顾名思义，本书强调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主要线索在于分析传统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宏观变化，把传播议题安置其中并作理论推敲。核心概念是“现代性”的特征与轨迹。全书共九章，重点分析十本重要理论著作及十多位社会理论家，最后一章综合各家之言，并推出“媒体现代”的理论构想，力图对前人作出修正与开拓，为传播学与社会学筑起对话的桥梁。

本书由吾师陈韬文教授担任“视觉作者”。他以图像为言、视觉为语，展现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媒体的理论思考。此一实验性的表述，旨在打开认知反思、美学反思、学术分析与艺术演绎的相互促进。谨以此书献给新一代的传播学人，并期待学友同仁作出更深更广的理论拓展。

马杰伟

目 录

序：寻找传播学的社会学视野 / 1

第一编 第一现代

- 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源起与论述 / 7
- 第二章 第一现代：特征、影响与诠释 / 43
- 第三章 媒介化的现代性与社会机构 / 83

第二编 第二现代

- 第四章 个人化：机构化的个人主义 / 117
- 第五章 液态现代与社会变迁 / 147
- 第六章 媒介事件与现代社会 / 181
- 第七章 符号经济与创意产业 / 211
- 第八章 网路社会与传播权力 / 241

2 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第三编 媒体现代

第九章 “媒体现代”理论初探 / 267

参考文献 / 289

后记 / 306

第一编 第一现代



现代社会缘起historical materialism阶级分析division of labour功能学说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劳动分工interpretive sociology
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实证主义Max Weber诠释主义Emile Durkheim工具理性Karl Marx



现代社会兴起historical materialism阶级分析division of labour功能学说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劳动分工interpretive sociology
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实证主义Max Weber诠释主义Emile Durkheim工具理性Karl Marx



现代社会兴起historical materialism阶级分析division of labour功能学说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劳动分工interpretive sociology
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实证主义Max Weber诠释主义Emile Durkheim工具理性Karl Marx

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源起与论述

我们在阅读社会学理论时常会看到“现代性”(modernity)这个关键词,它所指向的是怎样一种社会状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常会说,这是一所现代都市;或者会用“现代”(modern)的谐音“摩登”来形容一个时髦的人;中国以前提出过四个“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些都是与现代性有关的概念。

这本书力图系统讲述的就是现代性这个概念:现代性的源起、特征、发展历程,以及跟我们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关系。与现代相对的是传统,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国家有多传统,又有多现代?现代与传统的优与劣各是怎样?这本书在全面梳理有关现代性重要著作的过程中,会逐步明晰我们的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这个过程。这本书主要是写给传播学研究者的,所以在分析过程中特别注重媒体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角色。

那么首先我们要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①写于1971年的一本

^① 吉登斯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乃现代性和全球化理论中的主导理论家之一,现被封为吉登斯男爵(Baron Giddens)。吉登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荣休教授,之前是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学术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对经典社会学理论(转下页)

著作谈起,即《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分析》(*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在此书当中,吉登斯对马克思(Karl Marx)、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韦伯(Max Weber)的学说做了准确、全面的介绍和比较,是了解三人学说的最佳入门书籍。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对社会学和传播学有着深远影响,被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②兴起的论述,而这一兴起过程正是现代性概念讨论的起点。所以了解和理解他们对于“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的论述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作为现代社会学之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在学术上都很牛,但问题是太牛了。作为初学者,面对他们汗牛充栋的著述以及后人的评释,难免觉得无处下手。读着读着就开始觉得胸闷、气短,太阳穴阵阵发痛,却还是不大明白。那么,我们不妨从吉登斯这本书开始了解他们三人的思想。吉登斯这本导论的特点在于他对三人学术观点的忠实介绍、准确分析和全面比较,其行文轻松,易于读者理解和掌握。我

(接上页)的新诠释,代表作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分析》。第二阶段是对“结构理论”(the stucturation theory)的探讨,代表作是《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1979)以及《社会的建构:社会结构理论纲要》(*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1984)。第三阶段是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讨论,代表作为《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现代性与自我身份:晚现代时期的自我与社会》(*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1991)和《亲密关系的变迁:现代社会中的性、爱与欲》(*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1992)。吉登斯近年新作为《气候变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2009),讨论全球变暖给世界带来的挑战及各国政府的应对与角色。

② 在三位现代社会学之父中,马克思和韦伯都用“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这个名词,但涂尔干却没有采用这个词,他用的是“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虽然所用名词不同,但是三个人论述的都是现代性早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首先要准确理解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思想,然后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吉登斯对他们三人的比较。这种比较有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之间的两两比较。更重要的是,吉登斯视马克思为参照系,经常对照涂、韦二人与马克思的不同。

涂尔干^①和韦伯^②是同代人,而马克思^③是比他们早一代的社会学家。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流派大都可以追溯到他们三个人,比如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源自马克思;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可以追溯到涂尔干;而现象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则是可以追溯到韦伯(Giddens, 1971)。吉登斯不以批判性强为特色,他在书中特意强调自己在分析三人学说时并未采用批判的写法,而是解释和比较各人的理路,此外他经常纠正其他学者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思想的误读(Giddens, 1971, pp. vii-x)。

三位社会学奠基人的共通之处在于,从学术主题上来说都是研究现代社会的源起,认可人类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从学术视角来说,他们三人都属于宏大叙事,讨论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变迁过

① 涂尔干(1858—1917),法国人,当代社会学三位奠基人之一,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和结构功能主义者。涂尔干在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1984)、《社会学方法的规则》(*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 1982)、《自杀论》(*Suicide*, 1951)、《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1995)等。涂尔干的才华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围绕在他周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涂尔干的学术研究,其后他的儿子和很多学生死于战场,这对涂尔干造成了很大刺激。

② 韦伯(1864—1920),德国人,当代社会学三位奠基人之一,是诠释社会学的奠基人和反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其代表作是《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197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58)、《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1964)等。韦伯积极投身政治,对当时的德国政坛影响很大。

③ 马克思(1818—1883),德国人,当代社会学三位奠基人之一。也是哲学家、政治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等。他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其学说的核心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要代表作有《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 1956)、《德国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1970)、《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967)等。

程,指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但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在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上又存有根本分歧。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从历史分析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而涂尔干从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方法论出发,认为不同职业分工基础上的有机专门化(organic specialisation of cooperative occupational divisions)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韦伯也谈劳动分工,但是韦伯强调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劳动分工(the bureaucratized division of labour)才是社会基本结构,现代社会由此呈现“理性化”(rationalisation)特征(see Giddens, 1971)。三人的基本共识与分歧是我们在读《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需铭记在心的。另外,我们在理解三人思想时要跟他们所处社会历史的大环境联系起来,当时欧洲已经历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整个欧洲社会正处在剧烈变化当中,三位作者的祖国——德国及法国的具体情况也对他们的学说产生了影响。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

马克思是个出色的学者,才华横溢,影响深远。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金牛座,属虎。他穷其一生研究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1841年,马克思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德国耶拿大学审议,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教授审阅了他的论文后称赞他“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王德胜,2007),于是马克思没有经过答辩就得到了博士证书。那年马克思23岁。接下来我们将从哲学模式、社会模式、文化模式三个层面来了解马克思的主要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学说通常被分析家分为青年期和成熟期,吉登斯则致力于提供一个平衡和整体的解读。从渊源来说,英国的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 (French socialism) 和德国的黑格尔辩证法 (Hegelian dialectic) 都给马克思提供了学术营养。马克思继而结合与超越了黑格尔 (Hegel) 的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 (Feuerbach) 的唯物主义,从而建构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种结合与超越是马克思对学术的重大贡献 (Giddens, 1971, pp. xiv, 4)。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强调观念的重要性,认为思维和存在同一,客观存在是绝对观念的产物和体现。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为是思想源自人类而不是反之,上帝不过是人类虚构出来的理想化投射。马克思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论,但认为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重要性。对费尔巴哈而言,观念仅仅是物质的反映,而没有能动性,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 (mechanical materialism) 或者被动的哲学唯物主义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亦即是静态的“念”生于“物”。马克思历史辩证的唯物主义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 (ideology) 等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 的决定性作用。但是马克思也强调物质和观念的关系并非绝对而是辩证的。亦即“念”生于“物”之余,仍可辩证地以“念”击于“物”。物质决定人们的观念,而观念也能对物质产生影响。人类意识为主体和客体间的辩证互动所决定,世界塑造人,人也能主动地去塑造他所生活的世界。这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有时候,人们以为马克思只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这是错误地将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混淆为马克思的观点了。在吉登斯 (Giddens, 1971, p. xv) 看来,不仅马克思,包括涂尔干和韦伯,他们都希望能够打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哲学分歧。

阶级结构的社会模式

马克思学说形成的社会情境主要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其时,资本主义社会尚处于萌芽期,生产是资本主义勃发的引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整个市场制度的天翻地覆。这可以解释为何马克思学说会如此重生产、轻消费,并将形成于生产领域的阶级关系提升至社会分析的首要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解释——阶级。以此为标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是前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原始部落社会没有或只有很简单的劳动分工,所以那时没有强大及具有支配性的阶级。从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方古代社会或者古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开始,劳动分工的发展造成了阶级社会的形成。再经过封建社会,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整个社会处于高度劳动分工中,而劳动分工又建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之上。资本主义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阶级矛盾将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主义是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已经没有私有财产,阶级也已经消亡,但是劳动力仍然按照交换价值衡量,仍然有劳动分工。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超越,劳动分工不再存在,不再有异化,人类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Marx, see Giddens, 1971, pp. 24-34, 60-64)。

据吉登斯解读,马克思学说致力于提供对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社会形态的理论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之上,无产阶级处于一种“异化”(alienation)状态,这种异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产过程中的异化,一是工人阶级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之间的异化,即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剩余价值的呢?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有使用价值(use value)和交换价值

(exchange value)。使用价值由具体、有用的劳动来衡量,比如修房子的建筑劳动,或农业生产的种植劳动。交换价值由抽象劳动来衡量,也就是制造某个商品的社会标准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者的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资本家按交换价值购买劳动力,付给工人报酬。然而工人在劳动中实际创造出来的价值是超过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的,超过的这部分就是“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即资本家利润的来源。资本总是逐利而往,流向挣钱的商品生产领域,长久以往将带来该商品供大于求的结果,于是利润呈现下降趋势。或者资本家为在竞争中取胜,纷纷增大在机器等固定资产上的投入、提供更好的商业服务等,这也会带来行业利润的整体下降。于是这一“利润率下降的必然法则”(the law of the falling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就成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经济矛盾,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资本家为克服经济危机会将资本进一步集中,并加深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他们会解雇很多工人,使之加入无业的劳动力储备军,同时以危机为借口减少在岗工人的工资。等到经济形势好转时,再从劳动力储备军吸纳更多工人,还是达到减少在岗工人工资的效果。在吉登斯看来,很多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错误解读。马克思并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样预言:一次无法克服的剧烈经济危机造成资本主义的消亡。他认为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应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阶段性解决措施。但经济危机能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最终是工人阶级针对资本家的斗争造成资本主义消亡(Marx, see Giddens, 1971, pp. 46-55)。

马克思在讨论其重要概念“异化”时,谈到异化的一种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际关系被简化成了市场运作,这直接体现为金钱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Marx, see Giddens, 1971, p. 12)。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们想想越来越流行的婚前协议就可明白。2006年,汤姆·克鲁斯在迎娶第三任妻子凯蒂前签订了一份婚前协议。内容

为婚前阿汤哥将 1000 万美元存入凯蒂的账户当聘礼,并支付 1000 万美元作为女儿苏瑞的教育基金;婚后未满 11 年离婚,凯蒂可独得他们的加州豪宅;婚后她每年可领约 300 万美元保障金,即若未满 11 年离婚凯蒂总计可得 3000 万美元;结婚满 11 年离婚,她可分得他半数财产,估计约 2 亿 2000 万美元(百灵网,2008 年 9 月 22 日;《华商报》,2006 年 11 月 20 日)。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处于一种“客体化”(objectification)的状态。人本来是社会的主体(subject)和产品的创造者,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其价值却被同化,并且低于其生产的产品这一客体(object)。这种对人类世界价值的贬低和对物质世界价值的提升就是客体化。注意不要将异化与客体化两个概念互相混淆。工人阶级的异化和客体化浓缩了全人类被压迫、被束缚的状态,要想实现人类解放只有靠阶级斗争这种革命实践(revolutionary praxis),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的希望寄托于被压迫的工人阶级,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将实现对全人类的解放。当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人类解放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阶级将会消亡,劳动分工和国家都将不复存在,也将不再有私有财产(Marx, see Giddens, 1971, pp. 11, 60-64)。

“阶级”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根据“在生产工具中私有财产拥有权”来划分阶级(Marx, see Giddens, 1971, p. 37),占据生产工具者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不占据生产工具者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无产阶级。虽然很多其他学者也认可阶级概念,但划分阶级标准却可能不同,如以研究网路社会(network society)^①闻名的学者卡斯特(Castells)认为,应该在经济标准之上,按照人们对网络、手机等信息

^① 该词既有被译作“网路社会”,也有被译作“网络社会”。本书从《传播与社会学刊》例,译作“网路社会”。这样,可避免在行文中与“互联网络”(internet)或“无线网络”(wireless communication)中的“网络”产生意义上的混淆。

传播科技的使用体验来划分阶级(详见本书第八章)。在对“第二现代”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又认为阶级在这个阶段不再是一个能解释社会现状的概念。(“第二现代”这个概念将在本书后半部分详加解释。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由第一个较稳定的阶段走向更流动的阶段。)此外,并非每位学者或每个学术流派都按阶级来划分社会。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由人类学家们提供,他们认为人类生存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繁殖后代,所以必须进行斗争,从而占据更多资源好让种族强大,将自己的基因传下去。这种解释有它的合理性。此外,在马克思对社会模式的论述中,可见他非常重视生产的作用。他对于社会发展的讨论从哲学层面、历史层面和经验层面来说都是建立在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生产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和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等讨论之上。马克思论述的是“第一现代”(the first modernity)早期的情况,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第二现代”(the second modernity)时,消费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意识与物质互动的文化模式

马克思学说彻底打破了以往过于重视观念特别是上帝意旨的哲学传统。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是人的观念,而比观念更重要的是物质层面的经济基础。即使上帝意旨也是由物质基础所决定的,并服务于经济利益。费尔巴哈也曾说上帝是人的造物,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太过机械,基本忽视观念的作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更辩证,他认为历史发展虽有必然方向,但过程是曲折反复的。同时,观念本身也能造成改变,现在的观念能够影响今后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

对于文化/意识的讨论,马克思观点很明确:“意识源自人类实践”,“强势阶级传播使其统治地位合法化”(Marx, see Giddens, 1971,

p. 41), 并且“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时代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都是强势阶级自身的观念”(p. 42)。可以用图 1.1 来表达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所对应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反过来上层建筑也能对经济基础产生一定影响。图中实线的箭头表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更大,并且是决定性的,而虚线的箭头表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要小一些。阶级系统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中有很多是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这些错误意识是集体建构的结果,服务于强势阶级利益,使社会得以稳定,让不公平的阶级关系得以维系。只有让无产阶级从错误意识的蒙蔽中觉醒过来并从事阶级斗争,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历史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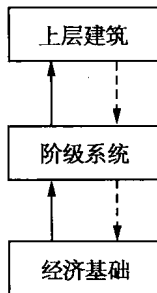


图 1.1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

经济基础好理解,指的是社会生产系统。那么上层建筑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政治、法律、宗教、教育、艺术和传播等,意识形态等观念就深藏于这些上层建筑。马克思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对后人影响很深。法国学者阿尔都塞(Althusser)作为结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 Marxism)的代表人物,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较不看重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与之相对,意大利学者葛兰西(Gramsci)是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的代表人

物,其观点给予上层建筑更大自主性和能动性。后来葛兰西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更多学者接受,在学界出现一种葛兰西转向。相比而言,马克思在文化层面着墨不多,此乃其物质决定论所致,亦留给后来的文化批判论者很大的空间进行学术创新。后来,社会学家汤普森(Thompson, 1990)在综述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时,围绕“是否服务于权力”厘清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勾连及两者与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马杰伟(1998)亦提出意识形态与文化争论的“第三种路线”,进一步调和多元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在意识形态/文化与经济基础关系上的分歧,弥补其各自不足(详见本书第三章讨论)。

涂尔干:实证主义与劳动分工

涂尔干的名字有时也被翻译成迪尔凯姆,白羊座,属马。封建制度的衰退和现代形态社会(modern form of society)的兴起是贯穿他学术研究的主旨。涂尔干的讨论主要调和了法国两位学者的学说:孔德(Comet)对社会实证阶段(the “positive” stage of society)和圣西门(Saint-Simon)对工业主义的讨论(Giddens, 1971, p. 65)。吉登斯对涂尔干思想的总结特别清晰和准确,比如对涂尔干早期研究的总结,还有其劳动分工的论述等。当然,这倒不见得吉登斯更了解或者偏爱涂尔干,原因可能更多在于涂尔干的学术发展轨迹本来就比马克思和韦伯简单。与积极投身政治的马克思和韦伯不同,涂尔干没有那么多地涉入政治,他更多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其学术研究的主题也相对集中。

功能主义哲学

涂尔干的学说不算特别复杂,但影响广泛,从学理层面来讲是结

构功能主义和仪式观。涂尔干的仪式观学说源自人类学传统,现对社会学影响深远,但对传播学界来说还有些陌生。我们在第六章再具体介绍涂尔干有关仪式的讨论,本章则重点介绍他的功能主义学说。功能主义是传播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和思路。功能主义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如同生物器官各有其功能,社会的各个部分也有其不同功能,功能主义就是研究社会如同生物体一般的功能性运作。美国传播学的主流就是功能主义,经常用实证主义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媒体效果等,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议程设置理论、第三人效果、涵化理论、创新与扩散理论等。议程设置是说大众传播媒介有告诉公众哪些议题是重要议题的功能,而创新扩散理论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技术、新产品的扩散过程中主要起到告知广传的作用。既然将社会看做有机体,涂尔干穷其一生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这个整体的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他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探讨落实在经验层面即对现代社会与劳动分工的分析。

劳动分工的社会模式

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的重要特征,在这点上三位社会学之父观点一致。马克思和韦伯虽然也谈劳动分工,但他们都没有涂尔干谈得细腻、投入和系统化。

涂尔干说,“尽管传统道德信仰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复杂的现代社会并不会发展到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道德的’劳动分工是一种有机团结的模式”(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 p. 72)。社会越发展,劳动分工的程度就越高,这与生物越高级器官分工程度就越高的原理一样。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程度远高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主要是在男女两种性别之间的分工,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等。“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和“机械团结”(mechanic solidarity)是涂尔干提出

的重要概念。机械团结是传统社会凝聚的基础,这样的社会结构简单,由很多并列的宗族部落群体组成,其内部结构大体相同,相互之间没有功能依赖。传统社会凭借“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团结在一起,这种集体意识为统一的宗教系统所体现,个人意识为集体意识所涵盖,人们都在相近的价值体系中团结而成社会。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人口不断膨胀,以前相互孤立的宗族部落群体接触增多,带来经济文化成果的频繁交流,劳动分工程度由此日益加深,集体意识在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逐渐消退。但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团结依然可以实现,只是不在于接受和拥有共同的信念、情感,而在于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功能性的互相依赖(the 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 pp. 73-79)。和马克思相比,涂尔干对劳动分工持肯定态度。两个人都认为现代社会中人类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是异化,涂尔干却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劳动分工及其所带来的合同关系强调合作,这种“合作有其内在的道德性”(Durkheim, see Giddens, p. 77)。

有不少学者觉得集体意识的消逝是令人哀伤的,并且缅怀逐渐消亡的“共同体”(community),但涂尔干觉得这真的不是问题。既然社会在变迁,那么在每个社会形态中都有道德与否的不同标准,在现代社会集体意识的消逝是道德的,劳动分工程度的加深也是道德的。作为现代社会凝聚的基础,有机团结源于劳动分工的扩张,分工强调个体差异,因而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紧密相连(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个人主义和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是现代性讨论中的重要命题,涂尔干在讨论劳动分工的时候已经涉及,而讨论个人主义/个人化的学者中的集大成者之一是社会学家贝克(Beck),我们会在本书第四章介绍他的学说。另一方面,机械团结在社会凝聚性上也许强于有机团结,但建立于机械团结基础上的共同体对他者差

异的宽容度是比较低的,而有机团结则对差异更宽容。对传统社群而言,往往是生者可疑或非友即敌。在共同价值体系之外的个人,往往被贬为异端邪说者。而在流动性高的现代社会随处可见陌生人,与不同于己的他者相处共存已成必然趋势。

涂尔干的个人主义讨论引发了他对失范(anomie)问题的研究,失范有关个人在现代劳动分工系统中的缺位或错位。与个人主义扩张相伴的是劳动分工的加深和集体意识的消退,社会给个人信念和个人差异留下更多空间,继而形成“认信个人的代宗教”(the cult of the individual)。这种个人崇拜并非不道德的,因为这种对个人价值、尊严和自由的尊重成为支撑社会的共同信仰,社会由于这种有机团结依然具备凝聚力。既然劳动分工不仅不会带来社会崩溃,反而会促进社会凝聚,那么现代社会怎么还会出现如此多问题,特别是远比传统社会频繁的自杀现象呢?涂尔干说自杀等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失范,这种失范不是劳动分工本身有问题,而在于有的劳动分工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强制的劳动分工(the forced division of labour),涂尔干认为只有自发的劳动分工才能形成有机团结(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 pp. 79-81)。比如说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15—18世纪)就是一种强制的劳动分工。这个时期是英国资本主义逐步取代封建主义的时期。由于当时羊毛价格飞涨,贵族们纷纷把租种土地的农民赶走,圈地养羊。被赶出家园的农民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同时英国政府又颁布严苛的法令禁止和惩戒流浪者。于是农民们被迫进入城市,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场和其他工场,被资本家廉价雇佣。圈地运动的结果是实现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国内市场和原始资本积累。这种劳动分工就是违背农民意愿进行的强制性劳动分工。

涂尔干的学术讨论归结于如何实现社会凝聚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建立在道德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有机团结。他这个思想与后

来美国学者帕森斯(Parsons)^①提出社会行动理论逻辑一致,与马克思的阶级冲突模型根本对立。帕森斯跟涂尔干一样是结构功能主义者,他同样将人类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社会系统的功能是将整个行动系统整合成一个整体。社会系统里的各个子系统是一种对流交换关系,社会秩序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维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稳定而看不到冲突的一面,因而备受批评。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调侃帕森斯是“魔术般地抹杀了冲突,令人惊叹地实现了和谐”(C. Wright Mills, 2000, p. 42)^②。涂尔干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严重的失范现象,于是他给后来的学者提出一个宏大命题:处于复杂变迁中的现代社会怎样才能实现社会凝聚?传播学对涂尔干这个问题最直接集中的回答在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 Dayan & Katz, 1992)一书中,这也是我们在第六章将要讨论的内容。媒介事件理论的一个侧面,就是在个人化现代社会中,媒介大事如何把人们再次吸引进入“想象共同体”之中。涂尔干提出社会凝聚问题,帕森斯强调社会稳定,而马克思看到的是社会冲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只有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才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社会的最终解放。此时,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社会学家致力研究的都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问题,他们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相异,从而得出了不同结论。

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劳动分工是马克思、涂

① 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思想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后来致力于将韦伯的思想介绍给美国,并自认为是韦伯主义者。从帕森斯本人的学术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人作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所具备的深远影响。

② 莱特·米尔斯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年早逝,其经典作是《社会学的想象》(*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2000)。这本书诙谐有趣,其学术批判酣畅淋漓而又有理有据,是美国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影响了几代学人。

尔干和韦伯都曾论述到的社会变迁哲学。马克思和涂尔干对劳动分工的未来做了不同预言。马克思认为当社会发展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而到达未来阶段后,劳动分工也会消失。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没有问题,道德的自发劳动分工可以实现有机团结,有问题的是强制的劳动分工(see Giddens, 1971)。涂尔干研究失范问题的经典著作是《自杀论》(*Suicide*, Durkheim, 1951),他认为现代人不能进入分工系统才是自杀的问题所在;她或他不能在规范之内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游离于“有机团结”之外的孤立个体。他这本书同时也体现了涂尔干的经验主义方法论。由于相信人类社会可以类比为生物体,并且社会由“社会事实”(social facts)构成,可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客观测量,涂尔干是三大社会学之父里面最偏自然科学的一个,也是离政治最远的一位学者。

经验社会学的方法论

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哲学观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体现其哲学观、方法论的代表性著作就是《自杀论》。《自杀论》与《社会分工论》(*Social Division of Labor*)一脉相承。《社会分工论》已经谈到由于强制性劳动分工所引起的失范,《自杀论》则具体讨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劳动分工是如何导致自杀率上升的。虽然自杀现象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可以确定自杀的持续稳定增加佐证了有机团结社会的一系列剧变”(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 p. 82)。总结分析前人对自杀的研究后,涂尔干认为自杀的这种规律分布和变化不在于地域或生物原因,而在于社会原因。在西欧自杀率与宗教信仰相关,简单说来就是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地区自杀率低,而主要信仰基督教的地区自杀率高,而这两种宗教信仰都是严格禁止自杀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基督教徒比天主教徒更容易自杀呢?

通过比较两种宗教的具体教义,涂尔干发现天主教徒的社会整合程度(social integration)通常比基督教徒要高,所以自杀率比基督教徒要低。天主教内的等级制度比较森严,信徒通过教廷/神父与上帝对话,教皇是人间的最高宗教领袖和权威,所以教徒与教廷间,以及教徒与教徒间的联系比较紧密,社会整合程度高。而基督教则提倡自由问询的精神,认为每个人都可直接跟上帝对话,信徒跟上帝是一对一的关系,这使得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比天主教徒更孤独。因此基督教派比天主教派整合程度低,从而自杀率高。不仅是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社会整合度低的单身人士比已婚人士自杀率高。家庭里孩子的数量越多,父亲或母亲的自杀率越低。政治危机或战争的爆发所导致的共同危机感都能增强社会整合程度,从而降低自杀率。总之,社会整合程度与自杀率成反比。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进一步分析了自杀的类型。第一种是利己型自杀(egoistic suicide),第二种是脱序型自杀(anomic suicide),第三种是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 suicide)。利己型自杀和脱序型自杀都是现代社会的自杀类型。前者是由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们社会整合程度降低从而自杀率升高,这种自杀的上升是无法避免的现代病,而脱序型自杀是由于社会的某种失常状态造成的,比如说经济大繁荣时期或经济危机时期,由于生活常态受到剧烈冲击,自杀率容易上升。这种自杀由外在突发事件带来,并非不可避免。利他型自杀是传统社会的自杀类型,源自责任、荣誉或者名望等(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 pp. 83-85)。

在现代中国社会,自杀问题也频繁见于媒体的新闻报道,每次媒体都会努力挖掘个人具体原因。如果某位农村妇女喝了农药,那么原因可能是跟丈夫吵架一时想不通;某大学生跳楼可能是因为感情纠葛或者找不到工作;娱乐圈某女歌手自杀可能是因为婚姻失败或者事业

走下坡路等。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社会变迁与转型矛盾在个人层面的体现。尽管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尽管城市女性的地位大大提高,但农村妇女仍然在教育、就业及家庭中遭遇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使得农村妇女与环境的整合度很低。大学生的整合度同样很低,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数量越来越多,大城市里的机会越来越少,房价日益高企,“天之骄子”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神话,更多大学毕业生成了城市里卑微求存的“蚁族”^①。看着繁华的大都市,却不属于自己,离开又不舍得、不甘心。艺人,更多的时候是表面风光,娱乐圈这个追名逐利的地方充斥着合同关系,人与人的真情以及家庭关系统统都用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精确计算利害得失。所以,表面上看似各有原因的个人自杀问题其实都可用社会变迁原理来解释,而发现这个原理并加以充分论证的就是涂尔干。

涂尔干对自杀问题的论述非常漂亮,逻辑严密且解释性强。为何说涂尔干的《自杀论》是经验主义方法论呢?因为他引用和分析了很多来自实践经验的数据和事例。在这本书的附录里有很多的社会统计资料,如法国各县的自杀人数(1887—1891)、中欧的自杀情况(根据莫塞利的资料)、自杀人数和家庭密度(人口数)、各年龄组有配偶者和丧偶者按有无子女分类的自杀人数等。

要想懂得涂尔干的方法论,我们必须了解他对社会事实的认识——“视社会事实为事物”(to consider social facts as things)(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 p. 89)。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社会事实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事物,并且能够为主体认知,这是衡量社会事实的第一个标准。首先,在每个人出现之前,社会已经存在了很长

^①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但主要从事各类临时性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如同蚁群一样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因而被称为蚁族(廉思,2009)。

的时间,社会环境决定个人。其次,社会关系不由某个单独个人所决定,也不会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第二个标准是在经验层面上衡量,社会事实的存在受到各种道德的约束。比如说“父亲”的定义不仅是由生理基因决定的,也由道德约束而存在,父亲要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如果父亲遗弃子女会受到道德谴责,进而被法律制裁。由于概念标准和经验标准的双重界定,社会事实就具备了客观性(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 pp. 86-88)。

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及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受到了孔德的影响,孔德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虽然这只是本书第一章,但是已发现在学者们的思想之间有着各种历史渊源,他们互相继承、借鉴、批判和发展,没有哪位学者的创见性思想是凭空而来。我们只有掌握很多已有知识,才有可能生产出更多新知识。同时我们发现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宗教是三大社会学之父都聚焦过的问题。马克思在早期曾有相关论述,但他在后期却很少再谈宗教问题,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已将这个问题用上层建筑的概念解决了。涂尔干通过研究自杀者宗教信仰的分布发现了社会整合与个人主义的解释力,自杀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变迁的问题。韦伯对宗教的研究见于他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Weber, 1976),我们在下文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比较。

韦伯:诠释工具理性

金牛座,属鼠。韦伯早慧,13岁时就写了两篇论文送给父母,分别是《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和《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迁徙运动的历史》(维基百科,2010年4月9日)。在三

大社会学之父中,韦伯对宗教研究投入精力最多。马克思谈得少且零散,涂尔干谈宗教问题是为了谈自杀问题和有机团结。而宗教却是韦伯的兴趣焦点,他研究过中国的儒教与道教(Weber, 1964),印度的印度教、佛教(Weber, 1958)和古犹太教(Weber, 1967),其对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尤为出色。韦伯是社会学家,更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被通称为“韦伯命题”。韦伯积极投身政治,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他跟马克思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思想改变社会,而且韦伯对德国,正如马克思对世界政治,也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

韦伯跟涂尔干是同时代人,但学术风格很不一样。前者是德国传统,后者是法国传统,而且涂韦二人间缺乏显著的相互影响。不过他俩还是有某些相同点的,比如两人都是改良主义者,都认为社会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不能依靠革命的手段。前面说到,涂尔干认为学者在研究中应当保持情感中立的态度,而韦伯同样认为学者应当道德中立(ethical neutrality),首先是因为社会科学跟价值判断不同,世界上存在着不可简约化的相互竞争的观念,科学分析无法证实某种观念是正确还是错误(see Giddens, 1971, pp. 90, 119, 143)。在三位社会学之父中,韦伯最为看重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这奠定了韦伯诠释哲学模式的基础。

哲学模式:“念”击于“物”

韦伯致力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从哲学层面来讲,韦伯强调观念的作用,反对“简陋的经济决定论”(crude economic determinism)。韦伯认为观念对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观念能够影响实践。就现代社会而言,现代人将其世界和行为

理性化,使现代人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sation)所支配,其特点是处于一种理性计算得失的状态,在组织形态上造成社会科层制度化(bureaucratisation),这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束缚人类的“铁笼”。

对马克思而言,社会演进是阶级冲突的结果。对韦伯来说,人类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却是为新教发展及其伦理推动。这体现了马克思与韦伯对于历史演进的不同分析逻辑。恩格斯(Engels)和马克思也曾分析过新教,他们认为新教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经济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种分析使新教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韦伯的分析就有了方向上的不同,他认为新教主动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印度等国之所以没有形成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因为缺乏新教伦理。不同于以往宗教,新教不对追求财富持冷淡或否定态度。新教伦理认为人们应该勤奋劳动,积极追求财富,同时保持简朴生活,这是被上帝“选中”(selection)的标志。根据新教伦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敬拜上帝的方式,是上帝的呼召(Calling)和安排的任务。信仰上帝越虔诚,越是要努力挣钱、合法致富,这种伦理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其他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后者小富即安,满足自身需求就可以。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追求超过自身需求的财富和利润最大化。此时可以发现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通过劳动积极追求财富上是贯通的,因此新教伦理盛行的地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很顺利。当然新教里面也有很多教派,最能体现新教通过劳动追求财富精神的教派就是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加尔文神学信奉努力工作、理性计算成果,能累积宗教回报,达到死后上天堂及得上帝偿赐的效果。这种信仰的副作用促成了资本主义所需求的劳动力及工作伦理(Weber, see Giddens, 1971, pp. 124-132)。此后,非新教支配的亚太区成功发

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反证了韦伯的新教动力论。

宗教在现代社会逐渐世俗化(secularized),神秘传统被理性解释,各种超凡的传说亦被科学拆解。韦伯称之为“去魅”(disenchantment),简单说来就是不再相信魔术力量,去掉了文化和宗教中感性、神秘的元素。那么去魅的结果是理性(rationlisation)的上升,继而计算(calculation)的盛行。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下降的必然法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经济矛盾,而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化解的矛盾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控制”(the irrational rationality)。当理性过分盛行而达到病态,现代社会就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控制,把人性中创造、直观、情感、个性的方面都禁锢起来。韦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化解的内在矛盾(Weber, see Giddens, 1971)。

韦伯的论述强调了新教伦理作为观念对现实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在三位社会学之父中,应属韦伯最为看重观念的作用。马克思虽然也认为现在的观念可以影响以后的历史,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认为观念为已有物质基础所决定。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独立于个人及个人意志,由人通过经验手段去感知。而韦伯以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为其理论框架,最为强调观念的能动性。康德(Kant)是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是对康德主义的回复和修正,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是说希望能够超越康德以心物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同时又不至于像机械唯物主义那样完全忽视观念的作用。

建构理性的社会

不同社会学家对社会建构基本模式的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

现代社会建构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对立,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建构于劳动分工和功能性相互依赖,在韦伯看来社会建构于科层组织(bureaucracy)的劳动分工。在科层组织乃至整个现代社会都为理性所垄断,以追求更高的效率。

韦伯认为人的基本行为取向有四种类型:目的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情感式(affective)和传统式(traditional)。目的理性行为计算以某种手段实现某个目的之可能性结果。价值理性只考虑所追求的理念,不考虑其他。情感式行为由感情所驱动,而传统式行为遵循代代相传的常规习俗(Weber, see Giddens, 1971, pp. 152-153)。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目的理性行为逐步取代价值理性行为,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计较并且精确计算得失。传统式行为也逐步减少。过去是遵循传统,现在则是鼓励创新,鼓励打破常规。

除了上面提到的基本行为取向外,韦伯(Weber, see Giddens, 1971, pp. 154-163)又划分了威权合法性的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traditional)、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其中传统型威权的合法性在于传统的神圣力量,尊崇长者为统治者,比如传统社会部落的族长,还有封建世袭制等。在2005年开始在中国热播的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年纪最长的“慢羊羊”就是管理全村大小事务的村长。在传统型威权中,人们的服从是基于对传统的尊重。而魅力型威权是一种非常规状态,其统治合法性在于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其实我们从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过程已经可以发现由个人魅力所带来的政治权力。魅力型威权是非理性、非常规的合法性,会逐渐向常规的传统型威权或法理型威权转化。法理型威权是常态,也是现代社会最为常见的威权形式。这种威权的合法性不在于传统或个人魅力,而在于理性科层组织及其所负载的规则。人们服从的不是

某个人的统治,而是整个制度和规则的统治,该制度由法律所规定。法理型统治的基础是目的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在这样的威权体系里,一切都被制度化、理性化。每个职位不是由上级直接指派,而是有规则明确地规定职责、权利和资格。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才出现了接近韦伯所定义的法理型威权的理想形态。韦伯认为在这种科层组织里出现了行政职能的分工(the specialisation of administrative tasks)以及公务员与行政工具(means of administration)的相分离。在现代社会,传统型威权已经越来越少,而魅力型和法理型威权越来越多。即使是魅力型威权,如靠魅力获得权力的奥巴马,其日常统治还是得依靠法理型威权的规则制度。韦伯所做的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的划分影响了众多学者,如戴扬和卡茨(Dayan & Katz, 1992)讨论媒介事件的加冕、征战和竞赛三种形态时,即是以此为基础(详见本书第六章)。

至此,韦伯已经分析了社会行为取向和社会威权类型,接着要介绍的是韦伯对社会阶层的划分。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阶级构成,阶级关系是不平等的;韦伯和涂尔干也认同人类社会是阶级社会。不过涂尔干强调次团体(the secondary group)在个人与国家间的调节作用。韦伯跟马克思在阶级分析上的相通之处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韦伯承认有阶级冲突,同样主要根据是否拥有生产工具来划分阶级,他所划分的阶级有很多也与马克思相对应。但是韦伯认为比阶级更重要的是身份群体(status group)。韦伯认为阶级是按阶级状况(市场位置)来划分,往往意识不到自身的阶级处境。而身份群体是按身份状况来划分的,通过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限制别人与自身接触来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并且通常能意识到其群体处境。与阶级和政党一样,身份群体也是社会划分的基础,在历史发展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韦伯认为这种身份群体的典型例子就是印度的卡斯特(Caste)种姓群

体的划分,这种制度将社会分成地位由高到低的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阶级与身份群体在概念上相异,但就经验层面而言,两者可存有因果互联。身份群体与韦伯所析“社会阶级”最为接近,而与他所说“商业阶级”最不相同。在某些时候,身份群体能以某种方式直接影响市场运作,从而影响阶级关系(Weber, see Giddens, 1971, pp. 163-168)。

印度的卡斯特种姓制度在韦伯看来有悖经济理性,印度的佛教徒和中国的儒生士人都是如此,而世俗理性(secular rationalisation)及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的普及,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特征。科层组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蔓延既是法律、政治和工业理性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韦伯还认为可以用“去魅”来衡量现代生活中理性化的高度。去魅消除了对魔术、巫术等的信仰和实践,让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和实践生活(Weber, see Giddens, 1971, p. 183)。在理性社会中成长的现代人会相信《小王子》的故事是真实而不仅是童话吗?一个小王子在星球间旅行,王子遇到并爱上了一朵娇气的玫瑰花,还有一只渴望被驯服的小狐狸对王子说:“请你驯服我吧!”因为“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便会彼此需要。对我来说,你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对你来说,我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埃克苏佩里,2006,页79、81)。如果你不相信,那么这就是去魅的效果。去魅的理性世界充满了效率,但也充斥着平淡,不论西方还是东方,到处都是同样的摩天大楼,喝着可乐,吃着麦当劳,穿着牛仔裤。为了摆脱这平淡的生活,现代人在服装和生活方式上追求和彰显个性,建筑物也努力造得与众不同,但这证明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现代理性去魅,这种在生活方式、服装还有建筑等方面对个性的追求其实是现代人希望能够“再魅”(reenchantment)的种种努力。

总之,现代生活为工具理性所垄断,即通过理性计算,以最佳手段

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使人类行为标准化、程序化和去魅化。这种理性蔓延到极端地步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非理性的理性控制。“非理性的理性控制”体现于教育即是将知识“创造”异化为知识“生产”,学校被全面量化。大学重视排名,学生醉心于成绩绩点,教研人员重在学术产量。沈祖尧说:

全球的大学教育正在急剧改变。世界各国埋首于追逐经济发展;推动学者做研究的是资源,而非对知识的好奇;大学重视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轻灵魂全面发展的使命;教师的回报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而非学养。凡此种种,都令危机悄然出现。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世界各国就只会制造出汲汲于利的成品和个人,而不是有主见、尊重见解不同于己者、能洞察别人的需要,以及有悲天悯人心肠的有责任感的公民。同时,想象力和创造力、科学研究的人文内涵,以及慎思明辨的能力将逐渐丧失,教育的价值也会湮没(沈祖尧,2010年12月16日)。

诠释主义方法论

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贡献重大,他的诠释社会学改变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早年学术界的支配地位,并促进了社会学与现象学的互动,所以他的诠释主义社会学也可以称为“反实证主义社会学”(antipositivistic sociology)。韦伯的学说影响了很多学者,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帕森斯就自认是个韦伯主义者。

韦伯的诠释主义方法论迥异于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涂尔干将社会事实看作可以独立于个人意志的事物,而韦伯却认为社会真实离不开人的主观诠释。社会学是研究具有主观意义的人类社会行动(human social action)的科学,韦伯对社会学所下定义是诠释社会学的前提。若像功能主义者那样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那么对应的方

方法论就是实证主义社会学。韦伯并不认为自己的诠释社会学是社会学研究的唯一路径,他指出功能主义和实证社会学同样有其可取之处。但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方法不足以充分反映人类行动中的意义,而诠释社会学是一种相对客观地去解释主观意义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社会研究可以复制和被证实。对意义的诠释方式可分为直接理解(direct understanding)和解释性理解(explanatory understanding),具体的诠释过程需要建构“理想类型”(ideal type),理想类型是韦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概念,是将一类事物的无限可能特征进行组合和抽象。理想类型是建构出来的一种分析机制,在真实世界里无法观察到,但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和解释社会现象。理想类型并不意味着完美,也不具备道德上的优越性,我们同样可以为偷窃这一犯罪行为建立理想类型。也不是说将所有特征取其平均值就算理想类型。它不是对某一个具体案例的描绘,而是对某一类现象基本代表性特征的概括、抽象和综合(Weber, see Giddens, 1971, pp. 141-142, 145-151)。比如说“猫”作为一个理想类型通常有以下特征:毛茸茸、有胡子、两只耳朵、一对圆眼睛、一条长尾巴、喵喵叫、爱吃鱼及会捉老鼠等。那么,我们在判断自家的宠物是不是猫时,可以拿它跟“猫”的理想类型做比较,看它是否具备这些特征。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猫没有毛^①,不仅不捉老鼠,还被老鼠吓得到处跑,但是“猫”的理想类型的其余特征它都具备,我们还是可以判断自己养了一只猫。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若要合理可信需同时具备“主观适当性”(subjective adequacy)和“因果适当性”(causal adequacy)。当对所涉行为的诠释,根据公认规则合理有意义时,其解释便具有主观适当性。诠释社会学对复杂的主观意义具有很强解释力,但相比实证主义而言,诠释社会

^① 加拿大无毛猫就是一种没有毛的猫,这种猫皮肤多皱,有弹性,身材瘦而长。全身基本没有毛,只有耳、口、鼻、脚跟部位有些薄软的毛。

学精确度和确定性低,研究过程复制和证实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韦伯也强调因果适当性,即某个行为以相同方式发生的或然率来衡量诠释社会学研究的可信度。也就是说,为获得“解释显著性”(explanatory significance),必须将行为的主观意义与特定范畴内的决定性因素相连(即获得因果适当性),从而建立经验层面的代表性。但另一方面,韦伯认为无论某种经验概括多么准确可证,倘若在意义层面缺乏适当性,其概括都只能停留在统计数据层面,而无法上升至诠释社会学范畴(Weber, see Giddens, 1971, pp. 149, 153)。

现代性讨论的基础

马克思和韦伯是德国人,涂尔干是法国人,他们生活于现代社会形成早期。英国是当时工业化最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何在现代性讨论中却没有出现有分量的英国学者呢?在吉登斯看来,其原因恐怕在于英国当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种历史环境的缺乏导致了学术生产的缺失。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在现代性讨论中给后世学者打下了基础,掌握三人对资本主义兴起和传统消退的论述,我们才能在接下来的章节具体讨论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各有其值得称道之处,他们对社会事实有着不同的认识。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是独立于个人意志的事物,可以被我们收集、测量和认知;研究者能够抽离于社会事实,在研究中秉持情感中立态度;将所有事实整合起来,就可得到社会的宏观面貌。韦伯认为社会事实是变动不稳定的,社会事实可能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事实”那样真实;我们无法“收集”社会事实,而只能“诠释”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无法独立于诠释者而存在,而我们的诠释也能产生新的社会事实。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事实是用于推动历史演进的工具。现实本身不够完善,需对其进行批评和改进。马克思认

为自身对社会事实的历史辩证性批评是为历史唯物主义,具可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真实性(see Giddens, 1971)。对社会事实的不同看法,体现了三位大师研究社会的不同路径。对于人类如何从传统社会变迁至现代社会,他们给出了和而不同的答案。我们可以用“快闪党”(flash mob)的例子来说明他们思路的不同和各自的适用性。快闪党指的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通过网络约定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做出预先张扬的举动,比如一起拍手、假装买书、扮青蛙跳等,他们会在数秒到数分钟之内完成约定任务,然后迅速消失。这种“快闪”行为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如果按照马克思学说来解释快闪党,或会说这是从属群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被异化,就采用这种“快闪”行为来抵抗强势阶级。涂尔干或会说这种“快闪”行为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参与者通过一起“快闪”可以分享共同的情感,从而增加他们与社会的整合度,实现局部的有机团结。韦伯的解释又或会跟前面两种不同,在他看来现代社会被纳入“去魅”的科层制度中,生活变得如此无趣,于是人们就通过策划和参加“快闪”活动,让生活“再魅”。快闪只是一例,我们无意作严谨论证,只点出三种可能的进路。各不相同的解释各有其道理,介绍他们的思想是要让大家知道解释社会的几种可能途径,让我们站在更多巨人的肩膀上,从而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事实上,后来者很少能脱离这三位大师的路径。如吉登斯更多偏向韦伯的诠释社会学,他所讨论的关键概念“反思性”(reflexivity)重在知识对社会的关照及知识对自身的反思。同韦伯一样,吉登斯也认为他的诠释社会学能够产生新的社会事实。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对现代性源起的论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在给现代社会论病。他们都认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阶段后出现了林林总总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人类的异化,从涂尔干的

角度来看是失范,韦伯则批评非理性的理性控制。出自对人类社会现代病的不同诊断,三个人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措施。持有批判与怀疑态度的马克思,从根本上不相信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那么要解决人类的异化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分工,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涂尔干很乐观,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分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造成失范的是强制的劳动分工,所以如果加强劳动分工和整个社会中的道德团结(moral solidarity)就可以实现社会凝聚。韦伯就悲观多了,既然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科层化、理性化的大铁笼,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铁笼里的人都是“没有神韵的专家、没有心的感观主义者”(specialists without spirit, sensualists without heart)(Weber, see Giddens, 1971, p. 236)。更可悲的是,在韦伯看来,即使他诊断出了人类社会的病因,这个病也是无法治愈的。因为“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非理性的理性控制”这一矛盾从历史必然的角度来说是无法解决的”(Weber, see Giddens, 1971, p. 242)。

所以涂尔干是个温和乐观的人,用孔子的话来形容就是中庸。他相信改良,不认可革命手段,认为社会凝聚可以实现。马克思激进,聚焦于无产者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韦伯也认为改良比革命可取,但改良了人类社会也不能摆脱工具理性的牢笼。涂尔干和马克思都谈解放(emancipation)这个概念,但两人所谈的解放却是不同的。马克思是说要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所造成的异化中解放出来,无产阶级就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力量。而涂尔干却是要将现代社会的个人从集体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要继续推崇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说来,马克思的影响是很深的,从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这本书来看,他始终在拿涂尔干或(和)韦伯与马克思来做比较。韦伯的学说被认为是一直在与马克思间接对话。从根本上

来说,韦伯是激进的新康德主义,认为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相互竞争,没有谁绝对正确,所以要在逻辑上区分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马克思与之相反,认为就终极目的而言,存在更科学的伦理。他相信辩证唯物史观是科学的。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韦伯却认为身份群体间的冲突更重要。涂尔干早期受到马克思影响较小,后来也开始讨论一些与马克思相同的主题。涂尔干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重要观点,但他并不认为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是社会政治权力的主要焦点,现代社会问题的实质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see Giddens, 1971, pp. 185, 195-196, 199-203)。

源自不同的哲学模式和对社会事实的不同认识,三位现代社会学之父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我们在本章一开始已经谈到,马、涂、韦三人分别认为阶级结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有机专门化和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劳动分工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他们三人对劳动分工做出了不同的预测。马克思预见劳动分工消亡的未来,然后人类成为具有大同理想的人(universal man)。涂尔干则认为劳动分工能够实行道德团结,让人成为有机群体的一部分(the part of an organic whole)。韦伯的讨论则超越了生产领域,更侧重于科层组织中的劳动分工,他认为即使资本主义被超越,其后的社会形态科层组织及其劳动分工只会更发达(see Giddens, 1971)。

吉登斯 1971 年这本书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人的思想做了浓缩式的总结,每句话都值得仔细推敲、咀嚼,所以让人读得特别累,但是值得。读完这本书后的感觉,犹如很辛苦地踉跄到了山腰,发现别有一番风景。然后,我们还有更多的山要攀登……

吉登斯的书,跟他学生汤普森的书风格很不一样。我们会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介绍汤普森的两本书。在此先给大家比较一下两位作者:吉登斯精炼,汤普森迂回。汤普森行文的一大特点就是翻

来覆去说同样的意思，让你不禁怀疑这迥异的师徒俩当初是怎么凑到一块儿去的。不过，汤普森有汤普森的好。他的书不会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就像吃臭豆腐一样，开始很抗拒，可到后面越嚼越有味道。接下来这一章，我们要开始具体地论述现代性的创始形态以及基本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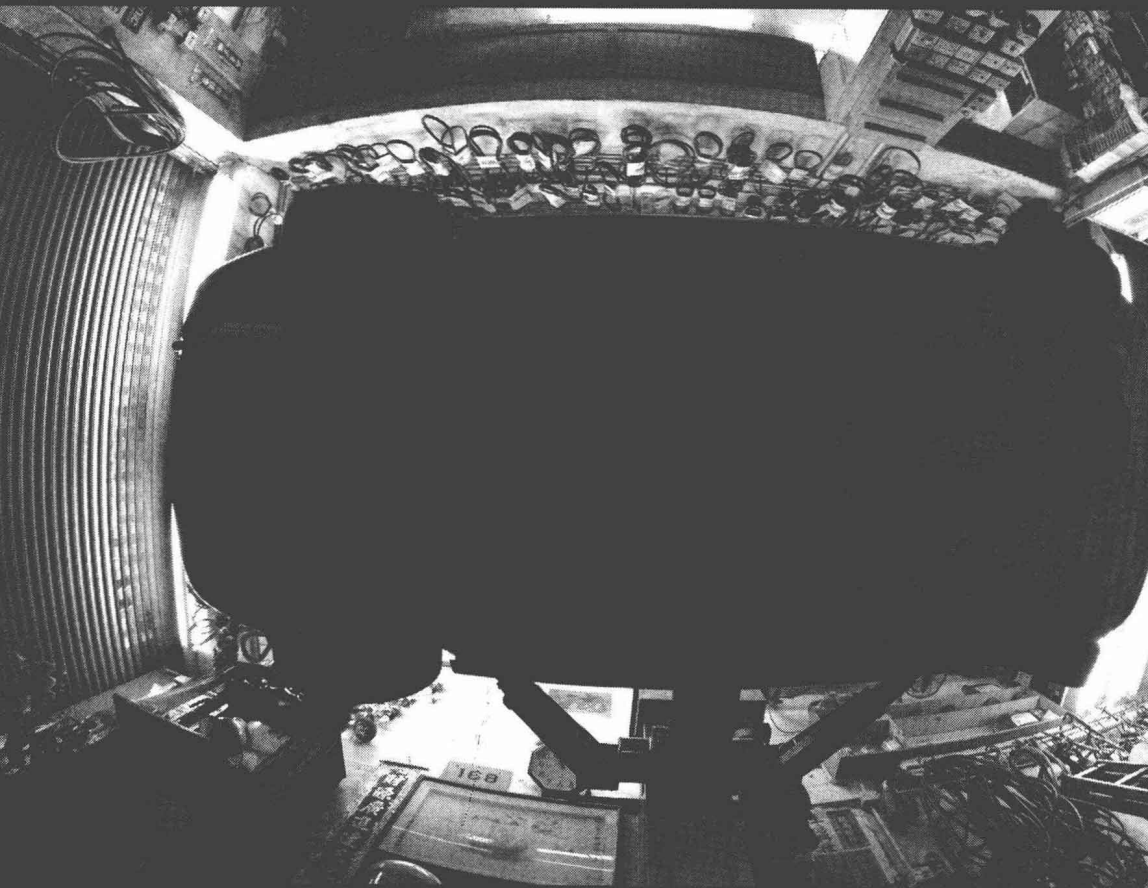
社会变迁 Anthony Giddens 第一现代 reflexivity 反思性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时空分延 disembodiment 抽离 expert system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工业主义 first modernity JB Thompson 媒介传播 industrialism 自我 self-identity



社会变迁Anthony Giddens第一现代reflexivity反思性time-space distanciation时空分延disembedding抽离expert system
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first modernity JB Thompson媒介传播industrialism自我self-identity



社会变迁Anthony Giddens第一现代reflexivity反思性time-space distanciation时空分延disembedding抽离expert system
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first modernity JB Thompson媒介传播industrialism自我self-identity



社会变迁Anthony Giddens第一现代reflexivity反思性time-space distanciation时空分延disembedding抽离expert system
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first modernity JB Thompson媒介传播industrialism自我self-identity

第二章

第一现代:特征、影响与诠释

吉登斯和汤普森(John B. Thompson)^①是一对师徒,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问题有着深刻认识,并早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全球化”论述,他的各种论著对学者、从政者、业界从业人员乃至普通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汤普森知名度不及吉登斯,但继承其衣钵,补充和发展有关现代性的理论,尤其是他非常看重媒介和传播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把社会学和传播学联系在一起。所以吉登斯和汤普森的著作和思想是我们学习新闻传播时值得了解的,吉登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变迁、认识社会现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而汤普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桥梁,让我们从社会学的底蕴出发,去了解被媒介改变和建构中的现代社会。

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论著主要有《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Giddens, 1990)、《亲密关系的变迁:现代社

^① 汤普森是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也是吉登斯的学生,主要研究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媒介的影响。采用诠释学方法,汤普森强调对传播和文化的研究应该在结构化的社会情境下进行。他对意识形态和可见性的变革等问题有精辟论述。当然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就是肯定和论述了大众媒介与传播在现代性中的重要作用,这在社会学家中是不多见的。

会中的性、爱与欲》(*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Giddens, 1992)和《现代性与自我身份:晚现代的自我与社会》(*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Giddens, 1991)等。社会学家们通常把现代性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现代(the first modernity)和第二现代(the second modernity),又称晚现代(late modernity)。《现代性的后果》主要是论述第一现代的特征和影响。《亲密关系的变迁》从微观的层面生动地分析了在现代社会人们亲密关系的演变。《现代性与自我身份》则主要阐释了自我身份建构在第二现代的新特征。此外,吉登斯还著有我们在第一章介绍过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深入分析了三大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有关现代性源起的论述。

汤普森虽然没有像吉登斯那样开创性地提出全球化构想,但对我们传播学者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家。通常社会学家们对于媒介和传播的重视程度和论述都是不够的,但汤普森是个例外。他确认传播与媒介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位置,而这一点已越来越多地被我们的现实生活所证实。汤普森的主要研究兴趣为: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媒介社会学与现代文化、媒介工业的社会组织、出版业结构转型、信息传播科技的社会政治影响和政治传播形态演变,他近年较关注政治丑闻的社会效应(Thompson, 2000)。从其研究兴趣可见,汤普森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研究媒介传播。其相关著作主要是《媒介与现代性:媒介的社会学理论》(*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Thompson, 1995)和《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大众传播时代的批判社会学理论》(*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ompson, 1990)。《媒介与现代性》这本书对媒介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了全面论述。《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则追溯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并提供了

一个灵活的界定,这一界定厘清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勾连和区别,有助于我们联结政治、社会、文化与传播议题。

所谓现代性,根据吉登斯(Giddens, 1990, p. 1)最早的一个定义是缘起于17世纪欧洲的社会生活或组织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在世界范围扩散开来,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对于现代性的讨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社会变迁的讨论。现代性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去传统”(detraditionalization)的问题,也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社会经历了重大社会变革,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其中,宗教和传统的影响不断削弱,知识和科技得到了推崇和扩散,工业化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成为基本模式,市场机制被广泛推行。民族国家形成,并成为国家政体的普遍组织形式。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且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西方化问题”(westernization),即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扩散,有关世界其他国家是否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广泛影响,是否存在被“西方化”甚至被“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这样一个过程与现实。在此必须指出,以西方现代性为典范的取向已被质疑。西方“先进国”早得先机发展现代体制,“后发国”争相效仿。这一历史过程毋庸置疑。但这种西方强势,却建基于殖民扩张与剥削,是殖民帝国强夺资源并压抑后进国发展现代格局。翻查历史,中国与中东在殖民扩张之前均有现代规模的雏形。当然我们认知的现代性是以西方先进国为主要对象,但这不应被视为“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发展论,更不应把“概括化的西方”优于“概括化的东方”视为本质上的必然(Darwin, 2008)。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学者们又对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进行了区分和论述。当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已基本实现去传统后,现代性自身也有了发展。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的特征被激进化了(the

radicalization of modernity),但人类社会还是处于现代格局,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言,已进入截然不同的后现代(postmodernity)阶段。而按照贝克(Beck, 1992,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鲍曼(Bauman, 2000)、拉什与厄瑞(Lash & Urry, 1994)和卡斯特(Castells, 1996, 2009)等学者的看法,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现代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第一现代的延续,但也有其新特征。本章主要是围绕吉登斯和汤普森的思想,论述第一现代的特征和影响,诠释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后的历史变革及这一变革对于我们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当然,除了吉登斯和汤普森之外,也有很多社会学家、传播学者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家谈到了第一现代的问题,本章也有所涉及。

关于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不同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表达,以强调现代性不同方面的特质。吉登斯(Giddens, 1990, 1991)用“超现代”(high modernity)来形容第二现代。贝克(Beck, 1992,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用的是“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一术语,强调第二现代是个风险普遍存在并不断深化的社会,而第一现代被贝克用“工业社会”(industry society)形容。贝克也用“反思现代”(reflexive modernity)来形容第二现代,反思现代强调反思性知识在第二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以及人们的自我反思性。鲍曼(Bauman, 2000)用“液态现代”(liquid modernity)或者“轻资本主义”(light capitalism)形容第二现代,强调当社会发展到第二现代后,社会流动性的加剧。相应的,鲍曼也就用“固态现代”(solid modernity)和“重资本主义”(heavy capitalism)来形容第一现代。拉什与厄瑞(Lash & Urry, 1994)用“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形容第一现代,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形容第二现代,强调资本主义从组织化到流动性、灵活性的发展历程。卡斯特(Castells, 2009)用“网

路社会”或“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来形容第二现代,强调传播与信息流动对于第二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跟汤普森一样,卡斯特也非常重视媒介传播的重要性。对于从第一现代到第二现代的社会变迁,我们将在本书第五至第八章进行专门论述。本书的第一到第三章先着重为大家介绍第一现代。而本章的重心,在于介绍现代性的三个动力和四个制度性维度,并分析传播媒介在建构现代性过程中的重要位置。

现代性与社会变迁

现代性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于社会变迁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变迁和更替大概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轨迹,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统称为传统社会。一般认为传统社会跟现代社会有着本质不同,现代社会是对传统社会的一个根本超越和变革。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模式,比如社会生活的时空关系、新的社会互动和交往模式、新的社会关系(Giddens, 1990)以及实施权力的新方式等(Thompson, 1995)。传统社会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社会模式和历史阶段,也包含了各种社会形态和变迁。但是它们能够统归于传统社会,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发展变化是有一定延续性的。而现代社会比之传统社会却存在一种“非延续性”(discontinuities),或者说断裂,所以才能够称之为新的“现代社会”。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变化的三个方面:变化的速度、变化的幅度和现代机构的性质。现代社会变迁速度之快是以前难以想象的,且不同于以前主要是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孤立变化,社会变化的幅度也扩及全球。再就是出现了在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完全不曾有过的一些社会机构,比如民族国家的出现(Giddens, 1990, pp. 4-6)。

社会变迁的宏观路径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存在,有着大体相同但脉络迥异的历史路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帝制时期及如今的现代社会。这种社会变迁可以从史书记载中体现,也可以从我们个人的生活体验乃至电视流行文化中找到。比如《故梦》是2009年很受欢迎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个有着清朝皇族血统的家族,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兴衰故事。虽是家族情仇,但折射出来的却是社会的发展与更替。故事主人公陆天恩的父亲是个前清王爷,起初拒绝剪去象征着封建传统的辫子,但最终无奈地接受已是民国的现实,而割掉了辫子。陆天恩一开始穿的是长袍马褂,后来在新派妻子燕笙的劝说下才勉为其难地第一次穿上西装,结果被思想守旧的母亲痛斥一顿。可到后来,陆天恩却非常习惯以西装为日常服装,其父母也完全认可了他的着装,尽管他们自己还是穿着传统服饰。这些服饰上的变化反映中国步入了现代社会,并被西方的文化习俗逐渐影响和同化的过程。如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加速,国家也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传统社会,科技发展水平远没有现在高,并且很多时候人们做决定不是依据科技,而是信赖传统或者占卜。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受到推崇。传统和迷信、占卜之类被视作落后和应当反对的(当然在晚期资本主义去魅的浮沉中,新纪元宗教又挑战了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对立,重新认识了传统的价值)。这是大家通常对现代与传统问题的基本认识。比如在“五四”运动时期,国人提出的口号就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并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

学”(百度百科,2009年12月27日)。由此可见,人们在追求现代性时,往往把“传统”与“现代”相对,认为传统是过时的、是要被取代的。如《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Lerner, 1958)一书,是学者勒纳有关现代性的经典著述,其中心思想即传统社会必将被现代社会所取代,并且科技(大众媒介的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三大条件之一^①。又如传播学者罗杰斯将传统看作创新推广和扩散的阻碍(Rogers, 2003)。总之,对于很多学者而言,传统(社会)有许多负面含义,是要被现代(社会)所替代和否定的。所以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经常会讨论到“去传统”问题。当然,后来很多学者(e. g. Thompson, 1990)对传统有了更新的认识和讨论,并指出现代与传统并非只有断裂,其中亦有延续与创新。

不论我们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性的更替却不可避免。中国社会也已卷入现代化进程中,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社会发展程度很不一样,就出现了一种复杂局面,即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现代化水平,比如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些大城市现代化程度要高于内陆很多城市。此外,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的多重特征。例如人们既重视家庭和孝义等传统道德观念,但同时在个人婚恋、职业选择等方面拥有了很大自由,而且也出现了高度个人化、感观消费、崇尚视觉等第二现代的特征。这种现代性的复杂性与混杂化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中国人对西方物质文化生活的追求和对繁华都市生活的向往。《蜗居》是2009年火遍中国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讲述了海藻和海藻姐妹俩在大城市奋斗的故事。电视剧第一集中,妹妹海藻考取了姐姐所在的大城市的

^① 勒纳对于大众媒介的重视得到了汤普森的肯定和赞许。

大学,初来乍到的海藻对大城市的繁华现代生活非常好奇,晚上姐妹俩谈心时有一段关于大城市的讨论。

海藻:姐,你说,是喜欢大城市,还是喜欢咱们小城市啊?

海萍:当然大城市啦。咱们老家那种地方,有什么意思啊?没逛两步就逛到头了。你喜欢哪儿啊?

海藻:我,有点想家,想爸妈了。

海萍:没出息的。家有什么好想的啊?那我问你了,你家,有大型博物馆吗?

海藻:没有啊。

苏淳(海萍男友):你家有音乐会吗?

海藻:没有啊。

海萍:那你家有世纪明珠塔吗?

海藻:没有哎。

苏淳(海萍男友):那你家有伊势丹吗?

海藻:没有。

海萍: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想的啊?!

音乐会、博物馆、世纪明珠塔还有名牌“伊势丹”(Isetan)等,是大城市的特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们体现的是消费主导的大都会生活。姐妹俩的这段对话体现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现代性和现代性背后所挑动的更舒适、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肯定。当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人们从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也不全然是好处,也有很多负面因素,比如风险的加剧、不安全感的增加等,这些将在后文有更多论述。

现代性的动力与制度性维度

本章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论述是奠基性的，他承接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对现代社会兴起和社会变迁的论述，并为后来的现代性讨论奠定基调。这个基调就是吉登斯（Giddens, 1990, p. 53）提出的现代性的三大主要动力（dynamism）：反思性（reflexivity）、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和抽离（disembedding）。反思性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动力，后来为诸多社会学家反复论述和发展，贝克指出第二现代是“反思现代”（Beck, 1992;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而拉什与厄瑞（Lash & Urry, 1994）深入探讨和发展了反思性这一概念。

首先要声明，反思性或者说自我对行为的反省检验（the 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传统社会也有，然而传统社会的反思主要是对传统的重述和阐明，是导向过去的。哲人上下求索如何更好落实传统、激活传统。而现代性的反思是导向未来的，其含义在于人类的行为不断被这些行为的相关知识所检验，并相应调整行为，甚至预设更有效的未来。现代社会正是这样一个被反思性知识（reflexive knowledge）所深入建构的社会，即使是反思性知识本身也在不断调整。也就是说，知识来源于实践行为，继而检验实践行为，并且相应地调整实践行为和知识本身。现代社会的反思性强调检验、调整行为和知识本身的非笃定性和待调整性。而在传统社会，知识更具有确定性。因而反思性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地位，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定义性特征（Giddens, 1990, pp. 36-45）。例如在中国古代，依据社会传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非常确定的事情。古人除了依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继而生儿育女外并没有其他更多

选择。但现代社会是个多元社会,人们有进行多种选择的自由。现代人会根据旁人的婚恋故事、社会上离婚率的高低、养育子女的经济和时间成本等来决定是否结婚,婚后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否生孩子,以及是否离婚等。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依据所拥有的知识而做出生活的决定,而这些知识又在不断地系统更新和调整。吉登斯(Giddens, 1990, p. 41)指出社会学在现代反思中作用重大,因其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系统观照。我们认为传播学对于反思现代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反思离不开知识的生产、传递和接收,而承载知识的核心场域之一就是媒介传播体系,由此传播学将在现代社会日益重要。

反思性动力从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的非笃定性和不断调整性。而时空分延体现的是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组织形式。在了解时空分延的具体内涵前,得掌握时间(time)、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三个概念。时间本身并不难理解,我们需知晓传统社会对时间的判断离不开日出、日落等当地自然现象,不同地方对时间的计量都不相同。例如中国古代把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等于现在的两小时。汉代开始将时间命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从这个命名系统来看,判断太阳方位对计时来说很重要。这一时间系统也可以用十二地支来对应,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样的命名系统是中国这个地域所独有的。到了现代社会,标准的计量工具(如钟表)开始出现,世界各地的时间开始标准化。今天我们不再用中国古人的计时系统,而是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将一天分为24个小时,用阿拉伯数字的1点、2点来表述时间,这样不用参照太阳方位也能知道是几点。时间就和空间分割开来,并且被标准化了。而时间的虚无化(emptying of time)就为空间的虚无(emptying of space)创造了前提条件,两者有因果联系。“地方”和“空间”是两个互相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这两个

概念很容易混淆,但厘清地方与空间对于传播学者来说是紧要的。学者们对于地方和空间做过很多界定的区分,相对而言吉登斯的区分比较简单明了。地方是一个有关“现场”(locale)的概念,强调社会行为在地理上存在于某个物理“环境”(settings)。换句话说,地方这个概念强调“同时存在”于某个现场,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同时存在于教室这个地方。而空间这个概念不要求“同时存在”,更多的时候是与“不在场的他人”的互动。当人们的社会活动能够发生在“不在场的他人”之间的时候,地方和空间就分隔开了(the separation of space from place)。比如说我们在QQ或MSN上跟不在场的同学聊天的时候,我们与同学并没有处在同一个房间,但是我们通过网络空间能够进行交流(see Giddens, 1990, pp. 17-21)。

时间和空间的分隔不仅有“分”的意涵,还有“延”的寓意。正因为时空分隔,所以我们借助媒介(如电话、网络等)的帮助可以跟相隔遥远的人互动,空间的距离就这样被克服了。这合起来就是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ng),这个概念跟哈维(Harvey, 1989)提出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有异曲同工之妙。

时空分延进一步带来了现代性的另一个动力“抽离”。抽离指的是“将社会关系从当地互动情境中抽取出来”(Giddens, 1990, p. 21)。由于时空分延,我们可以跟远方不在现场的人互动,这种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可以脱离对方的情境。吉登斯指出抽离能够捕捉现代性中变动的时空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社会改变和现代性本质来说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抽离超越了时空分延的含义。建构在“分化”(differentiation)或“功能专业化”(functional specialisation)的基础上,有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和象征符号(symbolic tokens)两种抽离机制。专家系统和象征符号合起来又叫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最典型的象征符号就是钱,即是可以流通开来的交换媒介,“钱”由个人

还是群体所有及其特性,对于钱的价值来说并不重要。在现代社会,钱可以通过自动柜员机自由存取,可以通过网络银行灵活转让,转让双方分处不同时空,甚至可以是彼此不知身份的陌生人。在现代社会,钱已经越来越多地简约成为数字,不大需要纸币、硬币这样的实物。相比传统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钱作为一种抽离机制跟现代社会密切相连。专家系统则是组织我们社会生活环境的一系列科技成就和专业技术,比如律师及法律咨询、医生及医疗服务、建筑师及建筑、教师及教育制度等(see Giddens, 1990, pp. 21-28, 80)。专家系统与象征符号一样有将社会关系从直接语境抽离出来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坐电梯的时候,并不会特别担心电梯会突然掉下去,出了电梯后并不会特别担心房顶会突然塌下来砸到自己,因为我们信赖建筑质量,信赖我们看不到的、不在现场的那些设计师、建筑师。而且,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使我们自身也并不需要参与到设计修筑建筑的具体过程当中去,这就是社会关系抽离直接情境的含义。

所有抽离机制都需要“信赖”(trust),信赖由此深度卷入现代制度。信赖与时间或地方的缺失相连,并有“可靠性”(reliability)内涵。信赖反过来可由风险定义,当我们意识到可能面临的风险而仍愿意相信自己所做的选择时,我们就处于信赖状态(Giddens, 1991, pp. 26, 31, 33-36)。恰如贝克(Beck, 1992,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所言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的存在成为普遍状态。当然传统社会也有风险,但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风险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加剧了。过去的风险更多源于自然灾害、饥荒等,虽然有战争风险,但战争范围通常较小。在现代性条件下,风险更多地源自人为,如人类破坏自然环境后引发的生态灾难、恐怖主义、大规模战争爆发乃至核战的威胁,又或者是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按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因为反思性、时空分延、抽离等动力,把人置于不可确定的恒常风险中。在这样

的现代情境下,“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的获得也就更加艰难,即人们很难对自我身份以及行为的社会物质环境的持续稳定怀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信赖的建立就有赖于人们对抽象系统背后知识的信心。以及当人们在与抽象系统的连接点(access points)打交道时,是否信赖其代表人物(如律师、医生、教师等)(Giddens, 1990, pp. 92-100, 114-115)。如遇到医德或医术不好的医生,我们会对那家医院甚至整个医疗系统都丧失信心。总之,反思性、时空分延和抽离就是现代性发展的三大动力,它们与现代性的基本制度性维度相联,并被制度性维度所制约。换言之,三大动力必须落实于下列四种制度之中发展其作用。

吉登斯在分析现代的制度性维度时特别反对单向度思维,他批判了以往社会学家们的简约化错误。不少社会学家在分析现代时要么聚焦于资本主义,要么聚焦于工业主义,并纠结于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谁涵盖谁的问题。吉登斯提出应该用四个基本制度性维度来分析现代性,这样才能概括现代性的复杂多元。这四个维度(如图 2.1 所示)分别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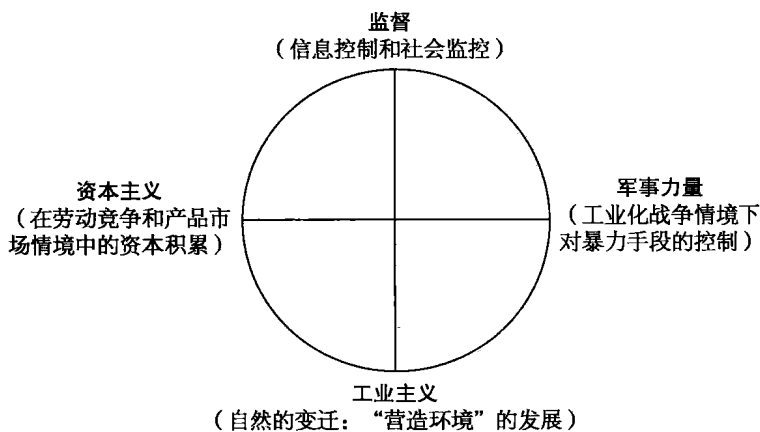


图 2.1 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surveillance)与军事力量(military power)(Giddens, 1990, pp. 55-59)。

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制度,构筑于资产私有权和无产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阶级系统的轴心。工业制度是对非人力(物质力及机械)的管理与使用,其核心在于对机械生产的规划。监督是指对社会行为的监管和对信息的控制,首先是政治领域的,但又超越了政治领域。军事力量是对暴力手段的成功垄断,也是现代国家行使权力的主要后盾。这四个维度相互勾连就是现代性的基本构成了。监督和军事力量两个维度都涉及“民族国家”这一现代社会机构,军事力量往往被垄断于现代国家辖下,国家同时也是信息控制和社会监控的重要主体。工业主义是现代性的轴心维度,导致了“营造环境”(the created environment)的发展。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机械化模式渗入现代生产、消费、交通与家庭生活等各领域。工业主义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反过来又强化了工业化,而现代军事更是离不开工业化支持。监督和资本主义有着交织的关系,资本市场必须对劳动力、资金、生产效率、交易趋势进行有效监察才能运作。资本主义内含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离与互相借力,这样带来了新的政治监督模式,而要想成功地控制暴力手段,就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工业化生产中,监管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是传统社会没有而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制度,监督与军事力量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呈现崭新模式。那么吉登斯的四个制度性维度论述了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工业和军事层面(Giddens, 1990, pp. 55-63)。

继而,吉登斯(Giddens, 1990, pp. 71, 157-171)又提出了一系列四维图分析全球化及现代性其他相关概念。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会全球扩展的,当现代性全球化到来,上述的四个维度就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化劳动分工以及世界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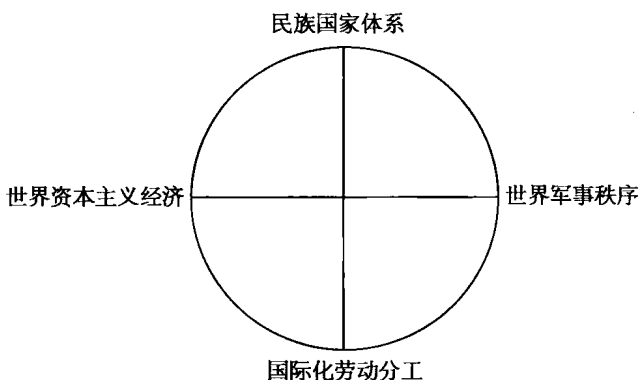


图 2.2 全球化的制度性维度

秩序(如图 2.2 所示),同样涵盖了经济、政治、工业和军事层面。其中,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核心,民族国家体系日益作为整体参与反思现代进程,在全球化情境下民族国家体系与个体国家的主权之间存在着张力。公司,特别是跨国性公司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引擎,并且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从最初就不仅是商品与服务贸易,更涉及阶级关系系统辖下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国际化劳动分工实为现代工业发展的最显著体现,涉及工业化发展程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世界军事秩序作为维度之一涉及战争工业化,武器、军事技术的全球流动及国家之间的军事结盟等(Giddens, 1990, pp. 70-76)。此时可以看出吉登斯模式所缺乏的是文化传播层面,而这个层面的缺乏对吉登斯的现代性/全球化论述来说是个缺憾,当然不仅他一人,很多社会学家都没有对文化传播层面引起足够重视。那么本章接下来会先分析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渊源,然后再追随汤普森的论述,将现代性/全球化理论中所缺乏的文化传播维度补充完整。

现代性与全球化

“全球化”一词,最早由吉登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使用,其后这个学术词汇从学界普及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谈之中(Rantanen, 2005)。全球化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发展与必然结果(Giddens, 1990; Thompson, 1995)。吉登斯对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论述既包括个人生活、个人身份的微观层面,也包括制度的宏观结构层面。全球化被吉登斯定义为“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化”(Giddens, 1990, p. 64),这种社会关系将相聚遥远的不同地点联系在一起,使得当地和远方的事件可以相互影响。汤普森对于全球化的定义是“世界各地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Thompson, 1995, p. 149),这个过程导致了复杂形式的全球互动和相互依赖。正如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连带影响,比如东莞这个地处中国东南的小城有很多加工工厂因此倒闭。这些连锁反应的例子俯拾即是。

全球化的现实也反映在影视文化方面。《我爱纽约》(*New York, I Love You*)是 2009 年底新上映的电影,由 11 个发生在纽约的小故事构成,其中心意旨就是在纽约这个繁华大都市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肤色的人,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习俗在这个城市相遇、交汇和融合,堪称全球化的“经典教学片”。电影由 11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各自拍摄一个小故事而构成,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解读纽约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讲述人与人相遇、相爱的故事。影片中的第一个故事由我们熟悉的中国导演姜文执导,在电影中我们可以听到崔健的歌《花房姑娘》。而另外一个故事里面讲述了一个犹太新娘和一个印度钻石商人的相遇及他们在宗教习俗方面的交流。全球化就

是这样一个过程,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生活、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宗教习俗的相遇、融合甚至冲突。现代性背景下的全球沟通和交流,乃至互相影响和依赖,与传统社会各地域之间相对孤立、交流困难的景象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唐代玄奘西去印度取经,明代郑和下西洋才会成为创举载入史册。而现在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搭乘飞机全球旅行,留学或与国外通商也稀松平常。

从吉登斯(Giddens, 1990)对于现代性/全球化制度性维度的论述及后面将要介绍的汤普森(Thompson, 1995)对于现代制度性维度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是其中重要一环,但并非所有社会学家都认同这一点。“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政府体制的一种形式,是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有明确边界,其主权建立在对彼此边界的承认之上。与18、19世纪传统帝国/王国或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制度不同,民族国家强调共同的认同感以及共同形成的体制。吉登斯和汤普森看重民族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与之相反,很多社会学家强调民族国家在第二现代中重要性的减退。如卡斯特在其新作《传播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 Castells, 2009)一书中再次肯定了“网路社会”的崛起和民族国家的削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贝克等学者的认同。关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有两大基本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依然很重要,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被称为“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s)。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不可避免的下降,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被称为“全球主义者”(globalists)。当然还有另一批持折中观点的“变革主义者”(transformationalists),他们既强调民族国家依然具有重要性,但也看到了全球化的深远影响(Cochrane & Pain, 2000)。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演变到底如何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可以

肯定的是,先进国家步入现代,并进行殖民扩张,外输现代制度。亦即是说,现代性与全球化初期,国家权力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手。这也是吉登斯所指向的阶段。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议题上,以及在现代发展的不同阶段,民族国家的作用都是不同的。不管怎样,民族国家都是讨论现代性与全球化的问题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当然,民族国家问题不是现代性/全球化问题中的唯一争论,另外一个争议性很大的议题就是西方化的争论。

我们已经说过现代性/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现代性与全球化是否等同于西方化。席勒(Schiller, 1969)和汤林森(Tomlinson, 2002)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议题,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不对等地位,也就是西方国家等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入侵,或者形容外来(西方)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征服。而美国作为近两百年来世界头号发达西方国家,有时候人们会将西方化等同于美国化,认为世界在经历一场美国化的宏大变革,这可以体现在牛仔裤、麦当劳、可乐、好莱坞电影乃至英语在全球的流行。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西方化问题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圣诞节在中国的日益流行就是一个例证,圣诞这个源自西方基督教的节日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每年快到圣诞时,很多商场、酒店、咖啡屋还有学校就开始布置圣诞树,挂上圣诞老人像。年轻人(特别是情侣)会筹划圣诞节的安排,年纪大一些的中国人也知道圣诞节的存在。从圣诞节开始,中国人就发短信互祝新年快乐。除了过圣诞节,中国人的服饰也已经全盘西化,牛仔、T恤和西装都成为日常的服装选择。在语言方面,从政府到个人都非常重视英语的教学和应用。随着西方流行文化进入中国,国人的观念也开始越来越西化和多元化,比如对个性的重视、在性观念方面的变化和对物质消费的追求等。

所以很早就有学者担心“西方文化入侵”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现实和影视作品中都有讨论。《阿凡达》(*Avatar*)是由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好莱坞3D科幻电影,于2010年初在中国上映。故事发生在2154年,地球人为了掠夺潘多拉星球的珍贵资源,以武力在该星球上开拓疆土。地球人希望能将潘多拉星球上的土著纳维(Na'vi)部落迁走,给他们修建了现代化的居所,并给纳维人开办语言学校,教他们学英语。但是纳维人拒绝了地球人的提议,仍然居住在大树上,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始宗教、语言和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艾娃神(Eywa)的膜拜。这个发生在地球与潘多拉星球间的虚构故事,实际上是对全球化过程中外来西方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矛盾的一个反映。《阿凡达》故事的结尾是纳维人打败了地球人,纳维文化得到了保护和延续。这个罗曼蒂克式的结尾并不全然是生活中的现实,在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有很多当地文化都受到了影响,或被吸收,或被侵蚀,也有很多付出了血的代价。比如印第安人在美国西部大开发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比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当然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重视对当地文化的保护,现代性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例如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依然保留着传统习俗,中国人最为重视的节日依然是春节这个阖家团聚的日子。虽然西式快餐和西餐在中国越来越常见,但中国人更能认可的还是中式美食。传统的儒家思想也依然对现代中国人有着很深的影响。

现代性/全球化的发展是否就是西方化/美国化,这个问题很难给出单一、明确的答案。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观察来回答,而吉登斯(Giddens, 1990, pp. 174-176)也给出了比较中肯的答案。他认为现代性/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化的问题,取决于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衡量标准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或者说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普及,那么现代性/全球化的确是西方化;但如果衡量标准是世界各地相

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意识的增强,那么现代性/全球化并不简单地等于西方化。现代性和全球化都还在进行当中,非西方地域的卷入和存在不容忽视。但是,吉登斯进一步指出在另一层面也可认为现代性/全球化是西方化。因为现代性特征之一的“反思性知识”不仅是对传统的根本颠覆,也是对其他文化的突破。现代反思性知识,由英语主导了学术生产,所以西方与他方(the West and the Rest)是一种强弱不等的互动。但当不同文化体系在全球化进程被卷入,而且层层深入,混杂于现代反思性知识之中,其作用与反作用不尽能以西方化与殖民化理论解释。无论是现代性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我们必须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媒介与传播的问题。这个问题起初并没有得到社会学家们的太大重视,但现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媒介与现代性的互相建构

吉登斯最早论述现代性时没有太看重媒介与传播的重要性,他只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简单提到如果没有新闻所传递的知识,就不可能有现代组织机构的全球性扩张,并认为传播科技已经深远地影响到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Giddens, 1990, pp. 77-78)。但吉登斯对传媒与传播的论述是浅尝辄止的,他迅速离开了这一论述,没有再进行深入阐释。虽然,他在2005年与学者兰塔宁的对谈中也提到“我已经看到媒介和传播以及它们作为推动全球相互依赖性最重要的动力角色”(Rantanen, 2005, p. 63),但第一个全面论述媒介传播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社会学家是汤普森,吉登斯的学生。他在吉登斯提出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基础上,不再单列原本的“工业主义”,而是纳入“资本主义”维度,同时补充了“媒介传播”这一制度性维度。在汤普森看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军事力量和媒介传

播,分别对应经济、政治、强制和符号四大权力(如图 2.3 所示, Thompson, 1995, pp. 4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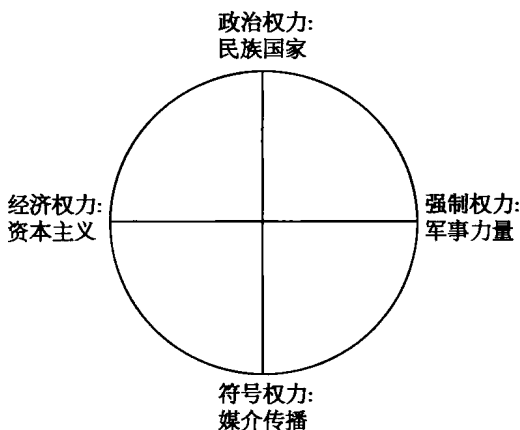


图 2.3 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①

关于民族国家这一制度性维度,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现代性和全球化讨论中有争议的问题,而吉登斯和汤普森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一致,即民族国家依然很重要。并且两位学者一致反对在分析现代性/全球化时采用单向度思维,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业化,或是其他维度,都无法独立解释现代性/全球化的复杂性。所以吉登斯才提出一系列四维度模型来分析现代性、全球化和其他相关问题。汤普森承继了吉登斯的四维度模型,并且补充了媒介传播这个维度,使得两人对现代性的论述更加完整和准确(see Giddens, 1990; Thompson, 1995)。

尽管坚持多向度思维,但是另一方面,汤普森本人非常重视符号权力和媒介传播这个维度,那么这与保持多元思维是否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汤林森(Tomlinson, 1999)早有类似论述。汤林森在论述全球化问题时,首先认为必须有多维度意识,但在实际分析中如果真的每

^① 汤普森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图示,此图为我们根据汤普森思想整理而得。

个维度都分析到却是难以完成的重任,所以必须从一个角度切入。汤林森所青睐的角度是文化路径。因为文化是全球化的内在部分和建构动力,同时全球化也深刻地改变了原本与“本土”概念紧密相连的“文化”^①。那么汤普森在强调媒介重要性时的逻辑与汤林森是一样的。尽管现代性和全球化都是多维度的,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必须选择一个角度切入进行深入分析,汤普森所选的这个维度就是媒介传播维度。学者们的不同偏重,我们可以从他们所提概念中一见端倪。马克思重生产,所以他提出“生产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概念,韦伯重科层组织,他分析“行政工具”(means of administration,见本书第一章),看重传播的汤普森则提出“传播工具”概念(mea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hompson, 1995, p. 16)。拉什与厄瑞极重符号与文化层面,他们甚至认为社会建构于“信息传播结构”(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uctures)之上(Lash & Urry, 1994)。卡斯特亦是重视传播的学者,他立足于“信息传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分析传播权力(Castells, 2009)。可以想象,如汤普森一般重视媒介传播的学者将会越来越多。上文借吉登斯分析了非文化向度,下文我们将集中介绍汤普森的媒介文化论。

在汤普森看来,媒介与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媒介重组了我们的时空,带来了媒介化的历史性(mediated historicity)、媒介化的世界性(mediated worldiness)和媒介化的社会性(mediated sociality)。更重要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使人类从“面对面互动”进入到“媒介化类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面对面互动是传统社会的主要

^① 汤林森为文化所下定义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经典定义。他将文化界定为“人类通过符号表征实践来建构意义的生活秩序”(Tomlinson, 1999, p. 18),这个定义强调文化是一种实践(practices),以及文化是意义(meaning)的建构。

交往模式,互动交流的参与者处于同一个时空,互动双方(或多方)能马上知道对方的反应,交流过程除了语言文字,还有表情、动作、情绪、服饰等语言文字之外的符号线索。进入现代社会后,面对面互动依然存在,但人们的交往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媒介化类互动日益主流化,这种互动指的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而进行的互动交流。汤普森认为在媒介化类互动中,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并不处在同一时空,因而在表情、动作、情绪、服饰等语言文字之外的符号线索是有限的。信息的发送者也很难得到信息接收者的反馈。传者和受者在传播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传者由于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物质资源,而更处于主动性、决定性的地位,受者相比传者要更被动一些(Thompson, 1995, pp. 31-35, 82-87)。

总而言之,汤普森重视媒介,认为媒介调节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综览其书,可发现他将“媒介化”(mediated)一词加诸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类互动、公共性、可见性和体验等多个词语之前。继而,他将“媒介化的”这一特征上升至“泛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普遍现象,分析“文化的泛媒介化”(the mediation of culture)(Thompson, 1995, p. 46),或“传统的泛媒介化”(the mediation of tradition)(Thompson, 1995, p. 180)。文化的媒介化指文化的系统演变,知识和学习在现代社会变得世俗化,媒介工业兴起并日益成为符号权力的主要基础。传统的媒介化指媒介对传统的调节,既使得传统受损、消退和去仪式化,亦可使传统得以保留、交流和演替(Thompson, 1995, pp. 46-52, 180-206)。媒介化概念对于理解汤普森的学术思想至关重要,可以解释为何他会将媒介传播维度列为现代性制度性维度之一。我们在理解、承继和发展汤普森“媒介化”与“泛媒介化”思想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媒体现代”(mediated modernity)理论,该理论亦是综合借鉴本书所涉现代性理论家的思想,目的在于从传播视角提供诠释现

代社会的一种可能性(详见本书第九章)。

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的《媒介与现代性》出版于网络未流行的1995年,在讨论媒介化类互动时自然没有提及网络,而主要分析电视和广播造成的媒介化类互动,这使得他的论述在有些地方不能反映今天我们深度依赖网络的现实,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网络时代来进一步完善汤普森的讨论。比如媒介化类互动发展到今天已有更多新特征。我们如果把汤普森所讨论媒介化类互动称为第一现代的“媒介化类互动”,那么网络所带来的媒介化类互动则属于第二现代的“媒介化类互动”。后者与前者一样,依然可以把遥远的不同地方联系在一起,也依然拥有超文本互用(intertextuality)的特征,可以把信息同时传给大量的受者。但是比之在第一现代,媒介化类互动在第二现代呈现一种虚拟性(virtuality),人们在网络上可以展现超越真实自我的“超我”(hyper-personality)。网络改变了人们的亲密关系(intimacy)和可见性(visibility),让我们的私人生活也可以通过网络呈现给众多个人。由于实时聊天工具(如QQ、MSN等)的普及,互动反馈在网络上也成为可能。网民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自己发布信息,成为信息的“传受者”(prosumer),再加上网络对信息监控难度比传统媒介要大,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够比较容易地接触和使用网络。所以第二现代的媒介化类互动给人们一种印象就是传者和受者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但这种平等依然只是表面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传播机构、精英在网络上的权力仍旧是远远大于普通的个人传受者,而财雄势大的政府及商业集团比庶民更能控制网络技术。当然,我们也承认网络给了很多普通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我的机会,这是一种自由和进步。我们在汤普森讨论(Thompson, 1995, pp. 81-87)的基础上,结合新媒体情境,深入分析和比较了面对面互动、第一现代的媒介化类互动和第二现代的媒介化类互动的具体特

征(如表 2.1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现代大众传播情境下的媒介化类互动,依然有第一现代大众传播情境下媒介化类互动的特征。为易于比较,我们在表中只列出了第二现代新媒体情境下的媒介化类互动特征。

表 2.1 变迁中的人类互动过程

变迁中的人类互动过程		
面对面互动	第一现代的媒介化类互动(20世纪40—90年代,大众传播情境)	第二现代的媒介化类互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媒体情境)
1. 传受可以直接互动 2. 传受方共处同一场所 3. 即时性 4. 互动范围有限 5. 非语言等符号线索十分丰富 6. 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7. 可见性有限,私域相对隐蔽 8. 真实参与	1. 传受难以直接互动 2. 与远方他者互动,不受空间限制 3. 延时性 4. 可与大范围分散受众互动 5. 非语言等符号线索有限 6. 高“互文性” 7. 可见性变高,私域相对可见 8. 类参与(quasi-participation) 9. 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分 10. 生产者与消费者地位的结构性不对等	1. 传受可以直接互动 2. 与远方他者互动,不受空间限制 3. 即时性 4. 可与特定对象或大范围分散受众互动 5. 非语言等符号线索较丰富 6. 超高“互文性” 7. 可见性超高,私域被推向前台,公私域界限开始模糊 8. 类参与,民众难以被动员 9. 消费者亦可成为生产者,使用者自创内容盛行 10. 生产者与消费者地位看似对等,实则普通网民等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11. 虚拟性 12. 超个性(hyper-personality)的建构

媒介与传播改变了现代人的交往模式,也改变了公共性/可见性(publicness/visibility)。权力的实施在于对可见性的控制。可见性与权力的具体勾连方式在不断演替(Thompson, 1995, p. 123)。在中国古代,觐见皇帝是皇家施恩,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殊荣,这是少数当

权者为少数人所见。所以《红楼梦》里,贾府孙女贾元春封贵妃后回家省亲,一路上“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五城兵备道打扫街道,撵逐闲人”(曹雪芹:《红楼梦》,齐鲁书社1994版,页300—301)。一般人是无权见到皇贵妃的。当然可见性和权力也可通过别的方式联系,比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Foucault, 1977)中指出权力的实施可以通过“多数人为少数人可见”。他提出其著名隐喻“全景监狱”(Panopticon),其中少数狱警监视着众多犯人。这少数狱警可以监察所有犯人,不管狱警站不站岗,犯人都自觉被监视而恪守纪律(Foucault, see Thompson, 1995, pp. 133-13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多数人为少数人可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监控器上。十字路口用监控器看司机有没有违规闯红灯,超市有监控器防备着小偷,电梯里有监控器防止人犯罪……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Lyon, 1994, 2001)。我们在监控中得到安全感(监控者同时是保卫者),也失去了安全感和隐私权(监控者同时可以是侵害者)。

在现代条件下,权力拥有者(比如政治精英)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让其为大多数人可见。权力可以提高知名度,知名度也可以强化权力。网络中,权力的可见性比之从前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没有面对面互动的人性化,没有古代皇权可见的仪式化,不需要与观看者处于同一时空,既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力,有时也反而会削弱当权者的权威。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全面展开报道,被关注者是四川灾民,关注者是全世界。“多数人为多数人可见”,这是自然的力量、人道的力量。还是2008年,陈冠希与众多香港女星拍的艳照传上网络,网上网下炸开了锅。照片风传、媒体热议,“几个人为多数人可见”,这是道德、法律和人性的博弈。艳照门等网络丑闻事件对我们的警醒在于,我们的私人空间为公众可见从此成为可能。

据汤普森分析,在传统社会可见的是公共范畴(public/publicness),在现代,包括家庭和个人生活在内的私人领域被推到台前为众人观赏。以前被看的是贵族、精英或者罪犯等非大众人士,现在被看的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正如汤普森所言,现代公共性失却具体的置身之所,变成“媒介化的公共性”。相应,可见性也被媒介化。私域亦成可见域,“公”与“私”的界限在不断重置。更重要的是,这种可见是脆弱的。过去可见是为了展现和巩固权力,现在被看得见越多权力也许更小(see Thompson, 1995, pp. 120-125, 134, 140-141)。

在给当权者赋权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他竞选的成功与其对媒体的成功运用密不可分。奥巴马的“改变”理念被媒体广为传播,其形象在电视上频频出现,他更在 Facebook 等网络平台发布自己的信息和演讲视频,赚尽人气。在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当日, Facebook 联手 CNN 共同直播,为其造势。奥巴马由此被称为“互联网总统”、“Web2.0 总统”。通过对媒介的运作和对可见性的控制,奥巴马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其权力的实施也将继续依赖于此。但汤普森指出无所不在,甚至是无可逃避的可见性,也削弱了当权者的神秘感和权威性,甚至将他们的丑闻也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公众面前。比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缺乏政治常识、语言表达能力欠佳、不懂装懂等很多缺点就被媒介反复报道,以致国内外人尽皆知。由此可见媒介传播对人际互动和可见性的具体影响。回到宏观层面,联系之前提到的现代性制度性维度(Thompson, 1995),媒介传播与现代性其他三个维度的关系依然是密不可分。

总的来说,媒介传播为现代性所建构,同时建构了现代性。由于传播科技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影响力日增。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权力共同构成限定媒介传播发展的社会结构。军事力量的强制权力是媒介传播发展的首要推动力,正如

马可尼的无线电报技术最早是为英国海军服务的,而现代民用的互联网也是从美国军方的阿帕网(ARPAnet)脱胎发展而来。反过来,现代民族国家、经济生产和军事通信早已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媒介传播所拥有的符号权力在现代性建构中逐渐势大,未来媒介传播的发展和威权将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这一点将由时间来证明。

现代性是对传统的突破甚至颠覆,很多社会学家对传统持否定的态度。即使是吉登斯(Giddens, 1990, p. 36)也认为“现代性思想里隐含着与传统的对立”。但是汤普森重新认识和诠释了传统,他认为传统是现代的一部分,尽管是削弱了的传统。前人之所以看轻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前景,正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媒体在其中的角色。汤普森从媒体切入现代性,以极大耐心分析媒体对传统的改造。当中并没有全面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而是细致分析此对立之中的曲折承传。他把传统礼仪在社会中的运作分为四个层面:1. 诠释层面(hermeneutic aspect),传统具体而重复地演绎于礼仪,代代相传,给世人提供诠释和理解世界的框架和背景。2. 规范层面(normative aspect),传统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向人训示可为与不可为。3. 认受层面(legitimization aspect),传统亦用作巩固权威,加强其认受性。4. 身份认同层面(identity aspect),个人依附传统,认同权威,归属社群,长幼有序,延续并安顿了身份。当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传统是媒介化了的传统。回到上述的四层作用,现代媒体削弱了传统的规范与认受层面,因为媒体传播多元规范,远方的生活方式就通过大众媒体供人参考,规范相对化了,约束力亦有所减少;而权威的认受性也因此被侵蚀。然而,媒体并非全然削弱传统,在诠释与身份层面更有加强及扩展之效,是人们理解世界和形成归属感的重要凭借。媒介化了的传统,具有去仪式化(deritualized)、去人性化(depersionalized)和非地域化

(delocalized)的特点。由于媒介的介入,很多传统文化被媒介保留下来,比如书籍/报纸记载、广播音频、电视视频还有网络对传统的记录和传播,不仅传承了本国、本地域的传统,也介绍推广了其他文化的传统。现代媒体成为现代人自由选取价值与观点的巨大数据库,让人从中建立对社会的诠释与自我的身份认同。除了正面作用外,媒介亦让古旧的文化传统变得脆弱,成为商家促销或者旅游推广的工具,或者在记录保存的过程中出现歪曲事实,甚至炮制出伪传统,以吸引游客,为文化商品增添卖点(Thompson, 1995, pp. 180-206)。

上文分析了媒介传播对可见性和与传统的关系,让我们理解媒介如何在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改变了现代人的视野和生活面貌。其巨大作用并不全然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作用和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重视媒介传播对现代社会和个人的作用,用批判的眼光去分析媒介传播与现代性的关系。在社会学家里面,汤普森和卡斯特都重视媒介传播在现代性中的重要性,都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处在权力不对称的社会结构当中。但汤普森主要是在第一现代情境下论述电视等传统媒体,而卡斯特主要是在第二现代情境下论述网络等新媒体。因此汤普森基本上只涉及大众传播,而卡斯特还涉及普通网民参与的“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在肯定媒介传播作用的同时,汤普森并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卡斯特则认为在网路社会这个现代性更高的阶段,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已经降低(see Castells, 2009)。关于卡斯特及其观点本书第八章将有更深入的论述。

整合理解吉登斯与汤普森的学说,对我们是很有裨益的。吉登斯总揽全局,提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汤普森补遗媒介传播维度。反思性、时空分延和抽离概念乃吉登斯思想精髓所在,这三大动力贯穿现代性进程,并与汤普森所讨论的媒介传播紧密交织。吉登斯的反

思性强调主体对自我、对社会及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和关照,这有赖于信息的生产、传递和接收,而承担信息运作重任的主要社会机构即媒介工业。时空分延更是建构在以媒介为主的社会机构之上,倘若没有媒介,我与你之间若要沟通得约定某个时间不见不散。有了媒介,我在香港,你在纽约,早晨新闻传来“9·11”事件,双子塔倾,夜里你email来,报得平安。抽离于你的、我的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嵌入共同的网络“空间”,从而获得“不受空间束缚的即时性”(despatialized simultaneity, Thompson, 1995, p. 32)。汤普森的学术思想汲取了多方营养。他发展吉登斯的现代性讨论,继承其诠释学传统(hermeneutics)。他也谈“自我”(self),但没有吉登斯和贝克那么细腻微观。在某种程度上,汤普森也有些受涂尔干和人类学传统影响,这体现在他对于历史性的讨论。总体而言,汤普森很善于将各位大师所长融会贯通,然后形成自己的新意,同时他是一位具批判性的学者,这些特点在汤普森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详见本书第三章)。

现代性中的“自我”

前文所说反思性、时空分延和抽离是现代性的动力,属于哲学层面的思考。而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从社会层面宏观地考察了现代性制度性维度。汤普森补充的媒介传播维度使得现代性的论述更为完备。

实际上,现代性发展有两个面向,一是泛化(extensionality),一是深化(intentionality)。全球化是现代性泛化发展的必然性结果,而现代性的深化则指向个人化方向。现代人的自我身份是现代社会机构形构的结果,但现代自我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机构(Giddens, 1991,

pp. 1-2)。吉登斯讨论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是从宏观层面考察现代性,作为一个大开大合的作者,吉登斯同样也会关注细微的问题。吉登斯、汤普森师徒对现代性微观层面的论述同样不失精彩,且吉登斯的功力要高于汤普森。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人们亲密关系的变迁(Giddens, 1992),“自我”建构于“生活方式”(lifestyle),从而成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给人们提供多元选择,指向社会平等和促成性的权力(Giddens, 1991)。汤普森则认为现代自我是项“符号工程”(a symbolic project)及远距离无回馈的亲密性(Thompson, 1995)。我们可以看出,吉登斯和汤普森在微观个人层面对现代性的论述依然是一脉相承、逻辑一致的。吉登斯原创性地提出了“生活政治”的概念。汤普森仍旧重视媒介作用,所以他强调自我在现代社会的符号性。汤普森对“无回馈”的强调,再次体现了他对媒介的论述停留在第一现代情境下的传统电子媒介。

“自我”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到底有什么不同?通俗地说,自我在传统社会是给定的(pre-given),而在现代社会是需要自我经营的(self-construction)(Giddens, 1991)。花木兰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自我在传统社会是如何被先天设定的。通过古诗《木兰辞》、好莱坞动画《花木兰》,以及2009年底赵薇主演的电影《花木兰》,我们早已熟悉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那么花木兰的父亲虽然高龄还被应征入伍的原因就在于花家世代是军户,必须代代服兵役。当然花木兰的故事大致发生在北魏时期,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每个朝代都实行给百姓限定职业的制度,但是古人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他所出生的家庭决定。血统、家世或者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功名(状元、举人或者秀才)——这些身份标签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对于中国古代的女人而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丧从子,女人的一生就这样为三个男人所界定。家族血缘关系犹如一张网,而“自我”就深陷

网中央,“自我”的自由度在古代非常有限。由《花木兰》案例可见,媒体化的传统,使规范相对化了,削弱了权威(事实上好莱坞的动画《花木兰》注入了女权价值),但同时活化了现代人对中国传说的诠释,亦给中外受众自由认同一种几经转化的女性身份。

现代性让“自我”得到释放,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却也使之成了一项工程,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建构。比如在现代性条件下的性欲关系需要双方的自我表露和互相发现。而这种自我发现和询问的过程与现代反思性紧密相联的。总而言之,亲密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体现在自我建构成为一个“反思性工程”(a reflexive project),由个人去从事、追求和自我成就,要求将“自我”向“他人”展现,并不断修正(Giddens, 1991, 1992)。在现代社会,婚姻不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是“个人问题”,由个人自己解决。结与离的过程,既是发现对方,也是发现自我。向对方展现多少自我、保留多少自我,都是自我协商、调试的过程。正如电影《色·戒》中王佳芝心中的千回百转:他是真心的吗?而王佳芝自己又何尝敢确定自己对易先生的感情。那颗硕大的鸽子蛋钻戒是否就能代表男人的真心?佳芝死后易先生的独白到底是真情,是虚伪,还是冷酷?无法确定。这也许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现代性条件下的亲密关系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心、智与情去探索、去维护。

吉登斯(Giddens, 1991, 1992)对生活方式、生活政治和纯粹关系等概念的探讨,是以“超现代”(high modernity)为背景的。在第一现代中“自我”自由度增大,自我需要在反思和显露中建构和自我实现。而在“超现代”,亦即第二现代,人们开始更多地追求“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即纯粹的现代爱情和现代友谊等。纯粹关系诉求伴侣或朋友间的情感满足,而非外在条件和物质利益等,从而摆脱社会结构束缚。这种关系只有通过彼此表露和承诺才能形成信赖。吉登斯更

指出自我形成有赖于抽象系统,特别是专家系统。现代孩子的孕育期有胎教,培育期有早教、幼教,育儿专家的意见往往比孩子祖父母们的更受重视。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直至大学,教育系统对于人的成长和自我形成起到关键作用。成年后,人们若有心理困扰开始越来越多地咨询心理医生,婚姻若有问题则求助于婚姻顾问……专家系统既深度卷入现代性宏观制度,亦是自我形成与延续的保证(Giddens, 1991, p. 3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Giddens, 1991)在讨论自我形成时谈到了媒介(印刷和电子媒介)在远方事件影响亲密关系中扮演着中心角色。汤普森自然是将吉登斯的这点零星论述发扬光大。对汤普森而言,自我的形成是个“符号工程”,它是反思性和开放式的。自我形成过程不断被媒介化的符号资源所建设。媒介的发展不仅丰富和转化了自我形成的过程,也产生了一种不同于面对面互动的新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已媒介化、无需共享一个地方、非反馈性的亲密关系(non-reciprocal intimacy),而自我也被展现在非本地的知识(non-local knowledge)面前。媒介丰富和强化自我的反思机制是媒介的正面作用,汤普森也客观地看到了媒介的负面作用。比如在媒介传播过程当中意识形态的嵌入;自我的反思机制依赖于媒介系统的符号资源,而自我难以控制这一媒介系统,于是自我的反思性和依赖性同时存在;过多、过度的信息带来符号的超负荷,从而使自我失去方向感;以及自我被媒介化类互动所吸收(Thompson, 1995, pp. 207-232)。时空分延,在本质上冲击着人们的身份认同。传统社会,人们稳定地身处同样时空,体验的获得自然而然。时空分离后,人们在不同情境发展不同生存经验或者媒介化体验,从而有碎片化和不稳定感,而媒介化体验也需要我们努力去获取。伴随百度、Google 和维基百科等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知识,我们必须不断吸收、选择和判断知识,进行自我

修正和自我创造,才能续存于现代之世。于是,我们有焦虑感。

现实情况正是如此,媒介极大地改变了自我形成和表达,自我被他人的认同和界定不仅仅是生活中的面对面交往,更多的是经由媒介的“自传式叙述”(an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Thompson, 1995, p. 215)。我们每天起床或者外出回来,第一个习惯性动作也许就是打开电脑,登录上QQ、MSN等实时聊天工具,上上开心网等社交网络,看看有谁的头像是亮的,看看别人的个性签名,更重要的是根据自身心情、动向改改自己的个性签名。也许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我情绪的波动,但是透过签名你发现了我生活改变的蛛丝马迹。有时候我们的签名告知大家自己所在的地点:在家、在学校还是在办公室;有时候我们的签名告诉大家自己在完成什么作业;又或者在签名档上告诉所有人我恋爱了,我失恋了,我快乐了,我难过了。有的人喜欢在QQ空间或者MSN Space上放很多相片,有的人会写下很多的文字。当然照片和文字都是精心挑选编辑过的,这些信息符号按我们的构想展现给大家一个编辑过、建构过的“自我”。透过QQ、MSN和微博等,我们可以在一个又一个开放权限的空间内游荡,我们把自己展现给朋友或者陌生人,也观看别人展现出来的自我。我们在网络上互相倾诉、互相依赖。网络所展现“自我”的个性、爱好甚至身份都可是虚拟的,是在媒介中、在符号里建构出来的。这样的“自我”似乎不够真实,可又如此确切。当人人都在网络的空间里建构或多或少的“自我”的时候,如果你在虚拟空间里的“自我”是空白,你会否感到一丝孤独和些许落寞?或者,另一方面,无论我们在网络上多么热闹地自我讲述,这个自我又有多少真实,多少温暖?我们在网络上相遇了,即使素不相识,也可能陷入新的关系。在网络上维系感情,似乎即使天各一方也可以让关系延续,不怕沧海桑田。又或者说,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不论是宏观的社会发展,还是微观的个人生活,

唯一笃定的就是媒介与传播已经深深嵌入现代社会生活,我们无从逃脱,也不打算逃脱。于是,现代个人无可避免地陷入吉登斯所说的“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existential uncertainty)中,人们不懈追求“本体安全感”,但焦虑(anxiety)却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状态(Giddens, 1991, p. 35)。下文是发生于笔者与一个考研女生之间的对话,可以清楚地说明现代人的这种焦虑感。

考研女孩:最近看到一个清华学生在港求学的经验分享,里面说“上帝不会遗弃你”。确实感觉到现在大家都太焦虑了,考研的、工作的、申请留学的,包括自己在内。

笔者:对的,是这样的。

考研女孩:总会不由自主担心未来怎么办,如果没结果,怎么办?

笔者:不过,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生活过下去,对吧?还得让自己尽量过得好一点,过得开心一点。

考研女孩:嗯,是啊,slowly 一点也没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社会氛围的关系,没有人提醒我们可以慢一点,慢慢来。

笔者:对啊,这个社会不允许你慢。

考研女孩:昨天有去华工^①,本来打算去听宣讲会,结果场外都已爆满,竞争压力好大。我跟同学去的,想凑凑热闹,看看人家的招聘要求什么的,不过没能入场,有如世博场馆的感觉,不过现在哪里的就业压力都大。

笔者:对啊。不过,到最后大家应该还是会有自己的位置的。

考研女孩:嗯哪,所以才会有“上帝不会遗弃你”一说。我现在也就让自己少想点这些了,不然总感觉脑子里乱糟糟的。

① 即华南理工大学。

笔者:嗯,控制情绪很重要,这是现在必备的能力了。98 天啊^①,好好准备,参加了考试再说,别的不要多想。

考研女孩:嗯。

介绍至此,现代性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是现代、高效、平等的社会制度,是更美好、开怀、自由的生活,还是淡漠的人情、冷酷的理性?对现代性病理,马克思将之形容为“怪兽”,这个怪兽归根结底可为人类驯服,因为人类总能驾驭自己的创造物。韦伯还是悲观,他认为陷入极端理性的现代社会是束缚人性的“铁笼”,悲哀在于我们无法逃脱。而吉登斯则用“战车”(juggernaut)来比喻现代性。现代“战车”的驰骋携有无可抵挡之势,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控制其驱动,但它总有脱轨而出甚至撞得四分五裂的危险(see Giddens, 1990, pp. 137-139)。现代性难以好、坏简单形容,唯一确定的是我们无法“下车”。现代性给人类生活带来进步和繁荣,也给我们带来灾难和退步,人类沉陷于“本体安全感”与“存在状态的焦虑感”之间的纠葛。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给大家徐徐展开现代性的多重面貌。

本书讲述的现代性,是被媒介化了的现代性,是在不断全球化中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符号权力的交织中,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演变,民族国家的浮沉,世界军事秩序的张力以及信息传播的威权为现代性所建构,又深入地建构着现代性。现代性让“自我”成为工程,成为反思,成为叙述。现代性的历史轨迹让人类社会逐渐从第一现代行进到第二现代,而传统余晖也依然残照。

^① 这段对话发生在2010年10月9日,通过网络聊天系统 Google Talk 进行,其时离这个女孩参加2010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约98天。



媒介化mediation意识形态visibility意义系统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meaning权力符号文化ideology多元自由主义power
批判理论public culture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文化工业JB Thompson



媒介化mediation 意识形态visibility 意义系统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meaning 权力符号文化ideology 多元自由主义power
批判理论public culture 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 文化工业JB Thompson



媒介化mediation 意识形态visibility 意义系统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meaning 权力符号文化ideology 多元自由主义power
 批判理论public culture 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 文化工业JB Thompson



媒介化mediation意识形态visibility意义系统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meaning权力符号文化ideology多元自由主义power
批判理论public culture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文化工业JB Thompson

第三章

媒介化的现代性与社会机构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较全面地勾勒了现代性的整体轮廓。汤普森补充吉登斯所忽略的媒介传播维度,将之定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在讨论现代性特征时,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是最常提到的两项,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到吉登斯都是如此。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两个特征贯穿现代性进程,它们的发展演绎影响着现代性的具体呈现。汤普森的贡献在于捕捉到媒介化——现代性这个曾被忽视但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浸淫在各种传播媒介之中,现代性在脱胎于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发展之后已被深度媒介化,从而成为“媒体现代”。

媒介化是汤普森着力发展的概念,加之他对“意识形态”与“文化”两个概念层层深入的对比和结连,使得他的理论对以意识形态与文化为业的传播学界有莫大的启发作用。汤普森对意识形态的讨论见于其著作《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大众传播时代的批判社会学理论》(*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ompson, 1990)。该书有两大主题:一是提出批判性意识形态概念,调和多元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在意识形态/文化讨论

中的长久分歧。二是分析“现代文化的泛媒介化”概念(the mediatization of modern culture, Thompson, 1990, p. 12),讨论现代社会与意识形态如何呈现于媒体。我们在上一章曾介绍汤普森如何分析“文化的泛媒介化”,其实汤普森早在1990年讨论意识形态时就提出“泛媒介化”概念,并做了更充分的论述。媒介化概念看似普通,但它有媒体能够改变社会结构的意涵,实则为一个非常大胆的设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这本书的批判性很强,汤普森用批判态度去剖析意识形态,而不是持中立或肯定的态度。汤普森的批判性也体现在他时常批驳其他学者的学说,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汤普森的好批驳跟他的老师吉登斯很不一样。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介绍三大社会学之父的学说时,特意强调自己不是批判的(见本书第一章)。这跟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人很牛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由吉登斯的个人风格所决定的。20年后,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依然是以深度及系统化的分析为主,批判性并不强,他较少驳斥其他学者观点,更多的在于建构自己的体系,随之提出启发后人讨论的很多概念。汤普森采用批判分析,他的写法是首先综述某个学者的主要观点,然后批驳其有哪几点不足,接着提出自己的修正。吉登斯的不甚批判和汤普森的批判写法是各有千秋,从中可以看到学者们的不同风格甚至性格,也可由此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观点。

汤普森看到并分析了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性的影响和构建,他广泛使用“媒介化”概念,也析出“泛媒介化”现象(Thompson, 1990, 1995),甚至提到过“媒介化的世界”(a mediated world)(Thompson, 1995, p. 207),却未能正式提出“媒体现代”构想,尽管他的《媒介与现代性》和《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两本书实际上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媒体现代”这个概念的缺席也体现了汤、吉二人的不同。吉登斯比汤普森更擅长于抽象和提出概念,而概念是简洁、浓缩和深具影响力的,

因此吉登斯所提出的概念能引发后人的持续讨论,比如全球化、反思性和时空分延等(见本书第二章)。汤普森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意识形态讨论,他的意识形态概念成为后来学界相关讨论的主要出发点。所以吉登斯和汤普森组合在一起,就能让传播学者更系统地结连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现代文化与传播媒体。我们这本书的现代性讨论就是以吉登斯为框架,以汤普森为路径,去看待现代世界,去讨论传播学说。然后从贝克、鲍曼、戴扬和卡茨、拉什与厄瑞、卡斯特等学者的视角,去逐个了解“媒体现代”的不同侧面。

批判性思维:意识形态与权力

“意识形态”一词,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在政治领域、学术领域以及新闻媒体中,不时会出现这个术语。有关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定义和分析汗牛充栋,而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替大家做了耐心梳理,这本书不仅是我们的讨论意识形态时主要借鉴的观点,也是文献综述的范例。读汤普森这本书可以把握两个脉络,一个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发展,一个是“文化”概念的历史发展,而这两个概念都与传播媒介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是如何把意识形态与文化两个重要概念进行了勾连与区分,又是如何阐释了它们在媒介化与符号化过程中的软力量的。

意识形态的中性与负面解读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在其后两个世纪的演进中,不同学者纷繁复杂的论述有着各自不足。汤普森批评前人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忽视了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的本质和影响,继而他将意识形态紧密地与大众传播媒介联系在一起,提示我们关注

“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本质与角色”(Thompson, 1990, pp. 2-3), 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概念”(a critical conception of ideology) (Thompson, 1990, p. 6)。综合来说,这个批判性概念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被符号承载,在结构性社会情境下为权力服务的意义系统,从而建立和维持整体不平等的支配关系(meaning system in the service of power, which is mobilized by symbolic forms, and establishes and sustains systematically 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in the structural social context) (see Thompson, 1990, p. 7)。这是一个具批判性、结构主义和文化取向的意识形态定义,在这个定义中有三个关键词: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①、权力(power)和符号(symbolic)。首先意识形态是意义系统,是意义中的一种,其次是意义与权力的勾结。之后我们在讨论文化概念时会发现,文化也是意义中的一种,那么意识形态跟文化区别何在?区别就在于意识形态是为权力服务的,其结果是导致了不平等。最后,意识形态由符号承载,所以生产和传递符号的传播媒介就成为意识形态运转的场域。理解和掌握了这三个关键词,我们的思路便较为清晰。

汤普森的这个定义是从批判的角度负面地去理解意识形态,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负面定义(the negative conception of ideology),与之不同的是意识形态的中性定义(the neutral conception of ideology),在此我们可以遵循汤普森的思路回顾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历程。“意识形态”一词最早为法国哲学家德·崔希(Destutt de Tracy)在1796年所使用,意思是观念的科学(the “science of ideas”),是第一科学,是对观念起源、组合和传播的系统诠释,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界定,没有负面含

^① 在原文中,汤普森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为权力服务的“意义”(meaning),但他实际指的是“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所以我们在本书论述时一概将“意识形态”表述为“意义系统”。

义。这一解读出现在现代社会诞生早期的背景下,使得意识形态概念秉持当年的启蒙主义精神:相信人类理性理解世界以及理性地自我决定的能力。实际上,从德·崔希到拿破仑、马克思等人都秉持启蒙主义精神。德·崔希的正面解读后来很快就让位于意识形态的负面解读。首先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意识形态对他而言不是崇高的“观念的科学”,而是观念本身,并且是应当被嘲笑和摒弃的虚幻观念,因为它们脱离了政治现实。他把意识形态之说贬为无事找事的学术空谈,背后亦有转移批评者视线的政治目的。最出名的意识形态负面定义来自马克思,他保留了拿破仑定义中的负面含义,并将之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使意识形态成为有力的批判工具(Thompson, 1990, pp. 29-33)。

首先要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定义具有复杂性,在其不同著述中的论述有着意义上的不同,汤普森将之大致划分为三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概念(the polematic conception),意识形态的附属概念(the epiphenomenal conception)和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the latent conception)。意识形态的争论概念之所以被称为“争论的”,在于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驳斥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①时所使用的概念。这里的意识形态被定义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种理论学说和实践,它错误地认为“观念”是能动有效的,可以独立于社会历史条件而自主存在。马、恩在使用意识形态争论性概念时与拿破仑的逻辑基本一致,都认为意识形态是脱离政治现实的虚幻观念。但马克思超越拿破仑的地方在于后者是将意识形态概念用于个人权力斗争,而马克思

^① 青年黑格尔派是19世纪30年代在黑格尔死后形成的激进派,在40年代分化和解体,也被称为黑格尔左派(Left Hegelians)。青年黑格尔派反对黑格尔思想中的保守倾向,力图从它的辩证方法中引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青年马克思也曾经加入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并影响了他早期思想的形成,但是后来马克思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尖锐批判。

则关心其理论开拓及将其用于阶级斗争(Thompson, 1990, pp. 33-37)。

意识的附属形态概念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表达强势阶级利益,并以虚幻形式表征阶级关系的系统观念。从这个定义开始,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紧密交织,内含阶级关系的不平等性,这是马克思影响汤普森意识形态讨论的重要概念。意识形态的附属概念从此奠定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曾介绍过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这一理论框架即认为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附属于经济基础,为其所决定,所以汤普森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理解命名为意识形态的附属概念。这个概念对后来的批判思潮影响深远,从此,意识形态不再是德·崔希分析中无法进行具体政治探讨的崇高“科学”,也不再是局限于某个驳斥对象的具体观念(如拿破仑的分析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争论概念),而是适用于普遍经验研究的理论分析工具。在意识形态的附属概念中马克思是相当乐观的,因为这个概念隐含着一个大前提:认可现代社会的进步特征。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所倚赖的阶级关系可被暴露出来,所以无产阶级的觉醒和革命才成为可能(Thompson, 1990, pp. 37-40)。

但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则要悲观得多,是有关失望或挫败的故事,这个概念认为无产阶级可能依然无法看清自己的处境或者被意识形态所蒙蔽。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的表征/再现(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s),它帮助维持现有阶级支配关系。意识形态让人们遵循过去而非面向未来,或者被掩饰阶级关系的形象与理想迷惑,从而阻碍社会变革。这个概念之所以是“隐性”的,首先因为马克思在此没有明确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第二个原因在于隐性定义承认历史的复杂性,意识形态中的符号建构(symbolic construction)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效力,而不仅仅由经济基础所

决定。也就是说,这个隐性概念是无法纳入马克思著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Thompson, 1990, pp. 40-41),又或是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发展了这个模型,使得马克思学说不至于真正落入经济简约主义(economic reductionism)^①的误区。不过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附属概念和隐性概念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阶级简约主义(class reductionism)^②,即将意识形态讨论通通理解为由阶级关系所决定,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留给后人很大的讨论空间,提示“符号建构的盛行和传播能够维持社会关系以及阻碍社会变革”(Thompson, 1990, p. 41),汤普森意识形态定义中对符号的理论开拓就是一例,他借马克思这个概念的模糊性注入了当今媒体现代的内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争论概念、附属概念和隐性概念中的微观区别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细细体会。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学说中最强大的部分,也是其最弱一环。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受益于此亦受制于此,要不停发展意识形态理论以呼应新的社会情境。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隐性定义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这个概念直接影响了汤普森的意识形态理解(Thompson, 1990, p. 56)。如前所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附属定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之中。而他的隐性定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一定程度自主性和效力的符号建构”

① 经济简约主义指过于看重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力量,认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完全由经济基础决定,经济简约主义是很多学者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批评。客观地来讲,在众多学者中马克思的确是最为看重经济基础的,但是马克思并非没有意识到和论述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其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对上层建筑能动性的论述虽然不够充分,但马克思唯物主义不是经济简约主义,费尔巴哈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才是。

② 阶级简约主义指仅用阶级关系为准绳来分析社会关系,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认为这两个阶级的冲突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解释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唯一主要原因。马克思学说的确存在阶级简约主义的问题,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往往过于看重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而忽视了社会中由于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等各种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和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Thompson, 1990, p. 41), 所以隐性定义不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中或者说修正了该模型。隐性定义最大的意义在于其注重符号建构及其表征过程, 这给我们传播学的发展和首要性埋下了重要伏笔。

在拿破仑、马克思之后, 学界出现了一种将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的倾向。比如后来的列宁(Lenin)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契(Lukács)^①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等论述都是将意识形态中性化, 因为此时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仅为资产阶级独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并以此为武器去赢得革命胜利。这样就去掉了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的负面含义, 即代表强势阶级并巩固阶级不平等。简而言之, 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阻碍, 列宁和卢卡契的中性定义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此外,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Mannheim)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中性定义: 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概念(the total conception of ideology)。根据这个界定, 意识形态不再是某个政党的武器, 而是思维系统和行为模式的交织, 意识形态被社会环境决定并由人们共享, 意识形态分析作为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成为研究社会和知识史的方法。亦即是说, 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时代的知识结构, 时代起落, 知识推陈, 研究意识形态就是探求时代知识变化的肌理。此时,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讨论摒弃了阶级支配、权力等概念, 使意识形态回归德·崔希传统, 即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科学。但是, 不同于德·崔希的是, 曼海姆强调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分析所处的社会历史情景。也就是说, 所

^① 卢卡契(1885—1971), 匈牙利人, 以其著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他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有概念并非科学的存在,而是由社会条件激发出来,有社会背景在其后,我们在理解不同社会情境下的观念时要看到社会变迁与思想观念的关系。在曼海姆看来,思想观念有其生命周期,如“三从四德”观念在中国的生命周期已基本终结,而“理性”观念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社会支配性观念。研究意识形态,也需要研究思想观念的生命周期。此外,曼海姆对意识形态一共有两个界定,除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概念(the total conception of ideology),另外一个为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概念(the restricted conception of ideology),这个局限性概念依然保留了意识形态的负面含义,认为意识形态是有悖真实、被社会条件局限的观念,并且在实践中无法实现(Thompson, 1990, pp. 44-52)。

综上所述,在意识形态的多种概念中有两大类:中性概念(neutral conceptions of ideology)和批判性概念(critical conceptions of ideology)。中性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或者社会探寻的一种形式,不论是强势群体还是从属群体都可以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既可以维持现有社会次序也可以促进社会变革。批判性概念负面地看待意识形态,这些概念或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不切实际”而又“错误虚幻的”(如拿破仑的界定、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争论概念和曼海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概念);或者意识形态是“错误虚幻”,“表达强势阶级利益的”(如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附属概念);又或者意识形态是“错误虚幻”及“维持现有阶级支配关系的”(如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不论负面的标准是什么,意识形态都是应当被批评和揭露的(Thompson, 1990, p. 54)。

批判性解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中性化倾向,磨平了这个概念最锋利的棱角,汤普森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回归马克思的负面定义。于是汤

普森保留了马克思的批判锋芒,进而发展了马克思的负面概念,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被符号承载和服务于权力的意义系统,用于建立和维系不平等的阶级支配关系。汤普森主要借鉴了马克思隐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但只保留了其两个负面标准之一的“维持阶级支配关系”,而不一定需要“错误”或“虚幻”,这样就将我们从必须证明意识形态错误虚幻性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之前我们说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阶级简约主义的问题,汤普森对马克思的发展即体现在他认为阶级关系只是支配—从属关系的一种,只是造成不平等和剥削的其中一个原因,阶级关系不是意识形态讨论中的全部和唯一要素。社会生活中的其他矛盾冲突也同样重要,比如不同性别间的、种族间的、个人与国家间的、国家与国家间的不平等。汤普森另一个更重要的发展在对符号的认识方面。如前所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已开始看重符号的作用,但是其论述只看到了符号及其承载的意义在作为意识形态时,可以“维系”现有社会关系,而没能看到符号可以主动地形成社会关系,从而“建构”社会现实。认识到马克思这一论述的不足,汤普森由此把意识形态界定为建立和维系支配关系(Thompson, 1990, pp. 55-58)。

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为权力服务的意义系统,更是符号化的意义(meaning mobilized by symbolic forms),为符号所建构和传递。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中承载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场域,有关这一点是汤普森之前其他讨论意识形态的学者未有如他那样详尽论及的。我们并不是说在大众传播媒介普及之前,社会中没有为权力服务的意义系统,而是强调“没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意识形态无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Thompson, 1990, p. 19)。但是,并非所有的符号都是意识形态,只有当它们为权力服务时才是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符号在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下的使用和理解。意识形态必须被置于

“结构化的社会情境”(structured social context)下去定性和解释(Thompson, 1990)。强调社会结构/情境是汤普森的特点,汤普森这个思想与后来很多文化研究学者的观点相呼应。当吉登斯提出的全球化成为研究热点后,不少学者从文化研究路径去分析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ty)现象,也就是在全球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混合各种不同地域的文化,呈现混杂多元的特征。这通常被认为是尊重文化差异、实现世界融合的进步表现。但是克瑞迪(Kraidy, 2005)等学者提醒我们依然要注意文化混杂中的权力关系,要注意将文化混杂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下进行分析,关注文化产品在生产和解读过程中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从汤普森到克瑞迪都是在谈符号的社会使用问题(the social uses of symbolic forms)。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考量融汇在一起并重视权力因素,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文化混杂的一个重要思路。

汤普森的意识形态批判性概念让我们思路清晰,能搞清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不是。而在较为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中,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观念系统,它可以属于任何群体,可以为权力服务,也可以对抗权力。那么请问,此时此刻,“意识形态”(ideology)跟“思想观念”(idea)一词有何不同?既然观念、意义系统都是意识形态,那么反之什么都不是意识形态呢?这样的中性界定让我们如何在经验层面进行具体的意识形态分析?

意识形态对汤普森而言是服务于权力并承载于符号形式的意义系统,它能够建立及维系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之前已经提及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是意义系统,前者为权力服务,而后者没有服务于权力的意涵。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文化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如何联系和区分?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意识形态与文化:勾连与区分

文化:承载于符号的意义系统与结构化情境

“文化”这个概念比意识形态还难以界定,汤普森先综述了常见的三种定义:经典定义、描述性定义和符号定义,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结构性定义。文化的经典定义将文化与教化(cultivation)联系和等同起来,文化包括经典著作、艺术形态、文明成就和高尚的情操及精神等,文化是高雅、精英的。文化的这个定义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可和运用,倘若懂得琴棋书画,看过很多文学名著,懂得很多历史知识等便被公认为有文化;反之则是没文化。照这样的标准,一个不大认字的建筑工人便不能被形容为有文化。但是,倘若按照文化的描述性定义(或人类学定义),这个工人一样“有文化”。文化的描述性定义认为文化是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观念、信仰、习俗、惯例、嗜好、物质产品及实践等。也就是说文化不一定要很精英,下里巴人的日常生活也是文化(see Thompson, 1990, pp. 123-130)。这个定义对我们的传播学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已甚普遍,让文化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饮茶、拜神、祭祖或婚姻关系等整体生活环境都可以是文化。文化的经典定义正面界定文化,文化的描述性定义则是中性化的。同时这个中性化定义的源起有着政治历史渊源,描述性文化由来与殖民主义运动有关,原为殖民者派人类学家去研究、描述当地文化而得。除了马林若夫斯基(Malinowski)等人类学家,最早让“文化”走下神坛的学者是英国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作为文化研究早期的重要学者,他们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探讨让文化的概念家常化起来。从此,学者们不仅研究文化的经

典成就,也研究文化的寻常面貌(the ordinariness of culture)。除了文化精英,普通人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普通人的日常经历就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给文化下的一个定义(see Hoggart, 1967; Thompson, 1968; Williams, 1961)。最后是文化的符号定义。人类学家吉尔兹(Geertz)从诠释路径将文化定义为符号形式,认为“文化是承载于符号的意义模式,包括行为、言语表达及被赋予意义的各种物体,由此人们能够与他人交流和共享体验、构想和信仰”(see Thompson, 1990, p. 132)。吉尔兹这个定义不涉权力,无关支配关系,抽离于具体社会情境。

汤普森认可并接受文化的符号定义,但感到吉尔兹的文化定义有其不足,因为吉尔兹并没有着眼于权力不平在社会中造成的冲突,他强调意义而非权力。汤普森提出了文化的结构性定义(the structural conception):文化分析是对符号(各种有意义的行为、物体和表达)的研究及其与历史特殊性、社会结构化情境的关系,以及符号被生产、传递和接收的过程。简而言之,文化现象是结构化情境内的符号形式(symbolic forms in structured contexts)(Thompson, 1990, pp. 134-136)。汤普森这个结构性定义的重要性在于他强调符号,这样就将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现代性讨论中。汤普森还强调结构化的情境,如前所述,这与克瑞迪等研究文化混杂学者强调社会情境和权力的观点相应和。在此可以发现文化与意识形态一样都是意义系统,这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勾连。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当意义系统为权力服务时就成了意识形态,而文化概念没有为权力服务的意涵。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符号的社会使用问题,当符号及其意义为权力所用时,当意义系统呈现不对称分布(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时,文化问题就演绎出了意识形态问题。

如果单就文化定义本身来说,汤普森的定义不算出色,我们可以

注意其他扼要的文化定义。比如汤林森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将文化定义为“人类通过符号表征来建构意义的生活秩序”(Tomlinson, 1999, p. 18),斯道雷在《流行文化研究与研究流行文化》(*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中将文化定义为“日常生活的文本与实践”(Storey, 1996, p. 1)。这两个定义目前比较流行,并涵盖了文化定义的关键词:意义、实践、符号与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但汤普森的长处是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勾连起来,让两个概念有异有同,并有动态的联系。

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中,大致有多元自由主义(the liberal perspective)和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perspective)两个派别。汤普森厘清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在实质上解决了两个派别在意识形态/文化讨论中的持久争论。遵循汤普森的思路,本书将介绍马杰伟(1998)在《电视文化理论》中提出的“第三种路线”,这一路线进一步调和多元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分歧,弥补其各自不足。

第三种路线:融合多元自由主义与批判理论

简单说来,多元自由主义与批判理论对意义的交流到底是文化还是意识形态存在根本分歧。多元自由主义不重视权力因素,认为人们的不同观点处于平等竞争的状态,没有谁有权控制意义,意义的交流属于文化范畴。与之相反,批判理论重视权力因素,认为人们的交流是不平等的,强势阶级用观念进行控制,让人们顺从于支配关系,意义的交流成为强势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马杰伟,1998)。比如说女人穿高跟鞋在多元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眼中就有不同含义。多元自由主义认为穿高跟鞋是个人选择,是为了自身美丽,属于文化现象。而在批判理论看来,穿高跟鞋是意识形态,是男人对女人的控制,高跟鞋扭曲女人的身体并减低行动的灵活性从而满足男性欲求,体现了男强女

弱的不平等关系。

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批判理论持一种强势意识形态论(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强势意识形态论也可简称为强势意识论,认为主流媒介文本是相对单一封闭的,构建出服务于强势阶级的一致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常见于阶级认同、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全球化等讨论中。批判理论由此认为媒介就是主控体制中的一个意识形态机关(马杰伟,1998,页12—13)。比如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1)认为意识形态是个表征/再现体系(systems of representation),国家通过教会、媒介和公共机构等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ISA)来实现意识形态控制,从而维护强势阶级利益。正如费洛(Philo, 1990)所发现的,电视能够有效地复制资产阶级观点并让大众接受。对于1984—1985年英国矿工工潮的解读,尽管不同观众会有不同的记忆和理解,尽管工潮还算和平而非暴力,但观众总体上却和新闻观点一样认为工潮是暴力的,示威工人应当为之承担责任。

多元自由主义则持多元歧义论(the polysemy thesis)^①,认为媒介文本是开放、“民主”和多义的,是意义公开竞争的场域,竞争结果是形成了社会多元主义(social pluralism),观众对文本的解读是主动和多元的。这种观点常见于多义文本和主动受众的讨论中。多元自由主义由此认为媒介及社会是一个多声道组合,可以接纳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声音(马杰伟,1998,页12—13)。从霍尔(Hall, 1980)的编码—解码模式提出优势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三种观众解读可能,

① 多元自由主义与多元歧义论是互相兼容的,但多元歧义论并不完全等同于多元自由主义。两者都强调媒介文本的开放性和市场力量。多元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产生多元媒介及自由社会,而多元歧义论认为受众通过消费可以抵抗强势意识形态。多元自由主义更强调意义间的相互竞争,展现一幅没有权力差异的理想图画。多元歧义论强调受众的主动解读,费斯克自信其多元歧义论是有着多轴的权力竞争和霸权斗争的,但多元歧义论有别于强势意识论的地方在于,费斯克坚信从属阶级有能力去打破强势(见马杰伟,1998)。

到莫利 (Morley, 1980) 对三种解读的实证检验,从费斯克 (Fiske, 1987) 将流行文化视作符号战争的场域到詹金斯 (Jenkins, 1992) 对粉丝文化的探讨,这些学说均集中于媒介的多元性。霍尔和莫利倾向批判传统多一点,而詹金斯和费斯克则倾向自由传统多一点。批判理论认为存在一致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服务于强势阶级并由经济基础决定。与之相反,多元自由主义认为意义是多元歧义、相对的和不确定的,意义并非由经济基础简单决定。对批判理论而言意义系统更多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而多元自由主义将意义看作文化的实践(马杰伟,1998)。自有多元主义者如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凯瑞 (Carey, 1989) 将传播看作意义分享的仪式,受众主动地参与制造意义。费斯克 (Fiske, 1987, 1989a, 1989b) 进而将电视文本分为财务经济 (fiscal economy) 和文化经济 (cultural economy), 观众充当了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其解读过程构成文化经济,解读的主动性足以对抗所谓的强势意识形态。

当然,两个学派并非僵守各自的观点。早期的多元歧义论过于否认阶级因素的重要性,难以解释经济与文化权力的不均匀分布,以及政治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制约关系。而早期的强势意识论的问题主要在于经济简约主义和阶级简约主义,只看到宏观政治经济层面,忽视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微妙性和多元性,以及符号文本、受众解读等微观层面。多元歧义论的优点是强势意识论的弱点,而后者的优点也是前者的弱点。两个学派都在对自身进行不断修正,并吸纳对方学派的优点。修正后的强势意识形态引入偶然性,并且带入非阶级因素的影响。修正后的多元歧义论认识到社会并非永远处于自由平等的多元竞争中(马杰伟,1998,页68—73)。

这些年,多元歧义论努力修正其主要倡导者费斯克 (Fiske, 1987) 等学者过于肯定受众能动性、忽视媒介机构研究,以及将文本从具体

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孤立分析等问题(e. g. Carragee, 1990; Curran, 2002; Morley, 1993)。强势意识论对自身理论的修正可见于葛兰西(Gramsci, 1971)被学界广泛引用的霸权(hegemony)概念。这个理论认为强势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并不是由经济基础自动决定的,而要靠强势阶级不断争取,当居于强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从属阶级所认同时,意识形态就成了霸权,这样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相对要开放和民主一些(见马杰伟,1998)。就像“男才女貌”这四个字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反映了社会要求男人以才(财),要求女人以貌。财力雄厚的男人可以赢得美貌的女人,女人的终极价值在于外表美丽,极端但并不罕见的例子有无数美貌女星如同飞蛾扑火般争先恐后地嫁入豪门。成功者有徐子淇嫁给香港富豪李兆基的二子李家诚,拼命生娃。未成者有青春少女梁洛施,尚未嫁给中年“小超人”李泽楷,已是拼命生娃;及后在保密合约下,发表简短的分手声明,男女关系只剩下合约关系。失败者有台湾女星贾静雯豪门梦碎,与富家子老公打官司争女。男才女貌的背后是男强女弱、男人掌控女人、女人依附男人的意识形态在作祟。不可否认的是,“男才女貌”的确是社会衡量男女般配与否的公认标准,它不仅是意识形态也是霸权。

融汇强势意识论和多元歧义论双方优势的理论是霍尔的串联理论(articulation)。霍尔认同阿尔都塞提出的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认为文化由包括经济在内的多种因素决定,但霍尔扭转了经济对于文化的“最终决定论”,认为经济是我们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而非终点。物质因素作为起点造就了意识倾向,但最后发展出怎样的媒介文本,却没有固定方向。霍尔重组阿尔都塞的多重决定论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认为强势意识形态之所以强势,是一个串联以及协商的过程。串联有“表达”和“连接”的双重含义。例如玫瑰代表情人节的浪漫,康乃馨代表母亲节的温馨,星条旗代表资本主义的

美国梦等。根据串联理论,意义系统与政治经济环境没有“必然因果”也不是必然“毫不相干”。而是经济和政治势力会努力串联意义以维护自身利益。串联理论实际上消除了强势意识论的绝对性,也没有多元歧义论的盲目乐观,是两者融合借鉴的很好范例(Hall, 1986a, 1986b;马杰伟,1998,页70—73、77—79)。

鉴于多元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在认识上各有偏颇之处,两者是可以融合的,且其融合在传播学讨论中还远远不够,马杰伟(1998,页83—126)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第三种路线来实现两个学派的借鉴和融合。这一修正式理论强调存在强势意识形态,但同时亦含有多元歧义的空间,用理论术语来说,各种媒介是多元空间的论述竞争场域。这个路线是一种含糊、复合的理论,从而具有更灵活的分析能力和更广泛的理论空间去容纳丰富的文化现象。这个思路是在强势意识论和多元歧义论之间的第三种选择,是为了建构出一个灵活有弹性的意识形态论,汲取强势意识论和多元歧义论的优点,而希望弥补其各自不足。根据这个路线,意识形态既不是被阶级剥削关系主宰的幻觉性观念,也不是处于平等竞争中的价值观念,而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不均等分布。这一路径呼应上文汤普森把意识形态串连文化系统的概念区分与融合。媒介既不是阶级支配的代言人,也不是社会整合的力量,而是意识形态竞争和霸权建构的场域,会倾向于权力阶级。如前文所述,经过修正后的强势意识论认为文本是松动的封闭系统,政治经济对文本有多重决定作用,个人是被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意识形态在取得认可后成为霸权;而修正后的多元歧义论则认为文本是有限开放和拥有多元歧义的,多元歧义论不讨论政治经济对文本的影响,个人在政治经济环境中是自主的,人们可以反抗所谓的强势意识形态。而第三种路线认为文本是个混杂的意识形态场域,处于由阶级关系主导的多层权力关系之中,意识形态在强势的场域中争取认同。物

质与意义之间是“不必然不干涉”的串联关系(Hall, 1985),物质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既可以建立也可以解除。个人在社会“互动领域”(fields of interaction, Bourdieu, 1977)中处于不同位置,从而拥有不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资本的不均等分配限制着个人,但资本的赋予也使得个人有其能动性。强势意识论与多元歧义论的共同盲点在于以为影响和诠释的产生总是认知性的,但“意识形态可以在情绪层面,超越歧义而发挥强大的威力”(马杰伟,1998,页118)。最为重要的是三种观点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上的不同看法。强势意识形态认为意义系统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都决定于经济结构,从而忽视了与权力关系较弱的一般性文化意义。多元歧义论认为意义系统都属文化范畴,操控支配人心的意识形态难以确立。经过修订后,两者的观点开始混杂起来,认为意义系统可以是文化,也可以是意识形态,但其实并没有厘清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区别和联系。而马杰伟的第三种路线遵循汤普森(Thompson, 1990)的思路,建构起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当意义系统服务于权力时是意识形态,意义系统与权力关联较弱时则是文化。某些表面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动机。某个意义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文化,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以是意识形态的压迫。比如清代男人“留辫子”,对满族人来说是萨满教游牧文化的一部分,但清兵入关后推行“留辫子”,则代表着其他各族人对清朝皇室的臣服。

此外,马杰伟颇重视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情绪层面。德·崔希、拿破仑、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其他学者、曼海姆乃至汤普森在内的众多学者,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偏重于认知层面的思想观念,而未能论及美学层面的情感、情绪等。实际上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在现代社会获得合法性和支配性,与之相反,感情、感性和情绪等相对具有非理性、情绪化、不客观或不可取等负面含义。除却负面含义,感情对意识

形态和传播过程影响的相关研究也被忽视。这种缺失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开始有学者致力于研究“情感社会学”(sociology of emotion)(e. g. Thoits, 1989; Turner & Stets, 2005),运用社会学原理与技巧研究人类情感。人们对情绪的认识也正面了一些。我们认为理性与情感作用机制不同,但并不冲突,无论是对于意识形态运作还是传播过程,理性和情感都很重要。虽然我们这本书不会深入介绍情感社会学,但我们也提示情感层面对于传播学的意义。

马杰伟提出的第三种路线强调在社会情境下去理解意义的生产和解读,是他糅合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学派各自优点的努力,这种糅合也弥补了两个学派相应的不足(马杰伟,1998)。政治经济学及文化研究曾有的对立已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和修正(e. g. Ermi, 2001; Maxwell, 2001),而实际上两个学派是可以融会贯通和互相借鉴的(Grossberg, 1991; Miller, 2001)。克瑞迪在文化混杂研究中对政治经济学考量的强调,同样也是在经验研究中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正因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对称的融合(Pieterse, 2009)以及不平等的文化渗透(Straubhaar, 2007),我们在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中常会从文化研究路径得出政治经济学的结论。

至此,已经讨论了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汤普森对这个概念的批判性解读和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勾连,以及马杰伟继承、发展汤普森学说所提出的第三种路线。在现代性条件下,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等社会机构的承载,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意识形态的传播和产生效果离不开社会机构,社会机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主题。

文化工业中的符号与意识形态

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对“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的论述是蜻蜓点水式的,观点很有意思但需要我们自己做更多发展。他仅在第三章厘清文化概念时用一小段分析社会机构,然后在下一章直接进入了 he 重点关注的社会机构:印刷和电子媒介。我们在讨论大众传播媒介之前,可以先回答什么是社会机构这个基本问题。

传播意识形态的社会机构

社会机构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意识形态循环的领域,就现实情况和我们的学术兴趣而言,最关注的社会机构当然是大众传播媒介,但国家机关、学校、宗教组织、医院、公司企业、社会福利组织、NGO 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机构对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传播也相当重要,如北大、清华、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中华慈善总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国安理会等都是社会机构。而大众传播媒介与其他这些社会机构间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让意识形态更为有效地建构和发挥效力。“社会机构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相对稳定的一系列规则和资源,以及在社会机构中由此相应确立的社会关系。”(Thompson, 1990, p. 149)在这个概念中有三个关键词: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包括不同种类和数量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如前所述,这三个资本由个人在“互动领域”(Bourdieu, 1977)中具体所处的位置所决定。规则指的是规定、习俗和程序等,用于约定控制资源的使用以及个人在组织中的行为。资源的分配和规则的约束就形成了个人或职位之间的等级关系(see Thomposon, 1990)。拿我们熟悉的学校为例,每个大学从招生录取、选课修学分、毕业就业以及教师评定职称等都有一系列规则。抽象来说,规则的缺失或者违背会影响大学的正常运转。具体来讲,今年考研究生有多少个招生名额,有没有公费名额,怎样才能获得公

费名额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命运。大学里职称从低到高依次是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教授在学校里拥有的经济资本 (economical capital) 自然比助教多,这体现在收入、办公室配备、实验器材和研究经费等各方面。提到某个教授,比如说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我们会想到他在澳洲昆士兰科技大学的职称职位、他的学历及相关研究等,这是他所拥有的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而他在学界的声望和获得认可的程度等是哈特利教授的符号资本 (symbolic capital)。资源分配和机构规则所确立的是依据职称从低到高的等级关系,这就是对“大学”这一社会机构的简单描述。那么大学有没有意识形态?当然有。以前中国大学是“公益事业”,所以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大学教育是免费的,没有收学费一说,宿舍也免费,每个月还发点粮票等生活补贴。90 年代开始大学的意识形态转向“市场化”,大学开始收学费,从最初每年几百元到现在的甚至每月数千元。研究生过去都是公费,现在则是自费越来越多。大学从公益事业到市场化的转变,是受到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一意识形态的推动。新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经济哲学强调平等竞争、倡导市场化、削弱福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它是源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主义但后来遍及全球的意识形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近些年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社会养老等福利制度的改革或多或少都受到新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 (Harvey, 2005)。

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理解意识形态,而社会机构是“社会情境”^①的重要构成部分。意识形态作为服务于权力的

^① 汤普森认为社会情境有四个典型特征:时空场所、互动领域、社会机构和社会结构。互动领域由资源和规则构成。社会机构是相对稳定的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社会机构与互动领域同中有异,前者建构后者,但只是后者的其中一部分。社会结构则指的是相对稳定的不平等和差异 (Thompson, 1990)。

意义系统,为符号所承载体现,在社会机构中流通传播。汤普森主要分析的是印刷媒介和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写作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还没能考虑到网络等新媒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加以补充。

从社会机构到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ies)或媒介工业(media industries)是常用来形容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新媒体等行业的名词。最早德国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①使用这个词的单数形式(cultural industry)^②,从激进的批判性视角指斥大众传播媒介愚弄受众,大量复制标准化、缺乏艺术价值的商业文化产品,造成人的异化从而丧失批判性。比如当年达·芬奇辛辛苦苦画了幅《蒙娜丽莎》挂进卢浮宫,据说她的微笑迷人无比。在 1900 年,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才有机会见到甚至知道这幅肖像^③。当时中国的光绪帝作为遥远东方帝国的统治者也不曾看过蒙娜丽莎的笑颜,更何况平民。现在通过印刷技术的大量复制,在大街上随便就能买到一张“蒙娜丽莎”像,大众媒体也经常介绍《蒙娜丽莎》的故事。没有人不知道或者没见过这幅画

①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的社会学理论著称,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诺(Adorno)、本杰明(Benjamin)、马尔库塞(Marcuse)和哈贝马斯(Habermas)等。这个学派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进行了全方位批判,从整体上来说比较悲观。他们认为受众是被动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等力量实现了对人的异化和束缚。虽然该学派的有些观点过于悲观和极端,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逐渐走向衰落。但其批判精神及学术探讨影响到很多学者,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至今仍是学界热点。

② 现在我们谈文化工业时,不再使用单数形式的 cultural industry,而是用复数的 cultural industries。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对文化工业认识的改变。复数强调了文化工业自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其影响也不全然是负面的。

③ 在 1900 年之前,《蒙娜丽莎》画像还不及现在这样广为人知,后来这幅画于 1911 年在法国卢浮宫失窃,到 1913 年底又戏剧性地失而复得。对于画像的失窃和复得,当时以报纸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展开了大量报道,从此《蒙娜丽莎》的大众知名度越来越高。

像了。如果此时此刻你的确不知,我们只需要上网 Google 或者 Baidu 一下,真的很简单。可是,平心而论,这些复制出来的“微笑”真的打动过你吗?艺术品与文化工业品的区别也许就在于此吧。当然,法兰克福学派那般对文化工业一批到底是略嫌简化,对文化工业我们还是得联系具体的社会情境,去分析文化工业及其产品的生产和解读,这其中有权力的因素,从而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

相比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社会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看重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并对意识形态问题有其独到的看法。前面我们在介绍负面的意识形态概念时,曾提及一个标准是“错误虚幻”背离真实,但正相反,文化工业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维持现有操控性的社会规则,“文化工业产品契合和反映社会现实”(see Thompson, 1990, p. 100),意识形态将自己呈现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汤普森赞赏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的重视,但认为他们夸大了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消费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等同于受众就会因此拥护现有社会秩序,不能将文化工业的经济影响直接等同于文化产品的社会效果。由于将意识形态视作将个人与社会秩序连接在一起的符号资源,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被称为“社会黏土理论”(social cement theory)。汤普森认为这只体现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五种主要运作模式中的统一化(unification)和具体化(reification),而没有看到意识形态也可以通过合法化(legitimation)、掩饰(dissimulation)和分裂(fragmentation)的方式运作。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归纳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五种运作模式。合法化是指通过符号表征使支配关系合法化。韦伯曾说威权合法性有理性—法理、魅力和传统三种理想形态(见本书第一章)。延续韦伯的讨论,汤普森指出理性论证(rationalization)、扩大代表性(universalization)和故事讲述(narrativization)是使支配关系合法化的常见策略。例如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以推行民主、推翻专

制来合法化其出兵他国的异常行动。掩饰是指通过掩盖、否认、模糊或分散注意力等方式建立和维系支配关系,常见掩饰策略有偷梁换柱(displacement)、委婉化(euphemization)和修辞(trope)。例如美军以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进入伊拉克,其后找不到武器却以伊拉克人民受迫害的故事、以巧言妙语的修辞,把军事行动模糊化、委婉化。统一化则指在符号层面建构涵盖个体的统一体,淡化共同体内的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维系支配关系。这种模式可通过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和统一体标识化(symbolization of unity)运作。例如美国出兵之初以统一的名义带领三十多国的军队“解放”伊拉克。后来各国国情有异,陆续退出。分裂以分化(fragmentation)和消灭他者(expurgation of the other)为主要策略。分化是强调个体或群体差异、分歧,从而防止其形成集体意识和行为从而诉求权力。消灭他者是通过塑造及排斥“他者”这一敌者从而造就内部的统一性和支配的合法性。事实上,伊战是2001年“9·11”事件的延续。“9·11”之后美国区分敌我,大量描绘中东异族为恐怖主义温床,伊战即美国反恐战的高潮。具体化将并非必然、恒久的支配关系表征为永恒自然。其策略有自然化(naturalization)、永恒化(eternalization),也可采用名词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语态(passivization)等语法技巧(Thompson, 1990, pp. 60-67, 101-106)。“9·11”事件后,泛西方对“东方”的观感呼应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中东人被视为自然而然有暴力和横蛮倾向的民族。总而言之,意识形态通过运作符号可以建构真实,从而建立和维系支配关系。以上所述有关意识形态的符号操作往往以文化工业作为广传于世的平台。

当然,学者们现在对文化工业的认识已正面很多,文化工业让普罗大众有更多机会接收信息、接受教育和表达自己。海斯莫汗在《文化工业》(*The Cultural Industries*, Hesmondhalgh, 2007)一书中分析了

文化产业近年来变化与延续的模式。他将文化工业定义为“直接涉及生产社会意义”(p. 12)的社会机构,文化工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拥有影响人们的能力……文化工业在维持权力关系和扭曲人们对这一权力关系的理解上承担着重要角色”(p. 25),也能成为“引发变革的中介”(p. 29),所以大众传播媒介和流行文化才如此重要。海斯莫汗没有直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但是他较全面地描述了现代文化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讨论了与全球化、新媒体有关的议题。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与我们的生活更加密切,对我们的影响也更潜移默化。

政治经济环境能够限制报业意识形态(Fung, 1998),电视则成功地把意识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马杰伟,1998)。网络似乎民主平等很多,但这也不过是表象而已。首先,人们接触使用网络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7月),截至201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4.2亿。问题是其中农村网民仅占整体网民的27.4%,半年增长7.7%,低于城镇网民相应增幅,同时40岁以上网民仅占网民总体的18.2%,可见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确实存在。网络上信息的传播也未必全然自由,背后照样有精英的操纵、企业的利益。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网络媒体以平等姿态给我们提供的意识形态会具有影响人心的更大力量。2008年美国大选,奥巴马的Facebook网页在把他送上总统宝座上发挥了一臂之力。除开政治,流行文化更是意识形态斗争和霸权建构的场域(Storey, 1996; Hall, 1977, 1980)。王菲的歌背后是性别政治(Fung & Curtin, 2002),早期她做小女人状,是“容易受伤的女人”,唱“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但愿心爱的那个男人能够把风景都看透,陪着看细水长流。后来王菲似乎越来越有个性,画烟熏妆、烫爆炸头。歌词再反叛、形象再前卫又如何?王菲到底还是

和香港流行音乐、媒体一起把自己打成一个“小女人”。你看她先是嫁了窦唯,后来又嫁给了李亚鹏。有关窦唯的报道是一代天后如何在窦家胡同的公厕外排队倒马桶。有关李亚鹏的报道是王菲如何在家相夫教女,争取追个男丁,做李家男人背后的女人。倘若是窦唯倒马桶,倘若是李亚鹏在家相妻教女,大家就会觉得怪异起来。这还是男强女弱的意识形态。音乐工业深悉,只有用反叛形式如此包装的“小女人”精髓才是新鲜又符合大众期望的,也是最能挣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说过,男强女弱仍是大众认可支持的相对稳固的共识。对比而言,美国流行音乐中,以前有麦当娜,近年有 P!nk 等歌手,女人以独立姿态呈现,亦是女权意识相对普及于欧美的写照。所以说,文化工业中浸淫着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建构、传递和获取认同又离不开文化工业的场域。意识形态表现于文化工业,并纠结在一起,表达权力的诉求。汤普森在《媒介与现代性》中也提到通过操控可见性来施行权力控制,我们在第二章已做介绍。

现代性的符号化、媒介化

符号的传递交流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古代也有书籍文字、狼烟示警等,但只有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符号交流才呈现截然不同的新特征”(Thompson, 1990, p. 1),如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对生活改变之深,以及对科技的深度依赖等。因此汤普森将大众传播视作“现代文化的定义性特征以及现代社会的核心维度”(Thompson, 1990, p.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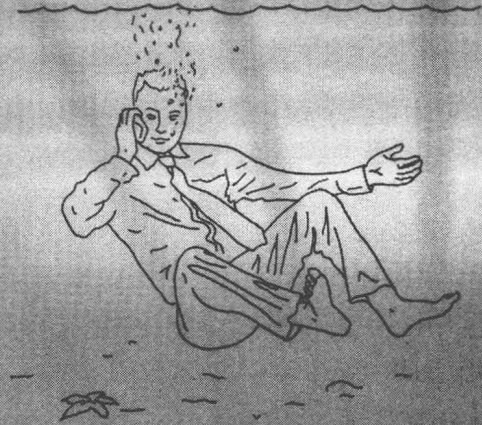
我们过去理解传播,往往是孤立思维,停留在传播学层面做自我解析,这令传播学长久以来较少借用社会学理论。而实际上传播作为微观现象或中观过程可与宏观社会情境相扣,实现文本性(textuality)

和情境域(contextuality)的结合。所以传播不仅是传播本身,更是社会机构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之一,并且是极为重要的维度,可以调节其他维度乃至整个现代性的构成与转变。

本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谈媒介与现代性的互相建构。综合并发展汤普森叙述的“现代文化的泛媒介化”(Thompson, 1990, 1995),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媒体现代”这种说法。现代性的发展促进了媒介工业的发展,直到网络等新媒体重现构建我们的生活。反过来,现代性也体现在各种媒介符号中,其特征已打上媒介和符号的深深烙印。如贝克(Beck & Beck-Gernsheim, 2002)所述,由于传播媒介,我们的现代生活变得个人化起来;如鲍曼(Bauman, 2000)所说,现代世界变成流动的液态社会;戴扬和卡茨(Dayan & Katz, 1992)给我们分析了媒介如何帮我们建构和分享推演时代的媒介事件;卡斯特(Castells, 2009)用“网路社会”和“信息社会”来形容第二现代;拉什与厄瑞(Lash & Urry, 1994)告诉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符号美学化了……这些都是有关现代性的新特征,学者们用第二现代来形容。

到目前为止本章讨论的都是第一现代,第二现代源自第一现代,但有其新的发展。在第二现代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学者们讨论的情况有的可能符合中国的现实,有的则不。这是因为这些学者大多是依据现代性更为发达的国家进行描述和分析。而中国的情况有些复杂,由于国家太大、历史太悠久,中国的现代性目前呈现出传统、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共存的混杂局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也促使我们在分析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时,要时常比照中国国情,看哪些适用于分析中国,哪些不适用。这些有关第二现代的分析、讨论,我们在下一章再作跟进。

第二编 第二现代



2. lots of ways around any problem

1 2 3 4 5 6 7 8
 Mostly False Somewhat False Slightly False Slightly True Somewhat True Mostly True Definitely True

3. Even when others get discouraged, I know I can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1 2 3 4 5 6 7 8
 Definitely False Mostly False Somewhat False Slightly False Slightly True Somewhat True Mostly True Definitely True

未来individualization个人化second modernity第二现代risk society风险社会Ulrich Beck反思现代社会机构碎片化
 flexible unemployment不再嵌入的抽离disembedding without reembedding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
 ontological security流动的再嵌入existential anxiety机构化个人主义



未来 individualization 个人化 second modernity 第二现代 risk society 风险社会 Ulrich Beck 反思现代社会机构碎片化
flexible unemployment 不再嵌入的抽离 disembedding without reembedding 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
ontological security 流动的再嵌入 existential anxiety 机构化个人主义



未来individualization个人化second modernity第二现代risk society风险社会Ulrich Beck反思现代社会机构碎片化
flexible unemployment不再嵌入的抽离disembedding without reembedding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
o ontological security流动的再嵌入existential anxiety机构化个人主义



未来individualization个人化second modernity第二现代risk society风险社会Ulrich Beck反思现代社会机构碎片化
flexible unemployment不再嵌入的抽离disembedding without reembedding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
ontological security流动的再嵌入existential anxiety机构化个人主义

第四章

个人化：机构化的个人主义

在清朝末年，外国人、炮、枪、军舰都等在外，那个慈禧还以为自己很行。现在我们艋舺的情况一模一样……未来就要来了耶，艋舺人还在睡。

这段话出自台湾 2010 年最红的一部电影《艋舺》，讲述台湾艋舺的传统社会秩序遭受着现代文明威胁的故事。无论是当年慈禧统治的清朝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艋舺，在“未来”面前既是软弱无助的，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现代性”是有关“未来”，有关社会变迁的宏大主题，这一主题分为第一现代(the first modernity)和第二现代(the second modernity)两个阶段。

本书之前的三个章节均论述第一现代。第一章是现代性讨论的基础，介绍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对现代社会兴起的讨论。第二章介绍了吉登斯和汤普森的学说，吉登斯给我们勾勒出现代性讨论的大纲，汤普森从媒介出发提供了现代性讨论的路径。第三章则讨论了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从第四章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二现代的主题，那么什么是第一现代，什么是第二现代，两者有何异同呢？

从第一现代到第二现代

定义第一现代时我们可以参考第二章中的内容,根据吉登斯(Giddens,1990)的论述,第一现代有反思性、时空分延和抽离三个动力,同时有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与军事力量四个制度性维度。在第二现代,这三个动力和四个维度依然存在,但是由于它们自身的深入发展和演变,从而能达到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承接第一现代,同时在以下很多方面呈现新特征:1. 第一现代推崇理性,而第二现代对理性更多秉持怀疑态度。我们在第一章中说过韦伯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到第一现代的演替中,社会变得越来越理性。现代社会推崇效率,建构于理性之上,尤其着力于工具理性。现代社会越发达,越呈现出韦伯所描绘的非理性的理性控制。但在第二现代,理性不再是值得我们不假思索地去追求的唯一目标,人们开始批判工具理性的不足。2. 反思性成为第二现代的基本特征。第一现代已经具备反思性,在第二现代反思性进一步深化,社会乃至知识本身都在不断地进行反思和修正。3. 第一现代实现了工业化,第二现代开始去工业化。传统社会的人力生产效率低,而第一现代的工业化生产极大提高了人类生产效率,工业化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到了第二现代,科技的发展、符号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兴起,使得社会经济开始逐渐摆脱对机械化重工业的依赖。个人技术、创意和符号等也能带来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4. 第一现代的工业化生产采用福特模式,以流水线生产、现代管理方式、本地范围内的资本运作和工人阶级的兴起等为基本特征。第二现代的生产是后福特模式(Post-Fordism),这种生产模式是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资本运作,知识产权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采用以信息技术达成的微观管理模式,重视下层的组织和

雇员的建议和自我管理等,工人阶级开始变得难以界定。5. 在第一现代科学和技术为世人所推崇,但科技这一完全正面的形象在第二现代被质疑。人们发现科技也有意识形态在其中,是权力施行和社会控制的现代手段。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也带来很多风险甚至灾难。6. 现代社会的兴起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和在全球的扩散,资本主义成为第一现代最显著特征之一。在第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开始经历新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精神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管制,主张削减福利制度。新自由主义不仅体现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深入影响了社会生活各方面。7. 第一现代的媒介化,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和对社会生活的渗透。第二现代的媒介化体现在新媒体和微观的信息传播过程(micro-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兴盛。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依然存在,但互联网等各种新媒体改变和重新定义了传播方式和人类社会。传播不再被正式的媒介机构所垄断,网络等新媒体的使用者都可以成为传播者,传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都更加精彩纷呈。8. 在第一现代人们可以在抽离之后再嵌入社会机构,即从传统社会生活模式脱离出来的现代人,大多可以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摆脱过去四世同堂的家族模式,从而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但在第二现代抽离之后不一定能再嵌入,又或在恒常的抽离/嵌入活动中,例如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生可能转换职业数次,离婚率高企,婚姻也不再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9. 第一现代强调社会结构,人们受制于其中,社会结构也给个人发展提供条件,社会发展建构于核心社会机构的运作,如国家、阶级、核心家庭和种族群体等。但第二现代是一个流动的时代(age of flows),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经济流、信息流、意识形态流和科技流等建构和定义着我们的社会。社会机构开始碎片化,相比个人,社会机构在瞬息万变的未来面前是笨拙的。所以第二现代是个人化的时代,个人化这一本质特征是

第二现代论述的起点和基点,敏锐捕捉到这点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他有关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普及于学界。本章重点介绍的是他跟妻子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合著的《个人化:机构化的个人主义与其社会政治后果》(*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贝克,1944年生,作为德国人,他很不德国。德国人以严谨出名,德国学者更甚,重视定义的严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但贝克不是,他是个有趣的学者,仔细读他的文章,其文风有点散文化,时常丢出由一个个问句组成的一段排比,字里行间也能感受到他的个人情感。按照学界的通行标准,这是不多见的。细腻敏感的他,预见到了即将或已经开始颠覆现代社会的个人化趋势,他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无法逃避自己做决定,并不停做决定的命运。仔细思量贝克这句话,再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会想知道,他到底在这本书里说了什么,什么是个人化,社会机构跟个人化有什么关系?

个人化:第二现代的社会结构

对于第二现代,贝克(Beck, 1992;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用“反思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或“反思现代”(reflexive modernity)形容,强调第二现代的反思学习过程。它有两个基本构成特征:全球化和个人化。反思现代从广度上来说是全球化的蔓延,就深度而言是个人化的深化,全球化和个人化的蔓延深化造就了世界主义的不断发展(Lash, see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p. vii-xi)。所谓世界主义指的是以世界大同为目标,追求尊重差异、平等多元的

理想,以及人们超越国界束缚,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的意识、态度和行为。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反思现代的经度,个人化是反思现代的纬度,而世界主义则是由两者所定现代性的第三维度(如图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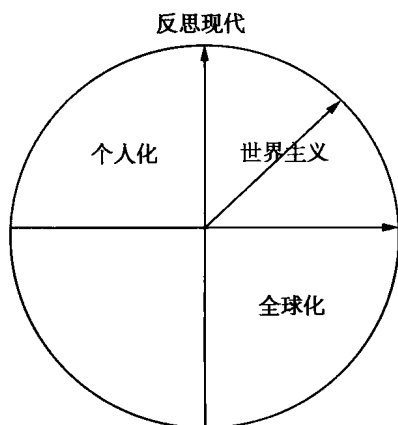


图 4.1 反思现代的个人化、全球化与世界主义

本书第一章已经谈到过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个人化。个人主义是以个人利益为重点的价值取向。个人化是指社会活动与思考以个人为单位的过程。个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产物(Wundt, see Giddens, 1971)。马克思指出“个人化是一个历史产物,与日益复杂和专门化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连”(Marx, see Giddens, 1971, p. 24)。涂尔干也认为“个人化源自劳动分工的扩张”,只有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道德的个人主义不断发展,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才能够得以实现(Durkheim, see Giddens, 1971, pp. 72, 77)。所以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个人化,在第一现代时期已是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并非第二现代所独有,但贝克夫妇认为个人化在第二现代发展到系统化程度从而成为新的社会结构,继而颠覆了整个现代社会生活。

在我们的日常思维里,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或者“个人化”既有自我、自私和不负责的含义,亦与个性、解

放、自由之类的词语呼应。这种用法属于新自由主义概念的个人主义,亦是功利个人主义(*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无需相互依赖,也就免去了彼此的责任。而贝克夫妇所论述的机构化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是一种社会科学含义的个人化(*the social-scientific sense of individualization*)。这一概念正面看待个人化,认为个人化是高度分化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不仅不会妨碍社会凝聚,反而会使之成为可能(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xxi)。此概念不重视“自私”或“解放”这些价值色彩浓厚的含意,而是集中展示个人脱离集体成为流动个体的过程。回想在第一章中,涂尔干提出了现代社会如何实现社会凝聚的问题,在本章贝克以其敏锐洞察力作出有力的回应,即道德的个人主义可以促进社会凝聚,高度发展的现代性建构于互惠的个人化之上。第二现代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合作或利他的个人主义”(a co-operative or altruistic individualism,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28)。劳动市场是个人化的推动马达,社会科技创新使工作方式更灵活多变,也就此形成个人化的生活方式,第一现代的阶级社会演变为“个人化的后阶级社会”(the individualized post-class society)或“雇员的个人化社会”(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of employees)(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39)。“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同时“个人化成为第二现代的基本社会结构”(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xxii)。贝克夫妇还指出虽然个人逐渐取代社会机构成为第二现代的能动塑造者,但是个人化的形成和发展却有赖于社会机构提供的保障。比如说教育普及,学校作为社会机构给个人(特别是女性)提供了实现自己人生的关键条件。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将个人而不是集体确定为社会福利的接受者,这样强化了个人化的可能性,在家庭网以外有另一张个人化的安全网。及后社会福利的削减,再有商业保险制度补充。于

是,个人化的发展一方面意味着社会机构作用的不稳定,但另一方面社会机构对个人化的发展功不可没,这就是个人主义与社会机构的矛盾及依赖关系,贝克夫妇因此将个人化称为机构化的个人主义,而不是泛指个性化、自我中心、自由意志之类的一般定义。“所谓‘自己的人生’是一种完全依赖于机构的高度社会化生存状态。”(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151)教育、医疗、娱乐、社会福利制度、金融机构等社会机构制定各种规则迫使我们自己做选择,我们必须书写和叙述自己的人生传记。高考填志愿要选学校、选专业,读大学要选课,毕业时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开股票基金账户要选择证券商,买房要选地段、选户型、选开发商、选贷款年数……还没选完,房价蹭蹭蹭又涨了。这些个人选择背后大多有社会机构的支撑,个人化并不是反社会机构的,而是由社会机构保障甚至是迫使的。如果说个人化是贝克夫妇这本书的主题,那么社会机构也许是其副题。本书第三章介绍汤普森的意识形态论时,论及社会机构是承载和传递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其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对个人同时有限定和赋权作用。汤普森讨论的背景为第一现代,这些讨论在第二现代从总体上来说依然有效,但毕竟社会情境有了变化,我们有必要时刻反思第二现代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如何通过社会机构落实于个人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当个人化成为社会结构,我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个人选择时,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意识形态依然承载于社会机构,但同时意识形态也日益在微观的个人传播层面传递。总而言之,意识形态传递的场域更加多元化,意识形态本身的形式也更复杂。在第二现代意识形态运作更微妙,对其透视和批判的难度也更大。

在个人化时代,社会机构变得碎片化。其功能越来越多以外包(outsourcing)或内置(insourcing)的形式表现出来。外包是指国家等

社会机构将很多功能托付于跨国机构等,这就是全球化。比如联合国协调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或世界银行组织对各国经济的调整等。社会机构的功能另一方面亦内置于个人层面,这也就是外延内置的个人化。比如以前都是由国家给大学生分配工作,而现在大学生毕业了要自己找工作;现在自助旅行都可自订旅舍,自我选择由外包的网络中介者提供折扣优惠和服务点评。第二现代的社会机构主要由“建构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而非“规定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组成,在第一现代人们遵守机构规则,在第二现代人们发现机构规则。社会机构及其中的权力和社会不公,在第二现代更多是通过排斥(exclusion)而不是剥削(exploitation)来运作。传播机构等社会科技机构成为社会中枢。社会机构和规则等对个人的约束力、限定性和保护性都相应减弱(Lash, see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p. x- xii)。第一现代习惯用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各种社会机构来归类 and 定义个人,比如鲁迅是中国人、汉族人、黄种人、男人以及文学家。但贝克夫妇说国家、民族、种族和阶级等在第二现代都呈现衰退,现代社会的主流伦理是个人的自我实现(the ethic of individual self-fulfillment and achievement)(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22)。概括说来,我们可以列表比较社会机构在第一现代与第二现代的不同(如表 4.1 所示)。

从表 4.1 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机构”在第二现代已越来越弱势和碎片化,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一种新的“社会机构”开始形成。那种将人们从第一现代社会机构中抽离出来的力量,自身也变成一种社会机构——机构化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独立、自主、自由、多元的个人叙事,是一种依赖众多机构、处于恒久抽离一再嵌入状态的生活,是不得不自我负责的个人化。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像定义鲁迅那样,将青年作家韩寒用社会机构来归类,他也反对别人用“80后”之

表 4.1 社会机构第一现代与第二现代的不同特征

第一现代的社会机构	第二现代的社会机构
1. 由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构成	1. 社会机构的碎片化
2. 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	2. 仍然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但以更微妙复杂的形式运作
3. 社会机构为国家、民族、种族、阶级、家庭和各类组织机构等	3. 社会机构的功能外包至全球化;内置于个人层面
4. 阶级为第一现代核心社会机构	4. 传播等社会科技机构为第二现代核心社会机构
5. 以规定性规则为主	5. 以建构性规则为主
6. 社会机构权力运作主要体现为剥削	6. 社会机构权力运作主要体现为排斥
7. 社会机构主要建构于国家范畴	7. 社会机构日益扩大至全球范畴
8. 人们能较恒久、稳定地嵌入数个限定的社会机构	8. 人们的生活全方位依赖众多社会机构,却难以稳定嵌入数个固定社会机构,或者处于恒久的“抽离—再嵌入”社会机构之中

类的标签去界定他。韩寒 1982 年出生,1999 年从高中退学,他的故事很简单:要过他自己的人生。不管别人怎么做,不理睬别人怎么说。韩寒退学的那个年代,“人作为个体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只有单位才被社会认为是可靠的”。于是老师们担忧地问退学的韩寒,“你不进大学,将来怎么挣钱养活自己?”17 岁的韩寒直接回答:“稿费。”现在,活在中国体制之外的韩寒,凭借写书和赛车养活自己。作为“中国最有文化的高中没毕业的司机”,他还办杂志,做歌手,写博客,参与拍广告、电影等。韩寒代表了中国目前最为个人化的、以实现自我理想和价值为目标的那些人。他说,“在这个时代,梦想同样可以是头上星空、心中律令,同样可以与占有的社会资源无关,你与我可以平等地拥有”(见《新世纪》周刊,2009 年 12 月 22 日)。

社会机构在第二现代处于转型中,这种转型还未结束,社会机构与个人的关系也在调整转变,透过社会机构来捕捉社会结构也就变得

困难起来。贝克夫妇更进一步否定社会结构在第二现代的存在,说反思现代是自文化(*self culture*)是一个“没有社会结构的两难社会”(an *ambivalent society without social structure*)。两人坦承《个人化》这本书缺乏对权力的讨论。社会不公在第二现代依然存在,社会问题依然普遍,但是当个人化成为社会基本结构时,对于由社会所造成的矛盾,我们需要寻求个人的解决方案(*seek biographical solutions to systematic contradictions*)。因此,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抽离的个人与全球问题之间存在制度性不平衡(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p. xxii- xxiii)。贝克发现并描绘了这个问题,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刻批判,这源于他对个人化命题的整体乐观态度。贝克在主观愿望上并非想为社会权力群体开脱,但他的个人化命题论述在客观上确实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贝克认为反思现代有关“转变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能动者的关系……能动者变得更为个人化,即逐渐不再被社会结构束缚”(Lash & Wynne, see Beck, 1992, p. 2)。也就是说在反思现代,个人而非社会机构,成为第二现代的能动塑造者。按此逻辑,个人也自然是责任的承担者和问题的主要解决者。我们完全同意个人化已经成为第二现代的社会结构,也同意互惠的个人主义能够帮助实现社会凝聚,因为今天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依靠外在的机构才能有效运作。但我们不能同意由社会造成的问题应当仅由个人自己去解决,这样只会让整个社会的利益团体与权力机构脱罪。仿佛某个人的悲剧源于他个人的错误或不足,而不是社会条件促成的结构性不平等的结果。个人与外延内置的他人必须一起承担责任,而更具决定性的责任往往在于社会利益集团。

比如说《丑女贝蒂》这部美国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丑女孩由于长得太丑而找不到工作,但她阴差阳错地成为一个出版集团男总裁的秘书。聪明善良的贝蒂勤奋工作,同时也逐渐变得美丽起来,最终她赢

得了英俊上司的爱情。整个故事的意识形态就在于贝蒂的外表与她成功与否的关系,当贝蒂的内在美得到认可,当贝蒂通过转型获得了外在美后,她也就获得了事业与爱情的双重成功。在这个故事里,贝蒂贫穷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所属的墨西哥裔种族都不是她成功的障碍,没有阶级冲突,没有种族矛盾,问题由贝蒂的丑陋外表而生,也通过贝蒂的个人努力得到解决。抽身局外,我们应对第二现代这种个人化为社会推卸责任的现象稍作思考。贝蒂的阶级、族裔、教育背景对于她自我改造不无限定作用。不论个人化如何发展,不论个人如何成为社会再生产的能动单元,我们不能说以后有何问题应当仅由个人去解决。贝克当初在写《个人化》这本书的时候,关注个人而非权力与集体,直言阶级已不能制约个人。我们认为贝克重个人而轻阶级,部分原因可能源自他在德国的社会处境下进行学术研究:德国教育普及,社会保障高,各种社会机构发达,成全了贝克笔下那种个人化生活。换了是阶层复杂且在剧变中的国家,阶级背景仍是人生计划的阻力与助力。也许,在个人化的第二现代,权力问题是以更巧妙的方式掩藏起来,这样我们批判起来更为困难,但批判权力在当下的流动社会依然迫切。

硬币的两面:个人化与风险社会

贝克谈得最好的两个命题,一个是个人化,一个是风险社会。个人化与风险社会如同硬币的两面,论及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简而言之,个人化可以定义为“没有再嵌入的抽离”(disembedding without reembedding)(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xxii)。既然无法再嵌入社会机构并在其中获得庇护,个人就面临着各种风险。贝克的《风险社会:趋向一种新现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Beck, 1992) 结合论及“反思现代”和“风险”两个主题,对学界探讨当今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本书里贝克看到了现代性的黑暗面,特别是科学和工业化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风险,这些风险超越地域限制,波及后人,其后果无法估量。但贝克并不像韦伯那样悲观,贝克认为风险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为此我们必须让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一步激进化(the radicalization of rationalization),以及让现代化具备反思性(Lash & Wynne, see Beck, 1992)。第二现代既是反思现代,也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核心概念是“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existential uncertainty),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很多选择,人们从可以自主选择到不得不做选择,以及必须不停做选择,实际上已经深陷于选择的牢笼之中。既然是选择,就有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定做决定后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到底什么是风险社会的风险? 风险概念与反思现代直接相关,是由现代化自身产生和引入的危害和不安全,风险是由现代科技或其他相关过程造成物理伤害的可能性(Beck, 1992, pp. 4, 21)。从这个定义来看风险是一种危害的可能性,科技是其始作俑者,风险体现了现代性的自我毁灭倾向。简而言之,风险就是由现代科技造成的人为灾害。风险与科技的关联及贝克对科技的置疑,回应了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讨论专家系统,以及是否信赖专家系统的问题(见本书第二章)。吉登斯分析“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之难以获得,贝克论述“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吉登斯与贝克都谈“选择”,但两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吉登斯谈选择时其思想背景是人类从传统社会的限定性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而贝克的思想背景是第二现代个人化成为内在的现代性,迫使我们必须做选择,我们无从逃避必须做选择的宿命。

贝克将人类社会分成前现代(pre-modernity,即传统社会)、简单现

代(simple modernity,即第一现代)和反思现代(reflexive modernity,即第二现代)。简单现代对应工业社会,其轴心是商品的生产流通;而反思现代对应风险社会^①,其轴心是危险的扩散(the distribution of “bads” or dangers)。工业社会以阶级为社会结构,而个人化成为风险社会的结构性特征(Beck, 1992)。这并不是说只有风险社会才有风险,实际上三个社会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风险,贝克强调的是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加深,成为每个人挥之不去的深刻体验。

在传统社会,人类受困于自然风险,如洪涝、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在第一现代,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驯服自然,风险更多由人类自身造成,主要是由大众一起面对的大规模风险,如战争、核泄漏、生态危机等,科技的发展也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多无法控制的后果。而在第二现代,无所不在的是由我们每个人独自承担的、微观层面的风险。比如说癌症、艾滋病等疾病越来越多,无论贫富贵贱,不分种族,谁都没有必然的豁免权。友情、爱情和亲情等愈发脆弱多变,这也会给人带来风险。2010年5月,陕西人吴焕明因患有糖尿病、前列腺炎等疾病救治不好,遂心理扭曲产生报复心理,于是冲进陕西省南郑幼儿园持刀砍伤了18名幼童。孩子们何其无辜,这样的风险让人如何预防,其后果又如何弥补?再以美国“9·11”事件为例,这也是第二现代的典型风险。在第一现代要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才会死伤无数,在第二现代几个人就够了。2001年,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击了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和位于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共造成2998人罹难。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恐怖事件,所造成的伤亡和损失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珍珠港事件”。“珍珠港事件”是两

^① 值得注意的是,贝克反复强调风险社会本身首先也是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众多风险正是由工业化与科技的发展联袂造成的(Lash & Wynne, see Beck, 1992)。

个国家之间动用超级军械的大型战争,而“9·11”事件仅由19个恐怖分子造成。在第一现代,科技进步及后果更多在物质科技层面,第二现代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多体现在信息科技层面。通过E-mail传文件或在电脑上存储文件,资料有泄漏的风险,所以香港艺人陈冠希才弄出个“艳照门”,害人不浅。上网下载文件,有中病毒的危险。跟朋友网络聊天,QQ有被盗的可能。

如贝克所言,风险社会中个人化的我们在抽离之后无法再嵌入,也就是说我们将自己暴露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社会里,却找不到庇护所。在传统社会,我们可以在宗族、家庭等社会机构里寻求庇护。在第一现代,除了家庭,我们可以在民族国家、阶级等现代机构里得到保护,而宗教组织也依然在运作。在反思现代,家庭不再是必选项,我们在社会上所面临的风险不再总有家庭为我们缓冲化解,家庭对我们所能提供的保护也在减弱。宗教形式日趋多元,对人的约束和保护都日益弱化。甚至宗教自身的认同和界定都开始模糊,比如“新纪元宗教”思潮开始在不同宗教中抽取不同元素,包括东西方世界观的元素,以集其大成。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劳动就业市场,在第一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但第二现代的关键问题是工人的劳动力和剩余价值不再那么被全球化了的资本和劳动市场所需要。科技发展、符号经济盛行等因素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更需要科技研发人员和创意工作者等,而不再大量需求体力工人。失业率高企,让人们从抱怨自己被剥削,转变为担心自己没有机会被剥削。正如学者卡斯特所言,“世人努力避免让自己变得无关紧要,而尽量置身于有意义的关系之中,例如我们所谓的剥削关系”(Castells, 2009, p. 33)。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甚至愿意不拿薪水但求有个工作机会,攒点工作经验。金融危机充分展现了信息叠加在市场形成的反思错乱。阶级概念变得模糊破碎,我们无法将自己明确归入

哪个阶级,并从中寻求一些以阶级为集体利益的团体的保护。这样的风险社会如何让人产生安全感?

贝克指出这些风险特别是风险的全球化使得个人形成一种深刻的风险意识,并逐渐产生世界意识(the cosmopolitan outlook)。在第一现代我们是民族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里的一个小单元,在民族国家内部是一体,在不同国家之间是我们和别人的他/我分别。但在第二现代,一方面我们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得到强调,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风险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也是世界公民。而传播媒介就是呈现风险、塑造世界意识的主要能动者(Robertson, 2008),正如“9·11”事件被全球媒体的广泛报道,灾难发生后媒体是吸引全球关注的大磁石。

过自己的人生:个人化后的女性与家庭

被称为新加坡版《大长今》的电视剧《小娘惹》,在2008年播出后获得了极高收视率和赞誉。这部电视剧从本质上来说,讲述的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女性地位的变迁和命运的改变。《小娘惹》第19集有一段女主角月娘与一个英国人养女丽贝儿的对话。

月娘:英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吧。

丽贝儿:英国在欧洲,这里是亚洲,说远是很远的。

月娘:欧洲、亚洲……

丽贝儿:还有美洲、非洲、南极、北极。

月娘:这世界真的好大。可是,我每天就在一间小屋子里。

丽贝儿:不只是你,有很多女人,一生都困在一间屋子里面。女人是应该解放的。

月娘:解放?

丽贝儿:嗯,解放就是松绑的意思。把以前捆绑在我们身上

的绳索全部解开,还我自由。换句话说,女人,不再只是等着嫁人,等着生孩子。

月娘:等着女人跟女人斗。

丽贝儿:怎么说?

月娘:女人不能跟男人争,就跟女人斗,为争男人斗,为争家里的地位斗。

丽贝儿:女人干嘛要跟女人斗?要斗也要跟男人斗。走出家庭,在社会上跟男人竞争。

月娘:对!

丽贝儿: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当建筑师、律师、法官、警长、商人、医生、部长,甚至首相。

月娘:男人能做的,女人一样能做,说不定还能做得更好。

贝克夫妇书中讨论的个人化与女性议题,基本上被这段对话的意思概括了。你看,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人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有了全球性思维。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特别是女人,开始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小娘惹》女主角月娘虽然在第19集中赢得了当地首富挑选孙媳妇的比赛,但她却拒绝了英俊男主角的爱情,因为她要过自己的人生。

过去在传统社会中,包括在第一现代,女性的位置在家庭中,女人的一生就是“等着嫁人,等着生孩子”,女人要顺从男人。《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22—24节以神的意旨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负责家务和带孩子。在中国,女性地位在1949年以后大大提高,但除却一段追求“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短暂时期外,现在很多女人依然信

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即使一些有事业心的女人,也怯于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更看重事业而不是家庭。然而现代性和个人化的深入发展,给了女人更多自由和更大的个人空间。女性不再局限于家庭,更多的女人开始有自己的事业。好处就是女人可以开始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仅仅为丈夫、为子女而活。比如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女性经济自主权增大,以及对感情和家庭有了更高要求。个人化对女性不好的地方也很多,比如女人的生活开始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冲突和压力。由于进入职场,女人跟男人一样要面对很多社会风险。而且由于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化是不完整的,男性和女性对现代性的经历和感受不同,所以女性面临的风险要比男性更深入、更复杂(Beck & Beck-Gernsheim, 2002)。现代女性要力争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艰难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香港明星张柏芝、歌坛天后王菲等都要在生孩子和复出之间徘徊。现代女性既不能只有事业,也很难像从前的女性那样无需事业,在家庭当中可以找到避风港。拉姑在谈到张柏芝复出时说,“她现在还年轻,又靓,复出拍戏我不知多赞成,女人最紧要有自己的事业,不要像我,很早便说退出,好蠢,子女和丈夫会觉得你没用”(拉姑,见查小欣博客,2010年7月26日)。

女人,挺不容易的。争取了那么久的权益,要过自己的人生(a life of one's own),然后终于多少可以过点自己的人生,却发现,女人们现在是不得不过自己的人生。女人有了更多的机会,但也面临更多的风险以及更少的保护,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独立起来的(Beck & Beck-Gernsheim, 2002)。女性同时为现代性和传统束缚,充满了焦虑以及缺乏安全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该如何做决定,面对事业或感情,真的不知道怎样选择才不会错。外婆和妈妈两代人的生活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是如此不同,我们已经无法遵循她们曾有的生活模式让自己获得幸福。个人化后的女性,面临的是必须自己做决定以及没

有标准答案的现代性。跳水女皇郭晶晶在跳水和豪门之间难以选择,她在国家跳水队曾长期隐而不退,与香港豪门后代霍启刚恋而不婚,人生于她就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題,她自己以及我们作为看客都在等待时间给出的答案^①。其实,人生就是一系列选择題,必须自己做决定,也只能自己承担相应风险。所以感恩于愿意替我们做决定的人,父母、师长与挚友,为了那份见地以及愿意为我们所承担的责任。

贝克夫妇(Beck & Beck-Gernsheim, 2002)从教育、工作和两性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个人化给女性生活带来的改变。女人开始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再依附于男人、依附于家庭。首先是教育,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女人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教育机会。由于我们现在对这种平等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很难体会这种平等有多么难能可贵。如果让时光倒退 60 多年,女人要读书都很艰难。中国古代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祝英台要女扮男装才能混进书院受教育,女人更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这一古代“高考”。在古代女状元只存在于戏剧当中,且都是扮成男儿身,一旦被揭穿女人身份就是欺君之罪。可见,教育的背后是权力。古代女人正是因为没有读书,所以才不被尊重,动辄被指责为“妇人之见”或“头发长见识短”。而现代教育机会的均等改变了女人的生活,女性接受教育的时间逐渐延长、专业逐渐广泛。虽然女博士也不免被赋予点呆傻、没有女人味的刻板印象,但能有今天这样的平等机会和对知识女性的尊重认可已算很不错,要知道过去女硕士就已经被当成稀有奇怪的“恐龙”来看待了。

贝克夫妇指出,平等的教育机会和知识增长是女人在工作和两性关系中取得与男性平等地位的重要前提。女人有自己的工作才开始有属于自己的钱,这是女人独立于男人的必要经济基础。现代中国女

^① 郭晶晶最终于 2011 年 1 月宣布退役,退役时 30 岁,在国家跳水队中已属大龄。与霍启刚恋爱多年来屡传婚讯的郭晶晶,至退役之时尚未证实结婚。

性的就业率不断上升,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即使在生孩子后也会继续工作。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女性如今在就业市场上所受歧视远远大于在教育上的。中国的情况亦如同贝克夫妇所形容的“在教育上大门向女性打开了,但是在就业市场上这扇门又再次向女性猛然紧闭”(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67)。等到我们毕业找工作时,会发现在同等条件,甚至在女生更优秀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往往更倾向于要男生。女性在职场获得提升的机会比男性少,与男性做同样的工作,收入却往往更低。在工作中女人充满了焦虑、失望和不安全感,金融危机、生育、内部人事斗争等都有可能危及女性的工作。女性从家庭进入社会,但是在社会上却是脆弱的,离婚、生病、失业,甚至仅仅是年龄的增长都可能让女性的生活质量下降。贝克夫妇用“女性化贫困”(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形容女性的这种窘况是非常准确的(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67)。女性在第二现代个人化的不完整,正体现在女人既开始拥有自己的人生,同时又身处女性化贫困的双重处境之中,这是一种希望与挫折感并存的状态。

教育和工作的变化之外,再来看两性关系,在这方面女性生活的改变贝克夫妇用剧变来形容。古代中国,特别是宋代以后,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严守男女大妨。女性无论是在婚姻还是性爱当中,基本是男人的被动附庸,缺乏自主权。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①指出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女性的性持多重态度。讲生殖时歌颂母亲,讲三从四德时否认女性性需求,讲到“红颜祸水”和“劳色伤身”时,又充满了对女色的恐惧。中国古代长期处于一种“性精神禁锢”的状态。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中国人的性以生殖为最终价值目标,反对性的“寻欢作乐”(潘绥铭,1993)。潘绥铭长期致力于中国性学研

^① 潘绥铭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究,他在福特基金资助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调查报告中称中国女性的性革命已经开始(《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见潘绥铭学术博客,2007年6月30日)。如今“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时间增加了,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了”(潘绥铭学术博客,2008年9月14日)。这一性解放的过程与个人化的过程大体同步。潘绥铭(2008年9月14日)总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以个人为单位,在性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个体化……”中国社会已经“急剧的分化”。不过,性解放对女人的影响也不全然是正面,贝克夫妇指出性解放后的女性面临着比男性更多的风险:名誉、健康、非自愿性生活、男性责任感降低以及意外怀孕等各种后果。

除却生育后代目的,中国人的性与婚姻开始更多地追求爱情。中国古人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爱情的成分并不高。唐明皇与杨贵妃“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是古代人婚姻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爱情表达。《红楼梦》里,贾宝玉与林妹妹那纯粹的真挚爱情,输给了宝玉与宝钗出于家族利益的政策婚姻。现代婚姻更多的是出于爱情而不是其他,爱情的标准也有所提高。“现代中国,包括全世界都一样,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因此标准越高,符合你标准的就越来越少,这是全世界共同的情况,尤其在受教育多的人的地方。”(潘绥铭,见中国家庭研究网,2007年11月2日)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影影响减退,给了个人在家庭、婚恋上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自由的获得伴随着更多的困惑,于是爱情在现代社会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主题和需要从事的一项工程(love project)。《诗经》有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如贝克夫妇所言,在现代婚姻里人们必须建构和维系自己“在一起”的方式(construct their own form of togetherness)(Beck & Beck-

Gernsheim, 2002, p. 92)。过去,“在一起”很简单。无论是古时候的父母包办,还是进入现代社会后的自由恋爱,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结婚,结婚后自然就生孩子,离婚较少。现在情况可就复杂了,“在一起”可能是婚姻名分上的、感情上的、情欲上的,又或者是三者的组合。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应当如何相处?在第二现代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固定模式,这需要我们一起摸索。现代社会,恋爱有异性恋、同性恋、老少恋、姐弟恋等多种形态。恋爱了不一定结婚,结婚前往往会同居试婚。结婚的变少,离婚的增多,离婚后又再婚,或者干脆不结婚了。2005年播出的《家有儿女》是一部反映离异再婚的家庭情景喜剧,丈夫带着一儿一女,妻子带着自己的独生子,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大家庭。如同电视剧所描绘,在现代社会孩子们面临着复杂的亲属关系:生父、生母、继父、继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乃至各种有血缘、无血缘的祖父母等。结婚后生不生孩子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也许就丁克了,领养也不出奇。好莱坞明星情侣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还没结婚,自己所生和领养的孩子俨然如同小“联合国”。婚姻对女人而言曾经不过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于是,女人安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运。在现代社会女人的要求更高了,实际上无论男女对婚姻都有了更高期望值。贝克夫妇(Beck & Beck-Gernsheim, 2002)将婚姻家庭分为三种类型。前工业社会的家庭生活以生产活动为核心,牛郎织女的“男耕田、女织布”就是典型。在第一现代,家庭生活既是物质利益共同体又看重感情因素。到了第二现代家庭生活的运作以精神层面为核心,婚姻应当是感情上的相互扶持,我们在婚姻里寻求个人幸福,以更好地找到自我、展现自我,也就是本书第二章所介绍的“纯粹关系”的一种。没有了包办婚姻,没有了媒妁之言,爱情成了一道选择题,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让他/她伴着自己成长。

贝克夫妇将第二现代的家庭形态及复杂的“在一起”形式称为“后家庭形态家庭”(the post-familial family)。传统家庭的稳固让位于现代家庭的复杂脆弱,家庭成员不再固定而是个人选择和定义的结果,比如是否将继父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看作家人等(Beck & Beck-Gernsheim, 2002)。贝克夫妇没有谈到的是“在一起”中媒介的作用,新媒体形态的出现改变了我们与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方式。现代人流动性增强,生长在一个城市,读书在另一个城市,工作、结婚可能又会换一个城市,于是我们离开老朋友,结识新朋友。我们跟朋友的交往不再局限于面对面,开始更多地依赖媒介。我们通过开心网等社交网络在一起,我们通过微博或 MSN、QQ 等聊天系统在一起,手机短信、电话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在一起”。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这样的“在一起”是多元的、超越时空束缚的,但又多少是令人惆怅的。思念时不免会想“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①。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这个越来越个人化的世界里,都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深入骨髓,即使是家庭圆满、事业成功,也挥之不去。

个人选择之现代性,流动的再嵌入

在社会学家中贝克的风格是特别的,似乎不太系统,不大追求逻辑的严密,但他细腻而有洞察力,情理兼备地解释社会变化,并充满了前瞻性。个人化概念“描绘了社会机构在第二现代的社会结构性转型,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202)。个人化并不为第二现代所独有,但只在反思现代才成为社会的结构性

^① 引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歌词。

特征。贝克夫妇对爱情、情欲、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关注填补了吉登斯和汤普森等其他社会学者讨论现代性时的重要空白。虽然吉登斯也论及现代性在身份认同及亲密关系的宏观/微观互动,却没有贝克夫妇较为敏锐的女性观点。

“选择”(choice)是贝克个人化讨论的关键词。在反思现代,因为必须做选择而有了选择的自由、负累与痛苦。第二现代的结构性的转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各种个人问题。生有生之选择,死亦需要选择。我们无法逃避死亡这个必然终点,但我们可以选择死去的方式(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p. 151-155)。

个人化的发展要求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在第二现代我们如何理解阶级、家庭、贫穷和富裕等。贝克说,这些词都变成了“僵尸概念”(zombie categories)(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203)。这些词还在为我们日常使用,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定义和内涵早已发生改变。比如我们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第二现代的人处于动态贫穷和动态富裕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会面临失业或贫穷问题,或者迅速成为富豪。前者有曾经宣布破产的香港明星钟镇涛,后者如英国女作家罗琳因为《哈利·波特》系列从窘迫的单身妈妈变成了世界女富豪。贝克认为阶级也是僵尸概念,第二现代作为“无阶级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class)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明确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Beck, see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205)。贫富等其他各种概念在中国社会是否为僵尸概念,或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尸概念,是需要我们去具体分析的问题。但贝克僵尸概念的说辞是可爱的,这提示我们不要想当然,不要对生活中的变化习以为常,而是要保持反思性,将现在比照过去,以析出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像贝克一样关照未来。个人化在中国也许还没有发达国家那么普遍,但是第二现代

全球个人化的结构性力量同样会在现在以及未来的中国社会发挥重大的影响。

贝克对个人化的未来趋势是乐观的,合作、利他的个人将个人自由与对他人的互动结合在一起,第二现代是一个反思的学习过程和社会化过程。贝克的思维充满了“乐观和对未来的殷切期望”(Rutherford, see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213)。当然贝克也说在反思现代我们无法再嵌入,这样的话想想就让人觉得焦虑。不过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也许我们不是无法再嵌入,而是必须以新的形式再嵌入——流动的再嵌入(new reembedding as liquid),以各种流(flows)的形态再嵌入各种保护机制中去。在第二现代,大多数人也许很难再嵌入某个固定的社会机构,而是让自己深陷各种流动之中。以学者为例,为具备学术资格我们要获取和增进知识流(the flow of knowledge)。这个知识流建构于学校和图书馆等社会机构,学术期刊和网络资源等信息媒介,全球范围的各种学术会议、学术协会和朋侪学术圈等。这个学术流包括学术资源的输入、产出、发布、鉴定和交流。日常交往中,友情谊呈现一种友谊流(the flow of friendship)。现代人的流动性日益加强,因为学习、工作、旅游等原因,我们很难一生固守于一个城市或者村、镇等。任何地方,或者是没有地点的网络空间,都可以让我们获得、失去乃至维系友谊。选择一个地方或网络空间,便是选择了自己友谊流的一个重要节点。QQ要常开,很多朋友同学在上面。MSN要申请一个,因为有些白领朋友或者在境外的朋友只用MSN。开心网得加入,不少朋友在上面偷菜、种菜、做饭、转帖、投票和玩游戏。最终不得不随大流申请了新浪微博,怕自己错过那纷繁热闹的世界。每天早起把QQ、MSN挂上,把新浪微博、开心网更新浏览一遍,不行再加上Google Talk、人人网甚至淘宝旺旺之类的。总之,在自己的网络友谊流里畅游一番后,终于可以心满意足、放心地学习

工作了。现实是残酷的,多少得有点钱防身。这年头,没人像旧社会土财主那样拖出一箱钱,眉开眼笑地逐个数银圆了。钱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在存折、银行卡里流动,在股票基金账户里流动,一不小心投资失误就流动到了别人那里。甚至还有未来的钱流动在信用卡里。赶上交学费了,财政吃紧,调动几张信用卡进行乾坤大挪移。这些就是我们的金融流(the flow of finance)。还有很重要的身体流(the flow of body),上午还在香港,下午已身处数日细雨绵绵的台北,终于明白很多年前,台湾歌手孟庭苇为什么让大家“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忙碌的现代人在频繁地转换空间,身处不同场域已是平常。除却个体身份认同,我们开始更关注和塑造自己的身体,身体政治也是近20年开始流行的学术新潮。做发型、修眉、护肤、洁牙、买衣服,还有健身、理疗等,都在不同的机构或者个人服务中完成,身体的构建有赖于服务流(the flow of service)。贝克这幅流动风景,若放在中国现场,自有另一番景象。资源丰富的中国富人与中产阶级,已尝到了这一种流动人生。但农民、草根阶层、南漂北漂的蜗居蚁族……他们的社会流动是困难的,并承担更大的风险。

这样的流太多,无法穷尽,它们编织成一张反思现代的网络,深陷网中央的就是个人化的我们每个人。反思现代同时也是液态流动的现代性,贝克的讨论给众多学者奠定了第二现代讨论的着力点,下一章我们介绍的就是其中一位学者鲍曼的液态现代(liquid modernity)。

all that'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 液态现代 Zygmunt Bauman 轻资本主义 light capitalism 消费者社会 liquid modernity 解放
privatizing the public 个人流动的时空 emancipation 不确定的工作 in search of commonality 共同体安全感的追寻



all that'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 液态现代 Zygmunt Bauman 轻资本主义 light capitalism 消费者社会 liquid modernity 解放
privatizing the public 个人流动的时空 emancipation 不确定的工作 in search of commonality 共同体安全感的追寻



all that'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 液态现代 Zygmunt Bauman 轻资本主义 light capitalism 消费者社会 liquid modernity 解放
privatizing the public 个人流动的时空 emancipation 不确定的工作 in search of commonality 共同体安全感的追寻



all that'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 液态现代 Zygmunt Bauman 轻资本主义 light capitalism 消费者社会 liquid modernity 解放
privatizing the public 个人流动的时空 emancipation 不确定的工作 in search of commonality 共同体安全感的追寻

第五章

液态现代与社会变迁

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出生于波兰,1971年被驱逐出自己的祖国,自此旅居英国。这段话于我们不过是普通的人物简介,于鲍曼本人却是伤痛的经历。作为具有犹太血统的社会学家,他自幼承载着家境清贫的困苦和外界反犹运动的压迫。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身参与,旅居他乡的坎坷人生历程,深深地烙入并影响了鲍曼的学术思想。鲍曼的名著《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Bauman, 1989)就是源于个人经历,认为屠杀犹太人与现代性的程序思维是紧密相连的。

鲍曼以两点著称,其一是他对第二现代——液态现代的探讨,其二是他优美的语言。鲍曼的语言老练优雅,如诗如赋,流畅而有音韵。他爱用长句、生僻词、难词,多隐喻,好典故,但浑然天成而非卖弄。这样的文风对于学界初学者特别是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颇感为难。对于不熟悉鲍曼风格的读者,第一遍读他的《液态现代》(*Liquid Modernity*, Bauman, 2000)^①,可能在浮光掠影间捕捉到几个

^① 鲍曼在书名当中用 *Liquid Modernity* 来命名“液态现代”,但在行文当中他用 *fluid modernity* 这个词更多,有时他也用 *liquefied modernity* 来形容液态现代。

关键词,猜测其大意;第二遍细读则开始具体感受该书难读之所在,领会鲍曼到底在说什么;读到第三遍之后,逐渐真正理解鲍曼。即使曾有难以读懂的“愤懑”,最终也不得不承认鲍曼语言之美,其思想之清晰深邃。

《液态现代》是鲍曼近年代表作及本章介绍重点,如果说贝克的个人化论述捕捉到了第二现代的社会结构,那么鲍曼的液态现代则描绘了第二现代的轻灵流韵。现代性之流动,也许早在现代社会兴起之初就由马克思(Marx, see Giddens, 1971)所预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类社会从第一现代进入第二现代后,曾有的坚固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机构等被逐渐解构,重型机械化生产、静态的劳动力和资本等开始变得流动、轻灵。我们在第四章伊始已对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做了扼要比较,而本书所介绍的学者中以鲍曼(Bauman, 2000)对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的比较最为系统和充分,甚至是戏剧化了。总而言之,第一现代强调社会结构,社会结构限定并成就个人,个人遵从社会秩序,社会机构势大。在第一现代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形成生产者社会,劳动力与资本捆绑在一起,采用福特生产模式,用鲍曼的术语这是“重资本主义”(heavy capitalism),即“固态现代”(solid modernity)。鲍曼认为“液态现代”(liquid modernity)作为第二现代,却是一种“轻资本主义”(light capitalism),资本与劳动力松绑后,在全球自由轻快地旅行,生产方式是后福特模式和去工业化的,重视创意产业,符号经济强劲,人类社会进入消费者社会,反思性成为第二现代之网路社会的本质特征。贝克对鲍曼影响很深,鲍曼用“令人大开眼界”(Bauman, 2000, p. 135)来形容贝克的研究。虽未明言,鲍曼实则以贝克个人化论述驾驭《液态现代》全书结构,书中讨论的解放、个人、时空、工作与共同体关键词,犹如五颗珍珠串联于个人化论述之上。这五个概念是第一现代的流行词语,在第二现代依然被广泛使用,但在

某种程度上已然变成贝克所形容的僵尸概念,其内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

在进入具体论述前,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学者书写情境的重要性。上一章,我们说贝克重个人轻阶级是因为他所处的德国社会高度发达,这成全了贝克笔下的个人化生活。本章所谈鲍曼对液态现代的论述,同样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英国写就。而中国正处于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的混杂期,传统的规范与制约也依然不弱。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准确理解学者们论述的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特征,然后衡量中国的情况哪些可用第一现代解释,哪些已是第二现代了。

解放与积极自由

“解放”(emancipation)在学界并非新命题,但事易时移,如果在第二现代情境下我们不相应考量其新内涵,解放这一概念也会变成贝克所说的僵尸词汇。法兰克福学派以讨论解放而知名,这些批判学者相信,为追求自由应当将人们从强势阶级的支配、从社会结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鲍曼(Bauman, 2000)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等批判理论所定义的解放概念已经过时,固态现代是秩序架构的社会,所以存在个人对社会结构之抗争。在液态现代,创造比秩序更重要。人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做自己的选择,而不全然是为社会结构束缚的问题。既然人们已经被社会结构推向个人化的工作与生活模式,第二现代的新救赎不单是如何争取个人自由,而是人们如何聚集在一起,如何营造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重新建构一个公共空间。在第一章我们说,涂尔干命题为在分工精细的社会中如何实现人类社会凝聚。在第四章我们说贝克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互惠和相互依赖的机构化个人主义。汤普森(Thompson, 1995)曾分析“媒介化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ness)。本章介绍鲍曼对共同生活(live together)形式的探讨,即现代人如何通过“衣帽间共同体”实现暂时的“在一起”。这是鲍曼所用的比喻,指现代人有如看歌剧的观众,在衣帽间脱去外衣,短暂地欢聚一起,我们将在下文再加分析。而本书第六章则介绍戴扬和卡茨给我们提供的凝聚现代个人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媒介事件。无论是衣帽间共同体还是媒介事件,我们认为这种突然形成、突然消散的在一起可用“爆发性公共性”(explosive publicness)来形容,并且爆发性公共性被媒介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总之,社会凝聚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学者给出了相互呼应的答案。鲍曼说,“社会是现代个人强烈需要然而尤为缺失的条件”(Bauman, 2000, p. 40)。这句话体现了贯穿全书的情绪,也反映第二现代由于社会过于缺席导致人们渴望社会和共同体的庇护,追求归属感与安全感。在上一章贝克指出个人化之趋势、社会之退隐。而本章介绍鲍曼在认可个人化前提下对社会、共同体的重新审视。贝克也好,鲍曼也罢,包括我们每个人,人类追求的往往是一种急剧变迁中的安全感。

鲍曼谈解放时经常复述贝克的个人化概念,继而深化发展并联系至解放主题。解放的目的在于追求自由,但问题在于追求哪种自由。遵循康德传统,学者伯林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 or ne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 or positive liberty),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Berlin, 1969)。学者卡特(Carter)解释道,消极自由意指没有任何阻碍和限制的个人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行动的可能性或实际结果,即个人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并实现基本目的。积极自由并不等于个人没有任何限制,有控制仍然可能是自由。消极自由经常归向个人行动者,而积极自由往往被归向集体,或积极自由的个人拥有者更多是作为限定集体的成员而存在。伯林又指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不仅不同,并且可谓相互竞争的,是同一政治理想无法兼

容的诠释(see Carter, 2008)。鲍曼详析了这种矛盾性所在。消极自由与“法理个人”(individuals *de jure*)相对应,所谓法理个人指既然个人在法理上已拥有不受限自由,那么对于个人挫败只能归咎于个人原因,并且应当不懈努力去寻找个人解决方案。积极自由与“事实个人”(individuals *de facto*)对应,指掌控个人命运并做出真正需要的选择。然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接近法理个人的一端,却远离事实个人。鲍曼认为,第二现代的解放就是跨越法理个人与事实个人之间的鸿沟,达至事实个人的状态。这个鸿沟的难以跨越正是因为现代人拥有消极自由有余而积极自由匮乏,以及个人权力与私域兴盛而公共权力与公共领域势弱。过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殖民,认为要实现人类解放必须压制公共权力以保障私人领域。但现在正相反,危险在于私人领域对公共空间的殖民。如今的公共领域充斥着私人话题,并且仅停留在关注自身的私人歆歆而缺乏集体关照。在个人化趋势压迫下,人们逐渐丧失了公民身份及公民意识、技巧。没有公民的存在和努力,法理个人转变为事实个人的前景黯淡,第二现代的解放难以实现。鲍曼解释说公共权力限定个人自由,公共权力过大会危及法理个人或消极自由,但现在法理个人基本已被法律系统保障。如今的问题在于公共领域过度萎缩,这使在法理上似乎得到保障的个人自由在实践中难以践行。也就是说,事实个人或积极自由现在还远未为大众拥有。简而言之,鲍曼认为第二现代的解放就是大力争取积极自由,并力图成为事实个人。为实现这样的解放目标我们需看到公共权力赋权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正面功能,应当重构公共空间,适当恢复公共权力,以防止私域对公域的侵蚀,并对全面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趋势作出修正。同时依赖公共政治,即将私人问题转换为公共议题,并寻求公共讨论、协商和解决。只有这样,现代人才能实现真正的和更多的个人自由(Bauman, 2000, pp. 38-41, 48-52)。

至此可以看出,鲍曼特别强调社会,而贝克始终更强调个人。鲍曼与贝克一样认为在第二现代社会结构已不是限制个人的大问题,而在吉登斯的现代性讨论中社会结构依然是问题。但鲍曼似乎比贝克更认可社会结构的赋权作用,认为公共权力不仅限制也能保障个人自由,这一点暗合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论述,即社会结构与能动性(agency)之间的辩证关系(Giddens, 1984)。另一方面,鲍曼谈解放时反复警示人们注意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殖民,这源于鲍曼对吉登斯生活政治概念的批评。生活政治是被吉登斯(Giddens, 1991)正面论述的重要概念,所指的是通过个人选择生活方式成全自由自在的自我。但这个概念在鲍曼看来却是负面的,现代人生活中悲惨的一面正是生活政治蔓延的结果,亦即是说个人抉择把社会推向全面分化。鲍曼(Bauman, 2000, pp. 51-52)在书中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将生活政治的私人乌托邦集体化,以建构美好的公正社会。要实现人类共同生活,必须在生活政治之外寻找答案。我们认为吉登斯强调生活政治与鲍曼强调公共领域各有其道理,两者并不相悖。吉登斯的生活政治追求多元、平等的生活选择以及促进性的权力。鲍曼提倡公共权力对于个人的保障及社会对于个人的责任。我们认可鲍曼对于第二现代解放的论述,理解但不认同鲍曼对于吉登斯生活政治的批评。生活政治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只有生活政治而没有公共政治才是问题。

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侵蚀,在传播媒介中体现为反映私生活的谈话节目盛行。或是明星等精英的私人生活叙述,如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等;或是普通人的情感纠葛,如湖南卫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真情》等。这些节目颇受观众欢迎,也不乏价值。但问题是目前电视屏幕上这类谈话节目太多,而关注公众议题的节目太少。生活政治取代公共政治,支配了包括电视在内的主流传播媒体。然而,我们即使从《康熙来了》中知晓再多齐秦与王祖贤的陈年往事,或是看那英在节

目中叙述她如何跟老公、孩子相处,也只是了解到某个人的个人故事,仅此而已。这些谈话节目无法将私人叙述转换为公共诉求,无助于我们去实现女性地位提高、儿童教育发展等议题,更遑论从整体上提升人类的积极自由,实现第二现代的解放。

个人、消费与传播

“个人”(individuality)是鲍曼论述的第二个关键词。对于个人在现代变迁中的命运,吉登斯、贝克和鲍曼观点一致,即现代人的自我不再是固定的个体而是任务或工程。贝克的个人化概念更是将鲍曼的解放和个人两部分论述紧扣在一起。在这个部分,鲍曼(Bauman, 2000, pp. 56, 63-68)对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做了反复比较。如果说第一现代是给你一个使命去完成,第二现代的使命却是创世纪。从无到有,你就是上帝,创造你自己的天地。固态现代/重资本主义由生产者主导,崇尚权威、服从领袖以及遵循规则,是一个“你说我做”的世界。在液态现代/轻资本主义,多种权威同时存在,或者说赋予个人更多的能动性。命令和教条被鄙夷,代之以顾问和范例的流行,是一个由消费者主导的世界。在《康熙来了》这类谈话节目中,嘉宾不是以权威身份指令观众如何去做,而是讲述自己。比如台湾歌手张清芳身为华语乐坛天后,依然有着普通人的困惑,原来她因为长相平凡而苦恼,也曾被嘲笑。她曾经恨嫁;婚后,又以家庭为重,要向先生申请才能在2010年重回台湾开演唱会。观众喜欢看谈话节目是因为他们清楚在现代社会一切只能靠自己,“知道与自己面临相同问题的其他人怎样处理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Bauman, 2000, p. 68)。谈话节目给大家提供的正是其他人的处事方式,所以,社会越现代、越个人,谈话节目将越加流行。从固态现代到液态现代的社会变迁,正是谈话节目

日益盛行的深层原因。我们之所以要强调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对话就在于只有深刻了解社会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传播。不光是谈话节目,在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媒体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公共领域被重新定义,私人问题日益取代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中被讨论和呈现。比如“艳照门”事件将几个人的男女情欲广而告之,引发轰轰烈烈的公众讨论,但讨论再多也无非是谢霆锋如何对张柏芝不离不弃,阿娇如何挣扎复出。这些讨论并没有在尊重女性及个人隐私权上带来变化,反而由于媒体的示范作用,引得更多类似的“艳照门”事件爆发出来。

鲍曼对消费社会和身体政治的论述也相当精彩。他说第二现代是“瘾社会”,上网成瘾,寻找范例、依赖咨询也成瘾。瘾之背后是永无止境的欲望,所以生活中不乏购物成瘾的购物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鲍曼说液态现代有个无法穷尽的购物清单,唯一不在上面的就是“不购买”。消费主要由欲望而不是需求驱动,其欲望永远无法彻底满足。在液态现代一切事物有被简约为商品的趋势,一切行为归根到底都是购买行为(Bauman, 2000, pp. 72-76)。教育在过去包括传道、授业与解惑,在今天教育成为产业,其绩效用学分绩点、学位学历还有毕业薪酬来量化衡量。婚姻在古代是誓约,在固态现代是责任,在液态现代是合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强调朋友能够起到的启迪作用。但今天这种启迪也成为商品,比如心理咨询师、律师、投资顾问等,他们的意见都是需要付费购买的商品。在消费社会里,欲望通过广告等方式被激活和培养,通过购物释放人们虚幻的快感,这种快感能即刻获得,又稍纵即逝,现代人因此沉溺于不断的购物和追逐名牌当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鲍曼对消费社会及消费的论述不甚正面,他认为消费生活中的流动性和弹性并非解放机制,反而起到限制自由的副作

用(Bauman, 2000, p. 90)。这与其他学者的观点形成对照。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赫布迪齐(Hebdige)认为亚文化群体通过消费行为交流,从而实现对主流文化的抵抗;詹金斯将粉丝的消费行为视作第二次生产,是受众能动性的体现,帮助建构粉丝群落;福柯将消费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我们通过消费实现社会区分(see Storey, 1996, pp. 115, 119, 120, 126)。可以发现消费文化逐渐成为传播学的研究热点,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迁已然在传播学研究主题中折射出来。在中国曾经非常流行的美国电视剧《越狱》就是粉丝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狂热的中国观众自发组成字幕组对《越狱》进行了效率奇高的翻译,翻译好中文字幕的版本放到网络供观众免费在线收看或下载。“某字幕组出品的《越狱》第二季高清版本竟被下载了200多万次。”(陈赛、刘宇,2006年12月21日)除开这种翻译字幕、疯狂收看等深度观看行为,《越狱》迷群体也通过消费行为建立起来。在中国粉丝为《越狱》建立的网站^①上,可以看到“越狱08黑色款T-shirt限量预购”之类的通告,《越狱》粉丝们购买和穿上这样的T-shirt就是一种粉丝群体的建构和对彼此粉丝身份的确定和认同。于是传播现象与消费行为融合在一起,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彼此贯通。

固态现代是生产者社会,以健康(health)为标准去追求;液态现代是消费者社会,溯求健身(fitness)。健康与健身经常混用,两者都与身体政治有关,但隶属不同的话语体系。健康作为第一现代概念,在“正常”和“反常”之间划分界限。健康是相对来说可用固定标准去衡量的身体、精神令人满意的适合状态。健康意味着达到了在劳动市场上被雇佣的标准。健康状态可以用一些具体指标衡量,比如成年人正常心跳速率范围一般是每分钟60至100下。健身,作为第二现代概念,

^① 域名为:<http://www.prisonbreak.cn/>。

很难用固定标准衡量,健身意味着拥有灵活和调节能力强的身体,意味着能随时应付反常、非常规或极端情况。追求健康要遵循规则、达到标准,而追求健身需具备打破规则、突破常规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达到某些标准时,就进入了健康状态,不至于有无法满足的焦虑感,而我们对健身的追求却永无止境,这是一种主观体验。追求健身促使我们消费更多,从减肥药到健身私人教练等。除开健身,人们有太多理由去消费,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购物是一种驱魔仪式,可以帮助人们逃避持久的不确定性和令人苦闷的不安全感。这一仪式需要不断重复,因为每次购物给人带来的快乐和安全感是短暂的,购物本身也无法斩断不确定性的根源(Bauman, 2000, pp. 76-81)。现代消费与传播关系密切,《越狱》粉丝等很多受众群体通过消费行为建构共同体。声势日盛的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等都有赖于传播渠道,网络购物有大名鼎鼎的淘宝网,电视购物有湖南卫视的“快乐购”电视频道。甚至,消费本身就是传播。走进任何一个大商场,我们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广告等各类符号,这些都属于传播学中符号传播或视觉传播的研究领域。在第二现代这一消费社会,消费与传播的交织势不可挡。

流动的时间与空间

消费与传播,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承载,在吉登斯之后,鲍曼对时间和空间做了精彩的论述。时空讨论中有三个概念:地方、空间和时间。吉登斯详尽论述了地方和空间的区别、空间与时间的分延(见本书第二章)。鲍曼在《液态现代》中的假定读者已由吉登斯处知晓地方与空间的区别,直接对时空进行了延伸讨论。

“空间是我们在特定时间经过的所在,而时间是经过某个空间所必须的历程。”(Bauman, 2000, p. 110)如鲍曼所言,现代性开始于将

时间从空间中解放出来,时间成为征服空间的工具,时空关系从静止、笃定变得动态起来。在第一现代,时间被标准化及抽象化为数字。在第二现代,在标准化基础上,时间开始湮灭(annihilation),这体现为由网络信息技术辅助的即时性(instantaneity)。在时间达到即时状态前,征服空间必须要花费一定时间。唐代杨贵妃爱吃荔枝,于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①。那时候的高级交通工具是马,从岭南到长安需要“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②。现在有飞机货运,征服空间所需要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会如同《机器猫》动画那样,打开“任意门”跨进去,人和物就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或空间。而在网上,信息跨越空间已经达到了即时性乃至“零时间”。在固态现代,无论是平信还是特快专递,信件传递都需要数日,而在液态现代,通过 email 只要数分、数秒。电话、QQ、MSN 等即时通讯软件,可以让处于不同地方的人实现同步交流。在液态现代,时间也变得灵活流动,可以即时,可以延时,可以瞬间勾连起不同空间。第二现代的时间概念跟我们从前理解的时间概念已经大大不同。

鲍曼对空间的论述很漂亮,充分体现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常人熟视无睹的生活场景,于他却是值得深究的社会现象。第二现代浓缩于都市生活,与小城小镇皆是邻里、彼此知根知底的生活不同,都市里涌动着陌生人,我们要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迥异、陌生的个人在都市里共同生活需要掌握礼仪(civility)技巧,即掌握社交技巧,彼此互惠相处。鲍曼在《液态现代》里面分析了四种“公共但不公民”(public yet non-civil)的空间:“排异之地”(emic places)、“噬异之地”(phagic places)、“非地之地”(non-places)及“不存在之地”(empty spaces)。在

^① 见唐代诗人杜牧《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② 据明朝张岱的《夜航船》载:“唐天宝中,贵妃嗜鲜荔枝。涪州岁命驿递,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

这四种空间里与陌生人相处时,都可无视其存在,无需掌握和运用礼仪。“排异之地”比如法国的新凯旋门广场,这种地方不鼓励逗留,适于游人之观赏而不是停歇。排异之地对他者(陌生人)之差异采用排斥策略,鼓励离开。排异之地是无情的排他,而噬异之地是冷漠的同化。所有的消费场所都是“噬异之地”,噬异之地对于他者(陌生人)之差异采用搁置、吸纳和同化策略,让不同个人采取同样的购买行为和心理体验。消费场所鼓励人们的(消费)行动而不是互动,虽然人头攒动,但终是没有交流的个人消费,是一种获得快感的精神体验而不是社会交往(Bauman, 2000, pp. 94-103)。正如我们去宜家,沿着地上指示方向的箭头行进,浏览、沉浸在家居用品之中,但不会与其他顾客有交流,除开偶尔问询,甚至也不用与店员打交道。查货、提货、付款、运输甚至组装家具都是如同电脑程序的个人行为,美其名曰DIY(自己动手做),实则是商家效率至上、利益优先的异化行为。去再多次宜家,我们于那个地方也是陌生人,没有人际互动,没有情感交流和投入,所经过的只是冷漠和高效的“噬异之地”。注意,无论是排异之地的排斥差异还是噬异之地的吸纳差异,都是人类学巨匠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①所分析的如何处理“他者差异”(the otherness of the other)的策略。与“他者差异相处”是人类学、社会学与传播学共同面对的命题。就传播学而言,媒介如何报道农民工、下岗女工、同性恋、瘾君子等“他者”是个问题。媒介应当如何通过传播行为,让社会对他者和他者之差异更宽容?第四章我们曾分析贝克提出的方案是世界主义,希望人类整体能够形成世界公民意识,对他者及差异秉持尊重、宽容的态度和行为。这是个值得追求但不易实现的理想。媒介在其

^① 列维—施特劳斯是20世纪著名人类学家,犹太人,退休前为巴黎市法国大学的人类社会学教授。他于2009年10月31日逝世,此时离他101岁生日只有数周时间。作为人类学家,他摒弃了西方学者曾提出的“野蛮”或“原始”的概念以及西方文明是唯一先进文明的观点。

中的角色和作用至关重要,且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而媒体对风险和危机的呈现也许是促使人类形成全球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比如媒体对美国“9·11”事件的报道,又如对中国2008年“5·12”汶川地震的呈现等。其中或引起“他我若邻”的同理心,但亦会触发“他我大不同”的排拒情绪。

“非地之地”是近些年日益增多的“公共但不公民”的空间,如机场、地铁等场所。与排异之地一样,非地之地也不鼓励逗留,但后者的目的在于敦促尽快通过或离开,或者绕开而行的禁止通行之地。当陌生人在机场等非地之地遭遇后,彼此没有互动,没有个人身份、关系和历史的表达,同样也不需要掌握复杂、熟稔的社交技巧。非地之地是空间转换、时间交错的节点,第二现代人们的流动性日益增强,非地之地也就越来越多。前面所述排异之地和噬异之地,他者之差异分别被排斥或吸纳,非地之地却是功能性的,鼓励某种功能高效履行。另一种情况却是他者之差异被无视,这个空间就是“不存在之地”。从物质角度来说,“不存在之地”是存在的,但是对某个特定的人来说,这个空间在其精神地图里却不存在。比如鲍曼在书中所举的城市精英所不知道的贫民窟。既然这个地方对精英、富人来说是不存在的,那么对他们而言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存在之地也是意义虚空之地(Bauman, 2000, pp. 102-104)。非地之地和不存在之地也是传播学中不容忽视的主题。每年中国媒体对春运的报道,其实是在诠释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等非地之地折射出来的亲情、伦理和资源配置等社会问题。而世界媒体的报道总是集中于几个欧美发达国家,或者与这些国家有利害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于是大量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不存在之地,其相关议题也被人类整体忽略,这是传媒失职与媒介伦理的缺失,有悖于世界主义的理想。

第二现代的时空流转,让我们面临着迷宫一样的未来,及无数从

未去往、未曾知悉的地方。都市化、网络化的液态现代,让我们在生活中或网络上更多地与陌生人打交道。我们遇上陌生人,也可能爱上陌生人,信任或者怀疑专家系统中的那些陌生人,我们该如何与他者之差异相处?我们自己作为陌生人,又如何被所到的地方接纳?在传播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中,有个主题是“花果飘零、乡关何处”之“流落他乡者”(Diaspora)。承载、浓缩时空转换的流落他乡者,因为被驱逐、移民或者求学等各种原因离开出生成长的家乡,到达新的地域,但求在抽离原来的地方后能够再嵌入新的地方。但嵌入不易,所付出的经济、精神及文化代价也是巨大的。我们从外地而来,语言多少有障碍,在当地没有资源,没有社交网络,所以我们获得成功要付出更多,即使成功也难以被承认。流落他乡者,在新的地方总是艰难,我们从家乡抽离出来,但不知在他乡是否能够成功地再嵌入。于是,在他乡建立、维持流落者的共同体成为一种精神和现实寄托,例如华人在世界各地形成的唐人街。在第二现代,流落他乡者共同体的营造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体。学者卡里姆(Karim, 2003)分析了流落他乡者是如何通过洲际传播网络来建构其共同体,认为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过程。流落他乡者对媒介的运用是当前日益流行的研究主题,也体现了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共同关注点。

鲍曼本人就是一个流落他乡者,这影响了他的学术视野和风格,让他更有一种悲悯气质。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流落他乡者,离开家乡的小城,去省会、首都甚至国外求学,毕业了或者留下,或者去往另外一个大城市。在新的城市永远都是异乡人,可回到家乡,又被家乡人认为来自另一个城市。于是,面对任何一个城市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你们”,什么时候该说“我们”。于是就会想,我是谁?我在哪儿?

不确定的工作、不确定的我

我们离开家乡往往是为了接受教育,留在他乡往往是因为开始工作,或者如农民工为了更好的生活,从乡村去往城市工作。在充满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的液态现代,工作是不稳定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非笃定的。于是,缺乏安全感、寻找安全感成为普遍的异乡情绪。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去往和留在陌生的地方,因为我们相信和追求美好的未来。

未来,我们的世界将繁荣,我们将获得挚友,而我们的幸福将得到确保。

——比尔斯(Bierce, 2002)

那么,如何到达未来?“未来则是由工作创造,工作是所有创造的源泉。”(Bauman, 2000, p. 131)工作由此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美德之一,这一点从新教伦理鼓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以获得上帝认可就已经开始(见本书第一章)。所以,工作、劳动力和资本等相关讨论对于现代性命题来说至关重要。从第一现代到第二现代,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加上时空关系的转化,工作的形式和内涵,比之从前已经大大不同。

在液态现代,工作越来越是个体行为。电话、电子邮件及QQ文件传输等,让人们工作中的合作不用再面对面进行,在家办公十分普遍,工作时间也变得弹性起来。在第一现代工作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最典型的是日本公司,他们过去长期采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即论资排辈制)。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人没有严重过失,员工就没有失业之忧。于是员工对企业会很忠诚,也能获得归宿感和安全感。但为更好适应现代社会竞争,日本公司开始打破论资排辈,人才流动

也开始增强。在中国,过去找到一份工作就端上了“铁饭碗”^①,虽大家收入都不高,但没有失业危险,那时候人们待在“单位”里。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干和干不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但是,1986年,沈阳市防爆机械厂宣布破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外国媒体称之为“中国改革的一项重大实验”。然而,对于中国普通职工来说,这是下岗浪潮的前奏。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指出:“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同一年,中国迎来国企改革和破产的大潮,社会开始出现下岗大军(网易,2009年9月6日)。失业率上升已然成为世界问题,在更为现代的欧美等西方国家甚至更严重。2008年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失去工作,从高层到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谁都没有安全感。2009年,《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名为《美国失业高管沦为时薪12美元看门人》的文章,主人公马克·库珀曾是年薪7万美元的一家“《财富》500强”企业负责人,在经济衰退开始后失业,靠朋友帮忙才找到一份时薪12美元的看大门工作。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又被确诊为乳腺癌。库珀说“我每天都在与绝望、失落和沮丧作战”(Luo, 2009, March 1)。按贝克的话来说,现代人陷入动态富裕与贫穷当中。在失业和贫困的威胁面前,无人拥有豁免的“尚方宝剑”。即使侥幸没有失业,想拥有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也不容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09年1月有17万美国人在从事兼职,因为他们无法

① 铁饭碗,顾名思义,饭碗乃铁所铸,坚硬非常,难于击破。人们通常将其意延伸,指一个好的单位或部门,工作稳定,收入无忧。长期以来,“铁饭碗”一直为人们所羡慕和追求,捧得此碗,便可衣食无忧,生活幸福。捧不得此碗,便意味着颠沛流离,生活困苦。“铁饭碗”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虽然改革以来,“铁饭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依然是相当一部分人所追求向往的目标(百度百科,2010年8月9日)。

找到全职工作,相比经济衰退开始时的2007年12月激增了40%”(Luo, 2009, March 1)。长此以往,全球年轻一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难问题。据英国高等教育局统计,英国有近一成2009年毕业的大学生,至2010年7月1日仍未找到工作。日本文部科学省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4月1日,日本2010年度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1.8%,创下自200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北京日报》,2010年7月7日)。工作不稳定,找工作难,失业率高,原因究竟何在?我们得从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变迁来寻找答案。

承接贝克的讨论,鲍曼对工作的论述也很精彩。在固态现代资本与劳动力捆绑在一起,财富增长需要雇佣劳动力,而劳动力所有者倚赖资本家付与报酬来维持生计。但在液态现代,资本与劳动力的共栖关系被单方面解除。资本在液态现代可以跨地域地轻快旅行,越来越少受当地贸易政策等阻碍。资本仅需少量或完全无需任何劳动力,就能实现财富增长。于是资本不再依赖劳动力,而劳动力却依然需要资本方提供报酬。在第一现代,从总体而言劳动力有位置可以实现相对稳定的嵌入,在第二现代,劳动力可以嵌入的位置和时间却越来越少。从固态到液态现代,劳资关系从一种“婚姻”关系,变为没有承诺、随时可生变与终止的“同居”关系。在液态现代,利润主要源自信息/观念产品而不是物质产品,信息/观念产品在由少量劳动力生产一次后,只要它们能继续吸引消费者购买就可以持续创造财富。因此资本在第二现代更依赖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劳动力(Bauman, 2000, pp. 116, 120-121, 148-151)。其典型例子即是湖南卫视的《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收视神话。1997年,《还珠格格》红遍大江南北,它当年播出时的收视率最高达到42%,至今难以逾越。直到今天这部电视剧每次重播都能获得高收视率。2007年春节期间《还珠格格》在湖南卫视重播,播出时长占全天的15.5%,对全天的收视贡献则达到25.6%。从1997年

至今,这部电视剧一直在为湖南卫视创造财富(金鹰网,2008年7月28日)。由于科技发展,第二现代财富增长可以通过少量劳动力生产大量物质产品,也可以通过反复出售电视剧、软件等信息产品来实现。甚至可以通过股票、期货、公司并购、拆售和债务重组等金融投资行为,实现从资金到资金的财富增长,而不需要生产任何实际产品。劳动力及其所有者,在资本面前更加卑微无力。就我们熟悉的媒体行业而言。在20世纪新闻记者头顶“无冕之王”的光环,对民众而言相当于半个官员,收入多、地位高、形象好且权力大。现在新闻记者待遇降低、地位下降,常常自嘲为“新闻民工”,甚至沦为“狗仔队”。新闻行业变成青春饭,记者们跳槽频繁,很少有人像从前一样在同一家媒体待到退休。媒体从业人员的地位、收入下降及工作不稳定,已经成为大陆及港台地区的发展趋势。这一变化趋势从表面上看是由媒介商业化、行业竞争激烈和用人机制改革等因素造成,但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劳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改变。

正是这样的根本社会变化导致劳动者在液态现代的进一步弱势。当资本与劳动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劳动者能够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已经变得很微弱,昔日工会势力强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例如2010年8月香港巴士司机失败的罢工运动。2010年香港“新巴职工会”与资方的加薪谈判破裂^①,工会随即宣布于8月9日发动罢工,工会估计参与罢驶的司机有750名,约占新巴司机的半数,另外还包括150名车厂职员,即合共900人(《大公报》,2010年8月1日)。而实际参加罢工的只有101人,远远少于预期。新巴职工会理事长钟松辉表示:“因公司给予心理压力予同事,令部分员工最后不敢罢工。”据新巴公司统计,截至8月9日早8时30分,有61名新巴车长参与罢工,

^① 工会要求资方加薪2.2%,但资方坚持只加1.8%。

占车长总人数的3.5%。另有40名新巴维修员工参与行动,占维修员工总人数的16%(《星岛日报》,2010年8月9日)。这次罢工失意也许正如鲍曼(Bauman, 2000, p. 150)所言,反映了温顺的劳工群体无力也不愿采取组织行为去抵抗资方决定。

当然不同的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在液态现代的境遇是不相同的。学者赖希(Reich)^①将第二现代的劳动者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符号操手(symbolic manipulator),他们是创意产业的设计人员和符号工作者,如服装设计师、艺术家等;第二类人从事“再生产劳动力”(the reproduction of labour)工作,例如教育培训业的从业人员等;第三类人提供个人服务(personal services),例如美容护肤、销售等行业;最后一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指流水线工人、普通服务行业等体力劳动者,如罢工失败的香港巴士司机。第四类人是过往一个半世纪以来劳工运动的社会基础。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特别的知识技能或与人打交道的社交技巧,因而成为所有劳动者中最容易被替代的群体。这类人在液态现代的地位最卑微,待遇最差,失业可能性最高。同时,符号工作者与再生产劳动力者两个群体的流动性最强,提供个人服务者次之,而常规劳动者流动性是最差的(see Bauman, 2000, pp. 151-152)。这个流动性主要指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工作过程中是否经常需要全球旅行,再就是在个人生活中是否有能力在世界各地游玩。比如一个华尔街的职业经理人,经常在世界各地开会,其工作内容本身就是流动性的。而香港巴士司机在本港日复一日地开车,也不是那么容易承担起外出旅游的费用。在内地,对有些山里的孩子来说,能够到达县城就是难得的大开眼界。在第四章里,我们曾说教育重要,就在于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走出家乡、感受外面世界

^① 赖希生于1946年,是美国政治家、学者、作家和政治评论家,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教授。

的开始。流动性高低的背后是占有资源的多少,正如鲍曼所说,在现代社会流动性高的群体即是优势群体。

我们也可以说农民工是“流动”的,但是这种“流动”仅限于从生长地流动到打工地,当到达打工地点后,民工就固定下来,守在生产线索旁或工地上,工余时,在夜晚的都市街头感受五彩绚丽的灯光便是他们的“旅程”。更重要的是,当民工年过30,对城市逐渐失去价值后,他们大部分人难以在城市生存而必须迁回农村。对于民工这种资源少甚至完全没有资源的“赤裸”状态,马杰伟在其《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研究》一书中作了深度的案例分析(2006)。随着中国赶超现代性,很多中国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镇流向中心大城市,从内地向沿海,以追求他们自己的现代生活。中国现代性飞跃时的巨大变迁同时彻底改造了微观生命政治及其轨道,变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进步的同义词。对中国农村而言,迁移不仅是人口流动也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期望。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文化和社会距离是想象最好的催化剂,而奇妙的现代城市想象是农村人口大量迁移背后的驱动力之一。甚至城里的“人工”灯光都使初来的民工着迷,视之为财富的标志和美好生活的希望。民工的迁移最初源于生产的驱动,但落地城市后的民工同时也深陷消费之中,消费似乎是身份转换的可能。工厂的宿舍生活成为去地域组织化的经验。逛超市成为他们的旅行,五颜六色的糖果满溢着幸福的城市气息。酒吧里弥漫着现代幻想以及社会向上流动的期望。民工进入城市后,通过规训自己的身体学做城市居民,并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牛仔裤等服饰是身份的显示,是“可见的”现代性。同时,他们从相对稳定的早婚语言与实践进入约会、爱情、浪漫、选择和欲望的流动话语中。民工亲密关系的转变不是一条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程路,而是摇晃于被动接受的传统道德教条和主动追求的现代选择观念之间。身体在

渴望现代和回到传统的中间地带存在,这是寓居于短暂打工时空、瞬间“赤裸”的身体。民工的故事,是劳动和消费生活所显现的中国的压缩式现代性,以及这种现代性对农村身体日常技能和欲望的影响。从农村到城市,从安稳传统的集体环境到变动的现代个人主义环境的临界通道。但这种流动也不单是现代市场的作用,同时有传统家庭网络的牵引。传统的血缘道义是民工在陌生城市互相照应的安全网,特别是当他们在城市一无所有、“赤裸”求存。也因此,民工们即使离开家乡也在向传统力量妥协,离乡背井这些年不过是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短暂解脱,以及获取尽可能多的金钱。最终,大部分人还是要回乡。民工流动有从农村到城市的去程,亦有从城市到农村的返程。在打工的日子,民工们开发着去地域组织化和去传统化的空间,但当他们的劳动力再也卖不出去时,城市的“窗口”就迅速关上。回到家乡,民工的现代身体再次嵌入农村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农村转向现代的身体再次转回农村的再分层。这种农村—城市—农村的双程旅行也说明,对民工而言,从一个地方底层到另一个地方底层的横向社会流动容易,但在新的地域从社会底层到上层的纵向社会流动却很艰难。于是,在中国南方兴起的劳动和消费文化中,社会变动构成了一个横向、纵向的双螺旋复杂格局,有跨国资本、生产劳动和感性符号消费在其中,这些都激发了中国农村身体,并触发了其强烈的身体和社会变动欲望(马杰伟,2006,页15—77)。

不光是个人工作在流动,工业也在流动。第一现代与第二现代真的很不同,鲍曼说前者是固态的,是硬件和重型机械的时代,愈大则愈强,成功人物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Henry Ford)。福特被尊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并被《财富》杂志评为“20世纪商

业巨人”,其创建的生产模式为工业化生产模式定名。第二现代是流动的,是软件和符号的时代,总而言之是个信息时代,在这样的网路社会,速度愈快则愈占优势,众所周知,21世纪的成功代表人物是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Bill Gates)。我们大胆猜想,是否可以将第二现代的财富增长模式定为“盖茨模式”(Gatism),这种模式以信息、软件、标准和专利等为产品,其财富源于对标准的垄断和不断提升的软件更新速度。在福特时代一个工人可能终身受雇于某个公司;而在盖茨时代,频繁跳槽、兼职、在家办公等多种工作形态让工作本身变得流动和不确定。如同鲍曼(Bauman, 2000, p. 124)所言,盖茨让自己身处一系列的可能性之中,他不会与任何事物形成依附性或长期承诺。液态现代是没有定式的时代。在轻资本主义,传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日趋流动,就影视产品而言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制成影视产品的全球传播,如迪斯尼动画片在全球的广泛流行,绝大多数中国孩子都知道米老鼠和唐老鸭的故事。第二种情况是跨地域合拍的影视剧等,使得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或国家,而是成为分工合作的工业流,影视产品也因而呈现多个地方特质。第三种情况是电视模式的全球传播和本土化。比如说《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①这一选秀节目获得成功,被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方模仿,根据其基本结构和理念,制作有本地特色的版本。在中国有湖南卫视克隆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这种电视模式在全球范围的本土化,既保留了原有模式中颇受欢迎的基本元素,又融入了本土特色,对本地观众来说更具有亲近性,从而成为当前最为流行的电视工业实践之一。

^① 《美国偶像》是由福克斯公司从2002年起主办的美国大众歌手选秀赛,收视率一直高企。该节目源自英国选秀节目《流行偶像》(Pop Idol),而英国是当今世界电视模式出产大国。

渴望,共同体

在这个结构性失业的世界,没有人能真正觉得安全。

——鲍曼(Bauman, 2000, p. 161)

缺乏安全感是液态现代的基本心理特征,结构性失业加之各种各样的风险,让我们无法确定明天的自己会是怎样,或者为今天自己的挫败而沮丧。追求现代生活,本来是为了过得更好、更开怀,但现实是我们处于一种孤独无助的状态,于是我们便开始缅怀和向往“共同体”(community)。

缅怀首先是因为失去,渴求是因为难得。现代性的发展伴随着伴侣关系与共同体的衰退和结构。从传统社会至死不渝的誓约到今天以互利为原则、不合则散的合同关系,液态现代面临的棘手问题即是人际纽带的瓦解。自由主义(liberalism)主张个人自由,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肯定共同体给人带来安全感。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争论,在实质上反映了现代人在个人自由与安全感之间越来越难保持平衡。共同主义思想的流行和共同体概念的大热,是现代社会加速流动的自然反映。共同体概念存在边界的划分和维护,通过某些标准来划定“我们”和“他们”。这个概念存在对“他者”的妖魔化和防范,而实质体现了共同体内部成员的深刻不安全感。对共同体的向往,是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液态现代,人们的一种逃避风险的防御性反应。那么共同体是个矛盾的词语,共同体内部的和谐总是伴随着共同体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与冲突(Bauman, 2000, pp. 164-165, 169-172, 179)。因此,共同体概念作为政治、伦理和实践有其矛盾性在其中。

在共同体部分,鲍曼对民族国家的论述特别清晰。几乎我们这本书中所有讨论现代性的学者都会论及民族国家问题,因为民族国家是

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之一,其在第二现代的作用和角色当下是学界热议的主题。但这些学者大多假定我们已经很清楚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渊源,直接进行深层次讨论。唯有鲍曼清楚地讲析民族国家概念的由来,因而更适合学界初学者或者是对民族国家概念不大熟悉的人。

共同体要么是个民族群体,要么是在民族群体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想象共同体。后者就是民族国家,比如中国是由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共同建立的国家。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中唯一能算成功的共同体形态。国家需要民族的动员力和天然的忠诚纽带,民族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同时它也需要国家机器提供的保护。一个成功的民族国家会营造出一个“自然”的想象共同体。不同于那些期望中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是由国家军队、官方语言、统一货币、教育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建构和确保的,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Bauman, 2000, pp. 172-173)。民族国家建立于民族基础上,而民族这一天生特质要求我们没有保留的忠诚,我们必须忠实于我们的民族所属的国家。正如中国人如果不爱国或者叛国,就会被指责为“汉奸”。而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大英雄乔峰/萧峰的悲剧其实也就是民族国家认同的难题。乔峰从小由汉人抚养长大,他以为自己是汉人,也理所当然忠实于汉人所属的宋朝。但是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契丹人萧峰时,从逻辑上他就应当忠实于辽国。这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是不能由他本人生长于宋朝的情感因素所压倒的。于是“乔峰”与“萧峰”的冲突,实际上是汉人宋朝与契丹人辽国的冲突,无法化解其矛盾,乔峰/萧峰的死亡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为获得安全感,在第一现代,人们可以在民族国家共同体或其他各种社会机构中寻找庇护所,所以,涂尔干“给稳固的社会机构唱赞歌”(Durkheim, see Bauman, 2000, p. 183),但在个人化的第二现代,社会机构逐渐简化,特别是民族国家逐渐放弃其承担的大部分社会职

能,将其外包至全球或内置到个人层面。但全球化不仅不能带来共同体间的和谐共存,反而带来人类社会的更多矛盾,而个人亦无法承受选择太多的负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该如何去寻找安全感?此时,唯有身体和共同体^①成为现代人最后的庇护,在其掩护下去追求安全感。身体给人安全感,乃因在液态现代生命之恒久超过社会机构和伴侣关系。另一方面,人们在液态现代也从“爆发性共同体”(explosive community)中寻求寄托。爆发性共同体早已有之,他们曾经依靠暴力为手段来划分共同体边界,共同体成员因而参与到集体犯罪当中。爆发性共同体在液态现代呈现新的特征,一个是拥有流动边界,或者说越是摆脱边界束缚则越成功。另一个是,共同体之存在不求其恒久,而在于其情感卷入度,所以液态现代的爆发性共同体往往是不稳定、稍纵即逝及单维度的。这样的爆发性共同体鲍曼称之为“衣帽间共同体”(cloakroom community)。衣帽间成员,或者说到访者,为衣帽间共同体的特定场合穿上适合的服装,在共同体里呈现与日常生活不同的面貌,大家的目光聚焦于舞台景观(spectacles)之上,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液态现代的景观代替固态现代的共同目标(common cause)成为凝聚社会的基础。衣帽间共同体也是一场嘉年华,所以鲍曼也称之为“嘉年华共同体”(carnival community),强调对生活常规的打破,与日常生活情境的对立。但问题是景观对现代个人的凝聚作用只是暂时的,当景观结束,人们离开衣帽间共同体,一切恢复原状,现代人继续扮演日常生活里的各种角色(Bauman, 2000, pp. 183-184, 192-201)。“衣帽间共同体”隐喻有关英国情境,对华人来说有点不好理解。英国天气严寒,人们在室外往往身着厚重的衣服、帽子和围巾。

^① 共同体是鲍曼论述的一个重要命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因为人们在液态现代缺乏安全感,所以缅怀和追求共同体。在2001年,鲍曼出版了一本讨论此议题的专著,即《共同体:在不安全的世界寻找安全感》(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Bauman, 2001)。

当人们到剧场等室内观看演出时,会将外套、帽子等脱下挂在衣帽间,散场时再排队取衣物。所以衣帽间里挂满的衣饰从侧面体现了人群的聚集。

2010年南非世界杯就是这样的一个衣帽间共同体,比赛即是凝聚世界各地球迷的景观,在观看比赛期间,现场或在电视机前的球迷很多身着所支持国家的球队服,有的还在脸上画上国旗等各种装饰。或狂热、或欣喜、或难过的看球过程,让球迷们忘却日常琐事,得到情感的释放和满足。但当世界杯落下帷幕,剩下的只是虚无,人们不得不回到现实,继续工作生活。这样的衣帽间共同体如果用戴扬和卡茨的术语便是一次“媒介事件”,我们在接下来的第六章会再做分析。当然也有并非媒介事件的纯衣帽间共同体,比如我们去香港迪斯尼乐园游玩的时候,就是一次加入衣帽间共同体的旅程。踏上迪斯尼地铁专线,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地铁上的窗户还有拉环都是米奇头像的形状,座椅是天蓝色绒面的沙发,橱窗里展示着迪斯尼动画的玩偶。来到迪斯尼城堡,便走进童话。坐旋转木马时,突然发现白雪公主坐在自己的旁边。在暑假,史迪仔跟他的迪斯尼好友在乐园里举行热闹好玩的夏日派对。走进剧场看看,米奇金奖音乐剧正在上演,米奇和米妮正在为他们的伙伴颁奖,幕布拉起,有音乐、有歌唱、有舞蹈,肥皂泡从空中落下,金色的彩条漫天飞舞。周围满是与您一样着迷欣喜的观众,此时此刻,哪里还记得现实中的自己。衣帽间共同体让我们感受其他人与自己的共同存在,给我们一种虚幻的拥有共同利益和“在一起”的感觉。但当我们离开衣帽间共同体时,发现彼此依然是陌生人,不会有互动,短暂地加入和访问衣帽间共同体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际纽带。我们曾短暂拥有共同体,但实际上这个共同体并没有真正建立。根据鲍曼的论述,液态现代的共同体不再是结构上的,更多是一次短暂的心理体验。衣帽间共同体/嘉年华共同体,通过提供“在

一起”的感觉,对现代人的孤独和缺乏安全感进行心理修复。但即使身处共同体,人们表面上在一起,实际上也是彼此分开的,更不用说在离开衣帽间共同体之后,于是这种类型的“在一起”让孤独的个体更孤独。坐着地铁离开迪斯尼乐园站时,广播响起提示“我们即将带你回到现代化的香港”,于是我们不得不满怀惆怅地回到现实。这就是第二现代个体的悲哀。那么,共同体也可以说变成了一个僵尸概念,衣帽间共同体里的共同体,既不同于政治家们在竞选时所许诺的共同体概念,也有别于学者们所讨论的有边限定、提供安全感和相对恒久的传统共同体。

书写,与研究传播

所谓现代性,也就是讨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问题,如何保留彼此差异而和谐相处是个现代难题。吉登斯认为第二现代是第一现代的延续和激进化,认为现代社会依然有结构。鲍曼认可这种延续性,同时夸张、强调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的区别,认为第二现代已不再有固定的社会结构,把现代性的流动特征论述到极致。我们可以把鲍曼的论述视为第二现代的一种理想类型,在实际生活中,即使是第二现代的社会依然是有结构的,只不过其结构更复杂和隐形。鲍曼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学家,他的《液态现代》从头到尾都是从社会学视角去分析社会学问题,而基本没有对传播、媒体的观照,这一点有别于汤普森、戴扬、卡茨和卡斯特等学者。我们这本书将鲍曼的社会学分析和传播学现象结合起来,力图实现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希望能对传播学者有所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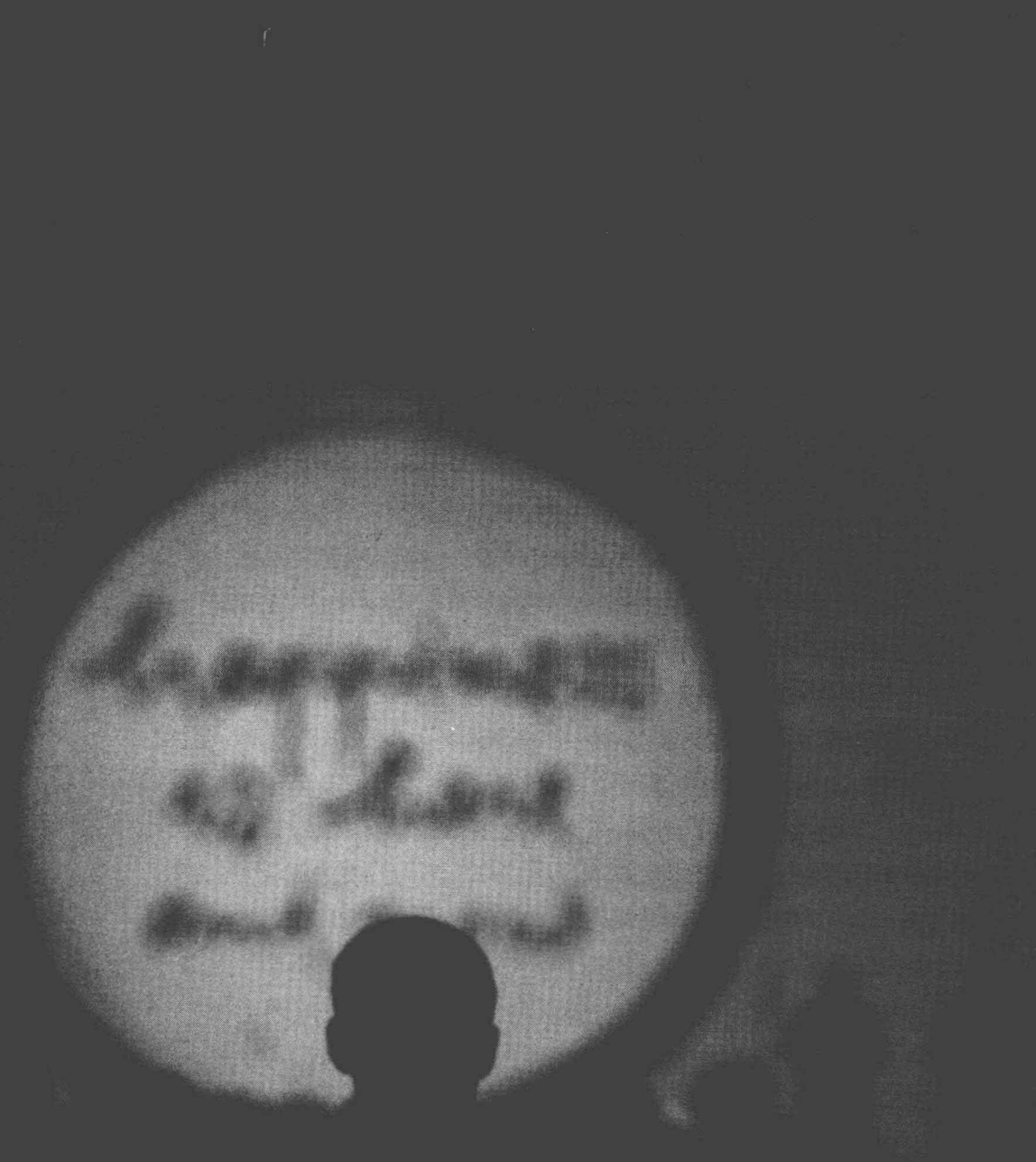
鲍曼心性敏感,思维缜密,行文流畅,以寓言说,文笔确实很美。其文如诗,一个思想家到了很成熟的阶段才可以如他这般写作。文如

其人,一个人的行文风格,或多或少可以折射出这个学者的学术风格。贝克的书跟鲍曼的书合起来看会很好,贝克洒脱,不拘小节,富有前瞻性,的确能给人大开眼界的感觉,他就第二现代的个人化前景勾勒了一个生动有趣的草图。鲍曼沿着这个草图,细细描绘出液态现代的精致唯美画卷。鲍曼比吉登斯和贝克要略悲观一点,他负面评价为吉登斯所正面认可的生活政治,指出公共领域正在被私人领域侵蚀。对于吉登斯提倡的纯粹关系,鲍曼同样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纯粹关系并非如吉登斯所言是解放工具和幸福保证,而是人类关系的商品化和消费化(Bauman, 2000, p. 89)。贝克的个人化和风险两个概念被鲍曼反复运用和佐证,但鲍曼更多地看到了个人化可能存在的问题,而要解决个人化的副作用,鲍曼还是寄望于社会,寄望个人成为公民。鲍曼源自个人被驱逐经历的气质,于我们研究社会与传播是重要的。

如同鲍曼,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皆是现代性的注脚与说明。我们承受着现代负荷,努力让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至于失衡。每当看到周围有人被现代生活所拒绝、抛弃,所感的不是幸存者的喜悦,而是唇亡齿寒的悲凉。当永恒变得短暂,当生命变得漫长,现代生活就变成一场在不安世界里寻找庇护的历程。认识、诊断危险的存在,并警醒世人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借用米兰·昆德拉的名言,鲍曼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成为现代生活的悲剧之源。”(Bauman, 2000, p. 119)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们传播学能做什么,我们研究传播是为了什么?

所谓学术,表面风光,内里辛苦;看似热闹,实则孤独,倘若不够坚强则难以承载学术制度的重荷。讨论至此,我们可以正式提出一个问题,即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鲍曼对社会学责任的回答是提供解释,增进理解。作为液态现代的社会学家,应当让自己的思想处于流动旅行的状态,既深入社会现实,又与现实保持一定抽离感,以进行客观而又接近真实的批判。进而让自己的思维空间同时关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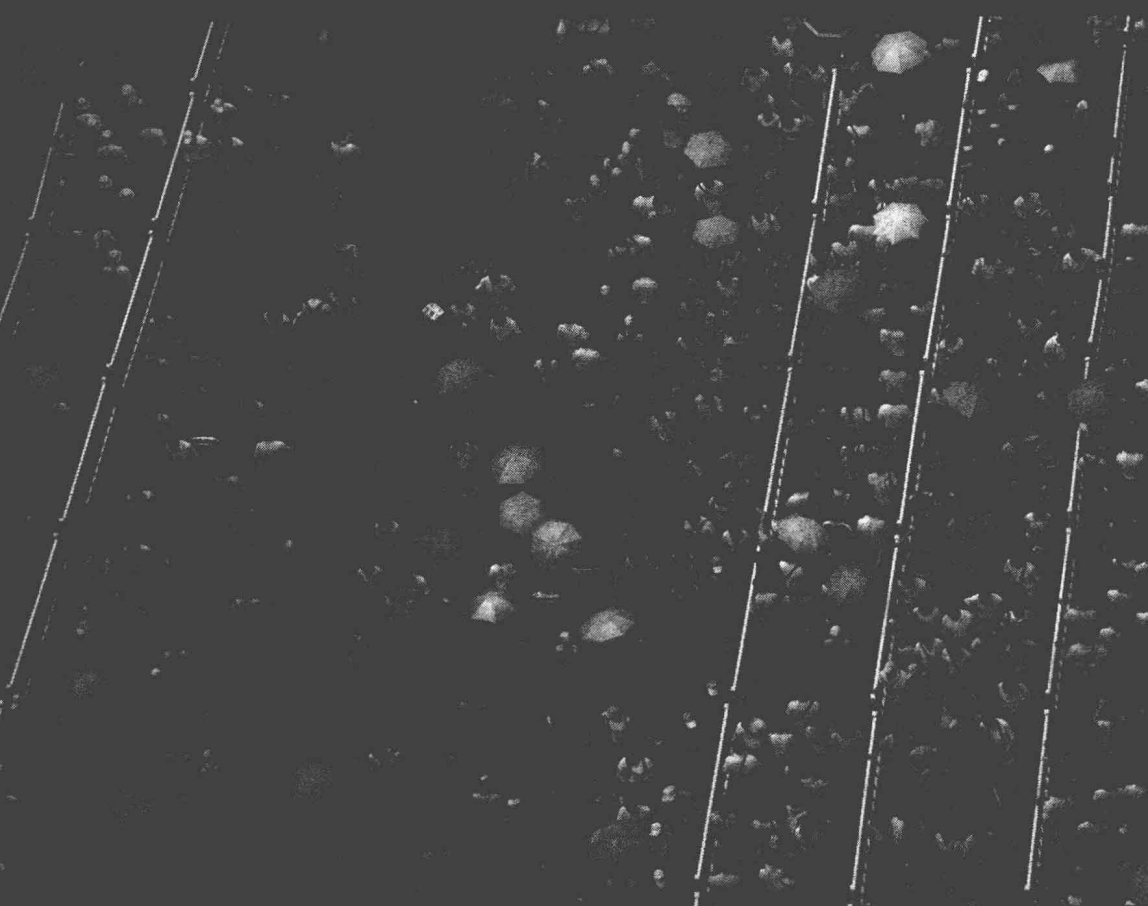
多个地域,从而具有比较视野。第二现代,人们比过去更需要社会学(Bauman, 2000, pp. 206-207, 211-212)。与社会学类似,身为传播学者,我们的社会责任即在于解释与说明媒体现代,为其诊断,并希望这一诊断能够成为治愈现代社会病态的良好开端之一。研究传播时,我们同样要对传播现象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具备混杂性视野以及源自学者良心应有的批判性。不否认,我们的阐释难免带有个人烙印,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嵌入的位置、个人经历乃至性格有关。但正是这种嵌入,让我们深切体会了现代社会与传播过程,从而可以更真切地理解、解构和阐释媒体现代。在媒体现代,我们不仅需要社会学,也紧迫地需要传播学,需要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对话。我们将在后面三章分别讨论媒介事件、符号经济和网路社会,皆是社会学现象与传播学现象的紧密结合。同时在最后一章我们将初步提出自己有关“媒体现代”(mediated modernity)的理论,提供传播学与社会学对话的可能路径。在掌握了第二现代的个人化结构和流动性特征后再来看传播,我们会有新的认识。在剖析媒体现代时,我们会将传播学的社会责任萦绕于心,去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中传播媒介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媒介事件 Daniel Dayan 共同体的追寻 Elihu Katz 竞赛 contest 征战 conquest 加冕 coronation 去魅 disenchantment 脱轨 derailment 分裂 disruption 全球化之媒介事件 media ritual 媒介仪式 neo-Durkheimianism 新媒介效果



媒介事件 Daniel Dayan 共同体的追寻 Elihu Katz 竞赛 contest 征战 conquest 加冕 coronation 去魅 disenchantment 脱轨 derailment 分裂 disruption 全球化之媒介事件 media ritual 媒介仪式 neo-Durkheimianism 新媒介效果



媒介事件 Daniel Dayan 共同体的追寻 Elinor Katz 竞赛 contest 征战 conquest 加冕 coronation 去魅 disenchantment 脱轨 derailment 分裂 disruption 全球化之媒介事件 media ritual 媒介仪式 neo-Durkheimianism 新媒介效果



媒介事件 Daniel Dayan 共同体的追寻 Elihu Katz 竞赛 contest 征战 conquest 加冕 coronation 去魅 disenchantment 脱轨 derailment 分裂 disruption 全球化之媒介事件 media ritual 媒介仪式 neo-Durkheimianism 新媒介效果

第六章

媒介事件与现代社会

戴扬(Daniel Dayan)与卡茨(Elihu Katz)的合作,使我们有了一本结合传播学与人类学的著述——《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edia Event: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Dayan & Katz, 1992)。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打破30年僵局,勇敢地访问耶路撒冷,承认夙敌以色列的生存权利,突破了双方积怨已久的互不信任。这场深具历史意义的“破冰”之旅通过电视播出实况,为全世界瞩目。受此激发,当时同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任教的戴扬和卡茨开始关注类似的媒介事件,并于1992年出版《媒介事件》。贝克的《个人化》面向未来,以作者出色的预见力直指人类无法逃避的宿命。《媒介事件》亦是从作者写作之时观照将来,有着恒久解释力。《媒介事件》成书时,网络尚未普及。汤普森于1995年所著《媒介与现代性》,今日多少有些过时。《媒介事件》虽也以电视为例,其解释力却越来越强。“媒介事件”,两个名词简单相加,却具有超脱历史情境、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性。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戴扬与卡茨又为何人?

戴扬,法国学者。拥有人类学、比较文学、符号语言学和电影研究

学位,并师从符号学理论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①获美学博士学位。戴扬的人类学和符号学背景在书中有着强烈体现。人类学家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见长,符号学聚焦于文本,因此《媒介事件》写得非常细致,围绕几个媒介事件的媒体报道文本,反复剖析其生动细节。卡茨,美国社会学家,却主要致力于传播学研究,探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在不同领域的互动。他师从传播学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卡茨传播学代表作有《人际间的影响》(*Personal Influence*, Katz & Lazarsfeld, 1964)和《意义的输出》(*The Export of Meaning*, Liebes & Katz, 1990)等。卡茨的导师拉扎斯菲尔德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开创者,《媒介事件》这本书从实质上来说即是一本讲述媒介效果的书。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肖尔评价这本书“对电视直播现象作为强大社会力量进行了全面探索与准确勾勒,是理解电视如何影响受众的奠基之作”(Schorr, see Amazon. com, 2010)。但卡茨超越其师所创美国效果研究的传统路径,跳脱出“刺激—反应模式”效果是大是小的争论迷局,从“仪式”(ritual)出发,讲述了媒介事件如何起到凝聚现代社会的效果。

那么,什么是仪式?

《公主嫁到》是香港 TVB 电视台 2010 年播出的精彩古装剧,讲述唐代昭阳公主的故事。在第 24 集中,宫女司徒银屏受重伤,藏身于一间破庙,与银屏相爱的丁有维陪伴在一旁。银屏担心自己未曾嫁人,死后没有神主牌,将成为野鬼孤魂,希望在她死后丁有维能给她神主牌。深知银屏爱己心意的有维,故意答道“口说无凭”,要与银屏完成

^① 罗兰·巴特是一位享有国际盛名的法国学者。作为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他的学说影响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巴特著有《神话》(*Mythologies*, Barthes, 1957)、《符号学基础》(*Elements of Semiology*, Barthes, 1968)和《文本的快乐》(*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Barthes, 1975)等多本著述。

拜堂成亲的“仪式”。

有维：我既然给你牌位，就要落实名分。

银屏：（银屏没有言语，脸露幸福笑容。）

有维：我们就以神像为证，完成仪式。

（有维眼望银屏，双手握银屏手，有维、银屏再一同望向神像。）

我自任媒人，跟你交拜天地。

从今之后，你就名正言顺，是我丁有维的娘子，是丁家的媳妇。

（有维与银屏深情对望。）

银屏：嗯。

（银屏含笑点头应允，有维与银屏起身，面向神像跪下。）

有维：天地为凭，神像为证，我丁有维今日迎娶司徒银屏为妻。

生死与共，永不相负。祝愿同偕白首，举案齐眉。

一拜天地（银屏、有维面向神像一叩首）。

二拜父母（银屏、有维面向神像再叩首，然后二人转身相对而跪）。

夫妻交拜（银屏、有维三叩首，二人眼泛泪光）。

一对新人，共订鸳盟，礼成（两人靠近对方，双手相握）。

这就是一个电视再现的仪式。所谓仪式，有见证者，所以“神像为证”，这也说明仪式与宗教往往交织在一起。依据性质不同，仪式各有其配套话语。比如婚礼仪式，常见为“同偕白首，举案齐眉”等。仪式又是有特定表演的，中国古代婚礼的特定表演即为“拜堂”或称“拜天地”。这样的表演背后，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一拜天地”是婚姻的合法性。“二拜父母”是感恩父母及婚姻获得家族之认可。“夫妻交

拜”之后,婚姻关系正式建立,“礼成”。仪式是承诺,是共同信仰,所以婚礼是“共订鸳盟”。仪式过后,社会关系将发生改变。“从今之后,你就名正言顺,是我丁有维的娘子,是丁家的媳妇”,新娘从此由娘家转入夫家宗族。有仪式,才有“名分”。所以,仪式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有着实质性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用。当中国古代的“拜堂”,转为由电视直播的英国皇家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的世纪婚礼时,婚礼仪式就成了一场“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之“魔幻辞典”

查尔斯与戴安娜的这场童话婚礼,是戴扬与卡茨主要分析的媒介事件之一。戴扬与卡茨二人强于描绘归类,弱于哲学抽象。其书是直白铺陈的,甚至是不够有趣的,在理论层面稍弱于本书提及的其他学者。但另一方面,两人对媒介事件的定义和分类准确、完备,详以文本分析方法佐证论点。《媒介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书,给我们提供了经验研究的“魔幻辞典”。倘若不掌握作者论述精髓而随意使用媒介事件一词将是可惜的,也是貽笑大方的。在这本“媒介事件辞典”中,我们需重点掌握的有 C 字部及 D 字部。所谓 C 字部,指的是 Contests(竞赛)、Conquests(征战)和 Coronations(加冕)。后来由戴扬补充的 D 字部为 Disenchantment(去魅)、Derailment(脱轨)与 Disruption(分裂)。这些单词具体有何含义,且看戴扬与卡茨细细道来。

3C: Contests Conquests Coronations

竞赛 征战 加冕

媒介事件之语法、语义与实效

戴扬与卡茨最为人称道的就是 3C 概念的提出,竞赛(Contests)、

征战(Conquests)和加冕(Coronations)是媒介事件的三种基本形态,是三种不同仪式。要想成为媒介事件,必须同时满足很多条件。是重大历史性事件之现场直播,邀请乃至垄断众多受众一起观看,打破其日常生活节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媒介事件都由媒介之外的机构发起组织,发生在演播室外。事件组织者与报道媒介合作建构媒介仪式。媒介事件必须是策划而不是突发的,所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突然遇刺不是媒介事件,而是突发新闻,只有其后筹划举办的肯尼迪葬礼才是媒介事件。媒介事件是为参与者所敬畏的典礼,报道者放弃批判立场,观众积极投入。媒介事件往往起到调节冲突或恢复社会秩序的作用,从而建构霸权。所有这些特点对于媒介事件来说都是“必要”元素,其中历史性、仪式性敬畏与和解作用属于媒介事件的语义维度(semantics),吸引大量观众属于实效维度(pragmatics),其余特征则属于语法维度(syntactics)(Dayan & Katz, 1992, pp. 1-13)。总而言之,媒介事件是“打破日常生活的典礼(语法),涉及令人敬畏的重大历史主题(语义),其报道收获巨大的观众反响(实效)”(Dayan & Katz, 1992, p. 14)。该定义的某些特征也可能在其他传播形态中呈现,但当所有条件同时具备时才成为媒介事件。戴扬与卡茨用了大量篇幅反复界定媒介事件,这种严谨定义有其必要性。学术研究之误即在于:尚且缺乏定义或定义谬误时就开始讨论的想当然和自以为是。戴扬和卡茨强调语义、语法和实效维度所有特征的同时具备,也是为了限定媒介事件外延。由于解释力强,媒介事件概念当前有被随意套用之嫌。倘若什么都是媒介事件,便什么都不是媒介事件了,这概念也就失去了价值。其逻辑与第三章中汤普森将意识形态概念限定为服务于权力、不对称分布的意义系统,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定义精准、概括力强。

此时,回想第五章中的“衣帽间共同体”概念,会发觉衣帽间共同

体与媒介事件有些共通之处。两者都有景观的存在,观众打破生活常规,共同聚焦于景观,获得“在一起”的感觉,从而实现社会凝聚。但媒介事件必须具备重大历史性和仪式性,令人敬畏,这样的语义对衣帽间共同体来说不是必要的。媒介也不是衣帽间共同体的必然要素。因而我们认为媒介事件一定是衣帽间共同体,但并非所有衣帽间共同体都能提升到媒介事件的地位。衣帽间共同体是鲍曼讨论液态现代时的一小着力点,亦只是以借喻形式表达,但媒介事件却是戴扬与卡茨的系统成熟论述。

竞赛、征战、加冕之不同脚本

凡是媒介事件都必须具备语法、语义和实效维度的特征,但同为媒介事件却可能拥有不同的脚本,从而有竞赛、征战与加冕三类。三者分别对应韦伯(Weber, 1946)的三种权力形态:理性、魅力和传统。“竞赛”是有关规则的仪式,观众等待的结果是“谁会赢?”竞赛事件面向“现在”,秉持理性精神,规则第一,通常按周期重复。媒体在竞赛事件中保持不偏不倚,观众却会选择所支持的一方,并且充当仲裁者。参赛者按规则竞争,胜者将获得高额奖励。竞赛事件通常发生于体育、政治等领域,奥运会就属于典型的竞赛事件。“征战”却是另外的剧本,是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征战事件中,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步迈出去之后,历史从此改变,世界从此不同。1969年美国人登陆月球,这就是“征战”。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的第一步,约有六亿观众共同见证,标志着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人类的地理概念从此延展至外太空。征战事件面向“未来”,征战事件的悬念在于“英雄是否会成功”。历史就这样掌握在英雄手中,英雄突破规则、重订规则,媒体变成歌颂英雄魅力的游吟诗人,观众则满怀敬畏地见证奇迹。竞赛事件与征战事件中都有很高的仪式成分,如奥运会有

开幕式、闭幕式,获胜者有颁奖礼等。而“加冕”本身全为仪式,其重点在于“仪式的魔力能否发挥作用?”加冕事件面向“传统”,共庆核心价值观。在加冕事件中,王者体现规则。仪式的举行是对社会、文化延续性的确认,媒体仿佛虔诚的神职人员,观众在亦真亦幻间向价值中心再次宣誓效忠。如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的婚礼不仅是灰姑娘的童话,更重要的是通过婚礼缅怀大英帝国的昔日光荣。通常情况下,某个媒介事件主要只会呈现竞赛、征战或加冕其中一个脚本,但最为戏剧化的媒介事件三者特征都有。例如美国登月事件,虽主要为“征战”形态,但在登月成功之前却是美国人与苏联人的太空竞赛,在阿姆斯特朗返回地球时又变成了宇航英雄的加冕(Dayan & Katz, 1992, pp. 25-48)。又如2001年9·11事件,发难之初是征战事件,因为它开示了恐怖主义的新里程,但及后则变成了加冕式,在纪念周年化身为美国强大坚毅的仪式。

竞赛、征战与加冕以不同方式与冲突相连。竞赛是对政治冲突的符号置换,加冕要求冲突臣服于传统与团结的符号象征,而在征战过程中,冲突消散于英雄光环所宣告的新符号秩序中。总之,这三种形态都属于起到凝聚作用或修复性(integrative or restorative)的媒介事件,修复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创伤。除了修复性媒介事件还有另外两种功能的媒介事件,分别是纪念性媒介事件(commemorative)与变革性媒介事件(transformative)。前者提示值得记忆之历史时刻,后者提供社会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甚至带来世界剧变(Dayan & Katz, 1992, pp. 20, 39)。3C形态中的征战虽然也能打破平衡,引发改变,但缺口的打开是暂时性的,之后又会重新巩固社会秩序,所以征战仍然属于凝聚或修复性媒介事件。但另一方面,征战可能引发或转变为变革性媒介事件,也可与之后将会介绍的媒介事件3D形态相勾连,我们在后面将有分析。戴扬和卡茨对媒介事件可能带来的变革也很重视,但他们主要分析的是竞赛、

征战与加冕三种修复性事件及其对霸权的建构。在3C之后,下面要介绍媒介事件的参与者:组织者、媒体及观众。

媒介事件参与者:组织者、媒体及观众

媒介事件不是某个人或机构的独角戏,而是组织者、媒体及观众的“合谋”。戴扬与卡茨(Dayan & Katz, 1992, pp. 68-73)提供了媒介事件的病理形态,倘若观众拒绝关注组织者与媒体发起报道的“大事件”,这属于“成空事件”(manqué event)。若组织者发起,观众亦期待,但媒体拒绝报道事件,则属于“被拒事件”(refused event)。若媒体希望报道,观众也期待,但组织者不同意报道事件,则是“被否事件”(denied event)。总而言之,媒介事件是组织者、媒体与观众共同协商的结果。媒介事件有时也能被劫持(hijacked),例如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几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潜入奥运村,挟持并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焦点集中到恐怖袭击上,国际压力迫使奥委会最终屈服,推迟与恐怖袭击同时开始的奥运会比赛。

媒介事件的组织者发起事件,确定其历史性;媒介报道者对媒介事件进行符号再现和重构;观众接收媒介事件,并以其主动参与建构有关媒介事件的集体记忆。戴扬和卡茨认为媒介事件这三方参与者相互独立,都具备自主性,媒介事件之前到之后的全过程都是互动的三方协商过程。我们认为戴扬和卡茨在这里的论述过于笼统。媒介事件组织者掌握报道所需资源,有时又必须将自己变得更符号化和具有故事性,以适应媒体呈现要求。媒体有所谓独立性,但实际上仰赖组织者的符号资源,也受制于所处政治经济情境。观众的自主性在新媒体时代的确越来越强,卡茨曾在与利贝斯合著的《意义的输出》中诠释不同背景观众对同一电视剧的多义解读(Liebes & Katz, 1990)。然而,若夸大观众主体性多少有些罗曼蒂克。我们认为在媒介事件中的

三角关系是动态的,“平等”、“独立”的形容失之简单。只是三方谁强谁弱及各方妥协之处取决于具体的媒介事件的不同,需我们在实证案例中去做检验,很难提供一个标准、预设的结论。

组织者、媒体及观众协商之目的在于控制媒介事件的定义及特征,以获取最大利益,并尽可能减小损失。组织者希望让媒体与观众认可事件所呈现的核心价值观,从而维系现有社会秩序。媒介事件中的主演是有得有失,如皇室婚礼中的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耶路撒冷破冰之旅中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等。他们的地位被媒介事件提升,成为核心价值的代言人;但在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媒介再现,失去解释自身言行的权力(Dayan & Katz, 1992, pp. 73-75)。戴扬和卡茨此处对主演得失的分析类似于第二章中汤普森对媒介可见性的论述。可见性高可以给媒介人物赋权,但过高或者负面的媒体曝光也会给人物形象造成伤害。相比组织者(主演),我们传播学者更为关注的是媒体对媒介事件的符号建构,观众的多义解读和媒介事件对于观众、社会的效果。

戴扬与卡茨认为媒体在媒介事件中易丧失批判性立场,但媒体并非被动,而是能主动界定媒介事件,通过对媒介事件的符号表征建构“真实”,从而影响观众乃至整个社会。电视使媒介事件发生质变。首先,电视对媒介事件的承诺是定义性、解释性和保护性的。电视媒介历史的现场直播赋予我们“在现场”的感觉,引领我们以特定衣着、特定行为及群体收看等方式对媒介事件进行仪式性参与。电视凝聚平日分散的个体观众,邀请大家聚焦景观,从而承继传统。电视媒体利用各种符号手段重新讲述“事件”,提供媒介事件的“互文”(intertextuality)情境,将事件戏剧化、虚幻化,将仪式中的神话元素转译为通俗的电视小说,媒介事件的最终形态是易为观众接受的符号景观(Dayan & Katz, 1992, pp. 76, 79, 92-118)。媒体通过其符号体系反

复提示我们,某件事乃值得注意的大事件,敦促我们放下日常琐事去关注“媒介事件”。在对历届奥运会的仪式建构中,媒体会频繁使用“奥运盛典”等话语突出其显著性,并播放和强化奥运会开幕式中的表演:火炬传递、点火仪式、奥运会旗帜升起、运动员宣誓等。这些表演都在提示我们以敬畏之心集体收看“盛典”。奥运会被媒体赋予的含义则是:和平、友谊及超越人类极限等。通过媒体报道的故事,我们知道原来奥运有古老的起源,它来自古希腊那个神话王国。奥运会尊崇人类和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同时,我们也要挑战人类极限,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

观众在平日的媒介信息里是分散的社会个体,但在媒介事件里却是共同体的一员。媒介事件当前,不参与便是把自己从群体中孤立出来。媒介事件确如同戴扬和卡茨所言,有“命令”我们参加之感。戴扬和卡茨这本书是跨学科领域的合作,仪式观源自人类学传统,3C的形态划分及语义、语法维度的分析出自符号学解析,当两人分析观众解读方式时又是出自文化研究路径。文化研究大师霍尔(Hall, 1980)分析观众解读时提出三种方式:霸权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套用霍尔模式,戴扬和卡茨也将观众对媒介事件的解读分为节日解读(festive readings)、替代解读(alternative readings)和对抗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s)。节日解读与媒介文本的主流信息相一致,即观众认信效忠于媒介事件表征的核心价值。替代解读和对抗解读则是某些民众对媒介事件的冷落、拒绝参与或持有怀疑。有些民众虽然接收媒介叙事,但采取其他甚至是敌对视角(Dayan & Katz, 1992, pp. 140-144)。在戴扬和卡茨论述的3C原型中,观众对媒介事件主要持节日解读,他们在竞赛中充当裁判者,在征战中充当见证者,在加冕中向权力中心及核心价值认信效忠。但在戴扬其后所论3D形态中,观众对于媒介事件的替代和对抗解读相对增多。

媒介事件之现代性诠释

有别于戴扬与卡茨的符号学话语,我们也可尝试用现代性讨论中的常见关键词来诠释媒介事件,如时间、空间、媒介化和社会变迁等。就时空角度而言,媒介事件是“时空分延”的浓缩体现。媒介事件的现场直播强调即时性,让符号传输速度趋近于零,从而“彻底”征服空间。在媒介事件中,“地方”概念变得暧昧,重要的是媒介事件所建构起的“空间”。萨达特之旅,地方是耶路撒冷,但撼动的是整个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欧美等国利益攸关亦是卷入其中。耶路撒冷这个点,激荡着一个广阔的政治空间。阿波罗号从美国到月球,两点相连,串起整个太空世界。全球观众共同经历媒介事件,形成集体记忆,这也是我们所谓“世界公民”共享的符号资源。

作为实现“时空分延”的重要渠道,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不仅让媒介事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同时也改变媒介事件的意义。现场观众只能触摸到媒介事件的某个片段,犹如盲人摸象,又似管中窥豹,不见全景。不在场观众似乎能看到全景式的展现,但“媒介事件”其实是“被媒介化的事件”(mediated event)。既然我们的现代社会都已是“媒体现代”(mediated modernity),我们又如何能跳过媒介去接触事件,又如何以亲身体验去认识事件真相?于是,媒介事件中之“事件”不仅要具备重大历史性,更要具备易被符号化、媒介化的特质。即使是重大严肃主题,往往也被媒介叙述得如同通俗肥皂剧。借由媒介,媒介事件中企图实现四个同一性:时间一致、空间共享、行为一致及集体记忆。其中顺应解读的受众较多,对抗解读的受众相对较少。总而言之,媒介事件不仅能动员大规模观众,也能较为有效地使其投入情感,形成共同的“我们”意识,认可媒介事件的权力中心。这个“我们”可以是本土的、国家的、全球的,要视乎媒介事件的规模而定。但在第二现代,媒介事件竞赛、征战和

加冕的原型开始被商榷,观众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

3D: Disenchantment、Derailment、Disruption

去魅 脱轨 分裂

2008年戴扬反思其原有媒介事件概念时,指出形势在变,媒介事件也在变。他首先分析了媒介事件概念的延续性,现今媒介事件延续以往媒介事件四个特征:破格强调(emphasis)、演练示众(performativity)、认信效忠(loyalty)和共享体验(a shared experience)。“破格强调”指事件的媒介直播无所不在,打破日常规律及反复播放强调。“演练示众”指媒介事件无关平衡、中立或客观,而是主观建构真实的姿态表演。“认信效忠”意为接受和传递组织对事件所下定义及其中所载核心价值观。最后,媒介事件不仅提供信息、知识和观念,更是一种“共享体验”,是对“我们”的建构或重构(Dayan, 2010, pp. 25-26)。当社会由第一现代进入第二现代,媒介事件形态亦在演变。除了过往所分析媒介事件的3C形态,戴扬又提出了媒介事件的3D概念:去魅、脱轨和分裂。戴扬和卡茨指出,在3C形态中无论是竞赛、征战还是加冕都服务于霸权建构,其中只有征战型媒介事件或会冲击现有秩序。与之相反,戴扬的3D概念具反霸权意涵。

戴扬坦承,他与卡茨1992年书写《媒介事件》时忽略了媒介事件的某些范畴。当时“冷战”^①刚结束,人们普遍相信战争威胁已经消除,其3C论述因而总体乐观。但进入21世纪后,战争威胁仍然环绕,而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不断。有鉴于此,戴扬对3C形态做出修正,加入并强调无关仪式庆祝的主题,即源自灾难、恐怖和武装冲突的“分裂”。在语义、语法和实效维度上,3D与3C均有不同。第二现代的

① “冷战”时期为1947年至199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因政治信仰不同而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相互对立的东、西两大集团。东方集团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即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西方集团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成员国。

3D 媒介事件,从语义方面来说更强调“冲突化”(conflictualization)。冷战之后,学界曾认为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e. g. Fukuyama, 1992)。但是当与战争、恐怖相关的媒介事件频发时,戴扬认为媒介事件似乎褪去和平之意,所以他如今更强调媒介事件的冲突分裂性。3D 媒介事件在语法上开始“平庸”(banalization)。信息网路社会,无数媒介事件相互竞争,垄断受众难之又难。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的真人秀等娱乐节目似乎也能产生与媒介事件相同的效果。最重要的是,信息充沛改变了媒介事件的实效,受众不再全然敬畏地看待媒介事件。媒介事件仍然能动员大规模受众,其魔力却在消散。同时新媒体的介入,让过去通过电视集体收看媒介事件的共享体验重新变得个人化,共同体概念值得商榷。这就是实效维度的“去魅”。媒介事件不再是单一叙事,而变为多种话语在其中竞争的场域(Dayan, 2010, pp. 24-29)。2009 年,戴扬在与传播学者邱林川、陈韬文的对谈中进一步解释了他的 3D 概念。竞赛、征战和加冕是叙事常规,是共识性媒介事件类型下的附属形态。而去魅、脱轨和分裂却是特定的组织和接收形式。“去魅”反映当代大众的犬儒,而当媒体将事件以反霸权形式建构、强调冲突时,“脱轨”和“分裂”就是呼之而出的结果。3C 模式有关整合和共识,而 3D 模式重视异见,甚至创造分化。3C 媒介事件虽不至于完全消失,但不再独霸天下,而要与其他形态媒介事件共存。戴扬进一步把 3C 和 3D 等各种形态的媒介事件统归为“表达性事件”(expressive events),其表达过程既可以有共识,亦可以是分化。现今很多媒介事件虽作全球之构想,但实际情况可能局限于某些国族社群。同一事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并非都能获得媒介事件待遇,或者被定义为不同的媒介事件脚本。科技发展也影响了媒介事件的建构和表达。戴扬认为新旧媒体对媒介事件的呈现有分工之势。旧媒体展现事件,新媒体作回应。传统媒介营造“想象共同体”,而博客等网络媒

体往往扰乱这种想象,用于挑战官方垄断的形象。如萨达姆之死,有官方处决版本,同时也有移动电话及网络的形象幻灭版本。总之,新公共空间的特征便是散布各式各样相互对抗、不协调的影像(戴扬、邱林川、陈韬文,2009,页4—6)。在我们看来,戴扬和卡茨的3C之间每个概念有明确区分,但戴扬的3D概念区分却较单薄。去魅、脱轨和分裂所言都是“分裂”之意,分裂也是第二现代我们日常生活的定义性特征。

3D概念是戴扬针对第二现代情境对媒介事件原有叙述所做修正,也是回应学界批评对3C概念所做发展。从3C到3D是媒介事件基本模型从“整合共识”到“异见分化”的转变。问题是,戴扬对他与卡茨的原有框架似乎有点怀疑过度。其实我们认为3C类型依然很有生命力,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定义和特征描绘依然有效。3D概念对我们的意义在于认识到风险社会媒介事件更多与冲突相关,以及新媒体时代媒介事件的符号建构更加多元,媒介事件所激发的社会互动也更多样。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媒介事件3C形态与3D概念的共存,即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特征并存。3D概念只能是3C形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甚至可以说,近十多年媒介事件出现频密,大多以3C为主,3D为辅。

媒介事件可以如涂尔干所愿实现社会凝聚,但也可能造成冲突和分裂。但无论3C还是3D,媒介事件这种广泛的动员力都是常规媒介传播形态所不具备的。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媒介传播网络的汇通使得大范围媒介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全球化之媒介事件

“媒介仪式”与“新涂尔干”路径

之前,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介绍涂尔干时,主要是讨论他的结构功能主义,对涂尔干仪式观的介绍则是本章主题。涂尔干学说同时涵盖

了功能主义和对“仪式”的讨论,后人在发展涂尔干学说至“新涂尔干主义”时,开始更多采纳其思想中有关仪式的部分,而不是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的功能学说。若忽视涂尔干的仪式讨论,会失却其思想的重要部分。新涂尔干主义对于媒介效果研究意义重大,遵循这个路径探寻,有别于刺激—反应的简单效果论,从仪式看效果,会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之感。按新涂尔干主义的思路,媒介使用会产生强大效果,但并非传统刺激—反应论所说直接、迅速的态度和/或行为改变。媒介使用除获得信息外,更是一种仪式。看电视、唱卡拉OK甚至追星都可能成为仪式让我们产生共同体的归属感,是我们形成共同习惯、价值观念乃至文化的基础。新涂尔干主义的仪式论说离人类学传统近,对传播学而言是陌生,但近年来在传播学界逐渐为学者引用。

在现代社会早期,广播是统领民族国家的全国性媒体。20世纪3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广播节目让美国人迅速恢复信心、支持新政,全国危局得以扭转。广播退为地方性、分众媒介后,电视在建构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上作用巨大。其后,新媒体瓦解电视威势,民族国家自身也困惑于邦界,此时电视已难以成为凝聚全国的媒体。在电视之后,媒介事件愈来愈成为建构和凝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Dayan & Katz, 1992)。最早,坎特利尔(Cantril, 1940)研究“火星人入侵地球”广播剧所引发的美国大恐慌^①,布尔斯廷(Boorstin, 1963)讽刺日益增多的媒介“伪事件”(pseudo events),到戴扬和卡茨“媒介事件”的集大成讨论让我们开始关注曾备受忽略的仪式性媒介传播,这些都是有关“异常媒介传播形式”的研究。“媒介事件”实质上是“仪式性媒介事件”(ritual media

^① 1938年10月30日,万圣节前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600万听众中有至少100万听众将其当成时事新闻报道,以为外星人从天而降,四处逃散,引发美国大范围的社会恐慌,这是媒介效果研究的经典案例。

events, Hepp, 2004)或“媒介化仪式”(mediated rituals, Rothenbuhler, 1998),这些不同的名词皆强调“媒介事件”的仪式性(Hepp & Couldry, 2010, pp. 1-3)。戴扬和卡茨路径也由此被学者库尔德里(Nick Couldry)标注为“新涂尔干主义”(neo-Durkheimian),新涂尔干主义是有效解析媒体社会效果的起点(Couldry, 2003)。皆因媒介事件能定期引发社会关注,造就聚焦社会中心的超常共享体验,包括共同收看与认信集体价值。媒介事件作为一种仪式,已成为整合社会的中坚力量,将高度分化的现代人凝聚在一起,后来库尔德里将“媒介事件”(media events)概念发展为“媒介仪式”(media rituals)概念,以探察现代社会如何被媒介事件(仪式)转化和呈现。在他看来“媒介仪式是围绕核心媒介相关类别或范畴而组织的行为,由于媒介被认为是我们接触社会中心的衔接点,媒介仪式中的表演能强化媒介所承载的观念,并使之得以合法化”(Couldry, 2003, p. 2)。

首先,媒介事件是个脱俗的构想。从戴扬和卡茨的讨论至今已二十多年,其解释力日强。然世易时移,两位学者1992年的讨论已无法充分应对今日媒介事件,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补充和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探察媒介事件。围绕媒介事件,已形成活跃的学术群体。戴扬与卡茨领衔,而库尔德里是其中新星。他于2003年出版的专著《媒介仪式:一个批判性路径》(*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Couldry, 2003)及2010年与人合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 Couldry, Hepp & Krotz, 2010),可助我们了解媒介事件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仪式的存在及意义。

戴扬与卡茨从新涂尔干主义出发,将媒介事件看做认信集体价值、团结社会的电视仪式有其说服力。但库尔德里与赫普(Couldry, 2003; Hepp & Couldry, 2010, pp. 4-5, 12)指出,完全从新涂尔干传统仪式观去解析媒介事件有其问题所在,媒介事件仪式观忽视了媒介事

件话语中自身的冲突,并且其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冲突。媒介事件通过以特定的、也许是冲突的形式建构真实,从而提供特定话语位置以维护权力。媒介事件仪式观的问题首先在于集体价值是否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范围内存在?特别是当媒介事件被放在全球范围内考察,当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本身存在多样性时,共同信念的存在越发可疑。例如,奥运会作为全球事件,在不同国家和地域有着不同的媒介呈现,其叙述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因此,我们理解媒介事件时可以不采纳仪式性媒介事件凝聚社会的思路,反而可另辟蹊径探寻媒介事件作为“媒介仪式”的存在,即媒介传播形式如何建构“媒介化中心的神话”(myth of the mediated centre)。在这种情况下,戴扬和卡茨所分析的3C媒介事件形态被赫普与库尔德里归类为“仪式性媒介事件”(ritual media events),除此以外还有“冲突性媒介事件”和“流行媒介事件”。冲突性媒介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灾难或战争,这类事件是对灾难的关注与注目,并非由组织者策划而成;而流行媒介事件却是由媒介引发,如《超级女声》等在中国喧嚣一时的选秀节目等。

比划分形态更重要的是,赫普与库尔德里认为反思与拓展媒介事件概念需将其放置于全球化情境。由于跨地域文化概念(a translocal culture, Pieterse, 2009)的混杂性,媒介事件已成为一个夹带多地域特性的意义深化过程。这一过程可与戴扬所说的媒介事件的破格强调、演练示众、认信效忠和共享体验合起来,用于分析全球化中的媒介事件。就“破格强调”而言,在全球化时代媒介事件不再局限于国家范畴,而是如同“9·11”或奥运会那样被全球媒体广泛传播,并且也不仅依赖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还有互联网和其他数字媒介。就“演练示众”而言,媒介事件依然链接权力,但不仅是一个权力中心,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利益集团及话语。在“认信效忠”层面,当媒介事件处于跨地域文化中,一方面可见对原有组织者定义的反驳和争论,如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中国倾向于国力展示,在西方社会则加入不少对中国集体主义的批判。但另一方面,在媒介事件的话语争论中原有定义的核心意涵也依然可能保存。如对“9·11”事件,不同文化、不同族群有不同解读。但双子塔被恐怖分子所劫持飞机撞毁的画面,是统一所有多种诠释的符号象征,表达对恐怖行为的谴责、对和平的向往。最后看全球跨文化情境下的“共享体验”,即使同一媒介事件所建构的也并非全球统一的“我们”,而是很多不同版本的“我们”,取决于当地情境,以及国家、种族、宗教、亚文化等不同族群(Hepp & Couldry, 2010, pp. 4-12)。事实上,美国“9·11”事件作为媒介事件在促进美国社会凝聚上效果显著。事发当晚,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致全国民众的总统讲话,他说“我们的祖国很强大”,“伟大的人民将捍卫这个伟大的国度”,并且“上帝保佑美国”(Bush, 2001, September 11)。布什的这些话语将多元分散的美国人召集至“美国”这个国族概念之下,并让他们形成共同归属感。是“9·11”事件激发美国人意识到“我们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自由”(Bush, 2001, September 11)面临着共同的外敌,从而更坚定“我们”这个国族共同体。所以,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是各行各业的所有美国人为争取正义与和平而团结起来的日子”(Bush, 2001, September 11)，“9·11”事件引发的媒介事件改变和影响了美国历史和国族概念,亦重新激活了美国人对异族的排斥心理。

我们可用身边事例来说明“破格强调”媒介事件的衍变,看个人如何用新媒体手段对重大事件进行微观层面的信息处理,同时投入情感、建构共同体。2010年世界杯决赛于7月12日北京时间凌晨2:30举行,香港中文大学虽远离南非但也深度卷入了这一媒介盛事。7月6日,学校传讯及公共关系处以校长沈祖尧的名义,向全校师生及校友发了封公开电子邮件邀请大家一起看球。

各位同事、同学、校友：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将于7月12日（星期一）凌晨2时30分上演，沈祖尧校长诚邀各位中大师生校友回校，在林荫大道的大型电视一同观看直播，详情如下：

日期：2010年7月12日（星期一）

时间：凌晨2时30分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林荫大道（百万大道）

查询：2609-××××

届时将提供饮品（不含酒精）及小食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于是世界杯作为全球范围的媒介事件，引发了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看球”这一校园媒介事件。比赛前几日，中大师生及校友们通过MSN、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等方式相约看球。决赛之夜，凌晨2:30，平日此时我们已在梦乡，这天大家却呼朋引伴地聚集到百万大道。电视大屏幕已开始播放广告，昏黄的路灯映衬着细细的雨丝。我们找好位置在屏幕前坐下，身旁是好友，其余皆是中大师长、学友或校友。一会儿，上任伊始的沈校长穿着橙色的荷兰队球衣过来了，与大家一起坐下看球。我们很多人也都穿上运动装，正装不属于这个夜晚。大家手里拿着充气的彩色棒加油助威，欢呼、鼓掌或叹息，这些都是适合这个观看仪式的表演。远在南非的决赛实况被电视传输至我们面前，此时在世上许多地方，有很多人与我们一样在共同经历这场比赛。这个夜晚将进入我们的集体记忆，连同那能神奇预测比赛结果的“章鱼哥”保罗^①。这场媒介事件属于典型的“竞赛”事件，沈校长是荷兰队粉

^① “章鱼哥”保罗是德国奥博豪森海洋馆的一只章鱼，准确预测了2010年足球世界杯有德国队参赛的所有11场比赛的结果。对于最后的世界杯决赛，保罗也成功地预测到西班牙队将获得冠军。

丝,我们几个跟章鱼保罗一样选择了西班牙队,最后荷兰败给西班牙队。沈校长说,“要赢一定要有 teamwork(团队合作)。当晚我鼓励的不是荷兰,是中大”(《文汇报》,2010年7月22日)。当晚簇拥看球的我们(如图6.1所示)所折射的是“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共同体。“百万大道看球”是现代校园仪式,借由世界杯决赛契机将我们聚集在一起,认同中大师生这一身份,认信“博文约礼”之中大校训。知识深广谓之博文,遵守礼仪谓之约礼,即“德智并重”之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育方针。沈校长作风亲民,在百万大道上与师生打成一片,一洗过去数年中大校方与部分师生对抗的印象。这一事例可证明媒介事件能发挥增强凝聚力和巩固秩序的效用。

看球时,旁人在不停玩手机,原来她通过手机上网在跟朋友交流看世界杯的情况。我们边看球赛边互相拍照,同样可以即刻放上网络。这种个人层面的信息传播,也是当前媒介事件被符号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媒介事件的符号化建构中,既有电视等传统媒介,也有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借由这些媒介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互渗透,我们既有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又有汤普森所说的“媒介化类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百万大道看球之夜所建构的“我们”是“中大的我们”,这个“我们”的强调有赖于世界杯这个契机,与世界杯在世界其他地方建构的“我们”相互辉映,却不尽相同。当社会进入第二现代,媒介事件本身的形态也在演绎变化。但不变的,甚至越来越强的是媒介事件的受众动员能力和社会凝聚能力。事后,据中大统计和香港媒体报道,当晚有800多名师生校友一起看球(Cuhk.edu.hk, 2010, July 12;《明报》,2010年7月13日)。此例也说明媒介事件波及范围各有不同,有世界杯这种全球性的,有“中大百万大道看球”这种当地的,还有全国性或区域性的。

综上所述,媒介事件实例相比过去有了很大不同,对其概念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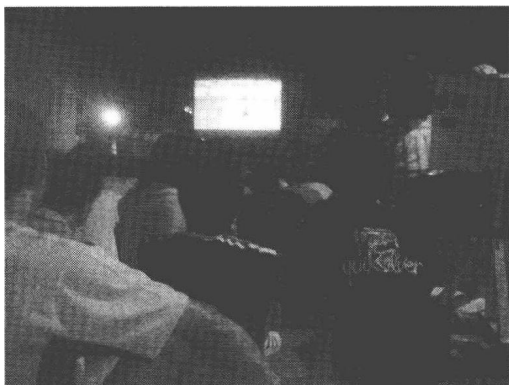


图 6.1 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世界杯之夜

发展有其必要性。但我们认为,库尔德里等人对媒介事件所做新分类不如戴扬和卡茨原有的 3C 形态简洁清晰。冲突性媒介事件可用戴、卡二人的“征战”形态加以解释说明,即使是恐怖事件和自然灾害等,也常见利益集团借力该事件巩固权力中心、维系社会秩序和团结,如布什在“9·11”事件后发表的讲话所示。倘若如戴扬那样将这类灾难事件划入 3D 完全合理,或是仍划为“征战”也未尝不可。至于《超级女声》等流行选秀节目,戴、卡二人在定义媒介事件时早已言明某些事件可由媒介组织,若一定要给这类媒介流行节目给予媒介事件待遇,当属“竞赛”形态。戴扬与卡茨所下定义是严谨而又基本完备的。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形态划分,但竞赛、征战与加冕的类型划分值得我们尊重,且到目前仍可有效应用于当前的各种媒介事件。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将媒介事件与权力勾连起来,却是值得戴扬和卡茨注意的,这的确为其原有思想之不足。戴扬和卡茨虽然意识到了媒介事件的霸权性,但他们并未对此做出多少批判,而是欣然于媒介事件的社会凝聚效果。现今从仪式观分析媒介事件已蔚然成风,我们亦认可媒介事件具有团结社会的仪式功能,相信新涂尔干主义在传播学方面的发现将渐为学者认识。但我们引入库尔德里等学者观点的目的在于:在

现象上提示媒介事件形态的多样性;在理论上提供解释媒介事件的多种可能路径;同时在价值观上寄望于媒介事件的研究能增强批判性,勿忘权力因素。

最终,赫普与库尔德里将“全球化媒介事件”定义为“特定情境下被深化并具建构中心表演的媒介化传播,其聚焦于特定核心意涵,呈现为不同媒介产品,达至广泛多元的受众与参与者”(Hepp & Couldry, 2010, p. 12)。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建构中心的表演”,包括作为多元叙述中心的核心意涵,也指该核心意涵是源于某个社会实体(当地社会、跨地域共同体或全球)的中心而建构的。媒介事件因而与对“媒介化中心”(mediated center)的建构紧密相连,今日之媒介事件已成全球权力博弈的重要一环。对媒介事件的研究因此必须保留批判视角,即媒介事件如何通过符号将“中心”建构为中心,及建构中心的表演如何与民众对媒介事件的日常应用相连(Hepp & Couldry, 2010)。

风险社会之“公民宗教”

戴扬和卡茨在其书最后一章的末尾部分谈到了媒介事件对于宗教的影响。他们只鳞片爪的论述背后却是一个重大社会现象,更有传播媒介作用在其中。若依我们所见,宗教议题之于媒介事件可单列出来深入分析。涂尔干认为“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彼此有着亲密但不确定的关系,宗教则是人们想象社会及相互关系的首要观念体系”(Durkheim, 1995, p. 227)。传统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失去以往的号召力和规范作用,但现代人仍有休戚与共的集体需要。个人化进程愈深,社会风险愈重,则大范围媒介事件影响越大。媒介事件犹如“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触动社会核心价值,巩固或者带来价值观念的剧变。第二现代,深陷孤独的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媒介事件。通过媒介事件,我们才能寻回缺失的共同体及“在一起”的感觉。传播学者凯瑞曾

说传播仪式观涉及媒介特定时刻维系社会的角色(Carey, 1989);库尔德里则说媒介事件正是这样的时刻(Couldry, 2003)。

新媒体和微信息处理的介入,让媒介事件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而风险社会中,风险亦成为媒介事件呈现的重要主题。从形式到内容,相比戴扬和卡茨的时代,媒介事件都有了变化,并将继续发展。第二现代,风险加剧,无远弗届,无可逃避。当可感知之风险转为现实之惨痛体验,媒介事件往往随之呈现。如美国“9·11”事件、中国 SARS 风波以及“5·12”汶川地震等。与风险相关的媒介事件,让人类的孤独和脆弱更清晰,也让人们对媒介事件这一“公民宗教”的需求更迫切。早在 1985 年,罗兰布勒(Rothenbuhler, 1985)就借由 1984 年奥运会论述了媒介事件作为公民宗教与社会团结的关系。“媒介事件”作为世俗公民宗教,不涉鬼神,集中于集体价值的效忠,以回应日益非人化、官僚化、程序化的世俗生活。在媒介实践中“传播者将社会成员凝聚起来,感受共同的心跳,并让人们对社会及其统治威权再次宣誓效忠”(Dayan & Katz, 1992, p. 9)。

如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的汶川地震,就属于凝聚社会的媒介事件。媒介事件现场直播,日常程序被打乱,英雄人物出现,标志划时代的新价值,触动天涯若比邻的感应,散发跨越地理距离的错位感。近年传统电子媒体如电台、电视,收听与收视率均有下降,而互联网世界虽然无远弗届,但网络信息散乱,小众社群多如星斗,增加隔阂多于凝聚共识。然而,汶川地震发生之时,电子信息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平日媒体千方百计抢夺民众的注意,但每逢大事当前反过来是民众追看传媒的内容更新。今天的分众社会,媒介各自吸引不同社群。但在媒介事件之中,媒介成为整合大众关系的平台,人数之多往往史无前例,媒介事件在政治、社会、文化上的重要性亦在于此。贝克告诉我们现代化就是个人化。现代人在工作、消费、家庭等各方面,都愈来愈孤

立于个人的生活处境内。媒介事件却有逆反力量,把孤立的个人拉回社群整体。汶川地震犹如强大磁石,把世界各地(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人卷入灾民的悲喜交集之中。媒介事件往往能在现代理性社会激起强烈集体情绪,“9·11”事件诡异地引起美国仇外情绪以及西方与伊斯兰文化的对立。2008年的汶川地震,成功地把天灾引发的强烈情绪引导向华人世界的团结与合作。过往媒介事件之中,英雄的出现往往能成为标示性的象征——如登月之旅的阿姆斯特朗、访问耶路撒冷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等。奥运竞技的权威来自于公平理性的体育精神,“加冕”礼仪的权威来自一代接一代的传统,而“征战”事件的权威则来自魅力英雄所体现的新风气、新价值。汶川地震属于“征战”类别,而当中往往出现一个或多个魅力英雄,在灾难或冲突中化为战场上的认同对象。温家宝总理是四川地震中的魅力领袖,他奔波于灾难现场,慰问苦困中的孤儿弱小,为士兵医护人员打气,指令救人是“重中之重、争分夺秒”。凝聚力创造认同,其一是指向人道主义的四海一家,其二是指向国家民族的集体意识。这种因魅力而生的价值是偶发不定的,未必转变为规律化的制度,却有力地揭示改变的可能性。媒介事件是一个重整社会作风与价值的大舞台。而征战式的媒介事件,能预示社会发展的最前线。历史的步伐在眼前展开,让人们看见新阶段的来临。当然,正如戴扬近年的修正补充,媒介事件亦有分裂暗涌,如汶川地震也引发社会对豆腐渣工程的关注,直指贪污敛财的社会问题。

总而言之,媒介事件/仪式是有关媒介效果的研究,反映了特殊情境下媒介的大范围动员能力。至于动员结果是新涂尔干路径的凝聚社会或是风险社会下造成异见分化,是当前仍在进行的学术讨论。不论答案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媒介事件“能辐射重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Dayan & Katz, 1992, p. 54)。涂尔干所提如何实现社会凝聚

的宏大问题,困扰着众多学者。鲍曼在《液态现代》里也曾问询,现代新救赎如何创造让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s to live together)。贝克从社会学角度答道,互惠的个人化能够让社会整合成为可能。我们传播学给出的其中一个具体答案即是“媒介事件”。在媒介事件中,利己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集体记忆,建构属于“我们”的共同体。这一过程无可避免有利益的交织和权力的依附。但毕竟,孤独于个人化中、被风险威胁深深笼罩的我们,有那么一刻曾经“在一起”。

针对媒介事件,我们在本章结尾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一论点综合了戴扬与卡茨 1992 年的经典论述、戴扬强调冲突提出的 3D 新论述及库尔德里等学者对全球化媒介事件的论述。我们认为媒介事件总体而言是新涂尔干路径下的媒介仪式,这一仪式通过对历史性事件的即时呈现和符号化建构,垄断广阔地域的多元受众。媒介事件呈现并鼓励个人认信符号化的核心价值观,借此促进社会凝聚,从而具有强大效果。在现代高度个人化的风险社会,媒介事件中的冲突性元素愈发明显,当冲突被媒介仪式驯服,媒介事件进一步为权力中心服务。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介事件陷入更复杂的权力图谱,而新媒体时代也使得媒介事件的符号化建构更为丰富灵动,但不变的是媒介事件的强大动员力和指向社会团结的仪式观。

再跳脱出来至更宏观的思考。本书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社会学家的学说涉及媒体现代中两股互相冲撞的力量。一股是吉登斯所谈自我身份、贝克论述的个人化和鲍曼所论液态现代,这股力量将人逼向个人化、流动的生活处境。另一股力量则是集体的需求,如涂尔干论述的有机团结、汤普森所谈公共性、鲍曼提到的共同体,即如何追求共享、共有、共存的感觉。这两条线经纬纵横,密密“缝”出媒体现代图卷。媒介事件即是个人化和集体需求两种趋势对行、冲突的结

果,戴扬和卡茨是从整体和经验层面回答涂尔干如何实现社会凝聚的问题,总有一些历史时刻,大家能够摆脱孤存状态而骤然聚集在一起。人类社会有分工就有相互依赖,媒介事件不会因为个人化而减少,反而会因为个人化的发展而越来越多。同时,戴扬和卡茨媒介事件的3C形态倾向于集体化需求,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而戴扬新发展的媒介事件3D概念则倾向个人化的一段,也就是将媒介事件的破格强调、演练示众、认信效忠和共享体验个人化了。3D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3C的效果,但3C目前依然是主流。同时,3C媒介事件中反思性较弱,受众对媒介事件的集体认同强。而在3D媒介事件中,由于对抗和替代解读的增多,而导致反思性的增强。

至此,我们力图传递《媒介事件》一书精髓,并希望在其基础上发展媒介事件讨论。并非以己之见超越戴扬和卡茨两位学者,而是我们贯通了众多学者有关媒介事件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现代性框架下去分析媒介事件,可以看出现代性之中个人化与共同体两者的互动关系。所以,在读这些学者的著作时,有两个原则:一是要精读原著,二是要融会贯通。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独介绍某个学者及其思想,而是要“打包”推介。希望大家在看了我们的讨论后,能去找寻每一本原著细读,读的时候最好忘掉我们这本书的论点。有了个人感悟后,再批判我们的分析。倘若能这样阅读,相信会对传播学与社会学创造更丰富的对话与交流。



all that is "natural" melts into image 符号经济 Scott Lash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sociology of flows 流动社会学 John Urry 反思社会学
space economy 美学反思 aesthetic reflexivity 信息传播结构 creative class 反思积累 David Harvey 文化工业 cultural industries
符号化 sign economy 传播研究 反思



all that is "natural" melts into image 符号经济 Scott Lash 非组织世资本主义 sociology of flows 流动社会学 John Urry 反思社会等
space economy 美学反思 aesthetic reflexivity 信息传播结构 creative class 反思积累 David Harvey 文化工业 cultural industries
符号世 sign economy 传播研究 反思



all that is "natural" melts into image 符号经济 Scott Lash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sociology of flows 流动社会学 John Urry 反思社会学
space economy 美学反思 aesthetic reflexivity 信息传播结构 creative class 反思积累 David Harvey 文化工业 cultural industries
符号化 sign economy 传播研究反思



all that is "natural" melts into image 符号经济 Scott Lash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sociology of flows 流动社会学 John Urry 反思社会学
space economy 美学反思 aesthetic reflexivity 信息传播结构 creative class 反思积累 David Harvey 文化工业 cultural industries
符号化 sign economy 传播研究 反思

第七章

符号经济与创意产业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马克思这句名言昭示了人类社会的命运,一百多年来被广泛引用,其中也包括学者拉什(Scott Lash)与厄瑞(John Urry)。惊叹于该预言的警示性,拉什与厄瑞合作撰写了两本专著:《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Lash & Urry, 1987)及《符号与空间经济》(*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ash & Urry, 1994)。两位学者都是英国人,《符号与空间经济》既书写于英国情境,亦有欧洲情怀在其中。

拉什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教授,在现代性讨论、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文化工业研究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厄瑞是英国社会学家,任教于兰卡斯特大学,其研究以旅游社会学与社会流动著称。《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分析社会生产制度是如何从20世纪的“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发展到始于20世纪末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作为本章重点,《符号与空间经济》延续和深入发展了《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的讨论,指出和详析这种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是一种符号与空间经济,

体现为客体在大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及主体的认知和美学反思性,经济支柱产业变成流动、轻灵的工业形态,不再是重型工业和机械化生产,其中消费势大,市场多变,以知识及创意开拓商机。具体来说符号与空间经济体现为文化工业和旅游业等行业在第二现代的蔓延,而文化工业正是媒体现代在工业层面的反映。虽然拉什与厄瑞自身未曾明言,但我们认为《符号与空间经济》实则回应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与文化,谁决定谁,两者是彼此两分还是相互消融,是社会消融入文化,还是文化消融入社会,学者们众说纷纭。据拉什与厄瑞的分析,是文化对社会/经济的渗透,继而文化发展出与社会结构并置,甚至更为强势的“信息与传播结构”。拉什与厄瑞的观点不能不说有些夸张,但是他们所指出的文化渗透社会的趋势,以及这种渗透在经验层面的体现——符号经济的壮大,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拉什与厄瑞在《符号与空间经济》中的论述,混杂着悲观与乐观的情绪。悲观在于其对“流动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flows)的论述,乐观之处在于他们对“反思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reflexivity)的探讨。依据流动社会学,主体与客体的加速流动造成主客体的虚无,社会关系失却意义。金钱资本、商品、劳动力及信息符号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导致人们被信息符号中蔓延的能指(signifiers)包围,将能指联系至所指(signifieds)越来越困难。符号与空间经济的盛行造成意义的空洞化、抽象化、社会反常和主体的解构等。但依据反思社会学,反思是自我的深化,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伴随社会关系的多种正面可能性。人们可能在工作、休闲中重置意义和重建共同体,主体反思性增强,从而挣脱第二现代理性之非理性的迷局^①,使得空间与日常生

^① 据韦伯所言,现代工具理性渗透社会各部门,令生活大规模“去魅”而失去活力,此之谓非理性的理性控制。

活呈现多元多态(Lash & Urry, 1994, pp. 2-3, 31)。反思社会学我们暂且不表,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流动社会学及符号经济。

符号经济,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论述伊始,拉什与厄瑞谈及金钱、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既是被结构的(structured),又是结构性的(structuring)。但两人的通篇论述主要围绕各种流动(flows)是如何结构性地改变社会,从而形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拉什与厄瑞同时指出在去传统过程中,社会主体日益从社会结构的他律控制和监控中释放出来,以实现自我监控与自我反思(Lash & Urry, 1994, pp. 3-6)。在结构与主体性/流动的动态关系上,拉什与厄瑞的立场与我们第八章将要介绍的卡斯特接近,即重流动轻结构,而离吉登斯和汤普森既重主体性也重结构的立场较远。非组织化政治经济学是拉什与厄瑞在书中经常谈到的概念,但《符号与空间经济》一书侧重经济及文化层面的分析,而不似之前吉登斯、汤普森、贝克和鲍曼等人,多少有政治层面的剖析。

流动社会学涉及金钱资本、物质商品、符号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金钱资本在今天更多是数字货币、证券、期权、股份或纸黄金等数字形式的存在,在全球资本市场具有极快的流通性。物质商品的流动体现为全球范围内的物资交易、加工合作及相应的专利、标准等交易。劳动力流动形式多样,有移民、教育、旅游等多种途径。符号流是本书论述核心。符号(sign)包括信息(information)与标志/形象(symbols/images),信息属于认知(cognitive)内容,涉及后工业化的信息产品。象征/形象属于美学(aesthetic)内容,涉及后现代形式的商品(Lash & Urry, 1994, pp. 4, 7, 15)。在此,我们要厘清拉什与厄瑞的思路。首

先,相比物质商品,二人更强调符号商品。其次,在符号商品中,二人尤为强调美学内容。符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金钱资本、物质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日益有赖于符号,更在于符号商品流动形成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重要产业。在第一现代,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符号的重要性,但那时我们主要看重信息,所以常将社会称为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至第二现代,由于拉什、厄瑞及其他美学论者的提示,人们开始更多看重符号中的美学维度。一方面,物质商品中设计成分增强,呈现物质商品的美学化特征(the aestheticization of material goods)(Lash & Urry, 1994, p. 4)。比如苹果公司(Apple)就是重设计的典型,相比传统电脑冷冰冰的形象,苹果电脑无论是名称、外形还是软件都是可爱亲切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外形绚丽,独特的设计极具美感。iPhone 和 iPad 外观简洁、时尚,内置多款好玩游戏。用其他品牌的电脑和相关产品是出于实用,而用苹果公司的产品却是让人开心,其使用者也被附以年轻、时尚的形象。除去技术因素,这更多源于苹果独具匠心的各种设计,即对科技产品的美学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学符号成为重要的工业产品。如迪斯尼集团(The Walt Disney Company)就是一个生产形象、靠经营形象牟利的大型跨国公司,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小熊维尼、巴斯光年等形象深入人心,被迪斯尼复制在电影、动画、主题公园、玩具、图书、电子游戏、服饰、家居等各种商品形式中,给迪斯尼带来滚滚财源。

基于流动社会学,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发生巨变,不再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而进入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中,金钱、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四种资本在国家范围内流动,公司形态以大型科层组织占优,其工业化生产为福特制度,主要生产物质商品。而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中,呈现一种乱中有序的状态:前述四种资本能国际范围内流动,大型科层组织形态不一定占优,后福特制

的去工业化生产模式愈来愈多地生产符号产品。由于主客体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经常把主客体的意义和情感掏空。马克思曾说异化的一种表现是仅以商品的交换价值去衡量事物,而无视使用价值(见本书第一章)。而在拉什与厄瑞看来,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中的商品有使用价值(use value)、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和符号价值(sign value)三种。符号价值体现为商品中不一定具有实用效能的设计、装饰等部分,现代商品中符号价值的膨胀,导致我们生活在泛滥的符号中,甚至日常生活亦被美学泛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contemporary everyday life)(Featherstone, 1991),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中的商品作为客体正日益失去稳定的意义及物质内容(Lash & Urry, 1994, pp. 10-15)。比如说苹果公司的 iPhone 等产品即是以符号价值胜出的典型例子。追求完美的苹果总裁乔布斯希望在苹果产品中实现自由艺术和科技的结合,他对产品设计、细节、外观、品质、易于使用和可靠性近乎偏执的坚持,是苹果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Fry, 2010, April 1)。苹果外观等属于美学符号,而游戏、上网等使用功能是信息符号的提供,这些是苹果产品核心,至于产品机身则是越来越轻、越来越薄,似乎要让物质载体的存在感被忽略不计。最终苹果产品在消费者心中形成时尚、潮流、可爱、好玩、好用等正面形象,成为其符号资本,使用苹果产品可以提升和增强使用者自身的形象。苹果的符号资本无关实用层面,却是吸引众人疯狂购买的关键因素。中国《环球》杂志联合搜狐网在 2010 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在苹果的众多特点中消费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时尚的外表”,占 28.34%,同时接受调查的消费者中有 45.8%的人认为苹果就是“时尚代言人”(王宁,2010)。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上市时引发了全世界的抢购热潮,甚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十大新闻之一(中国网,2010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0 年 iPhone4 依然引发全球排队抢购潮,人们对 iPhone 真的是“爱疯”了。

也许对大家来说,苹果系列不单是实用工具,而是让我们乐此不疲的玩具。正如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对乔布斯专访中所言,“苹果的成功是因为他了解用户的感情需求——用户在使用苹果产品时会不经意地微笑”,乔布斯也因而成为“业已改变世界的极少数人之一”(Fry, 2010, April 1)。从信息科技和美学设计的角度,苹果系列同时是后工业与后现代的符号产品。苹果产品也由此被纳入支配模式。支配(domination)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方式。依拉什与厄瑞所言,支配在传统社会体现为满载意义的符号系统,如被人格化的玉皇大帝、阎王爷、上帝或魔鬼等超自然力量。在第一现代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支配关系体现于意识形态的角力,如国族、金权、自由、平等、科学、男权或女权等意义系统。至第二现代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支配关系通过满溢的符号暴力而践行,符号之中意义稀薄但仍有强大的权力倾斜(Lash & Urry, 1994, p. 15)。苹果产品现今俨然已成为财富、地位、知识和科技等因素的象征,拥有“i”系列产品就拥有了开启符号世界的魔方,倘若没有“i”系列,仿佛就失却了那快速流转的信息流、炫目多彩的符号形象。这么说也许有简单两分之嫌,但在我们看来,苹果和其他符号产品日益将人们分为两个阵营:符号富裕者(sign have more)和符号稀缺者(sign have less),其背后从本质上依然是权力的因素,体现了政治经济背景的不同及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差异。这种资源不均在于卡斯特的网路社会论之中更为显明:资讯符号网路之外的阶层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失败者。

符号与空间是拉什与厄瑞论述的两个关键词,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中的新盛势力是符号在全球空间的流动及其产业化,其流动历经特定的节点,而这些节点中的枢纽就是“新核”地带(now core)。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中,核心经济管理机构/地域必须同时具备驾驭空间的能力,是为“核心空间机构/地域”(institutions of spatial governance)。通

俗地说,就是资本、劳动力、物资、信息技术与形象符号等交汇和贯通的枢纽,比如纽约、东京、香港、北京和上海等这样的现代都市。更重要的,这些“新核”是被媒介架构的。它们上可辐射广阔全球空间,下则承载本土地域,是“全球化之地方化”(globalized localization),这些“新核”不仅是主客体流动的枢纽,更是信息密集、传播兴盛的场域(Lash & Urry, 1994, p. 17)。在组织化的福特生产模式下,最重要的城市是大型工业基地,东北三省作为重工业区曾是中国经济命脉。“铁人”王进喜被评为1959年“全国劳动模范”,作为东北大庆石油工人的他,其个人命运亦是那个时代工业模式的投射。但后来,信息产业、服务行业、旅游业等符号和空间主导的第三产业兴起,东北没落。如本书第五章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就是于1986年宣布破产的东北沈阳防爆机械厂。现在,时代的荣光不再属于大型机械重工业和以体力取胜的机械工人,这可见于“东北被市场抛弃”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话语叙述(人民网,2003年8月5日,2003年8月18日)。新的时代英雄群像是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搜狐公司创始人张朝阳等引领中国信息潮流的人。他们的网络公司属于非组织化的后福特生产模式,除网络公司外,亦有移动、联通等电信企业在中国的势大甚至是霸权。前(钱)途光明的企业还有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等媒体牵引的全国媒体网络,以及中国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等交通机构,又如中国旅行社、广之旅旅行社等大型旅游机构。新兴行业不胜枚举,但通常其利润源自对符号和空间的操作与管理,工业转化的背后是从物质生产主导转向符号操作主导的时代大背景,也是经济形态从组织化倾向非组织化的社会变迁。这些符号空间行业聚集的地域即是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等中国“新核”地带,它们是中国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传播

的中心。而湖南邵阳、湖北黄石、山东邯郸、广东茂名、江西鹰潭、福建福清等我们不熟知的城市,再及广大乡镇农村等地域,是相对信息流动慢、形象符号较缺乏的边缘地带。拉什与厄瑞认为当前的社会分层即是“新核”与“边缘”(periphery)的对立,两者划分的依据为符号在广阔空间的流动速度。符号在空间的流淌,借由新核与边缘节点交织成网路,在其上建构液态现代轻灵敏捷的符号与空间经济,这就是两位学者论述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整体思路。

不过,拉什与厄瑞书写的情景是经济高度发展的英国,所以有符号与空间经济的整体论述。其部分特征亦适用于中国情况,但毕竟中国经济发展没有那么发达,不能简单用非组织化特征解释中国情况。符号与空间经济在中国的兴起目前主要见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地很多中小城市仍然是以物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主,其生产模式仍是组织化的。至此,本章第一部分介绍了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特征及其中客体的流动。本章第三部分,将以北京 798 艺术区和“时尚传媒集团”为例,例证中国文化工业和符号经济的潮涌。但需注意,这样的经济形态在中国整体尚不算主流,中国仍有很多无法用符号与空间经济解释的地域和行业。在进入第三部分讨论前,本章第二部分将介绍拉什与厄瑞对反思性的剖析和发展,其“美学反思”的提出有别于吉登斯、贝克等学者对第二现代的描述。在此,拉什与厄瑞从流动社会学转向了反思社会学的探索。

反思性,认知兼美学

拉什与厄瑞对反思性社会学的论述是全书理论较为创新之处。在拉什与厄瑞之前,其他学者讨论反思性是笼统的,反思性为主体对现代社会、知识、科技及专家系统等的反思或主体的自我反思,但拉什

与厄瑞却做了概念层面的两分,即“认知反思”(cognitive reflexivity)和“美学反思”(aesthetic reflexivity)。如果说认知反思是主体对个人、社会结构性角色和资源的监控,那么美学反思则是对自身的自我诠释及对社会实践的诠释,其中包含对时代情调的掌握。认知反思从根本上来说预设判断,而诠释性的美学反思超脱于判断。认知性反思是主体监控自我和社会世界的“主客体”关系(a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而美学反思假定“自我”同时即是“寓居于世”(a being-in-the-world),是活在当下的诠释。拉什与厄瑞美学反思的论述立足于他们对吉登斯和贝克反思性讨论的批评。贝克的反思概念具体来说是知识对科学的质询或知识的自我反思,就整体而言是对社会本质、规范和结构的反思,导致批判性的社会结构改变,从而更适用于分析社会变革。吉登斯的反思概念主要作用于复制社会结构,因为其反思强调自我反思的不断深化,即主要不在于反思社会而在于反思自我,是自我对个人行为的监控及个人传记叙述的组织。在拉什与厄瑞看来,吉登斯和贝克都忽视了美学反思的维度,其反思性论述因而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所讨论的仅仅是认知反思。拉什与厄瑞进一步指出,吉登斯和贝克对美学反思的忽略在于他们对“自我”概念的认识存有问题。对吉登斯和贝克而言,“自我”(self)等同于“自我意识”(ego),从而与身体(body)相对立。自我反思即是自我意识对身体的监控,自我与身体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两分。拉什与厄瑞反思性讨论中的“自我”却不同,他们认为自我是“自我意识”与“无意识”(unconscious)的复杂结合,身体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自我的一部分,这样反思变成诠释性和美学性的。总之,第二现代之所以是反思现代正是由于认知反思和美学反思的持续深化,而美学反思是符号与空间经济的内核(Lash & Urry, 1994, pp. 5-6, 31-38, 42-45, 59)。吉登斯和贝克只看到反思的认知维度,应该在于深受启蒙精神的影响,从而过于看重理性和判

断。拉什与厄瑞让我们重新注意人类自省和关照外部过程中那些属于无意识、下意识和情感的因素,他们对美学维度的补充丰富了反思性的内涵。吉登斯的确不曾谈过美学反思,他谈个人选择,并将之发展为生活方式与生活政治,如对个人发型服饰的选择。拉什与厄瑞看到消费中美学反思对生产领域的扩张和影响,论述美学反思如何成为第二现代经济结构的基础。创意产业与符号经济正是基于个人的美学反思,并同时渗透于生产和消费领域。

顺势,拉什与厄瑞提出了“信息传播结构”(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uctures/I & C structures)的概念。他们认为在第二现代,社会结构在主体(agency)面前较之从前日益势弱。但社会依然可用结构解释,其新兴结构即是信息传播结构。信息传播结构是各种流交织的网路,这些“流”形构符号与空间经济。信息流动和聚集成为认知反思的基础,而形象与表达符号的流动和聚集是美学反思的基础。符号与空间经济同时以认知反思和美学反思为基础性条件(Lash & Urry, 1994, pp. 6-7)。注意,“社会结构”和“信息传播结构”中虽然都有“结构”一词,但两者含义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结构”是传统社会学含义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稳定的模式。“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不平等和差异(Thompson, 1990),有关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等,更强调社会结构对主体的限制性和赋权(参见本书第三章)。而信息传播结构中的“结构”见于新兴社会学讨论,强调社会网路的流动性及其模式。“信息传播结构”由信息和形象等符号的流动构成,更强调主体对于社会结构的相对自主性。信息传播结构的提出是重要的,亦是言之有理的。虽然我们始终强调社会结构即使在第二现代也很重要,只是形态更为复杂,但同时我们也强调信息传播结构将会越来越重要,或者说现代社会将日益同时依赖社会结构与信息传播结构,而社会结构与信息传播结构间存在互动的相互勾连。拉什与厄瑞用日本、德国和

美国的例子来具体说明这种互动建构,提出和分析了生产制度中的“反思积累”(reflective accumulation)。

拉什与厄瑞(Lash & Urry, 1994, pp. 63-67, 111)指出反思积累有三种模式:日本模式(Japan form/J-form)、德国模式(German-speaking form/G-form)和美英模式(Anglo-American/A-form),这三种反思积累有其相应的信息传播结构。日本模式的反思积累是一种“集体反思”(collective reflexivity),集体反思在工作小组内部发生,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是强纽带。德国模式是“实践反思”(practical reflexivity),工作模式比日本模式更为个体化,人际联系为弱纽带,产品中机械成分较高,教育中更偏实践技巧,模糊工匠和设计者的界限。美英模式是“话语反思”(discursive reflexivity),意味着专家系统特别是抽象知识处于核心地位,职业经理人在生产者中位高权重,这既不同于日本的工作小组模式,也有别于德国注重手艺人,话语反思中的人际联系依然是弱纽带。现代生产中的这三种反思积累模式都将主体从社会结构中释放出来,并对其赋权。其中,以国家邦界和组织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虽不至于完全消失,但作为限制主体的框架整体呈削弱之势。社会结构留下的权力真空被新兴的信息传播结构所代替,这样的信息传播结构越来越非组织化和非机构化,且同时着眼于全球性和当地性,如我们前面所述“全球化之地方化”的“新核”地带。但是,何为信息传播结构?拉什与厄瑞虽在其书导论部分就提出了信息传播结构概念,但在分析反思积累的日本模式、德国模式和美英模式时却主要限于讨论信息结构(见《符号与空间经济》第四章),到讨论文化工业时才再次将信息结构概念扩大至信息传播结构(见《符号与空间经济》第五章)。我们认为这种区分意义不大。二人在信息结构与信息传播结构之间的转换比较随意,逻辑不够清晰,甚至反映他们在讨论非组织化生产制度时依然是重认知维度而忽视美学维度。也许我们可以统一

用信息传播结构论述,并以拉什与厄瑞的信息结构概念为基础,将信息传播结构元素定义为:(1)创新、设计和相应问题解决等符号处理活动;(2)生产与消费中的文化、符号资本积累;(3)社会和生活领域中包括信息、形象在内的符号流。

据拉什、厄瑞所析,日本的集体反思模式呈现信息传播结构的平行化(horizontalization),信息可在基层员工间流动。日本模式所涉及的信息更偏理论知识,不似德国的实践反思模式更偏实践知识,而美英的话语反思模式则介于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之间。在日本模式中,工作小组而不是个人在信息传播结构中居主导地位,日本模式反思性的集体化说明最现代的可是最传统的。德国模式和美英模式的反思都是个人化的。德国模式的信息传播结构同样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其结合体现在对匠人传统的继承,非常注重实践制作能力,设计过程和制作过程没有严格两分,即使所谓的艺术设计师也要能亲手实践其创意。德国模式中信息传播结构的特征体现为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信息可在组织中不同层面流动。美英的话语反思模式中,生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吉登斯所指的专家系统。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的生产过程依赖研发设计,而美英模式生产过程基本就是研发设计过程。美英模式的信息传播结构话语性高,同时信息在由于供应商关系而跨越多家公司的多重节点间流动。总体说来,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的信息传播结构以生产者为中心,而美英模式则以消费者为中心。抛开三种模式区别不谈,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中,生产过程与信息传播模式日益交织和共延。信息传播结构的日益重要,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逐渐从以往的物资经济转向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经济活动以信息传播活动为基础,经济生活自身变得文化化(culturization)与美学化(Lash & Urry, 1994, pp. 66, 70, 74, 86, 94, 96, 99, 107-109)。

拉什与厄瑞对日本、德国和美英三种反思积累模式的分析是有意义的,他们从反思性角度揭示了物资生产转向符号与空间经济的过程,提示我们信息传播结构的重要性。这三种模式的划分在当时也大体准确。中国的信息与传播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有点日本模式。但拉什与厄瑞的论述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德国和美英世界。如今我们再读《符号与空间经济》时,要思考三种反思积累模式在今天的适用度。本章论述不会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时常反思学者论述所处情景,并用当下情景去检验该论述。此外,过去马克思分析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资本积累是组织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有赖于反思积累。反思积累是信息和形象符号的积累,不仅在生产领域,在消费领域中反思积累同样重要。亦即是说,生产者与消费者如何累积自身的品味、美学和符号经验等,将左右符号与空间经济的变化。“反思积累”不仅意指生产消费过程中涉及认知信息和美学符号的处理,也因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越来越是非物质的符号。正如拉什与厄瑞所言,“经济与文化日益交织,难分彼此。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Lash & Urry, 1994, p. 64)。换句话说,社会现象与传播现象彼此深陷,传播学与社会学对话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也在于此。在工业层面,经济与文化的交织体现为文化工业的兴盛,这也是下文的重点。

最后,拉什与厄瑞在其书结尾感叹地说,马克思当年本应该也预言道:

一切人造或“自然”的东西都变成符号了。

All that is built or all that is “natural” melts into image.

— Lash & Urry, 1994, p. 326

文化工业,操作符号

如前所述,在符号与空间经济中,社会结构逐渐局部松动及网络化,代以信息传播结构兴起。在拉什与厄瑞看来,信息传播结构的存在是反思个人化与现代化的基础,按我们的话语叙述即现代性被媒介传播化。媒体现代和信息传播结构最集中体现和作用在文化工业领域。

信息传播结构中,“信息”结构是认知反思的结构性条件,其个人化是“认知功利性”(cognitive-utilitarian)的,注重信息的流动和信息处理能力;“传播”结构是美学反思的结构性条件,其个人化是“美学表达”(aesthetic-expressive)的,注重美学符号的流动及其处理能力(Lash & Urry, 1994, pp. 111-112)。认知与美学符号成为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中文化工业的生产及消费对象,其特征是后福特制、后工业化、灵活弹性和知识形象密集,主要是出版、广播、电视、电影、音乐等媒体行业及其近年来的网络汇合。拉什与厄瑞论述之时新媒体尚未有现今之势,所以也不曾被二位学者论及,但其论述亦适用于或者说更适用于新媒体行业。文化工业除我们熟知的电影、电视、音乐等文化行业,现今发达国家的符号经济,更普及于奇观建筑、空间改造、设计艺术、知识生产、风格化服务和品牌创造等商业活动,并与上述各项传统的文化产品混合。在全球化压力下,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各“新核”地带,争相在符号经济方面争取国际关注,一方面对外向世界推广,另一方面亦对内创造新集体认同(马杰伟,2007)。拉什与厄瑞用英、美等国家实例论述文化工业,我们在此将替换为更符合中国情境的例子。此外两位学者详实地介绍了媒体工业经验,多宏观统计数据,这与戴扬和卡茨论述媒介事件(见本书第六章)时好用微观细腻的文本数据相映成趣。

宏观数据或微观解析各有其妙,无优劣之分,能说明问题就好。

接下来,我们用北京“798 艺术区”和“时尚传媒集团”的例子来说明中国文化工业作为符号与空间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案例均为马杰伟近年所做研究,是其对符号与空间经济在中国情境下的关照和解析。马杰伟的主要研究兴趣为文化身份、社会理论、媒体与文化变迁等。我们之前已介绍马杰伟在其早期学术研究中提出意识形态与文化争论的第三种路线,沟通多元自由主义与批判理论(见本书第三章)。近年来马杰伟倾向于视觉文化研究,并在方法上日益重视“视觉民族志”(visual ethnography)。

“798 艺术区”(Beijing 798 Art Zone)^①原为工厂厂房,从 2001 年开始众多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开始集聚于“798”地区。原有厂房采用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实用、简洁。艺术家和机构们将厂房稍作装修,转而成为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798 艺术区”初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北京都市文化新地标。2003 年,“798 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 22 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近年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及商业化,令此区的艺术活力稍为褪色,但无减其在世纪交汇之初的那种时代标志性。在艺术家眼中,今天的“798”不再具先锋性质,但在 2001 年至 2006 年大型开发前的开创期,“798 艺术区”是显示中国城市符号经济的上佳案例。“798 艺术区”发展早期同时具有文化探索、创新、实践、结连和推广的多重功能。在“798”空间内,破落的墙壁、高耸的烟囱、机械、车床、标语等既是历史遗留的符号,又与今日的破格艺术合构形成慑人景观。在“798”的美学骨架上,建立起具有社会意义的神话,这

^① “798 艺术区”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所以又称大山子艺术区。其前身最早为 1957 年 10 月开工生产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自 2000 年开始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厂房。由于艺术机构及艺术家最早进驻的区域位于整合重组七星集团单位之一的 798 厂所在地,因此这里被命名为北京“798 艺术区”。

神话不是宗教,而是泛指城市人为之着迷的符号、价值、生活与时尚。在经年累月的过程中,“798 艺术区”酝酿出活跃丰富的文化资源,以串联一波又一波的创意经济活动。厂房空间横构历史、现在与未来,被创意工作者和机构不断投以艺术价值。“798 艺术区”作为空间品牌被建构和累积,并转为商业性活动,成就符号与空间经济。其符号经济普遍逻辑及创意工业具体运作首先在于艺术先锋将“798”的建筑风格及空间特性转为符号生产的场域。“798”原是福特制的集体工业生产基地,雇佣密集劳工,建立以生产物质产品为基础的社群。而今天的“798”,将这种重型机械生产转为以符号创作为基础的液态现代生产模式。“798 艺术区”结合福特形式的工厂空间及流动的符号生产,将“工厂”之“实”,转为“符号”之“虚”,是虚实混合的符号文化与工业。其次,“798”这一“符号工厂”激发大量符号生产,这些丰富文化资源被艺术家以外的另一波文化工作者所借用。“798”孕育的不单是艺术品,它也吸引了文化精英在“798”进行种种生活方式实验,并通过出版、访谈、社交等扩散其生活方式。空间与生活、艺术与商品,互为因果,亦是符号经济一环。再次,“798”的符号生产除艺术创作、生活方式实践外,也创造了极具市场价值的品牌。消费市场中的感性商品,借用“798”作为宣传场地,希望将“798”的文化资源附加于商品之中。最后,“798”的空间及其文化资源亦被不同经营者借用为风格化的服务行业,如食肆、书店和其他时尚商品等。符号经济点滴渗透于具体的服务休闲经济之中。从符号经济衍生出来,“798 艺术区”更是一个刺激创意、多元结连的文化网路,源源不绝的符号生产与消费又辐射到城市其他社群或其他城市之中。作为国际化的艺术文化窗口,“798”对国家形象亦有文化推广上的益处。“798”之例,展示了城市空间转化为符号经济创作空间的过程。从重型器物生产工厂到生产符号的文化工厂,粗略可见符号经济在中国的酝酿。这一连串空间、

艺术、符号、记忆和生活的串联,其中有不同层面的相互跳接、转化,促成丰富活跃的文化资源,并被借用于公关、广告和时尚品牌至上,变成市场中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甚至成为散发魅力的城市象征(马杰伟,2007)。

北京这座城市的神话地标不仅有“798”艺术空间,数年前,马杰伟途经位于北京市中心商业地带的“时尚大厦”,立刻被其现代的外形深深吸引。《时尚志》(2011)在这次与“时尚大厦”的邂逅后因缘而出,该书聚焦符号生产者和消费者,折射出中国符号经济的萌动和发展。“时尚大厦”是“时尚传媒集团”^①总部所在地,集团创办人有意识地将“时尚大厦”内外空间做成“文化产品”,用其陈述本土建构的国际地标,亦可累积文化资本。“时尚传媒集团”出版十多种潮流生活杂志,包括与跨国公司合作的中国内地版《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芭莎》(*Bazaar*)、《时尚旅游》(*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华夏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时尚健康·男士》(*Men's Health*)、《男人装》(*FHM*)等。通过这些杂志及其自身的地标性建筑,“时尚传媒集团”源源不断地生产和输出有关感性、身份、品味与生活等各方面的符号,成为一座替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制造符号和身份的工厂。通过这座没有炊烟、重型机械和定点生产线的“工厂”,我们可以探究城市中国符号经济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马杰伟,2011)。

霍金斯在其新著《创意生态:思考产生好点子》(*Creative Ecologies: Where Thinking is A Proper Job*, Hawkins, 2009)中指出创意工业有重

^① 时尚传媒集团成立于1993年,原为《时尚》杂志社,与国际众多著名杂志进行了版权合作,是第一个本土化时尚类期刊出版集团。2006年9月集团迁入新址“时尚大厦”。时尚传媒集团旗下现拥有《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时尚家居》、《时尚旅游》、《时尚健康·女士》、《时尚健康·男士》、《时尚芭莎》、《时尚芭莎·男士》、《芭莎珠宝》、《华夏地理》、《时尚时间》、《好管家》、《时尚座驾》、《男人装》、《罗博报告》、《时尚新娘》及时尚网 www.trends.com.cn、时尚男士网 www.trendsmen.com、YOKA时尚网 www.yoka.com。

规范、讲效率的工业一面,更有与以前产业不同的创意一面,就是个人的思想、意念、触觉成为推动产业的核心动力。以往产业是以模式、生产线为单位,今天创意工业是以“人”为单位。“时尚人”及其个性、观念、喜好均成为“时尚传媒集团”的文化资产。“时尚”各杂志管理和主要创作人员是中国符号经济的引领者和弄潮儿,他们不甘于抄袭和大量借用外版时尚杂志内容,希望将全球符号资源本土化以适应中国市场需要。在“时尚传媒集团”案例中,全球化过程并没有将本土性格全面霸占,反而由于中国创意阶层对国人精神面貌与文化性格的发掘与追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尚文化。“时尚”杂志员工每天吸收世界各地的潮流生活信息,将它们落实于中国本土,重新制造和包装既新鲜又亲近的时尚符号,迎合多变的消费市场,他们是文化产业中的时尚工人。传统工厂工人以操控机械为主,需求严格的工作规律以及付出极大的劳力,而工作技术可以说和工人本身的生活方式没什么关系。虽然时尚工人也要生产实质的杂志,他们更要兼顾产品的文化价值,甚至是品牌效应。他们运用脑力多于体力,运用知识多于手作技能。传统工厂工人是整个生产团队的一分子,需在科学管理之下按程序办事,否则出了乱子就累及别人。而时尚工人固然也要服膺管理层的权威和遵守制度规章,但偶尔的“离经叛道”,说不定会有神来之笔,无意间为产品增值。当然,并非这两种工人有高低之分,只是在不同经济模式和产业类型下,“工人”工作状态的性质不尽相同。符号与空间经济也是消费者经济,只要消费者接纳符号、为其买单,符号产品就可以较低成本反复生产和销售。“时尚传媒集团”出版的生活潮流杂志与中国城市生活结合的过程,契合现代性在中国城市中产群体中植根和发展的过程。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由时尚杂志带动的跨境生活潮流,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催生了混杂全球与本土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在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中,“时尚文本”是社会分层的表

达。不同分众市场的读者群,透过阅读分层信息,能强化各归各位的社会层级。但在急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时尚文本”不是分层指标,更不单是分层读者各取所需的信息库,而是拉动社会变迁的浮动符号与象征。正因为发展速度快,脱序与接轨的情况不断发生,社会中殷切追求生活的城市人,或超前其所属的社会位置,或先有经济实力而文化品位追不上来,或在成熟的消费生活中反过来归于平凡,种种混杂的“时尚文本”与“生活现实”,整体上都在时代巨轮中起了拉动文化分层的作用,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创造有中国特性的时尚文化。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本地生产者的视觉鉴赏能力尚追不及强劲经济所推动的本土视觉需求。就拉什与厄瑞的美学反思层面而言,时尚视觉风格并未出现成熟的中国主题,欧美消费美学仍是主流,国人的美学反思能力仍是混杂不明。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正由生产实物的经济,走向一个符号和标志的经济(Lash & Urry, 1994),消费社会也经历了一个影像和图像的转向,“视觉性”成为消费的其中一个主要诱因(Mirzoeff, 2002; Mitchell, 1994)。“时尚传媒集团”不仅是中国符号经济的先锋,其符号操作更是结合中国本土视觉文化,对国际视觉文化的“再符号化”过程,从而为大众提供了一个似曾相识但又略不同的文化塑造形式,兼有异域更高现代的诱惑及本土乡情的亲切。“工厂”是早期现代器物生产社会的根基和标志,作为制造业经济的主要场所,它促进了本土就业和工人阶级社群的形成。到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制造业经济与符号经济并存,标志、符号、信息的生产力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例子比这个理论描述更复杂。中国正高速追赶着不同形态的现代性,因而仍处在发展阶段的现代性,这一阶段是压缩、混杂的(Chan & Ma, 2002; Lee, 2000; Yeh, 2000)。中国得益于信息科技引致的时间、空间的加速压缩,同时亦保留了生产线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态。作为世界工厂,

中国为跨国资本主义提供了看似数之不尽的劳动人口,维持了跨境资本主义的运作。耐克、索尼、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都跑到成本低廉的内地开设生产线,同时中国城市亦大步踏进符号经济:潮流杂志、创意广告、媒介工业、家居设计及文化旅游云云。这种“软工业”是对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国,原始的生产线经济与拉什、厄瑞所形容的符号与空间经济并存。这种中国式的压缩现代性有着不同的层面:空间上,工厂区和农耕小区为伍;文化上,传统风俗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融合了;社会方面,劳动阶级和愈趋富裕的中产阶级接触频繁,而两者的社会地位差距十分大。在此情境下,坐落于北京中心的时尚大厦可算是一座富有符号能量的工厂,它接驳着国际的视觉资源,将之转化成为适合国人的身份,挑动了中国城市人对全球化城市生活的想象和欲望。时尚杂志呈现了符号经济的开拓雏形,但同时以早发制人的优势,取得了支配性的权力,在中国城市占据时尚消费的强势市场。

《时尚志》与“798 艺术区”的例子在目前的中国虽然不具备普适性,但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生产与消费将越来越多涉及符号的操作。在“世界工厂”与“符号工厂”的双重面具下,目前中国更多以前者示人,但中国作为“符号工厂”的能力亦不容忽视。社会与文化的消融和内爆,使得人类社会除去政治经济分层,其文化、符号分层亦日益重要。如拉什与厄瑞所言,在符号与空间经济中既有反思赢家(the reflexivity winners),又有反思输家(the reflexivity losers),取决于嵌入符号流中累积自身符号资本,并将之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能力,促成了经济差距外新一层符号资源的贫富悬殊。今天的符号经济同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符号生产倾斜于具备消费能力的一群,让新富作昂贵的品位消费,让中层白领追逐潮流生活,更令广大的低下阶层在经济以外感受多一重的资源匮乏。而对于我们传播学者而言,亦可顺应时势变化增强自身对符号经济的反思性与批判

性,从而更好地研究媒体现代。

反思研究传播

借拉什与厄瑞的思路,传播学研究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反思和美学反思不断增强的过程。先看自我反思的增强。子曰,吾日三省吾身^①。曾子这句千古名言亦可警醒我们身为学者的自我反思。不少早期的社会学者试图在研究中保持绝对客观,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捕捉“真实”,认为学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是低度的,在这个阶段学者的自我反思性不算甚高。其后,学界开始重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也相应增强了自我反思,探讨学者作为研究主体,其个性、经历、学术训练、社会位置等主观因素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局限与贡献。再看反思社会,研究传播不能局限于传播学视角,特别是在当前媒体现代情境中兼有社会学视野至关重要。我们这本书从传播学角度去阐释社会学,鼓励传播学与社会学对话之用心即在于此。

就反思维度而言,认知反思与美学反思并重能更有效切入信息传播结构。鉴于美学反思在过去传播学研究中的缺乏,对美学反思的重视或能为传播学研究带来新意。传播学研究中美学反思维度的缺乏体现在以下多方面:(1)在学术生产和再生产体系中,论文、期刊和著作等以文字形式为主要载体,其中视觉成分比较低。这与文字更易规范化、理性化及能表达丰富思想内涵相关,有其合理性。我们提倡重视学术研究的美学维度,也依然肯定当前以文字作为主要载体的学术体系。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在学术载体中适当加强图像、音乐等多媒体符号,特别是当研究主题与符号和空间经济有关时。

^① 《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2)传播学发展之初,满足于经验描绘,强调价值中立。大量媒介效果研究简单断定媒介效果是大是小、态度是否改变等。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等批判学派兴起,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也相应出现批判分支,学者在个人研究中持有鲜明立场不再罕见。如本章第二部分所介绍,“主体对个人、社会结构性角色和资源的监控”属于认知维度,那么经验描绘或批判研究大体可归为学术研究的认知维度。而美学维度是“对自身的自我诠释及对社会实践的诠释。认知反思从根本上来说预设判断,而诠释性的美学反思超脱于判断”。那么传播学中文化研究等强调诠释的学派,当属于传播学研究的美学维度。我们认为,不光文化研究,传播学其他学派或多或少也可融入诠释成分。简单说来,就是保持思维的开放性,容许不同诠释的可能(Denzin & Lincoln, 2003)。(3)学术领域确立非朝夕之间,其改变亦难与时俱进。当初文化研究兴起源头之一即在于雷蒙·威廉斯等学者顺应英国工人阶级在第一现代的兴起,将研究主题转为工人阶级的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现在中国符号与空间经济萌芽,在全球符号流中图谋嵌入和保有自主性,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我们可适当重视和投入相关符号与空间经济的研究。(4)倘若要回应以上三个建议,必须开拓相应研究方法作配合。传统的研究方法依然适用于研究符号与空间经济及进行美学诠释,但我们也可发展特别适用于研究符号与空间经济的方法,比如近年部分学者采用的“视觉民族志”及视觉文化分析,试验“反思性即兴发挥”(reflexive improvisation)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像研究,在研究技巧和文化假设上作出视觉探索(葛海伦、欧阳怪, 2010; Ma & Tse, 2005)。

自2000年开始,马杰伟开始实验“视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并与视觉艺术家谢至德合作进行《地下狂野分子》(2001)、《酒吧工厂》(2006)及《时尚志》的视觉民族志研究。2007年夏,马杰伟与谢至德

及两个研究助理进驻“时尚大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考察，观察“时尚大厦”内恒常密集的符号操作和社会文化交流活动。马杰伟说明研究问题和初步论点，但并不要求谢至德拍摄特定事物，谢至德则可自行在研究场所（“时尚大厦”和读者家居）作个人诠释。他不用数码相机拍摄，而用大格菲林拍摄黑白照，这需要场景设计和诠释性取景。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被重新诠释，一些未经探究的范畴也被重新审视。二人特意采用黑白照，以对比时尚集团及其出版物那些光鲜的视觉元素，为的是突出时尚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并展现所摄影像的诠释性，从而诠释和反思时尚杂志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实际上，《时尚志》是以视觉民族志为主，结合多种定性研究方法的范例，除视觉民族志外，马杰伟还组织了10个焦点小组（其中四组是集团员工，六组是杂志读者），也和总编辑及读者进行了超过50个深度访问，同时参与了日常的宣传活动和聚会。并伸展到时尚大厦以外的社会网络，去勾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城市生活—视觉文化接口”。

马杰伟之师乃陈韬文。陈韬文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座教授，曾任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陈老师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其主要研究兴趣为全球化与比较传播、政治传播、新闻学研究、网络之社会影响等。自2007年开始，陈老师的兴趣也涉及用影像表现日常生活（见其摄影集《光影行》^①和《失焦·对焦》^②）及在本书所作的理论视觉化表达，亦是其对美学反思的重视。对陈老师而言，“以影像说话是一个充满奇趣、不确定的过程，是发现之旅”（陈韬文，2009）。以其多年学术功底和人生阅历，陈老师驾驭光影轻松自如，兼有理论视野在其中。陈老师亦为我们这本书作视觉的探索、展现与再诠释，将我们的媒体现代论述“视觉

① 《光影行》成集于2009年，见网址 <http://www.com.cuhk.edu.hk/monday.come/>。

② 《失焦·对焦》成集于2010年，见网址 <http://www.com.cuhk.edu.hk/inoutoffo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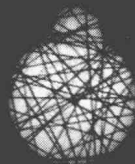
理论化”。如他所言,“这是一个有趣而富有挑战性的念头,我视之为一次有助于‘视觉化’抽象理论的实验”。陈老师的视觉图片将为我们这本书提供新的张力。类似马杰伟论述视觉民族志时所言,图像亦是意义的载体,视觉呈现能丰富书写文本,提供多视角、多声音的诠释,从而让我们的理论阐释更有深度(Ma & Tse, 2005)。

包括美学反思在内,传播学反思性的整体提升,可使自身学术研究拥有更大能量,为媒体现代提供更丰富的关照和诠释。这一趋势是当前现代性进程反思性深化在学术层面的体现。对美学反思的提示和强调是拉什与厄瑞对现代性讨论所作的贡献。

在拉什与厄瑞的书中,时隐时现的学者就是吉登斯和贝克。字里行间,拉什与厄瑞似乎力图超越吉登斯和贝克等学者的现代性讨论,创出自己的天地。但实际上,他们依然是在吉登斯、贝克等学者的框架内开疆拓土。拉什与厄瑞对吉登斯、贝克的反思性讨论做了准确批评和发展,补充了反思性的美学维度,提出了符号与空间经济概念,特别适用于文化工业与旅游业分析(拉什与厄瑞对旅游业的分析也很精彩,但因与传播学不甚相关,本章未作介绍,具体请见《符号与空间经济》第十章)。拉什与厄瑞的补遗重要而中肯,但在整体上他们未能超越甚至不及吉登斯的学术高度。就目前社会现实来说,拉什与厄瑞的论点略为夸张,而吉登斯在火候上拿捏得当,论述恰到好处。就写作而言,拉什与厄瑞亦不及吉登斯。吉登斯逻辑清晰,深入浅出,行文轻松,不愠不火。他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是文献综述的典范,分析、比较亦精准;而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原创性极强,影响深远;其《现代性与自我身份》从宏观达至微观,从社会关照个人生活,切换自如。拉什与厄瑞虽有精彩观点,但行文逻辑不如吉登斯清楚、严密。二人知识渊博,引用了很多欧洲学者的文献,但在某种程度上似乎略有堆砌文献之嫌。贝克也不以逻辑清晰或行文优美见长,但他有深刻

的洞察力和充沛的理论活力,而这又是拉什与厄瑞二人所不及的。分析审视学者论述及批评,比较不同学者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可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大家不用迷失或沮丧于《符号与空间经济》中炫目的文献综述和哲学阐释,大可跳脱出来,掌握拉什与厄瑞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美学反思、符号与空间经济三大精髓。

行文至此,我们的论述也渐近尾声。本书从传播学角度切入,综述和发展现代性理论。第一章至第三章讨论第一现代,第三章至第八章论述第二现代,第九章发展“媒体现代”理论。第一章总括现代社会兴起,介绍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现代性讨论;第二章贯通社会学与传播学视野,涉及吉登斯和汤普森相关学说;第三章勾连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重点介绍汤普森的学术贡献。有关第二现代论述,从第四章贝克宏观讨论个人化社会结构开始;第五章鲍曼亦总体写意第二现代的轻灵流动;第六章介绍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理论;第七章拉什与厄瑞从美学反思出发论述符号与空间经济。两章均是就第二现代的某一侧面施以浓墨重彩。第八章论及第二现代作为网路社会的存在及深远意义。此外,我们在第九章提出“媒体现代”理论,补充吉登斯对传播文化维度的忽略,修正和发展汤普森所论现代文化的媒介化,进一步提示媒体传播维度在现代性中的重要性。



网路社会cosmopolitanism传播权力network society意义建构networking power网路规范权communication power强大媒介效果论
multiculturalism数字时代mass self-communication大众自传播branded consumerism文化全球化pro-sumption消费主义
digitalization网路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多元文化主义Manuel Castells 世界主义

网路社会cosmopolitanism传播权力network society意义建构networking power网路规范权communication power强大媒介效果论
multiculturalism数字时代mass self-communication大众自传播branded consumerism文化全球化pro-sumption消费主义
digitalization网路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多元文化主义Manuel Castells 世界主义



网路社会cosmopolitanism传播权力network society意义建构networking power网路规范权communication power强大媒介效果论
multiculturalism数字时代mass self-communication大众自传播branded consumerism文化全球化pro-sumption消费主义
digitalization网路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多元文化主义Manuel Castells 世界主义

第八章

网路社会与传播权力

2010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45周年。10月29日,学院举行晚宴,以庆“薪火延传,情怀深厚”。参加者皆是学院历届校友、在读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及其他嘉宾。席间少见觥筹交错,但见众人热络致意,恢复旧情谊,结交新相识。借由中大新传学院这一平台,在座者无论认识与否,都直接或间接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友会”的社会网路(如图8.1所示)。



图 8.1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45 周年晚宴

其实,现代社会是由各种网路构成的全球网路社会,包括经济网路、政治网路、科技网路、教育网路、传播网路、人际网路等。“网路社会”是学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①提出的概念,其论述网路社会理论的著述主要是《网路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stells, 1996)和《传播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 Castells, 2009)。卡斯特是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与新闻学院教授,他是传播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在传播学领域,他主要围绕信息传播科技,从事信息时代和网路社会的研究。《传播权力》为卡斯特2009年所著,相比他1996—1998年出版的《信息时代》三部曲^②来说,此书逻辑更清晰,语言更精炼。之前我们曾赞鲍曼文风,但鲍曼之风美则美矣,习之不易。而卡斯特文风宛若邻家,甚至比吉登斯行文更无华。卡斯特以《传播权力》一书,揭示在信息传播科技基础上,网路社会的建构和崛起,分析权力在网路社会的本质,并提示传播网路对权力建构和施行的核心意义。

网路社会,新权力关系

若要探讨网路社会中的权力,我们需从网路定义谈起。拉什与厄瑞在讨论流动社会学时曾论及何为“网路”。网路中散布着无数节点(simplices),节点相连成为桥梁(bridges/links),桥梁交织成网,物资、信息和形象等在网中流动是为“交通”(traffic)(Gould, 1991, pp. 25-

① 卡斯特为西班牙裔,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阿尔瓦塞特省,其西班牙名为 Manuel Castells Oliván。作为社会学家,卡斯特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社会与传播,他是被引用最多的社会科学家之一。

② 卡斯特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三部曲分别为《网路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 1997)和《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 1998)。

26; Lash & Urry, 1994, p. 24)。在卡斯特看来,网路由无数节点(nodes)^①勾连而成,其中重要的节点成为中心(centers)。节点之间的流通循环是为流。节点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其处理信息、物资的效力。每个网路有其特定程序(program),程序设定了网路的目标及规则等。网路之间存有合作或竞争关系(Castells, 2009, pp. 19-20)。基于网路概念,卡斯特进行了权力关系的讨论,下文将就此进行说明。

网路社会的四种权力

卡斯特将权力因素放在全球化和网路社会崛起的社会情境下考量(Castells, 2009, p. 16)。在第一现代,民族国家领衔现代化进程。鲍曼曾说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中尚算成功的共同体形态(Bauman, 2000)。在勾勒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时,汤普森将民族国家视作维度之一(见第二章图 2.3)。吉登斯虽未将民族国家直接纳入其现代性制度维度图谱(见第二章图 2.1),但他对现代性四个制度性维度的论述却时时联至民族国家。而且,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维度图中(见第二章图 2.2),民族国家体系是重要维度之一(see Giddens, 1990, Thompson, 1995)。纵观历史,支配关系尤为通过国家及其不同形态体现(Castells, 2009; Mulgan, 2007; Poulantzas, 1978)。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有疆域限定,“社会”的外延在第一现代由民族、国家和地域所圈定,由此预设权力关系存在于国家之内及国与国之间的互动。但全球化改变了权力施行的地域概念,权力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既是当地性的又是全球化的。单个国家的重要性下降,由国家构成的网路重要性上升。如欧盟、世界银行集团、世界卫生组织等重要网路均是跨越国界的。“社会”作为全国性地域概念开始变得碎片化,网路的

^① nodes 和 simplices 都可用来形容“节点”,但在城市研究文献中,nodes 较 simplices 更普及。

动态发展不断重塑“社会”的形态,尽管网路自身也承自历史性社会结构。第一现代的社会边界较鲜明,但第二现代的网路没有固定边界。在多层结构的全球化中,国家降为网路中的节点之一,当然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建构于网路之上的社会从此渐失稳定的组织形态,这样的社会是新的社会形态——网路社会。网路社会由多层互动空间中的全球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网路形构,网路没有固定边界,或者说边界高度不稳定。从历史角度看,网路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并非为 21 世纪所独有,但唯有第二现代可称为“网路社会”。因为在第一现代,由等级式组织纵向支配社会,而非横向网路形态。这种纵向组织自上而下,有明确、稳定和数量有限的权力中心,在组织社会运作上比横向网路更有效。但信息传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的迅猛发展,释放了网路的巨大能量,在第二现代网路成为组织社会运作的更有效形式,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借由信息传播科技,社会个人或组织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互动。在网路社会,社会结构基于各种网路而建,这些网路由数字式的微电子信息传播科技所驱动。于是照卡斯特的理解,社会结构是为人类生产、消费、再生产和体验关系的组织安排,及权力通过文化编码的意义传播符码而表达的(Castells, 2009, pp. 17-24)。

在第七章,我们曾分析拉什与厄瑞对社会结构和信息传播结构的论述。拉什与厄瑞指出,第二现代社会同时存有传统意义的“社会结构”和新兴的“信息传播结构”,后者逐渐局部替代前者,但前者势力仍存(Lash & Urry, 1994, p. 6)。如果我们将信息传播结构看成一种文化结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拉什与厄瑞的论述中,社会结构逐渐为文化结构局部取代(the social structure is increasingly displaced by a cultural structure)。但是,在卡斯特的讨论中并没有两种“结构”的并

存,只是这个社会结构本身被“网路化”了,网路本身建构于文化编码的传播过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卡斯特的论述中,社会结构本身被“网路化”和“文化化”了(the social structure is itself increasingly networked and culturalized)。无论过程有何不同,拉什与厄瑞或卡斯特的论述都指出社会与文化的交融,社会日益“文化化”。从工业层面来说即是符号经济,就社会形态而言即是网路社会形成及传播权力日盛。

以网路社会为情境,卡斯特重新定义了权力,分类介绍网路社会中的四种权力形式:网路准入权(networking power)、网路规范权(network power)、网路内控权(networked power)、网路建构权(network-making power),每种权力形式对应着施行权力的特定过程(Castells, 2009, p. 42)。

网路准入权。这种权力指对网路的“把关”(gatekeeping),即是否让某个节点或信息进入网路,控制网路进出的节点即把关人(gatekeeper)。节点或信息对于网路的价值在于它对提高网路效能、实践网路目标的贡献,网路会据此纳入新的有用节点/信息,同时删去低效或无用的节点/信息。倘若某个节点或其相关信息被网路排斥,意味着该节点(个人、群体或组织)在网路社会的结构性边缘化。纳入/排斥(inclusion/exclusion)或者说传播与失却传播(communication/outcommunication)成为网路准入权执行的方式,网路准入权是网路内节点对网路外节点所施行的权力(Castells, 2009, pp. 20, 25-26, 42, 418; Mulgan, 1991, p. 21)。倘若某节点相关信息被传播网路排斥,就会出现该节点在传播媒介中的不可见(invisibility)或低可见度。如中国电视剧大多描绘都市生活,较少与农民、农村相关的电视剧,这与57.01%的中国人(74 471 万人)居住在乡村的情况严重不符(2005 年统计数据,见中国政府门户网站,2006 年 3 月 16 日)。我们也可用吉

登斯的词汇重述节点的被纳入与排斥,节点被纳入网路是一种嵌入和再嵌入(embedding/reembedding),节点被网路删除是一种抽离(disembedding)。吉登斯泛指抽离与嵌入浮动的社会情境,而卡斯特的纳入/排斥是专门针对当今的网路社会。我们由此可认为在网路之内的人是成功者和权力拥有者,如苹果公司总裁斯蒂夫或百度总裁李彦宏等。在网路之外的人,相对而言失去了网路竞争力,拥有的权力较小,如失学者、失业者等。所以我们参加高考、留学、找工作、换工作,或我们积极加入各种网络上的社交网路,都是希望进入网路,并证明自己某个或多个网路有价值,否则我们会被这个网路社会所抛弃。我们可以香港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申请为例,来说明网路准入权。中大新传学院作为一个教育网路,其宗旨(程序)是“博文约礼”以增进知识,那么申请人需向该教育网路证明自己有研究潜力,并立志投身于教育事业。就目前情况而言,一般每年能够进入中大新传学院读博的学生在四五个左右。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申请、筛选和录取程序后,被学院录取的博士生就成为中大新传学院网路中的“新节点”。在这个网路中也有被删除的可能,如在博士候选人(Ph. D. candidate)资格考试中失败,或无望完成合格毕业论文等。从被录取成为博士生,到成为博士候选人,至最终拿到学位成为博士,有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涉及网路规范权。

网路规范权。这一权力是指网路施加于其成员的标准,或进入网路的信息需采纳该网路的标准传播形态(Castells, 2009, pp. 43, 418)。网路成员标准,就中大新传学院的网路标准而言,每个博士生最终若想拿到博士学位主要需达到以下要求:修完十门专业课程,通过两门博士候选人资格笔试,通过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口头答辩,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至少一篇论文,在匿名评审的期刊上发表至少一篇论文,及完成一篇方法扎实、有理论深度甚至有理论贡献的毕业论文,该

论文要通过三位校内评审和一位校外评审的审核。信息标准形态如信息必须数字化才能在网络世界自由流通,简言之就是网路规条。例如网路讨论区往往有发帖规范,各个专业群团均有专业指引,不同搜索引擎各有格式。

网路内控权。与网路准入权不同,网路内控权是在同一网路内,某些节点施加于其他节点的权力。在传播网路内,内控权体现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经营管理和编辑决定权等,传播网路内控之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然而,网路内控权及准入权、规范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网路建构权影响,网路建构权是决定性的网路权力(*Castells, 2009, pp. 419-420*)。

网路建构权。这种权力指建立网路并给网路编程的能力,就大众传播网路而言,网路建构权在媒介机构拥有者和控制者手中,如国家或企业家。施行网路建构权有两种基本机制。一种是构建网路及编定、修改网路程序以设定网路目标的能力。另一种是与其他网路联合及合作,以设定共同目标和分享资源,同时通过策略合作抗衡与其他竞争网路的能力。简而言之,网路建构权包括编程(*programming*)和转换(*switching*)。网路的编程者和切换者也就成为权力拥有者,这些权力拥有者往往不是单独的个人,他们自身也结构网路,编程权和切换权由他们联动施行。网路建构权是网路社会的最高权力(*Castells, 2009, pp. 45-47, 420*)。以凤凰卫视为例,凤凰卫视的网路内控权在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值班总编辑吕宁思和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王纪言等高层手中,但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不仅拥有网路内控权,更拥有网路建构权。刘长乐是凤凰卫视创始人,是他编定了凤凰卫视的“程序”——“拉近全球华人距离”,力图为全世界华人提供高质素华语电视节目。时至今日,凤凰卫视已发展成为跨国性多媒体网路,旗下有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资讯台、凤

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欧洲台及凤凰卫视美洲台,还有《凤凰周刊》与凤凰网。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是刘长乐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于1996年合作创办。2006年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花费约10亿港币从新闻集团的星空传媒购得凤凰卫视19.9%的股份,直接跃升为第二大股东。至2006年6月,凤凰卫视持股方分别为刘长乐(37.54%)^①、中国移动(19.9%)、默多克(17.64%)^②、华颖国际(8.34%)及公众控股(16.5%)(《新京报》,2006年6月9日)。也就是说凤凰卫视网路建构权的拥有者亦是由刘长乐、中国移动、默多克和华颖国际等个人和机构组成的网路。立足于凤凰卫视网路,刘长乐也在多个网路之间切换。2000年,刘长乐连同陈永棋收购香港“亚洲电视”股权成为大股东,刘出任主席。刘长乐作为传媒人同时勾连全球性(新闻集团)、区域性(凤凰卫视)和本地性(香港“亚视”)媒体网路。作为商人,刘长乐又与商界、政界、文化界乃至宗教界等各网路关系密切。除经济利益外,刘长乐也获得“传媒智者”、“中国企业领袖”、“亚太最具创造力之华商领袖”、“全球华语节目提供商领导者”等多种称号(百度百科,2010年11月19日)。身为网路编程者及切换者,刘长乐影响力不小。而刘长乐与默多克、陈永棋等人,还有中国移动、华颖国际等组织构成“行动者网路”(actor-network, Latour, 2005)联动施行网路建构权力。在这些“行动者网路”中,中国移动拥有一个遍布中国的通讯网路,默多克背后的新闻集团更是个全球性、拥有复杂结构的传播网路。这个世界,确是网路社会。

在第一现代,国家权力重在政治支配(political domination),以垄断暴力军警权为基础。在网路社会,网路权力更多通过意义建构而施

① 刘长乐所拥有凤凰卫视股份由“今日亚洲有限公司”持有,今日亚洲有限公司93.3%的股份属于刘长乐。

② 默多克所拥有凤凰卫视股份由“星空传媒”持有,星空传媒全部的股份都属于默多克。

行,重在文化框构(cultural framing)(Castells, 2009, pp. 50-51),“网路社会之权力即是传播权力”(Castells, 2009, p. 53)。

数字时代与传播权力

传播在卡斯特看来是通过交换信息而分享意义。对传播权力的理解,离不开数字时代的社会情境。借由信息传播科技推动,人类进入传播新纪元。传播分为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和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三种形式,三者共存、互动及互为补充。随着分众时代的到来,电视等大众媒介发生转化,既有“广播”(broadcasting)亦有“窄播”(narrowcasting),也就是媒介市场的分化、间隔化及受众需求的多样化。而大众自传播是由信息传播科技带来的传播新形态,数字网路技术让普通网民能轻松成为“使用者兼生产者”(users-turned-producers),传者和受众由此需要重新定义。“使用者自创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通过 YouTube、优酷、土豆、开心网、人人网、新浪博客等视频分享网站、社交网站、博客或微博等,可达至全球广大民众。个人化的内容,在网络中“可大可小”,或小众流传,亦可在全球网络任人观赏,甚至引起火爆的点击与转载。正因为如此,大众自传播可被冠以“大众”一词。同时大众自传播也是“复合模式”(multimodal)的,常以网络免费资源为素材,进行数字化的自由形式转换和内容重组。传播内容由网络用户自主生产、自行发布,是否接收也由用户自主选择。这两年的新趋势则是无线上网(wireless communication)的流行,进一步使得大众自传播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这将进一步改变现代生活情态。大众自传播有潜力生产出多样、自主的传播流,在公众心中建构丰富意义。但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大众自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和控制(Castells, 2009, pp. 53-57, 66-67, 70-71)。

在《传播权力》一书中,卡斯特采用大量统计数据 and 图表,对媒介工业系统进行了系统翔实的分析,刻画了时代华纳(Time Warner)、迪斯尼(Disney)、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等西方多媒体商业网路,还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印度“宝莱坞”(Bollywood)、尼日利亚“尼莱坞”(Nollywood)等其他网路领衔的媒体群英谱。卡斯特熟稔媒介生态,并且没有止于工业描绘,而是深入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信息时代情境下文化变迁的类型学,并将之与媒介传播网路做了合理联系和诠释。

卡斯特指出信息时代的文化变迁由两对互相抗衡的力量交织而成,第一对力量是(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的对立,第二对是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communalism)的分歧。文化全球化指的是由全球广泛认可的特定价值观念的出现,文化身份认同则指那些仅有某些特定人群认可的特定价值观念之存在。文化全球化强调共同性,而文化身份认同强调差异性。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利益优先,社群主义主张社群的集体利益优先。全球化、身份认同、个人主义及社群主义四股力量相交,就形成四种文化模式:(品牌)消费主义(branded consumerism)、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网路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的交集便造成品牌消费主义的扩散,消费主义文化是当前文化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现代个人企图通过不断消费寻找快乐和安全感。学者拉什与劳瑞(Lash & Lury, 2007)认为品牌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维度,在其中人们给消费赋予意义(Banet-Weiser, 2007)。品牌消费主义文化模式对传播工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全球娱乐工业,如电影、音乐、综艺节目、肥皂剧、网络游戏等媒介娱乐产品的盛行,甚至出现新闻娱乐化(infortainment)趋势。总之,由广告支撑的全

全球娱乐工业是建构品牌消费文化的主要渠道,并且全球娱乐工业的发展并不等同于美国文化的扩散,而是销售有利可图、可源自任何地域的文化形式。全球消费文化并非唯一具全球性维度的文化模式,世界主义同样如此。世界主义是全球化与社群主义的交集,这种文化模式力图建构全球公共领域(global public sphere)、超越边界的全球公民意识(global citizenship)及环保等相应价值观念等。表达世界主义的主要传播形态是全球新闻网路(global media news networks),如 CNNC、BBC 和半岛电视台等。多元文化主义是社群主义与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文化全球化张力巨大,但文化产品在内容的生产、传递和接收上仍存有多多样性,这可由印度“宝莱坞”、尼日利亚“尼莱坞”,还有亚洲各国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工业形态得以验证。最后,身份认同与个人主义的融汇形成网路化个人主义。互联网并没有让现代人成为社会中的孤立个体,而是提供扩展社交的多种可能及渠道,从而有选择地建构自主的文化世界,表征自己、联系他人。网路化个人主义与大众自传播密不可分,在互联网和无线网络等数字技术基础上,建构起社交网路(如开心网、人人网)、即时聊天网路(如 QQ、MSN)、游戏网路(如魔兽世界)、虚拟生活网路(如 Second Life)等。在大众自传播中,重要的是“我”及我的“网路”(Castells, 2009, pp. 116-125)。卡斯特所论(品牌)消费主义、网路化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四种文化模式,归根结底是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与社会团结(solidarity)的抗衡。个人化与社会团结实乃现代性这一“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互为依托。个人化进程已深,自我实现、自我掌控的现代人尽享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力,回归尊崇集体威权、束缚个人主体性的传统社会已是不可能。但另一方面,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孤独。个人化给我们自由也让我们脆弱,在此情境下对社会团结的渴求与个人化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社会越是个人化,则个人越是

需要社会,这也是鲍曼在《液态现代》中的观点。那么如何在个人化与社会团结之间保有平衡,尽享个人化之益处,又得社会之扶持?于是我们再次回到涂尔干命题——高度分化与个人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社会凝聚?我们在本章介绍“现代性理论族系谱”时会综述对这一命题的讨论。

总而言之,品牌消费主义对应全球娱乐工业,世界主义对应全球新闻网路,多元文化主义对应本土文化工业,而网路化个人主义对应大众自传播,文化模式与媒介传播网路的契合能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Castells, 2009, p. 121)。卡斯特《传播权力》一书实则是媒介效果研究,并且佐证的是强大效果论。虽然他一开篇就表明,权力的施与受必经角力、博弈,但他亦强调网路中编程与切换的推手能行使强大权力,达至强大效果。戴扬和卡茨也是论证媒介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有强大效果(见本书第六章),但他们另辟蹊径,围绕仪式概念,从人类学路径出发去分析媒介事件如何在特殊历史时刻实现社会凝聚。但卡斯特的媒介效果研究在我们看来却依然属于美国传统效果研究。在《传播权力》中卡斯特以美国媒体在2003年至2008年间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为例,详尽说明了媒体报道如何框构人们的意识,其中所涉理论都是我们熟悉的媒介效果理论,如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框架建构(*framing*)和启动效应(*priming*)等(see Castells, 2009, pp. 165-192)。这与卡斯特本人身处的美国学术环境不无关系。美国的媒介效果研究属于效果研究的传统路径,以“刺激—反应论”为基础,试图解析媒介影响受众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其发展历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强大效果论时期,以“魔弹论”为代表的媒介理论认为媒介有强大效果,受众是被动接收媒体信息的客体。到效果研究的第二阶段,学者们认为媒介效果是有限的,“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等理论开始强调受众的主体性。美国媒介效果研究发展至第三阶段

又逐渐认识到媒介的强大效果。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能引导受众关注特定议题,涵化理论(cultivation)研究长期生活于电视环境如何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至于卡斯特,则是在网路社会情境下分析传播媒介的强大效果。

在本书所介绍学者中,论述媒介角色及其效果的,卡斯特并非第一人。汤普森的《媒介与现代性》(1995)及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1992),也都以论述传播媒介为主,但均是针对第一现代的广播电视媒介。卡斯特的《传播权力》则聚焦于第二现代的互联网等新媒体。汤普森对媒介的讨论属于宏观描绘,从现代“文化的泛媒介化”(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Thompson, 1995, p. 46)出发,指出媒介传播是现代性的重要制度性维度。而卡斯特既宏观探究网路社会,也潜至微观的心理认知层面,解释意义在人脑中建构的原理,分析权力作用机制。不仅社会有网路,人脑之中也有神经元网路(neural network)。人类要生存必须将神经元网路与外界网路相连,并进行意义建构,而沟通内部神经元网路与外部社会网路的就是传播过程。人类通过观察、表征和抽象来理解自身和外部世界,抽象能力有赖符号表达,也就是通过语言进行传播,传播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即在于此。卡斯特的《传播权力》分析因而是跨领域的,将神经系统科学与传播学相结合,从而更好地理解权力关系在人脑中的建构(Castells, 2009, pp. 137-165)。

我们认为,卡斯特的媒介效果论仍处在美国传统效果研究框架内,就理论创新层面来说是平淡的,他的理论亮点主要是对网路社会与传播系统的结连。而戴扬与卡茨的媒介事件论述是基于仪式观的效果论,更有原创性和理论活力,愈来愈为频发的媒介事件所验证。但相比戴扬与卡茨,卡斯特的批判性更强。戴扬与卡茨很少谈权力和抵抗,所以库尔德里等学者在发展媒介事件理论时,指出要将权力因素纳入媒介事件考量(见本书第六章)。而卡斯特认为传播衍变是社

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表达。所以卡斯特谈网路中的排斥、边缘化及反抗性权力(see Castells, 2009, pp. 42, 47-50, 57),他认为媒介效果——“权力”来自网路,来自人们的思维,大众自传播使人们有可能聚集在一起促进改变。卡斯特与汤普森同样重视传播过程中权力的不对等性。汤普森(Thompson, 1990, p. 7)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被符号形式承载、服务于权力的不对称意义系统。而卡斯特将“权力”定义为某些社会主体影响他者行为的相对能力,从而不平等地惠及权力拥有者自身。权力关系,是权力施行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权力施行基础是建构于社会机构之上的结构性支配力量。权力关系为支配关系所调控,但并不为其所决定。权力形成主要有两个机制:暴力/强制(violence/coercion)和话语/意义(discourse/meaning)。暴力与话语机制互相成就,互为补充。但在现代社会,权力不似从前那般依重暴力手段,而日趋依靠在人类头脑中建构意义而施行,其建构依赖传播过程,包括全球/地方性的大众传播网路和大众自传播,传播网路及过程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即在于此(Castells, 2009, pp. 10-12, 44, 416)。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卡斯特和汤普森都非常注重观念,因为观念重要,所以帮助形成和承载观念的传播过程就很重要,这是两位学者重视媒介传播的深层基础。同样论述观念的重要性,汤普森论述得更好,因为他进一步将观念抽象为意义,并以意义是否服务于权力厘清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在前面第三章曾谈过汤普森所下的文化的结构性定义不算出色,我们还需借鉴吉尔兹、汤普森和斯道雷等学者的文化定义。但相比较而言,卡斯特的文化定义又不如汤普森。为更好论证其观点、突出传播权力,卡斯特将文化简约为观念,“文化是告知、引导和激发人类行为的系列观念和信仰”(Castells, 2009, p. 36)。这种简约式定义预设观念改变引发行为改变,这可以使得卡斯特在佐证传播效果显著时省却很多力气,他只需要论证媒介

传播触及观念改变即可,而无需直接论证媒介传播与行为改变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卡斯特有关网路社会及传播权力的论点是合理的,论证过程也是出色的,但我们需注意到隐含其中的这种简约过程。然而,文化也可包含实践已被很多学者认可,如学者斯道雷的文化定义(Storey, 1996, p. 1),过于简约文化内涵有些不妥。相比卡斯特,汤普森的文化定义更全面,他的文化概念对应承载于符号的各种有意义的行为、物体和表达(Thompson, 1990, p. 136)。所以我们认为,同样是论证媒介传播的重要性,汤普森的功力高过卡斯特。

现代性理论族系谱

接下来,我们将梳理这本书所触及现代性理论的脉络,并把卡斯特的网路社会论述置于此宏观脉络之中。首先,我们用一到两个关键词提示本书涉及的主要现代性理论家的思想(如表 8.1 所示)。

表 8.1 现代性理论家及关键词

现代性理论家	现代性理论关键词	参考书目
1. 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分析》
2. 涂尔干	劳动分工/有机团结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分析》
3. 韦伯	工具理性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分析》
4. 吉登斯	反思性	《现代性的后果》
	本体安全感/存在状态的焦虑感	《现代性与自我身份:晚现代的自我与社会》

续表

现代性理论家	现代性理论关键词	参考书目
5. 汤普森	媒介化	《媒介与现代性:媒介的社会学理论》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大众传播时代的批判社会学理论》
6. 贝克	个人化/风险	《个人化:机构化的个人主义与其社会政治后果》
7. 鲍曼	液态	《液态现代》
8. 戴扬、卡茨	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
9. 拉什、厄瑞	符号经济	《符号与空间经济》
10. 卡斯特	网路社会	《传播权力》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三大社会学之父,对于现代社会的兴起,他们从不同路径做了论述。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博大,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他对现代社会兴起及发展历程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推动人类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文化层面,但反过来现在的观念亦可影响今后的历史发展,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思想体系。同时,马克思认为社会情境与文化阐述密切相关(see Giddens, 1971)。因而本书反复强调学者书写情境的重要性,我们在读每本著述时,宜首先思考作者所处、所论述的社会情境怎样,是第一现代,还是第二现代。再推人及己,思考在该情境下所形成理论是否适用、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涂尔干对于现代社会的论述可用两个关键词概括:劳动分工和有机团结。这两个词反映了现代性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劳动分工不断深化,遍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这是个人化的根源和基础。但个人化进程越深,人类就越渴望归属感,渴望共同体。在此情况下涂尔干首先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然趋势,继而解析在互惠劳动分工基础之上如何达至现代人的有机团结,从而实现社会凝聚(see Giddens, 1971)。个人分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

现凝聚成为涂尔干留给后人的恒久命题。论述现代社会,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涂尔干是功能主义与仪式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韦伯却是另一路径,他从工具理性出发,以诠释主义为渡,分析理性作为统御现代社会的原则如何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又如何造成“非理性的理性控制”的牢笼(see Giddens, 1971)。虽然韦伯并未给我们提示从牢笼中挣脱之法,但他所剖析的现代理性之特征始终是现代性讨论的主要命题。这三大社会学之父对于现代性的讨论是宏观层面及发轫式的,他们思想深远,启迪了后人的学术研究。吉登斯(Giddens, 1971)的现代性讨论从综述三位学者的思想开始,并集其大成,继而吉登斯(Giddens, 1990)对现代性理论做了原创性发展,为我们的现代性讨论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讨论首先是宏观、社会层面的。在他看来,现代性有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与军事力量四大制度性维度,以及反思性、时空分延与抽离三大动力。专家系统在现代社会地位重要,而反思性是现代性的统领性特征,是理解吉登斯理论的关键词之一(see Giddens, 1990)。吉登斯也不曾忽视现代人的生活层面,他从微观分析现代人的本体安全感和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现代人由此无法逃避焦虑。自我身份、生活方式和亲密关系也是吉登斯探讨的主题(see Giddens, 1990, 1991, 1992)。吉登斯的学术魅力在于,后世众多学者基本上都在他提供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之内进行探讨,沿用他的术语,继承、批评和发展他的理论。和吉登斯相比,汤普森是个中观层面的理论家,他对现代性讨论最大的贡献是补足了为吉登斯所忽视的媒介传播维度,这是传播学与社会学得以沟通的理论根源,启迪我们让传播学与社会学加强对话的愿景。在汤普森看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军事力量和媒介传播。媒介传播作为社会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场域,在对意识形态的精彩综

述和发展中,汤普森勾连了意识形态与文化两个概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自由多元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分歧。对他而言,意识形态与文化两者相通,均为意义与价值体系的分布,分野在于意识形态较倾向于权势,文化较倾向于生活。因而媒介化与意识形态是总结汤普森思想的两个关键词(see Thompson, 1990, 1995)。

从三大社会学之父到吉登斯和汤普森,他们所论述的社会形态处于第一现代,从贝克开始现代性讨论进入第二现代阶段。贝克同吉登斯一样,同时关注现代性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就宏观层面而言,贝克指出了制度使然的个人化成为现代社会的新结构,逼迫人非个人化不可。在微观层面,贝克与妻子一起分析了个人化对亲密关系、家庭、工作等个人生活的影响。个人化的另一面就是风险,当我们从各种机构的既有保护中抽离,却发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再嵌入,或无法恒久嵌入新的机构。社会责任褪去,我们不得不过自己的人生。无论是全球网路社会还是个人生活,我们每个人在风险面前都没有豁免权(see Beck, 1992;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汤普森补充了吉登斯对媒体的相对忽视;贝克则应用吉登斯反思性、时空分延与抽离机制,发展了“个人化风险社会”的原创理论。鲍曼从整体上捕捉了第二现代的轻灵流动。贝克指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很多我们熟知的概念都变成了僵尸词汇。以贝克的个人化理论为前提,鲍曼细细解析了解放、个人、时空、工作与共同体这五个词语在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有何不同。“液态”作为隐喻,贯穿这五个词汇的变化,亦概括了第二现代的时代精神(see Bauman, 2000)。戴扬与卡茨的“媒介事件”不曾直接讨论现代性,却是以媒介事件这一“仪式”回答涂尔干提出的问题,即现代人可以通过媒介事件在特殊历史时刻实现社会凝聚(see Dayan & Katz, 1992)。“媒介事件”与贝克的“个人化”是现代性中两种互相矛盾的驱动力量。媒介事件指向“和合”,而个人化制造“分离”。天

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媒介事件与个人化之间“合”与“离”的交织抗衡,犹如太极之阴阳两极,相斥相生、缺一不可。拉什与厄瑞的论述亦是某个侧面描绘现代性,他们的《符号与空间经济》有三个关键点值得注意,分别是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美学反思和符号经济。即立足于哲学思辨和工业层面,补论前人未曾论及的符号与空间经济学说(see Lash & Urry, 1994),这种论述亦较为中立客观。至卡斯特又是较为宏观的论述,其用网路社会的概念重新诠释了第二现代的社会,并指出传播网路在其中的核心地位(see Castells, 2009)。

在这一章的后一节,我们回顾了本书所分析的各个理论家的学说,下一章我们将会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媒体现代”的理论,进行修正与拓展。

第三编 媒体现代



All that's social transpires as images 媒体现代(dis) organized capitalism 被媒介化的现代性 mass self-communication
宏观传播 (trans)national power 微观传播 disembedding (跨) 国家力量 reflexivity (非) 组织化资本主义 dialogue
(去) 工业主义 communication 反思性 sociology 时空分延 reembedding 抽离(de) industrialism 传播学 对话社会学



All that's social transpires as images 媒体现代(dis) organized capitalism 疏媒介化的现代性 mass self-communication
宏观传播 (trans)national power 微观传播 disembedding (跨) 国家力量 reflexivity (非) 组织化资本主义 dialogue
(去) 工业主义 communication 反思性 sociology 时空分延 reembedding 抽离(de) industrialism 传播学 对话社会学



ple in the eye. Wear large amounts of black and white. Do everything lo wi

All that's social transpires as images 媒体现代(dis)organized capitalism 被媒介化的现代性 mass self-communication
宏观传播 (trans)national power 微观传播 disembedding (跨)国家力量 reflexivity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dialogue
(去)工业主义 communication 反思性 sociology 时空分延 reembedding 抽离(de) industrialism 传播学 对话社会学



All that's social transpires as images 媒体现代(dis)organized capitalism 媒体化了的现代性 mass self-communication
宏观传播 (trans)national power 微观传播 disembedding (跨)国家力量 reflexivity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dialogue
(去)工业主义 communication 反思性 sociology 时空分延 reembedding 抽离(de) industrialism 传播学 对话社会学

第九章

“媒体现代”理论初探

卡斯特《传播权力》的要旨为现代社会是网路社会,传播网路在其中居核心地位。在融汇本书所有涉及学者观点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是“媒体现代”,社会生活被媒介传播过程调节和改变,并且这种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媒体现代:制度性维度

在本书这个部分,我们试图发展“媒体现代”理论,阐释媒体现代四个制度性维度和三大动力,及制度性维度与动力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所论述媒体现代四大制度性维度是:宏观/微观传播(macro/micro communication)、(跨)国家力量[(trans) national power]、(非)组织化资本主义[(dis) organized capitalism]、(去)工业主义[(de) industrialism],这四个维度的提出立足于对吉登斯(Giddens, 1990)现代性制度性维度的继承和批评,及对汤普森现代性制度性维度的修正和发展(Thompson, 1995)。我们所分析媒体现代的三大动力依然是吉登斯曾论述的反思性、时空分延和抽离,我们所做发展是将这三大

动力与我们所提出的媒体现代制度性维度及私人生活层面进行勾连,从而将宏观达至微观互动。

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时,指出其有四个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与军事力量,并将之以图谱表示出来(Giddens, 1990, p. 59, 也见本书第二章图 2.1)。汤普森在发展吉登斯的现代性论述时,首先补充了为吉登斯所忽视的媒介传播维度,然后将工业主义维度并入资本主义维度中,同样提出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军事力量和媒介传播,分别对应经济、政治、强制和符号四大权力(Thompson, 1995, pp. 45-47),但汤普森仅用文字叙述了现代性四维度,所以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将汤普森所述制度性维度整理为图形(见第二章图 2.3)。在吉登斯和汤普森的两个四维度图基础上,再借用拉什与厄瑞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概念(Lash & Urry, 1994),我们认为“媒体现代”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分别是(非)组织化资本主义、(跨)国家力量、(去)工业主义、宏观/微观传播(如图 9.1 所示),其中(非)组织化资本主义、(跨)国家力量和(去)工业主义分别是图谱的三角,而宏观/微观传播为贯穿图谱的椭圆线。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权力,三者互动、互联,传播作为文化维度在其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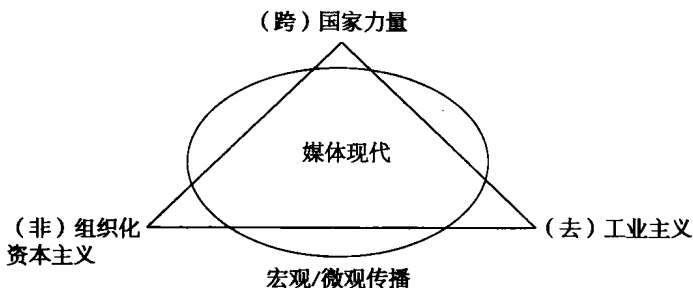


图 9.1 媒体现代的制度性维度

我们这个四维度图在很多方面发展了吉登斯和汤普森的四维度图,反映了媒体现代中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并具有吉、汤图谱中所没有的灵活性和普世性,易于进行经验研究,具体内容见以下几个方面。

1. 补充媒介传播维度,并突出其首要性

吉登斯的四维度图中没有容纳媒介传播。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一书成于1990年,以网路为核心的第二现代情境尚未如今天全面展现,其时传播媒介虽已极为重要,但毕竟不如现在这般深入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虽然在《现代性与自我身份》中,吉登斯也曾指出媒介在社会生活某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现代性不同阶段与其特定媒介密不可分,甚至分析了“媒介化体验”(the mediation of experience)(Giddens, 1991, pp. 4, 23-24)。但这种论述在他的著作里只是散落的几句,媒介传播并没有进入吉登斯的四维度图,也未曾被他系统论述。实际上媒介传播与现代性紧扣,传播学者伊尼斯(Innis)与麦克卢汉(McLuhan)纯熟论述了媒介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媒介之于现代性崛起的关系(see Giddens, 1991, p. 24)。汤普森属于较早关注传播媒介,并对其进行系统阐述的社会学家。我们认为汤普森将媒介传播纳入现代性制度性维度是其重要学术贡献,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传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与汤普森一样将媒介传播列为“媒体现代”的制度性维度之一。此外,虽然吉登斯、汤普森和我们提出的都是四维度图,但吉、汤图谱中四个维度之间是没有等级区别的,而我们的四维度图突出了宏观/微观传播这一维度(如图9.1椭圆线所示)在图谱中的穿透性地位。亦即是说,宏观/微观传播既自成体系,亦穿透其他三个维度。图中椭圆线与三角线贯通相连及椭圆形涵盖三角形之处,体现了媒介传播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调

节和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现代日益深远。当然(非)组织化资本主义、(跨)国家力量和(去)工业主义之间,也可不经传播媒介直接相互影响,这就是图谱中椭圆形未曾涵盖三角形之处。我们强调媒介传播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我们并非夸张媒介传播的作用,我们也认为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亦是传媒不曾触及的。总的来说,如汤普森(Thompson, 1995, p. 12)所言“现代文化的泛媒介化”是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或如卡斯特(Castells, 2009, p. 53)所说“网路社会之权力即是传播权力”,我们将在阐述媒体现代理论的过程中展示媒介传播维度在现代社会中日益重要的位置。

2. 去掉了军事力量/暴力维度

吉登斯和汤普森的四维度图都有军事力量/暴力维度,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是形成今日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重要推手之一,军事力量/暴力的确是第一现代的重要维度。此外,吉登斯生于 1938 年,在他于 1990 年提出四维度图之前,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和冷战时期(1947—1991)。在他的这段人生经历中,军事力量的确深远影响了世界历史。生于 1940 年的汤普森所经历史时期大体同于吉登斯,他发展吉登斯的四维度图是在 1995 年,是时冷战结束未久。所以吉登斯和汤普森将军事力量/暴力纳入四维度图,合乎昔日社会情境。但我们的四维度图去掉军事力量/暴力这个维度,将之融入(跨)国家力量的政治军事运筹或(去)工业主义的科技层面,则是应对现代社会演变所做修正。如卡斯特综述,一直以来暴力与话语机制是施行权力的两大手段,两者互相成就、互为补充。暴力依靠强制力施行政治支配,暴力手段主要为国家所垄断。话语通过建构意义而施行劝服,主要通过传播、教育和宗教等机构在人类头脑进行文化框构。进入第二现代后,权力不似从前那般依重暴力手段,而日趋仰仗在人类头脑中建构意义

而施行(see Castells, 2009, pp. 10-12, 50-51, 416)。即是说当人类进入第二现代,权力更多是通过符号而不是暴力施行。有鉴于此,若仍将军事力量/暴力单列为媒体现代的制度性维度则会稍稍与今天的后冷战时代脱节。当然,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已进入第二现代,有很多地方仍然处于战乱或武装冲突之中。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会将有关暴力的论述分别并入(跨)国家力量和(去)工业主义两个维度中考量。

3. 媒体现代四维度图具有灵活性和普适性,适用于第一现代与第二现代混杂的局面

我们的四维度图中,(跨)国家力量、(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和(去)工业主义三个维度分别有前缀:“跨”、“非”、“去”。前缀的添加是重要的,这使得我们的图谱具有灵活性,从而具备普适的解释力。吉登斯和汤普森的四维度图从本质上来说只适用于第一现代情境,即民族国家是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工业化进程推动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垄断经济话语。但问题是现代性发展到今天,情况远比吉登斯和汤普森二人的年代复杂。就世界情况而言,不同国家有的处于第一现代,有的处于第二现代,有的同时具有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的特征。即使是同一国家或地区,也许在(跨)国家力量这个维度上处于第一现代,即民族国家仍然是权力中心,但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和(去)工业主义已经进入第二现代,即以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和后工业化生产为主。为了让我们的四维度图能在经验研究中检验各种复杂情况,我们在“国家力量”、“组织化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之前添加前缀,成为(跨)国家力量、(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和(去)工业主义。这样在做实证研究时,我们只需根据某国家/地域的实际情况添加或去掉某个维度的相应前缀即可。

这样一来,我们的四维度图解释力就比较强。倘若在每个制度性维度上不加前缀,那么某个地域的四个维度要么全是第一现代,要么全是第二现代,图谱的解释力在灵活度上稍欠。

4. 民族国家在媒体现代的沉浮

吉登斯和汤普森在现代性讨论中重视民族国家的作用。在汤普森的图谱中,民族国家作为四维度之一是政治权力的施行者。吉登斯并未在现代性制度维度图谱中标示民族国家(见第二章图 2.1),但在具体论述现代性四维度时却时常指向民族国家,并且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维度图中(见第二章图 2.2),民族国家体系是重要维度之一(see Giddens, 1990, Thompson, 1995)。在他看来,“民族国家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样,对现代性发展意义重大”(Giddens, 1990, p. 174)。从贝克(Beck, 1992;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鲍曼(Bauman, 2000)等学者开始,学界很多人认为民族国家在第二现代的重要性下降,跨国网路逐渐局部取代民族国家的权力。而卡斯特对民族国家的论述比较中肯。卡斯特指出网路社会的流动性和超越边界束缚冲击民族国家对强制权的施行,从而给民族国家带来全方位危机,但民族国家并不会因此消亡,而是转换自身以适应新的社会情境。为应对危机,民族国家采取了三种主要机制。第一种机制是与其他民族国家相互联合形成国家的网路,如欧盟(The European Union)或非盟(African Union)等,这些网路有的具有多元目标并共享部分主权。第二种机制是建立国际性或跨国组织处理全球议题,如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或世贸组织(WTO)等。第三种机制是很多国家政府将部分权力释放出来,托置区域性或当地政府,同时给非政府组织(NGOs)更多参与空间。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自愿公民组织,具有非政治性和非赢利性特质。借此,民族国家希望加强与民众联系从而缓解其政治认受危机。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在网

路社会已从“主权国家”(the sovereign nation-state)演进为“网路国家”(the network state),网路国家在不同国家及多级政府间共享一定主权和责任,国家与国民间的责权关系相比从前更为动态和复杂。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转化为网路国家,虽然暂时缓解了危机,但很多国家权力上托于全球层面,下置于本地层面,从长远来看民族国家的认受危机将更为严重。但卡斯特也看重民族国家在网路社会的角色,指出民族国家是网路社会中的重要节点。在第二现代,权力也许更少通过为国家所垄断的暴力来施行,而更多通过网路权力、借由传播建构意义来施行。但问题是国家及政治体系在网路权力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所有权力网路的运作中,国家都是预设已存的网路(Castells, 2009, pp. 19, 39-41, 51, 427)。

在民族国家议题上,我们认可卡斯特的立场。一方面,在第二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的确在下降,而全球性网路、地方性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各有其权力空间。但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角色不容忽视。事实上整个现代化进程甚至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国家推动的。就具体经验层面而言,不同地域的国家权力也很不同。对已经加入欧盟的欧洲各国而言,欧盟作为“网路国家”权力确实比较大,这体现在欧元作为统一欧洲各国的货币等方面。但俄罗斯、日本、中国及美国等很多国家仍主要是由本国政府施行主权,并没有某个网路国家凌驾于本国主权之上。有鉴于此,(跨)国家力量维度就能比较中肯地反映民族国家角色在全球的复杂性,也能反映从“国家力量”到“跨国国家力量”的动态趋势。就当下而言,倘若(跨)国家力量倾向于民族国家力量的增强,在现实中就表现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但若(跨)国家力量倾向于跨国网路,那么在现实中就体现为全球化进程或世界主义的发展。同时,社会运动也是可与民族国家权力相抗衡的一种力量;反过来说,今天不少政权也借用网路新兴的动员机制来擦新其认

受基础。

此外,进入现代社会后暴力手段一直垄断于国家手中,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国家军事力量是重型机械式(heavy military power)的,以大量军力为基础。但在第二现代,重型机械式与轻型流动式军事力量并存,国家军事力量日益高科技化,大量军力之外还辅以轻型流动的军事力量(fluid/light military power)。甚至军事力量出现个人化特征,这体现为细胞式扩散的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

5.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

“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是由拉什与厄瑞(Lash & Urry, 1987, 1994)提出的概念,被我们借用来描绘现代经济这个维度。马克思认为经济生产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基础,立足于生产,他详述了资本主义在第一现代的兴起和全球扩张(见本书第一章综述)。吉登斯和汤普森图谱中的资本主义维度属于组织化资本主义,或者说是福特模式的资本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被鲍曼用“重资本主义”来形容,资本与劳动力还有土地捆绑在一起,以大型机械生产为特征。但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轻资本主义”,资本和劳动力松绑,形成后福特模式(Bauman, 2000, pp. 54-59)。顺应鲍曼讨论,我们将轻资本主义的财富增长模式命名为“盖茨模式”(Gatism)(见本书第五章),因为轻资本主义这种后福特式的财富增长模式以信息、软件、标准和专利等为产品,其财富源于对标准的垄断、美学符码的创新和不断提升的软件更新速度。现在看来,这种轻资本主义又似乎是“苹果主义”(Applism),体现为苹果公司以iPhone、iPad、iTouch还有苹果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掀起的时尚潮流。这股时尚潮将科技与时尚相结合,注重产品的美学元素及信息衍生,力图给消费者带来使用乐趣和身份象征,至于实用功能和物质载体反而是为轻为次。提炼新的名词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希望以“盖茨模式”和“苹果主义”提示轻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经济模式的

“非组织化”，同时从福特模式到盖茨模式、苹果主义，新词迭出，也反映了社会经济模式的发展之迅速。文化工业成为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支柱性产业。汤普森指出“媒介工业的兴起是符号权力的新基础”（Thompson, 1995, p. 52）。文化工业涉及社会意义的生产，具有影响人们的能力，因而是引发变革的中介（Hesmondhalgh, 2007, pp. 12, 25, 29）。学者海斯莫汗在其专著《文化工业》一书中全面描绘了全球化和新媒体情境下文化工业的发展。文化工业操作符号，以少量劳动力生产出某符号产品后，只要该产品能继续吸引消费者购买，就可持续创造财富，因而包括文化工业在内的现代经济越来越以消费者为中心。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文化产品用0和1标准化，使之能在全世界传播网路快速流动和分享，这改变了我们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让我们从共享某种文化发展到“共享”作为一种文化（the culture of sharing）（Castells, 2009, p. 126）。

撒切尔夫人有句著名断言：“不再有所谓的社会，只有作为个体存在的男人与女人。”也就是说社会团结消融，让位于个人主义、私有财产、个人责任与家庭价值（see Harvey, 2005, p. 23）。新自由主义转向体现了个人化的进程，而哈维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体现了社会团结完全缺席所造成的问题。哈维这本书将思维框架扩张至全球范畴，尝试解释本应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暂时得以消解的。亦即是说，资本市场的过度生产与深度剥削，在本国市场会累积矛盾而成危机，但因为矛盾与冲突可以全球扩展，让新兴市场吸纳过剩产品而消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发展也离不开媒体支撑。我们虽未将哈维及《新自由主义简史》纳入本书所介绍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转向契合着从第一现代至第二现代的变迁过程。新自由主义转向也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概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组织化/

重资本主义走向非组织化/轻资本主义,从福特模式演变至后福特模式的过程。在经济生产之外,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医疗、福利和就业等各方面变革或多或少也可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解释。

从组织化资本主义/重资本主义到非组织化资本主义/轻资本主义,是鲍曼、拉什与厄瑞所描绘的普遍趋势。但首先,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已进入第二现代阶段,且以后福特模式的信息生产和符号经济为主,因此简单以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概括现代社会经济并不具有全球适用的准确性。但若仍像吉登斯和汤普森那样用“资本主义”去描绘现代社会经济也不妥,这样不能动态地反映从第一现代至第二现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大变迁。同时,并非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上都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推动,比如古巴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就是由旅游业推动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较能灵活地反映现代性的经济维度,它既可以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还可以是非资本主义的。具体答案如何,有待在实践中进行经验验证。

6. 科技发展,从工业主义到去工业主义

在吉登斯图谱中,工业主义独立于资本主义,位列现代性四维度之一。但在汤普森模式中工业主义却被并入资本主义维度,丧失了独立性。首先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两个维度还是分开较好,如古巴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同样有工业主义,也有古巴模式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工业主义以科技发展为核心,给经济生产、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带来转变,并非经济逻辑可全然解释。因此,我们的四维度图首先会将工业主义单列,并将侧重于其中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在经济层面影响资本主义经济从组织化走向非组织化,从福特模式进入后福特模式,从物资生产为主转向符号与物资工业并存,从重生生产转向亦重消费。在文化层面,科技发展对传播产生巨大影响。从报

纸、广播电视到网络等新媒体的媒介发展史,亦是从印刷术、电子通讯技术到数字通信技术的科技发展史。就国家力量而言,科技发展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美国在当前世界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由其领先科技奠定。就日常生活而言,科技给现代生活带来极大便利,衣食住行处处由科技发展支撑。不少传播学者都重视科技的作用,比如现代性早期理论家勒纳将科技(大众媒介的发展)视作现代社会的三大条件之一(Lerner, 1958),卡斯特则是当代传播学者中极为重视信息传播科技的,科技发展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于阶级/阶层的认识。

从第一现代到第二现代,阶级/阶层内涵也有了变化。最早马克思认为阶级结构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并根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韦伯与涂尔干也认同人类社会是阶级社会,不过涂尔干强调次团体在个人与国家间的调节作用。韦伯承认阶级冲突,他根据是否拥有生产工具所划分的阶级也与马克思的划分大致对应。但韦伯认为比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身份状况来划分的身份群体,身份群体也是社会基础,在历史发展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see Giddens, 1971, 亦见本书第一章综述)。拉什与厄瑞也讨论阶级划分,一种是按流动性高低将人们划分为高层精英人士、中层普通白领与技术人员以及下层阶级(Lash & Urry, 1994, pp. 29-30)。有人或许会疑惑,中国民工的流动性也很强,难道民工阶层也算占据很多资源的社会高层人士?对此,拉什与厄瑞(Lash & Urry, 1994, p. 30)的理论解释是社会底层被动的“迁移”(move)不同于自主的“流动”(circulate)。正如马杰伟在《酒吧工厂》中所析,中国民工阶层的迁移是农村—城市—农村的双程旅行(2006)。这种移动不仅不能说明民工阶层是流动性高的社会高层,反而是其缺乏社会资源的体现。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民工阶层先是迁移至城市为中上层人士服务,其后在丧失价值后被城市拒绝而迁回农村。拉什与厄瑞也按反思性高

低,将社会划分为反思性日益增强的服务阶层、技术工人阶层和反思性低的社会底层(Lash & Urry, 1994, p. 57)。卡斯特则用信息传播科技经历来划分阶级,分析信息传播科技对于身份形成的意义(Castells, 1996)。根据信息处理能力,卡斯特将现代人分为自我编程劳动者(self-programmable labor)和一般劳动者(generic labor)两类。自我编程者能在生产过程中,依据工作目标,搜寻和处理复杂信息。其工作强调创意和自主性,多与知识和艺术生产相关,可替代性较低。而一般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无需涉及太多信息处理或创意过程,其工作易被机器取代(Castells, 2009, pp. 30-31)。传播学者邱林川也根据接触使用信息传播科技的能力,将现代人划分为信息富裕者(information have more)和信息稀缺者(information have less)(邱林川, 2006; Cartier, Castells & Qiu, 2005; Qiu, 2009)。总而言之,信息技术已成为其中一个阶级分野的力量。

7. 媒体现代:既包括大众传播,也包括微观层面的信息处理

论述至此,我们对(跨)国家力量、(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及(去)工业主义三个维度有了基本认识。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媒体现代的文化维度——宏观与微观传播,以及传播是如何调节媒体现代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维度的。宏观传播指的是大众传播,微观传播指大众自传播等个人信息活动,网路化个人通过各自的微观信息处理活动,不仅建构了自己的网路(Castells, 2009),同时形成了属于自身的“自文化”(self culture)(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42)。

最初,由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人类互动由面对面传播变为“媒介化的类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借此,媒介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性、世界性和社会性(Thompson, 1995, pp. 31-37, 85),现代意义的全球化过程开始发展,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发展都受此影响而连锁反应。更重要的是媒介化的类

互动改变了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当我们可以即时与不在场的他者进行互动交流,时间开始湮灭,空间被时间征服(Bauman, 2000)。宏观传播在第二现代日益势大,体现为媒介文化工业的蒸蒸日上,尤其是符号经济的兴盛。微软总裁盖茨、苹果总裁乔布斯、百度总裁李彦宏、腾讯总裁马化腾等人成为全球或中国的网络权贵。电影方面,好莱坞、宝莱坞等是金钱、文化、科技乃至政治流转的场域。电视剧工业接驳日常生活,成为现代性的反映,亦是构建现代性的力量之一。新闻行业直指意识形态,是信息传递、民意表达与真实建构……这些宏观传播层面即使有盖茨、默多克等媒介人物引领,也离不开庞大的组织机构支撑,媒介权力体现为媒介机构之间的竞争、共谋、融合与结连网路。宏观传播与大众传播机构,在第二现代将会越来越壮大,但另一方面微观传播也得以发展。

微观传播用卡斯特的话语来说就是大众自传播,即由受众发起、进行的传播,虽然没有大众传播机构的资源,但依靠网络等新媒体技术依然可将信息达至全球广大受众(Castells, 2009)。这类“微播”十居其十散失于信息的海洋,但均有被寻回的可能,更有爆发全球认知的“宏播”机缘。2006年初在中国网络上蹿红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属于大众自传播的“微宏播”例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由普通网民胡戈创作的20分钟短片,重新编排陈凯歌电影《无极》的画面和中央电视台《中国法治报道》节目的对白,搞笑而又另类,在网络上大受欢迎。

胡戈及其《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卡斯特所形容的“使用者兼生产者”及“使用者自创内容”,也是生产与消费融合为“产销合一”(prosumption)的形式。学者布伦斯(Bruns)精准地以“造用”(produsage)一词概括网络自传播中同时性生产与使用的混合状态,此时网络自传播不仅是网民也能成为传播生产者那么简单,而是永无止

境的生产与消费相构、同构的过程,典型例子是维基百科(Wikipedia),由众多网民一起建构网络词典,增益人类知识。布伦斯所言“造用”或学者本克拉(Benkler, 2006)所说的“协同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成为网路社会内容产业创新与改变的源泉(Bruns, 2008, 2010, June),但大众自传播与大众传播关系紧密(See Bruns, 2010, June; Castells, 2009),大众传播机构常将“造用”等用户自创内容商品化,以获取经济利益。如新浪微博的流行,既是每个微博用户自文化的构建,亦是新浪网作为传播机构的商业成功。无论是宏观传播还是微观传播都在深远改变现代社会,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叙述传播维度对媒体现代政治、经济和科技维度的媒介化,并将在叙述中从宏观达至微观,亦关注媒体现代的制度性改变是如何影响现代人的个人生活,如亲密关系、家庭、工作、休闲和身份认同等。无论是媒体现代的制度性维度还是现代人的个人生活,都有反思、时空分延与抽离三大动力作用其中。而我们将传播学视角去审视这个被媒介化了的现代社会。

被媒介化的现代性:反思、时空分延与抽离

1. 传播媒介对于(跨)国家力量的调节

学者安德森(Anderson, 2006)认为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多元语言的交汇形成“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国家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通俗地说就是现代国家的出现与看报纸有很大关系。汤普森本人则认为不受国家干预和控制的独立报业的出现,对于现代宪法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Thompson, 1995, p. 68)。就国家治理而言,信息传播科技的发展提升了国家监管社会的能力。以日常生活为例,电梯、公交车、地铁车厢里或是十字路口都装有视频监控设备。现代社会已是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Lyon, 1994, 2001)。在第三

章我们已经论及通过监控而控制的可见性是国家权力施行的一种重要方式,其运作有赖传播机制。互动性日强的传播技术也改变了政府运作方式,并提高其行政能力。2006年1月1日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该网站“是政府面向社会的窗口,是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渠道,对于……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门户网站,2010)。在中国政府门户网站上可以查询浏览新闻、法律法规、下载各种申报表格,或链接到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网站等。这就是现在常称的电子政务(e-governance)。

现代媒介传播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国家里的人。大众传播媒介出现前,古人一旦离家便与家人、朋友难得一见,古人为尽孝道便“父母在,不远游”^①。受益于传播媒介的发展,现代人即使离开家乡也能轻松地与家人保持联系。现代人流动性增强,我们认为现代人处于恒常的抽离/嵌入活动中(见本书第四章)。这种再嵌入往往有赖于大众传播媒介,比如我们通过共同参与媒介事件仪式来重建共同体(Dayan & Katz, 1992)。传播媒介也改变了公共/可见与私域/不可见之间的界限和性质,私人生活被推向前台(Thompson, 1995)。私人生活为公众可见与微观传播过程紧密相连。私人生活公开化、可见化,离不开电视谈话节目的推波助澜,甚至造成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侵蚀,社会沉溺于私人琐事,忽视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对公共议题的探讨(Bauman, 2000)。私域对公域的侵蚀在网络媒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无数个人博客讲述私人生活,或明星微博相互之间飞短流长。

传播不仅是我們分享生活的渠道,也是我們组织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载体。吉登斯(Giddens, 1990)对专家系统的论述捕捉到现代社会运行的日常机制。古代男耕女织,夫妻二人维持小家庭的全部运

① 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作。现代人不再事事亲力亲为,日常生活通通倚仗专家系统。洗衣服用洗衣机,所食蔬菜水果肉米大多来自超市或餐馆,交通依靠公共巴士、地铁或私家车、自行车……而洗衣机、超市、餐馆或巴士、地铁、私家车等背后都是专家系统在支撑,是我们不曾接触的陌生人在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给我们提供服务,我们信赖他们能提供给我们安全舒适的生活。而传播媒介的发展将专家系统全球化,我们能轻易接触全球各个专家系统的知识体系。当我们用 Gmail 收发邮件时,我们相信 Gmail 能为我们的邮件保密,能将我们的信息快捷准确地传达目的地。当我们用 Google Scholar 查询文献时,我们信赖这个搜索引擎能给我们提供最新、全面的信息。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ome Box Office/HBO)给我们提供娱乐,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给我们传递知识……现代人的生活不仅由本国专家系统保障,更是由全球专家系统支持。前文卡斯特所析的网路国家、国际性或跨国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都是对主权国家边界限定的稀释,而这三种形态的形成、运作和权力机制都是凭借传播网路而得以实现或维持。于是全球网路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同时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弱化。不论传播媒介是建构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还是削弱民族国家角色、深化全球化进程,其对于(跨)国家力量维度的调节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传播媒介对经济生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2. 传播媒介不仅是经济生产的重要工业,也从整体上深入调节现代经济

从汤普森(Thompson, 1995)、拉什与厄瑞(Lash & Urry, 1994)的论述,我们已知操作符号的媒介工业是现代经济的支柱。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推动了知识的传递与共享,人们面临源源而来的知识,对自身、社会及知识本身的反思性不断增强,其中既包括认知反思,也包括美学反思(Beck, 1992; Giddens, 1990, 1991; Lash & Urry, 1994)。

而大众自传播加速了知识传递速度和共享过程,维基百科或百度知道成为信息查询的重要来源。符号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符号工业在第二现代日益兴盛。

但传播对于经济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此,即使无关文化工业的其他行业也有赖于传播。卡斯特说现代社会是网路社会,而全球网路中的不同节点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限制相连即在于日益发达的传播体系。美国华尔街是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一条大街,长不超过一英里,宽仅11米,却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影响,聚集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联邦储备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对于华尔街来说,信息灵通至关重要。在1882年成立的《华尔街日报》就是为了满足商界信息需求应运而生。《香港打击炒房 房地产股受挫》、《美国第三季度GDP增幅向上修正至2.5%》(《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0年11月23日a,2010年11月23日b)这类新闻都可能影响华尔街的投资行为,而及时获取这些信息有赖于传播。前面所介绍新自由主义实践同样离不开跨国信息网路,比如国际网路连构起一个国际证券市场,其中信息灵便通达,资本才可在其中跨国界自由流动。此外,后福特模式的生产制度若无传播的发达将无可能,该模式是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资本运作,知识产权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采用以信息技术达至的微观管理模式,重视下层的组织和雇员的建议及自我管理。传播对于全球生产网路的构建和生产机构内部的信息沟通都非常重要。

第二现代,消费形态亦在演变。大众消费市场逐渐让位于“缝隙市场”(niche market),即搜寻小型且有获利潜力的细分市场,研究该市场消费者,并针对这些消费者设计和定制产品。在寻找、定位、研究和服务细分市场消费者的过程中,信息传播的作用贯穿始终。如《时尚先生》和《男人装》两本杂志,就是中国“时尚传媒集团”针对消费者

所做的市场细分。虽然都是男性杂志,但是《时尚先生》介绍成功男士及其时尚生活,而《男人装》却是性别探索杂志(马杰伟,2011)。消费者对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消费变成一个身份的建构和认同过程(see Storey, 1996),购物商场、各类媒体广告,乃至《欲望都市》、《绯闻女孩》这类时尚电视剧都成为消费者获取身份认同信息、建构自我身份的渠道。我们希望通过消费来获得快乐和本体安全感(Bauman, 2000),逃避如同幽灵一般环绕着我们的存在状态的焦虑感,于是消费成为生活方式的选择,其多元多态进而成为生活政治,具自我实践、顺从霸权和抵抗霸权三种可能,生活层面同样可具有政治意涵(Giddens, 1991, 1992)。

3. 传播媒介亦反作用于科技发展

科技发展推动传播形态演变,大众传播与大众自传播皆是如此。2003年互联网从Web 1.0到Web 2.0的跨越,使网络对我们的意义不再仅是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而是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反过来传播发展亦推动科技进步。在全球科技生产体系中,科研人员借由传播网路汇聚、生产和发布知识。相比古代和第一现代,科技知识在信息时代生产速度更快、传递范围更广、社会影响更深远。传播让我们获得更多的科技知识和形象符号,这深化了主体的反思性(Lash & Urry, 1994)。宏观、微观传播所提供的知识,加速知识共享,襄助咨询检索,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便捷了知识创造和输出。传播让我们对自身、对科学知识及对社会反思的加深,进一步推动了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不是来自对它的笃信,而是来自对其质疑。传播网路不仅成为学界知识交流的边界平台,也让普通民众亦可成为科技的生产者和发布者。

传播科技本身也成为科技时代的引领者和社会变革的推动者。“i”系列产品的推出,让苹果总裁乔布斯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

据《纽约时报》所言,“当苹果公司作为 iPod、iPhone 与 iPad 生产者,超越微软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时,美国华尔街见证了旧时代帷幕的垂落与新时代序幕的开启——当今最重要的科技产品不再是置于办公桌上的产品,而是我们的掌上科技”(Helft & Vance, 2010, May 26)。“i”系列是属于“我”的掌上传播,“i”系列是个性化、数字化和便携式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让我们与全球网路世界相连。运动时我们通过 iPod 听歌;在地铁里我们抱着 iPad 打游戏、浏览新闻;堵车间隙,我们亦可以用 iPhone 查看和回复邮件。拿着“i”系列,我们有时甚至忽略了与身边人的交流,但有了“i”系列我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不在身边的人互动。借由传播,我们抽离于当下的情景,我们再嵌入远方的社会关系。当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被媒介化时,我们个人化的程度日益深切。以“i”系列为首的传播科技,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媒介化了。学会与媒介相处,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首要素质。

4. 传播改变个人生活

1991年,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身份》中讲述了都市里陌生人的相遇以及相遇瞬间的“都市冷淡”(civil indifference)。都市冷淡一词最早为学者戈夫曼(Goffman, 1971)分析,当陌生人在都市街头等公共场合遭遇,彼此迅速打量对方以建立和表达相互信任。同时陌生人之间也避免长时间注视对方,以免给对方造成尴尬和不安全感。这样的瞬间遭遇和打量是都市人必备的日常礼仪,更是有关“现代性如何践行于日常交往”(Giddens, 1991, p. 46)。仔细剖析,“都市冷淡”中的遭遇是现代性制度性维度的宏观层面与个人生活微观层面的交汇。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前,都市并不发达,或者说都市生活并非社会生活的主流形态,于是人们的生活中少有陌生人,而是左右皆邻里。人们不需具备太多与陌生人相处的技巧,在很多时候是生人可疑可忌。资本主义生产的勃兴,许多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转变为工

人,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人口流动,不同地方的人借由现代交通工具流动,在都市里相遇,与陌生人打交道无可避免,彼此也不能再非友即敌,于是有“都市冷淡”的礼仪出现。这个例子提示我们宏观可以达至微观,现代性同时体现于制度层面与个人生活,我们在此侧重的是传播媒介这一文化维度如何改变现代人的个人生活。

我们这代人早已习惯传播无处不在,生活也建构于传播,犹如从不停电的现代都市人已经难以感受黑暗中的烛光。试想,找一天,让我们自己隔绝于媒体 24 小时,生活将会变成怎样?倘若手机算媒体,那么我们将难以与朋友约定见面,而是必须早早笃定见面的时间与地点,倘若迟到就会让对方陷入不知状况的茫然等待。离开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我们将少却很多信息、很多娱乐。断绝网络,我们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已有些网瘾,不能挂着 QQ 或 MSN,心里仿佛空落落的。不上开心网和新浪微博,我们又怎么知道远方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不能上网,我们如何上淘宝买东西,如何在线订机票或查询天气预报?甚至,我们不能学习与工作。时不时地,我们就需要 Google 或百度一下,又或是进入图书馆数据库查资料。不能收发邮件,如何与外界联系?倘若在等待教授的答复、申请的结果、学院的工作安排……隔绝媒体的这一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严重后果。没有媒体,这现代生活还怎么过?

有了媒体,生活顿时变得有趣、丰富、便利起来,生活恢复常态。媒体的众多信息让我们日益反思自身,过去人的一生变动不大,现代人则难有稳定的记忆与人生轨迹。过去人们谈中年危机,现在危机感却持续人的一生。媒体及传播改变了我们地方的概念,建构起一个又一个空间。地方,是个物质的所在,有我们的情感投入、个人体验和回忆在其中。地方,是家中墙沿画着我们身高记录的一列小横线,有睡觉时抱着的公仔,是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科学怪才谢尔顿偏执坚守的

“宝座”^①。可是倘若没有媒体,我们又如何知道远在美国属于谢尔顿的那个小小地方? 媒体传播链接地方、架构空间。空间,是物质的虚无和符号的满溢。空间往往没有具体所在的地方,我们也会形成关于空间的记忆,却少有情感的依附。空间是流动、符号化和标准化的。空间是处处同一的7-11便利店,7-11作为抽离机制,剥夺我们的回忆;空间也是表面温馨实则模式化的宜家家私,它通过商场内和媒体中的符号告知我们这是来自欧洲的现代生活;空间还是让分散各方的我们共聚的“开心网”社群,我们一次次地刷新和发布个人信息,只为了了解我们所关心的人,并表达和建构自己……倘若地方缺失,现代人会有掏空的虚无感;但若隔绝于直接/间接建构于媒体之上的空间,我们生活的便捷、丰富和多元也会消失殆尽。传统美好的那面是现代人缅怀和努力坚守的,但若真要彻底回归传统,回到那没有、少有媒体环绕的过往,现代人却无法忍受。

小 结

综上所述,就是我们“媒体现代”理论的意涵,该理论阐述现代性的四个维度:(跨)国家力量、(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去)工业主义及宏观/微观传播。四个维度互动、互联,而尤以传播维度穿透性最强,调节整个现代性进程。宏观社会进程亦会关照微观生活层面,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有反思性、时空分延和抽离三大现代性动力贯穿其中。我们尤其关注微宏播(如土豆、优酷)、大众自传播(如微博、博客)这些新势力,如何结合既有大众传播,更深远地把第一现代推向第二现代,并强化反思

^① 《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是2007年9月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美剧,其男主角谢尔顿(Sheldon)聪明、可爱、怪异,他只肯坐在家中沙发一个特定的位置,并不让别人坐他这个位子。

性、时空分延和抽离再嵌入的力度,使我们更灵活地分析现代性之中,(跨)国家力量、(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去)工业主义的互动。

从这个理论视觉去思考传播现象,我们将意识到个别案例在现代社会的多层次扣连:我们所分析的对象,是典型的大众传播?是大众自传播?还是程度不一的复合传播?我们相信今天现代社会充斥微宏播(如网闻变新闻)及宏微播(如大电影小恶搞)的复合传播模式,而此复合模式令社会活动更能因反思而流动不定;因时空分延而网络化;因抽离再嵌入而冲击社会结构。或反过来说,第二现代的社会结构就是微宏播及宏微播基础上的流动网络,此网络穿透(跨)国家力量、(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及(去)工业主义。做具体案例分析及实证研究时,我们不必面面俱谈,把各维度深入分析;但意识到第二现代的多层维度与动力,将令我们的分析更关照宏观、微观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媒体现代理论受益于众多学者对于现代性的论述,各学者及其理论相互辉映、勾连,对“现代性”或综述、或特写、或写意。在第五章里我们曾提出,何为传播学的社会责任?在众多现代性理论家启迪下,我们试图给出答案。作为传播学者,增强对自己、对社会的反思性,以扎实的理论和方法去诠释媒体现代,将对传播学有所裨益。

我们这本书,源于对一种理想的践行,即希望把社会学视野带入传播学研究中,促进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从而更灵活地理解和诠释被媒介化的现代性。希望这本书能够促使大家去读那一本本非凡的英文原著,这不是一条易走的路,这意味着无数个白天与黑夜,伏案在书桌前枯燥地阅读、梳理、分析、整合与理论创造。我们这本书所介绍的现代性著述,将给予我们更开拓的视野、更深厚的理论积淀,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传播,这样去提出问题。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媒体现代”的理论构想,为传播学与社会学筑起对话的桥梁,抛砖引玉,在此期许进一步的跨界对话与理论创新。

参 考 文 献

一、书目

1. [法]埃克苏佩里:《小王子》,张小娴译,香港皇冠出版社 2006 年版。
2. 曹雪芹:《红楼梦》,齐鲁书社 1994 年版。
3. 陈赛、刘宇:《〈越狱〉的中国隐秘流行》,取自《三联生活周刊》网页版: <http://www.lifeweek.com.cn/2006-12-21/0000417226.shtml>,2006 年 12 月 21 日。
4. 丹尼尔·戴扬、邱林川、陈韬文:《“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 年第 9 期,页 1—17。
5. 葛海伦、欧阳桢:《为影像赋予声音:传意在视觉和口述之间》,《传播与社会学刊》2010 年第 14 期,页 191—206。
6. 廉思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7. 马杰伟:《电视文化理论》,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
8. 马杰伟:《地下狂野分子:次文化图文传真》,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

公司 2001 年版。

9. 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10. 马杰伟:《探索 798 艺术区的符号经济》,《二十一世纪》2007 年第 102 期,页 103—108。
11. 马杰伟:《时尚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2. 潘绥铭:《当前中国的性存在》,《社会学研究》1993 年第 2 期,页 104—110。
13. 邱林川:《从信息中层到信息中坚》,《二十一世纪》2006 年第 97 期,页 101—110。
14. 王宁:《你被“苹果”了吗?》,《环球》2010 年第 21 期,页 54—55。
15. Althusser, L.,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 1971.
16.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17. Banet-Weiser, S., *Kids rule!: Nickelodeon and consumer citizenship*,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Barthes, R., *Mythologi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57.
19. Barthes, R., *Elements of semiolog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8.
20. Barthes, R.,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21. Bauman, Z.,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22. Bauman, Z.,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23. Bauman, Z.,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 Cambridge: Polity, 2001.
24.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25.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2002.
 26. Benkler, Y.,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7. Berlin, I., *Four essays on liberty*,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8. Bierce, A., *The devil's diction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9. Boorstin, D. J., *The image, or, what happened to the American drea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30.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1. Bruns, A.,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32. Bruns, A., *Exploring the pro-am interfac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produs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et Turning 40 conference, Hong Kong, 2010, June.
 33. Cantril, H., *The invasion from Mars.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anic*,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0.
 34. Carragee, K., Interpretative media stud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2), 1990, pp. 81-96.
 35. Carey, J.,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36. Cartier, C., Castells, M., & Qiu, J. L.,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equality, mobility, 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0 (2), 2005, pp. 9-34.
37.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6.
38. Castells, M., *The power of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7.
39. Castells, M.,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Mass. : Blackwell, 1998.
40. 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1. Chan, J. M., & Ma, E., Transculturating modernity, in J. M. Chan & B. T. McIntyre (Eds.), *In search of boundaries: Communication, nation-stat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Westport, Conn. : Ablex. 2002.
42. Cochrane, A., & Pain, K. A, globalizing society? in D. Held (Ed.), *A globalizing world? Culture, economics,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0.
43. Couldry, N.,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44. Couldry, N., Hepp, A., & Krotz, F.,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45. Curran, J., *Media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02.
46. Darwin, J., *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47. Dayan, D., Beyond media events: Disenchantment, derailment, disruption, in N. Couldry,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48. Dayan, D., & Katz, E.,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9. Denzin, N., & Lincoln, Y.,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2003.
50. Durkheim, E., *Suicide*,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51. Durkheim, E.,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52.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84.
53.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Free Press, 1995.
54. Erni, J. N., Media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A symbolic convergence, in T. Miller (Ed.),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Mass: Blackwell, 2001.
55. Featherstone, M.,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1991.
56. Fiske, J.,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Methuen, 1987.
57. Fiske, J.,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89a.
58. Fiske, J., *Reading the popular*, London: Routledge, 1989b.
59.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60. 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61. Fung, A.,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Hong Kong's media in transi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merica, 1998.

62. Fung, A., & Curtin, M., The anomalies of being Faye (Wong): Gender politics in Chinese popular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3), 2002.
63.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64. Giddens, A.,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65.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1979.
66.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7.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8. 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69. Giddens, A.,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70. Giddens, A.,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Malden, MA: Polity, 2009.
71. Goffman, E., *Relations in public*, London: Allen Lane, 1971.
72. Gould, P., Dynamic structures of geographic space, in S. Brunn & T. Leinbach (Eds.), *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1.
73.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Q. Hoare & G. N. Smith (Eds. & Trans.), London: Lawrence &

- Wishart, 1971.
74. Grossberg, L., Strategies of Marxis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R. K. Avery & D. Eason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1.
 75. Hall, S.,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 J.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76. Hall, S.,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 London: Hutchinson Press, 1980.
 77. Hall, S.,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2), 1985.
 78. Hall, S.,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1986a.
 79. Hall, S., 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1986b.
 80.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81. Ha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2. Hepp, A., *Netzwerke der medien, Medienkulturen und globalisierung*, Wiesbaden: VS, 2004.
 83. Hepp, A., & Couldry, N., Introduction: Media events in globalized media culture, in N. Couldry,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84. Hesmondhalgh, 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2007.
85. Hoggart, R.,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7.
86. Howkins, J., *Creative ecologies: Where thinking is a proper job*,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9.
87. Jenkins, H.,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88. Karim, K. H., Mapping diasporic mediascapes, in K. H. Karim (Ed.), *The media of diaspora*,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89. Katz, E., & Lazarsfeld, P. F.,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90. Kraidy, M. M.,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91. Lash, S., & Lury, C.,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The mediations of th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92. Lash, S., & Urry, J.,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1987.
93. Lash, S., & Urry, J.,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1994.
94.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5. Lee, L.,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urban Shanghai: Som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n W. H. Yeh (Ed.), *Becoming*

-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96. Lerner, 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97. Liebes, T., & Katz, E.,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New York;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98. Lyon, D.,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99. Lyon, D.,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Buckingham (England);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2001.
100. Ma, E., & Tse, D., Working and spending in South China: A methodological experiment with visual ethnograph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1), 2005.
101. Marx, K., & Engels, F., *The holy family, 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que*,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 House, 1956.
102. Marx, K., & Engels, 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67.
103. Marx, K., & Engels, F.,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0.
104. Maxwell, R., Political economy within cultural studies, in T. Miller (Ed.),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Mass.: Blackwell, 2001.
105. Miller, T.,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in T. Miller (Ed.),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Mass.: Blackwell, 2001.

106. Mills, C. W.,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7. Mirzoeff, N. (Ed.), *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2.
108. Mitchell, T.,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09. Morley, D.,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
110. Morley, D., *Television, audiences, &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111. Mulgan, G., *Good and bad power: The ideals and betrayals of government*, London: Penguin, 1998.
112. Philo, G., *Seeing is believing*, London: Routledge, 1990.
113. Pieterse, J.,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Global mélan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114. Poulantzas, N., *L'État, le pouvoir, le soci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8.
115. Qiu, J. L.,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9.
116. Rantanen, T., Giddens and the "G"-word: An interview with Anthony Giddens,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1), 2005.
117. Robertson, A., Cosmopolitanization and real time tragedy: Television news converge of the Asian tsunami, *New Global Studies*, 2(2), 2008.
118.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119. Rothenbuhler, E. W., *Media events, civil relig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e living room celebr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merica, 1985.
120. Rothenbuhler, E. W., *Ritual communication: 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8.
121. Schiller, H. I.,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A. M. Kelley, 1969.
122. Storey, J.,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1996.
123. Straubhaar, J. D., *World television: From global to local*, Los Angeles: Sage, 2007.
124. Thoits, P. A.,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 1989.
125.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126. Thompson, J. B.,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127. Thompson, J. B.,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8. Thompson, J. B., *Political scandal: Power and visibility in the media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0.
129. Tomlinson, J.,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0. Tomlinson, J.,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Continuum, 2002.
131. Turner, J. H., & Stets, J. E.,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2. Weber, M.,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133. Weber, M., *The religion of India: The sociology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134. Weber, M.,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135. Weber, M., *Ancient Juda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136.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137.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38. Williams, R.,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1.
139. Yeh, W. H. (Ed.), (2000).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二、网络

1. 百度百科:德先生 赛先生,取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25824.htm>,2009年12月27日。
2. 百度百科:铁饭碗,取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02121.htm>,2010年8月9日。

3. 百度百科:刘长乐,取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0570.htm>,2010年11月19日。
4. 百灵网:婚姻签字盖章才生效 明星形形色色的婚前协议,取自百灵网:<http://news.beelink.com.cn/20080922/2583385.shtml>,2008年9月22日。
5. 《北京日报》:各国政府高校联手“出招儿”应对大学生“就业难”,取自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1/12076933.html>,2010年7月7日。
6. 陈韬文:《光影行》,取自香港中文大学:<http://www.com.cuhk.edu.hk/monday.come/>,2009年。
7. 陈韬文:《失焦·对焦》,取自香港中文大学,<http://www.com.cuhk.edu.hk/inoutoffocus/>,2010年。
8. 《大公报》:新巴900人8月9日罢工,取自大公网:<http://www.takungpao.com/hk/top/2010-08-01/347466.html>,2010年8月1日。
9.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取自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http://www.stuln.com/bainianlvshun/xuexitiandi/2009-4-20/Article_33897.shtml,1980年8月18日。
10. 《华尔街日报》:美国第三季度GDP增幅向上修正至2.5%,取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http://cn.wsj.com/gb/20101123/BUS20101123LL003065.asp?>,2010年11月23日a。
11. 《华尔街日报》:香港打击炒房 地产股受挫,取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http://cn.wsj.com/gb/20101123/rea094208.asp?source=whatnews2>,2010年11月23日b。
12. 《华商报》:汤姆·克鲁斯婚前协议曝光 千万聘礼才娶到新娘,取自新浪网:<http://ent.sina.com.cn/s/u/2006-11-20/07081334911>。

html,2006年11月20日。

13. 金鹰网:红遍两岸三地的格格戏《还珠格格》,取自金鹰网:<http://ent.hunantv.com/e/h/20080728/26736.html>,2008年7月28日。
14. 《明报》:沈祖尧百万大道看世界杯,取自长青网:<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8854/sc>,2010年7月13日。
15. 潘绥铭学术博客:真正的性革命:性行为革命,取自潘绥铭学术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009j6.html,2007年6月30日。
16. 潘绥铭学术博客:中国人的性观念变化的轨迹,取自潘绥铭学术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0atkk.html,2008年9月14日。
17. 人民网:温家宝: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取自人民网:<http://unn.people.com.cn/GB/14748/2000335.html>,2003年8月5日。
18. 人民网:东北:到底被谁“抛弃”了?取自人民网:<http://unn.people.com.cn/GB/22220/29090/29094/2023180.html>,2003年8月18日。
19. 沈祖尧:沈祖尧校长在今早就职典礼上的讲辞,取自香港中文大学: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101216_vc_c.pdf,2010年12月16日。
20. 王德胜:浅谈学位论文的撰写,取自个人图书馆: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1225/21/52776_923902.shtml,2007年。
21. 网易:1986 打破铁饭碗,取自网易:<http://news.163.com/09/0906/18/5II15Q4I00013MSI.html>,2009年9月6日。
22. 维基百科:马克斯·韦伯,取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9%A9%AC%E5%85%8B%E6%96%AF%C2%B7%E9%9F%A6%E4%BC%AF>,2010年4月9日。

23. 《文汇报》:沈祖尧盼中大添和谐 冀欢呼抑争拗,取自《文汇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7/22/AZ1007220001.htm>,
2010年7月22日。
24. 《星岛日报》:新巴罢工人数少,九巴车务正常,取自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32/1/1/1814813/1.html>,2010年8月9日。
25. 《新京报》:中国移动成凤凰卫视第二大股东 挺进传媒业,取自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6/09/content_4667258.htm,2006年6月9日。
26. 《新世纪周刊》:韩寒体制外十年:从主动退学到不想当市长,取自搜狐网:
<http://men.sohu.com/20091222/n269119962.shtml>,2009年12月22日。
27. 查小欣博客:狄波拉的婆婆守则,取自查小欣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9b3d50100kwcc.html? tj=1,2010年7月26日。
28.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取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10/7/15/100708.pdf>,2010年7月。
29. 中国家庭研究网:潘绥铭:中国性革命已基本成功,取自中国家庭研究网:
<http://www.sass.org.cn/familystudy/articleshow.jsp? dinji=628&artid=61459&sortid=1776>,2007年11月2日。
30. 中国网:《时代》周刊评出2007年“全球十大新闻”,取自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12/11/content_9371984_2.htm,2010年12月11日。
31. 中国政府门户网站: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取自中国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gzdt/2006->

- 03/16/content_228740. htm,2006年3月16日。
32. 中国政府门户网站:关于我们,取自中国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aboutus.htm>,2010年。
 33. Amazon.com., *Book review*. Retrieved September 26, 2010, from [http://www.amazon.com/Media - Events - Live - Broadcasting - History/dp/0674559568](http://www.amazon.com/Media-Events-Live-Broadcasting-History/dp/0674559568). 2010.
 34. Bush, J.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in his address to the nation*. Retrieved December 26, 2010, from [http://www.opm.gov/guidance/09 - 11 - 01GWB.htm](http://www.opm.gov/guidance/09-11-01GWB.htm). 2001, September 11.
 35. Carter, I.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berty. In E.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08 Edition)*. Retrieved December 29, 2010,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08/entries/liberty - positive - negative/](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08/entries/liberty-positive-negative/). 2008.
 36. Cuhk.edu.hk. *CUHK vice - chancellor Prof. Joseph Sung joins in the World Cup fever at the University Mall with over 800 campus members*. Retrieved September 28, 2010, from <http://translate.itsc.cuhk.edu.hk/gb/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100712e2.htm>. 2010, July 12.
 37. Fry, S. *The iPad launch: Can Steve Jobs do it again?* Retrieved November 11, 2010, from [http://www.time.com/time/business/article/0,8599,1976935 - 4,00.html](http://www.time.com/time/business/article/0,8599,1976935-4,00.html). 2010, April 1.
 38. Helft, M., & Vance, A. *Apple passes Microsoft as No. 1 in tech*. Retrieved November 24, 2010,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0/05/27/technology/27apple.html?_r = 1&src = tp](http://www.nytimes.com/2010/05/27/technology/27apple.html?_r=1&src=tp). 2010, May 26.

39. Luo, M. *Forced from executive pay to hourly wage*. Retrieved August 17, 2010,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9/03/01/us/01survival.html?_r=1&ref=michael_luo. 2009, March 1.

后记

研究初起

张潇潇

这本书于我,最早源于一门课:社会学理论与传播学研究。

2009年9月,我修读了马杰伟老师的这门社会学理论课,这是一次愉快的上课经历,深邃的社会学理论与熟悉的传播学现象,在笑声与讨论中被连至一起。视野从此开拓,再看传播,逐渐有了许多社会学思考。

其后,我于2010年1月选修马老师的“独立研究”课程,于2010年9月再修他的“社会学理论与传播学研究”,三次跟随马老师学习的历程受益匪浅,也开始与其合作书写《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这本书于马老师是多年学术研究的厚积薄发,于我是个学习过程,是学术研究的初起。受他学术热情激发,望能将社会学情怀导入传播学研究。我们谦卑地从前辈学者那里汲取知识,力求精准地比较、综合和评述理论,快意地勾连传播与社会,大胆发展“媒体现代”理论构想。而陈韬文老师视觉表述的加入则丰富了全书内涵,让理论探讨变得丰富灵韵。同时也感谢蔡美英小姐帮我们处理书稿版式。

陈韬文老师曾对我们说,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中要磨很多把“剑”。很幸运自己有一年多的时间,能静下心来磨砺,有这样的机会跟随老师学习,认真读书、认真写书。

我们这本书旨在抛砖引玉。盼引发学人关注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勾连,令传播学研究者从社会学中有更多借鉴,对传播学研究有更多观照。在媒体现代之世,传播学对话社会学,恰是初起。